# 我與紅軍

龔楚 著



南風出版社

# 我與紅軍

龔楚著

# THE RED ARMY AND I

By

KUNG CHU

*Formerly Chief-of-Staff of the Chinese Central Red Army.*

南風出版社

*South Wind Publishing Co.*




# 我與紅軍


定價 [redacted]

民國四十三／西曆一九五四 年一月初版

出版者：南風出版社
香港九龍彌敦道
樂宮大廈三〇五室

承印者：大華印務局

First published in January, 1954 by
SOUTH WIND PUBLISHING CO.,
Nathan Ro d, Kowloon,
Ho g Kong.

# 張序

「我與紅軍」一書，是龔楚先生記載共在紅軍中所親身經歷的史實的回憶錄。從龔楚先生的經歷中，可以看到中國近代史中許多寶貴的資料。

龔楚先生是參加中國共產黨井崗山時期的少數人物中之一，現在，這種人物即使在中共內部也是不多了：因此由他來寫這一段歷史是最恰當的了。龔楚先生以共所著示余，余細讀之後，覺得所記各節，從龔楚先生參加農民運動到上井崗山，由井崗山到瑞金這一時期，固是龔楚先生的十一年紅軍生活，也是中共蘇維埃運動時期的主要歷程。至於龔楚先生本人，首先參加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運動，既而又參加中共，成爲紅軍主要人物，後來又脫離中共，逐漸站在反共陣營中來，他本人這一番經歷確是不平凡的。讀本書者，對中國半世紀

來的這許多演變，也將發生無限的感慨。

五四運動前後，一部份急進的學者和青年，就開始仰慕俄國革命，傾向社會主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不少青年陸續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行列。那些參加中共的青年，實質上幷非眞正的共產主義者；他們對於馬克思列寧的學說既無研究，更無所謂信仰：他們對於蘇聯和共產國際的理論和實際，也是一知半解，那批青年幾乎都是對於中國的積弱和腐敗．懷抱着痛心疾首的心情，他們心目中所憧憬的，是一個獨立自由和富强的中國。當時情形如此，而且三十年來都是如此。爲什麼如此？這是研究近代史者所應當解答的。

時代背景確是一個主要因素。中國一直被專制政權統治着，政治腐敗極了，古老的文化又是脆弱的和空虛的，外侮紛至，國亡無日，民國以後，此種情況，幷未改善，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無論在理論上和行動上，已經具有急進的特色，然而孫中山先生窮畢生之力，仍未能撼動專制統治的根本；這就使中國這一代的青年更加偏激了。

正在這個時候，俄國人來了。中國人要反對帝國主義侵畧和軍閥統治，俄國人就告訴中

國人如何去反軍閥和反帝國主義侵略。俄國人教育中國人如何組織革命政黨，如何組織工人和農民，如何組織青年和婦女，如何組織軍隊，如何進行地下工作，如何革命奪取政權。這一切的一切，大體既不違反中國革命的需要，尤適合一般急進青年的口味。

可是俄國人並不是爲完全無私的目的而來的。俄國的貨色，既不盡適合中國人的應用，也並非全是有益於人生的，其中鴉片一類的貨色，實在不少，原來俄國人是要找尋它的東方打手，要將充當帝國主義後備軍的殖民地轉而成爲它自己的後備軍的地盤。俄國人所需要的是可靠的附庸，並非獨立的中國。因此它不顧中國民族的需要，扶持完全蘇聯型的共產黨、蘇維埃型的政權，包括鬥爭，清算和專政等等特色。這才使投入蘇聯羅網的愛國青年一點一滴的覺悟過來。中國愛國人士到底祇能接受蘇聯幫助中國的一部份貨色，卻不能接受它毒害中國的另一部份貨色。這就是歷史的眞實。

本書作者，就是我所熟悉當年這類青年中的一個，我們讀了他的這本書，就可以了解和同情他這一不平凡的經歷。今日青年讀了他這本書，也可以知道今日中共政權的所作所爲並

非適合中華民族的需要，而是一面倒在蘇聯的獨裁和戰爭的魔掌中，成爲蘇聯帝國主義的爪牙。現身說法，這就是作者欲使今日青年知所警惕的本意。

張國燾

一九五三年三月廿四日于香港

# 自序

我自民國十三年參加中共，到民國二十四年脫離，共十一年。這十一年，正是中共所謂「革命的第一階段」。在這一階段中，由國共合作，參加北伐，到國共分裂，領導武裝暴動，建立紅軍，成立蘇維埃政府，實行土地改革，發動游擊戰爭；可以說，每一件事，對於以後中國局勢的重大演變，都是具有基本影響的。

我在沒有參加中共以前，深受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響；因此，投筆從戎，矢志革命。可是，當時的種種現象與我所期望者大相逕庭；於是我乃轉而參加了中共的組織。在我參加中共以後，眞是懷着滿腔的熱忱，抱着無窮的希望；從致力農民運動，到創建紅軍，領導軍事鬥爭，出生入死，艱苦備嘗。不料，一切一切的事實，又使我由懷疑而至於苦悶，由苦悶

而至於失望，由失望而卒至於出走。這一段經過，曲折變化，有血有淚，眞使我不堪回首！

按照歷史的文化的背景和當時國內的情況，中國革命的唯一目的，是要從帝國主義者與軍閥統治之下解放出來，而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富强，眞正爲人民謀福利的新國家。千千萬萬的革命志士仁人所以茹苦含辛赴湯蹈火以求者，也就是爲了這個目的的實現。然而，不幸在中國革命運動的過程中，中共的所作所爲——就共革命理論，革命策畧，及其革命手段而言——據我十一年長期身經目擊而中心所領悟者，中共不但沒有實現這一目的的希望，而且與它背道而馳。凡中共勢力所到之地，雖表面上親近民衆，組織民衆，而宣傳上更口口聲聲爲民衆解除痛苦；但實際上，只有使人民的痛苦愈陷愈深，而去革命的目的愈離愈遠。我說這句話，是完全根據理智的觀察與事實的證明，沒有絲毫感情作用的。

第一，中共的革命經典是馬克斯主義，百年以來，世界著名學者專家對於馬克斯主義的批評，可謂精微備至，無待贅言。在中國，中山先生對馬克斯學說，研討最深而評論最確；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中，在論駁其「剩餘價値」及「歷史唯物論」之後，加以總評曰：

「馬克斯只是一個社會病理學家」，這一評語，可以說最爲恰當。如果我們從中山先生這句話而進一步去推求，則馬克斯所知的病理，至多也只是「西歐社會的病理」或「工業社會的病理」；對於東方的社會演進及其實質，馬克斯實在是隔靴搔癢，不得要領的。因此，以治「西歐社會病與工業社會病」的藥來治一個經濟落後的中國農業社會病，猶如將治「肥胖病」的藥施之於「貧血症」。不僅不能將病治好，反而要使病症加重。我在共黨中，終日所耳聞目接者，都是一些馬，恩，列，史的教條；其實，每個像我一樣的黨員，心中都很明白，這不過是一種口頭上的信仰而已。他們自命爲「無產階級的政黨」，鼓吹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可是，中國四億五千萬人，究竟有多少無產階級呢？據中共當時的統計，產業工人還不到一百萬，僅佔全國人口四百五十分之一，以四百五十分之一的一百萬人的利益爲基礎，來革四億五千萬人的命，這種革命，是爲人民的革命嗎？老實說：我在共黨中與紅區中，實在沒有發現過一個眞正如馬克斯所謂的無產階級者。這些所謂「無產階級的革命領袖」們若以毛澤東爲代表，他就是一個標準的典型的小資產階級的人物；其餘大半都是軍閥或官

僚出身的人物更不必說了。如果一定要說有「無產階級」的話，則只有那些游手好閒，不事生產的流氓地痞，却可當之而無愧。所以，中共為了要名符其實的來從事革命，于是祇有利用這些流氓地痞來做革命的基礎。試問，這批流氓地痞革命成功了，還能讓善良的人民安居樂業嗎？當我在從事農民運動時，我實在是眞心想將終年辛勞而不得溫飽的貧苦農民，從地主惡覇的手裏解放出來；可是，後來在蘇維埃運動中，舊的地主惡覇打倒了，而新的農村統治權便轉而落到一般流氓地痞的手裡，貧苦的農民更貧苦，而且一批批的往軍隊裡送去，齒大多數都成了寃魂白骨，我自問良心，這種「無產階級革命」，除了將百份之九十以上的有產者都變無產者，而將極少數的無產者與流氓地痞扶植成為統治階級外，還有什麼別的意義呢？難道這就叫做馬克斯主義嗎？馬克斯主義果然害了中國，中國共產黨更也欺騙了馬克斯。

第二，「一面倒」這個名詞，在三年前中共竊據政權時才提出來的。當時，自由世界許多國家的當局，覺得非常驚異；其實，中共自組黨之日起，便已「一面倒」了。我在共黨

中時，他們於馬，恩，列，史，奉之如神聖，但對於中山先生却詆毀笑罵，無所不至。至於中國歷史上的許多聖賢豪傑忠臣義士，都一概被作爲「人民的罪人」；我當時心中眞是有無限的憤慨。嗣後，我發現他們事事聽命於蘇聯；曾經到過俄國受訓回來的人物，他們那種氣燄，比我在若干大都市中所見到的富商巨賈的面目，還要令人討厭。可是他們一見蘇聯顧問，便又低聲下氣了。在國共初合作時，鮑羅廷顧問，不僅是中共的老闆，而且儼然要做國民黨的太上皇。當時他在廣州的住宅，就是一切政務的中心；任何重要的事件，不經過他們允許，便無法行得通。那種「頤指氣使」的傲謾作風，眞是使人望而却步。國共合作之卒至分裂，有人說這與鮑羅廷的作風大有關係，當亦不無理由。因爲中共旣「一面倒」，當然甘心受其指使；國民黨的首腦人物，却忍受不了這種輕侮，更如何能合作下去呢？後來我在紅軍中工作，當時蘇聯軍事代表是李特，他的態度雖不壞，可是蘇區中的政治重心完全建立在他一人身上：他的一句話，幾乎就是一紙命令。我記得有一位中委曾經對我講過「沒有蘇聯，就沒有中國革命，我們不僅要永遠的向蘇聯學習，而且要永遠的跟蘇聯走」。他又說：

「斯太林是永遠沒有錯誤的」。我聽了他的話，眞不知作何感想。他們當時常說：「中國是英美日德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國民黨政府乃賣國政府，學英日德文，讀英日德書，事事聽命於英美德日，將中國人民充當英美德日的奴隸」。可是，擺在我眼前的事實，他們學的是俄文，讀的是俄國書，事事聽命於俄國顧問，精神思想，確完全被俄國所征服了。我心中暗想，共產黨如果成了功，恐怕中國也就「俄國化」了。想不到，二十年後的今日，我的話，竟不幸而言中了。

第三，中山先生領導革命，一再倡導「平等」與「博愛」，在民族主義講義中，更大聲疾呼的要提高「民族道德」，他臨死時最有價値的遺言，便是「和平奮鬥救中國」。因爲他深切的瞭解中國的國本與民情。但是，中共的革命，則恰恰與中山先生相反，他們以「仇恨」爲出發點而以鬥爭殘殺爲手段；他們這一套作法，可以說完全是效法蘇聯的。他們從中國歷史中，只能找出爲古今人所一致痛恨的流寇首腦黃巢，張獻忠，李自成這一類的人物和他們相似，因此他們也就將黃巢，張獻忠，李自成等殺人魔王捧爲革命的模範人物，可見他

們的內心，不只以「殺人」來做革命的手段，而且竟將「殺人」變成了革命的目的。我在紅區時，看見他們的殘殺政策，實在心痛已極。他們殺一個人和宰一個雞一樣的視同尋常，我曾親眼看到一個地主的全家大小受盡毒刑而卒至全被殺害的事實。我也曾常常勸他們不要如此殘殺，他們却笑我是「小資產階級意識」與「革命不澈底」。他們還訓示我：「對反革命的寬容，便是對同志的殘酷」。可是，他們只是對反革命才如此殘酷嗎？在我十一年中，我發現他們對同志和對反革命是一樣殘酷的。當某一個同志被他們懷疑或對他們稍有不順從的表現時，他們便毫無情感的立即加以刑審或一殺了之。如我本書中所記載的林野同志，他究竟犯了什麼罪呢？他的太太更犯了什麼罪呢？

第四，至於說到他們的各項政策，可以說，沒有一件是合乎國情本乎人理的。以土地改革而論，地主對於農民的剝削，當然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地主中，有的是一生勤儉起家的，有的是繼承祖業的，也有些是急公樂善而爲人們所敬仰的；雖然其中免不了一些豪紳之流，但不能一概而論。若謂地主一律可殺，顯然是違背人性。何況，中國農村，早已脫離了

中國的農奴制度。農民的痛苦，是受統治階級的欺凌壓迫與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畧，連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在內，統統是被壓迫者與被侵畧者。只要能將外國的侵畧者驅逐出去而將統治階層置之於革命者的手中，然後施行合理的土地改革政策，不需流血，便可將剝削制度根絕了。可是，中共則不然。凡是地主，縱使是一二十畝，也要將他們的田地產業充公，並將他們監禁或殺戮。他們盡量利用農民，互相鬥爭，互相仇恨，最後，農民憑血汗所得的一切生產，都落到中共的手中了；成年的壯丁，也一個個變成紅軍的士兵了。他們土改的目的，不是為了農民的利益，而是為了解決他們政府和紅軍的給養問題和兵源的問題。這一套殘酷手段和欺騙行為，如果不是身歷其境的人，眞是不易相信。我對於土地問題和農村經濟，沒有深切的研究；不過，我出身農村，深知農民的痛苦。在土改以後，當我看到農村的土地一塊塊的被分割後，農民把所有的生產一担担的繳納給紅軍時；當我看到農村的人口一天天的減少而農民的體格漸漸的瘦弱下去時，這些事實便告訴了我，大屠殺大流血的革命代價，只是換得了窮和苦。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怎能再忍心盲從下去與同胞為敵呢！

第五，中華民族立國至今，歷史所以能如此悠久，人口能如此衆多，實全賴高尙的民族文化作爲發展的動力和重心使然。其中「仁愛的精神」和「倫理的道德」，更爲民族文化的最高表現。如果將這種種精神和道德毀壞了，就等於中華民族的解體。中共的革命，不僅是推翻現狀，而且要推翻歷史。他們要將民族的文化完全摧毀而代之以「俄化」；將民族固有道德完全摧毀而代之以「黨化」。他們是以「仇」代「仁」，以「恨」代「愛」，使中國人的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師生，親屬的一切關係根本打破而代之以互相仇恨，互相監視。這種種的情形，我在蘇區時，眞是看得太多了。尤其是男女的關係，根本談不到情感。因此，使我感覺到，中共這一切的做法，只是將人類帶向一個新的野蠻時代。最使我痛心的，一般未成熟的青年男女，受了他們的麻醉和誘惑，以爲舊的一切都是封建的，應該澈底打倒；中共的一切，都是前進的，應該無條件的去加以信奉。于是，如瘋如狂的跟着他們走。以致善惡，是非，貞淫，邪正的一切觀念，完全顚倒了。能反抗父兄的才是好子弟，能反抗丈夫的才是好婦女，使每一個家庭，都成爲鬥爭的場所，而中共反謂這才是革命的模

範。試想照這樣的演變下去，中華民族將成為一個什麼樣的民族？在這樣場合中，我又怎能長此忍受下去呢！

以上五點，僅就其主義政策與作風為簡單的論述；至於其險詐欺騙的種種事實，更舉不勝舉。當時，我年齡還輕，由於在紅軍工作，終日繁忙，沒有時間去瞭解民間的眞實情況。雖然發覺了許多可恥的事實，總以為有一天可以得到改善；或者憑我的建議可以扭轉過來。所以遷延復遷延，十一年的寶貴光陰，便白白的浪費過去了。最後，當我深切的了解更經周詳的考慮後，我能向誰去建議呢？扭轉嗎？太奈想了，因此，我便決定了逃出這邪惡的天地。

現在，事隔十八年了；這一股災禍險惡的洪流，不但淹沒了中國，而且正嚴重的威脅着世界人類的生存。我回憶過去，瞻望未來，我仍然是不寒而慄！因為自由世界中，還有許多人不明瞭共產黨的眞相，以為他們不過是一群為共產主義的理想而鬥爭的革命者；更惑於他們的宣傳，以為他們眞能為人民謀福利；更以為他們眞能與資本主義的國家和平相處。因

此，我乃窮數月之力，將我親身經歷的一切事實，很忠實的報導出來。使讀我書者，至少能認清共產黨的眞面目而不再受其迷惑；更進一步，我書中關於紅軍的若干追述，對於自由世界的反共人士，也許多少可以有點帮助。

我是一個軍人，不長于寫作，許多曲折的情節，我無法一一的描述出來；加以過去並沒有保存任何資料，專憑記憶，總不免有所遺漏。這一點，我想讀者是可以多多原諒的。

我寫作此書時，得張國燾先生許多的指教，謹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謝！

龔楚

龔楚一九五三年三月廿四日於香港

# 導言

「我與紅軍」所敘述的是龔楚先生投身中共十一年的經歷，也是中共所謂「革命第一階段」最親切、最坦白的實錄。中共自民國十年創立，已有卅餘年歷史。中共官方的「史料」雖很多，但其內容經過了一番主觀的竄改，貶褒、隱諱、和誇張，已失去了純正的史料價值；外國人根據這種「史料」寫的書——如「西行漫記」、「中國震撼了世界」之類——意存偏袒，辭多溢美，更不能視為信史。近數年來，關於中共的書，確乎出版了不少，可是真能暴露中共內幕的著作至今還貧乏得可憐。無怪許多一知半解的西方觀察家認為中共僅是單純的土地改革者，而無數青年對於中共還存着迷夢似的幻想。

龔楚先生所啓示的史實，有許多是中共官方所「諱莫如深」的。例如：第三國際對中共的控制，中共內部的派系鬥爭，朱德一度向國軍投降的經過，毛澤東受過三次開除中委和八次嚴重警告的處分，中共在「整肅」時期的自相殘殺……這許多事實，祇有一個身歷其境的人纔寫得出來。可惜「這種人物」——誠如張國燾先生在本書序文中所說的——「即使在中共內部也是不多了。」

中共的發跡，其關鍵全在前後二次的國共合作。以一個少數黨的身份，自附於革命的主流，進而僭奪革命的領導地位，這本是共產黨的慣技。蘇聯的十月革命就是列寧運用這種技倆而獲得成功的一例。我們知道，中共在創立之初，黨員人數不過五十左右，到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容共時期，中共還是一個力量薄弱的小黨。那時國民黨是革命的主力，中共是附庸，可是出席一九二二年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的中共代表團已有如下的意見：

「如果我們不加入國民黨，我們仍將陷於孤立。我們所傳播的共產主義固然是偉大崇高的理想，

但民衆不會歸向我們……如果我們加入該黨（指國民黨），我們可以昭示民衆，我們也是爲了民主革命。但這僅是爲達到我們目的的一種手段……我們可以號召民衆歸向我們，而分裂國民黨的」。（註一）

這「中山狼」式的企圖，在當時固然是失敗了，但經過這次「合作」，中共已乘機滲入了北伐的軍隊和華中華南廣大的工農組織，爲後來武裝反叛，建立蘇區，打下了基礎。民國十六年「南昌暴動」時，中共已擁有三萬多軍隊，至民十九年全國紅軍約六萬人左右；民二十三年激增至三十萬人。若不靠國民黨最初的提攜，這樣奇蹟的茁長簡直是不可能的。

國共第二次合作始於民廿六年。那時中共經過國軍五次圍剿、和二萬五千里「長征」途中的追擊，最後在陝北集合，殘部尙不足三萬人。他們喘息未定，國府已調集强大的兵力，銳意殲他們整個殲滅；中共處境之險惡是不難想像的。可是民二十五年的「西安事變」促成了國共再度携手的奇蹟；從此中共非但轉危爲安，且得借抗日的機會，培養自己的實力。迨及抗戰終結，中共已擁有黨員一百二十一萬人，正規軍九十一萬（註二），民兵二百二十萬，佔有十九個「解放區」統轄九千五百五十萬人口；在實力上它已可與國民黨分庭抗禮；加以蘇聯的援助（註三），不久它就佔得軍事上的優勢，終於併吞了整個中國大陸。

在國共兩次合作的過程中，國民黨未嘗沒有「養虎遺患」的戒心（註四），但揆之當時中國的局勢，國民黨實有不得不委曲求全之苦衷。回溯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之初，日本乘機侵佔膠濟，翌年又提出二十一條要求，脅迫中國接受。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列强一意袒日，漠視中國的主權，卒至激起了「五四運動」的怒潮。一九二一年的華盛頓會議雖解決了中國一部分的問題，實際上不過爲維持「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原則。列强根本不了解中國革命的必然性，更無扶助中國，使遠東局勢因而趨於穩定的遠見。那時中國南北對立，軍閥橫行，北京政府雖爲人民所厭棄，但其實力遠勝於踞處一隅的國民黨，且爲列强所承認的中國合法政府，而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反不能獲得列强之同情及援助。只有蘇聯高瞻遠矚，單獨向國民黨伸出了友誼之手。在這種局勢之下，國民黨捨「聯俄容共」外，還有更好的途徑可走麼？

從第一次到第二次國共合作，可以說是一個「凶戾的循環」（vicious circle）。中國政府方在企圖用武力（註五）消滅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惡果——中共的叛亂——日本已在東北開始了積極的軍事侵略。在全國熱烈抗日的輿情下，國民黨「安內然後攘外」的政策，當然不合時宜，中共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口號，却極能迎合一般人的心理。「西安事變」可以說是這種憤激心理的反應。經過這戲劇性的事件，國共合作的形勢已成，國民黨雖明知有再蹈覆轍的危險，也只能勉為其難了。

政治的演變本來是主動的力量（action）與反動的力量（counter action）互相為因果的；中國近數十年來的動向，當然也不在例外。假使當年巴黎和會諸巨頭能以遠大的眼光來處理中國問題；假使同情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而予以援助者，是西方民主國家，而不是蘇聯；假使日本對中國友善而不事侵略……中國的政局一定會有絕對不同的演變。可惜現實頭腦的政治家往往以「曲突徙薪」為迂腐，一旦起了火，那就無怪他們要弄得焦頭爛額了。

* * * *

關於共產國際與中共的關係，龔楚先生在本書中有很親切的叙述。我們再從共產黨官方的文獻裏找出一些補充材料，以供讀者參考。

中共受共產國際驅策，其見於文獻者，當以應否加入國民黨的問題為嚆矢。一九二〇年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對於亞洲國家的共產黨曾有下面的指示：「……一方面可以支援眞正革命的中產階級民族主義者，一方面仍須致力於警覺及組織勞動大衆，並滲入及獲得現有的革命運動的領導地位」（註六）。可是中共並不贊成「滲入」的政策；在一九二二年「第一回對時局宣言」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中共祇主張與國民黨成立聯合陣線而已。同年八月間，中共中央委員會為這個問題召開特別會議，共產國際代表馬林（Maring，原名H. Sneevliet）建議以滲入方式，潛在國民黨內維持中共的組織。中共領袖陳獨秀等恐失去了黨的階級獨立性，竭力表示反對。最後馬林用共產國際的紀律來強制執行他的主張，陳等始帖然就範（註七）。那年十一月中共代表團（陳獨秀在內）出席莫斯科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共產國際首腦

拉薇克還把他們訓斥一番，教他們「從共產主義經典派（註八）的書房裏滾出來！」他教他們千萬記住，「現在還談不到社會主義或蘇維埃共和國的問題呢。」（註九）二個月之後，共產國際甚至於不惜公開地承認：共產主義與蘇維埃制度都不適宜施行於中國（註十）。就意識的觀點而言，這種不打自招的宣言，其嚴重性猶如一個宗教的發言人當衆承認他的宗教不能拯救人們的靈魂。於此可知，企求投靠國民黨，是那時共產國際迫不及待，志在必行的路線了。

陳獨秀等輩雖然不願意「賣身投靠」，但在共產國際壓力之下，終於一九二三年六月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通過遵循莫斯科指示的路線，並宣言承認國民黨爲中國民族革命的主力。（註一一）

共產國際這條路線雖爲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派所反對，但史大林派始終堅持到底。在史大林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的演講辭中，他還說：可以把國民黨榨乾了，然後拋棄，「像檸檬一樣」。誰知一星期之後，國民黨右翼就厲行淸黨，幾乎把京滬一帶的共產勢力一網打盡。至此，共產國際不得不痛斥國民黨右翼的行動爲「資產階級的叛變」，以掩飾自己路線的錯誤，可是一方面還存着繼續與國民黨左翼的武漢政府合作的幻想。由於克里姆林態度之模稜兩可，所以局勢雖甚緊張，中共五月中召開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註一二），「在事實上就沒有解決任何問題」（註一三）。

直至六月初史大林纔訓令共產國際代表洛艾向武漢政府提出下列的要求：（一）黜除不可靠的國民黨將領。（二）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須有澈底的人事改組。（三）除軍官所有的土地外，土地之充公不需官方批准。汪精衞看透史大林的用意是要中共奪取國民黨的領導權，所以就把國民黨內的中共跨黨份子開除黨籍，與中共決裂。史大林的路線於是全盤落了空。

爲保全自身的面子，共產國際忙改派由羅民那茲（Lominadze）領導的代表團赴華，並將領導錯誤的責任推在陳獨秀譚平山等身上。中共中央接到了莫斯科的電令，即於八月七日在共產國際代表領導之下，召開緊急會議，「澈底地糾正了陳獨秀的投降主義，並撤換了陳獨秀的領導職務」（註一四）。一九二八年中共在莫斯科開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再詳細地檢討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因爲陳不肯認錯

，所以終於一九二九年被開除黨籍。

事實上，陳獨秀所施行的正是克里姆林所指示的路線，而且施行時一直有共產國際的代表在領導，監督；所有一切的錯誤，自應由共產國際負責，不該責備陳獨秀。可是依共產黨的教條而言，馬克斯列寧主義的理論是絕對正確的，共產黨中央的領導是絕對不可能錯誤的。如果事實與理論背道而馳，那就得曲解事實來遷就理論；如果黨中央的路線碰了壁，那就是執行的人犯了某種錯誤，而不是領導者失策。像這樣的例子，在共產國家是不足爲奇的，我們限於篇幅不能縷舉了。

從上文所暴露的事實，我們可以得到五個結論：（一）中共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政黨，而是直接聽命於莫斯科的。（二）共產黨慣常利用與民族主義者合作，進而奪取革命的領導地位。（三）共產黨的諾言和它的實際行動截然不同（註一五）。（四）爲達到目的，共產黨是不擇任何手段的。（例如上述越飛的宣言）。（五）共產黨的路線發生錯誤時，照例以曲解事實及清算執行者，來掩飾領導者的失策。

我們若想從共產黨官方的史料裏尋求事實的眞相，劈頭就要被一套一套錯綜曲折的理論和離奇晦澀的名詞，攪得眼花撩亂，愈看愈糊塗。在本書的敍述中，著者依照身經的事實，秉筆直書，絲毫沒有忌諱掩飾，使我們對於中共那一時期的內幕眞相，得到一個明晰的概念。我們知道許多青年、學生、工友、和智識份子對中共懷着美麗的憧憬，就爲他們不明眞相，不知道內幕的醜惡。「我與紅軍」的出版將可袪除他們眼睛上的障翳，使他們猛然覺醒；因爲這本書的內容是活生生的經歷，是血淋淋的事實，而事實是勝於雄辯的。

黃　復

一九五三，十一，十一，於香港

註一：譯自一九二三年德國漢堡出版的德文版「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議案」（Protokoll des IV Kongresses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p.615）

註二：據達林的估計，一九四六年中共的正規軍在中國本部的約五十萬，在東北的約有四十萬，其中包括三萬東蒙軍，一萬五千日本部隊，另有朝鮮縱隊。請參閱本社出版的達林原著：「蘇聯的遠東政策」（頁273—274）

註三：蘇聯將關東軍的武裝配備給予中共，這固然是很大的援助，但比這更重要的是幹部的訓練和顧問人員的指導。請參閱「蘇聯的遠東政策」第十六章第一節「蘇聯對中共的援助」（頁274—281）

註四：例如：民十三年廣州市黨部呈請制止中共活動；監察委員張繼等聯名彈劾中共。

註五：瀋陽事變發生時，國府第三次圍剿正在進行中。

註六：參閱一九二〇年莫斯科出版的「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The Second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頁五七〇至五七九。

註七：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頁十六，及華崗「中國大革命史」，頁五六一。共產國際首腦拉戴克（Carl Radek）給「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的信也可以證實陳獨秀的敘述。

註八：原文作「孔夫子式的共產主義書房裏」，極盡諷刺刻薄之能事。

註九：參閱德文版「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議案」，頁一四〇至一四一。

註一〇：參閱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孫中山先生與蘇聯特使越飛（Adolph A. Joffe）聯名發表的共同宣言。

註一一：參閱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註一二：這次大會是由共產國際派來的洛艾（M.N.Roy）指導的。

註一三：胡喬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頁二〇。

註一四：同上，頁二五。

註一五：例如蘇聯在「孫文越飛共同宣言」中聲明不使外蒙脫離中國。

翻身的故事（一）

## 從前的毛澤東



民十七年湘南秋收暴動時期



民十四年在廣州農民講習所

## 從前的中國人民

# 翻身的故事（二）


抗戰時期在延安
（民國廿七年）


在延安時期
（民國廿五年）


在陝北保安縣
（民國廿五年）


抗戰勝利時期
（民國卅四年八月）


在中共七全會中
（民國卅四年四月）

# 翻身的故事（三）

今日的毛澤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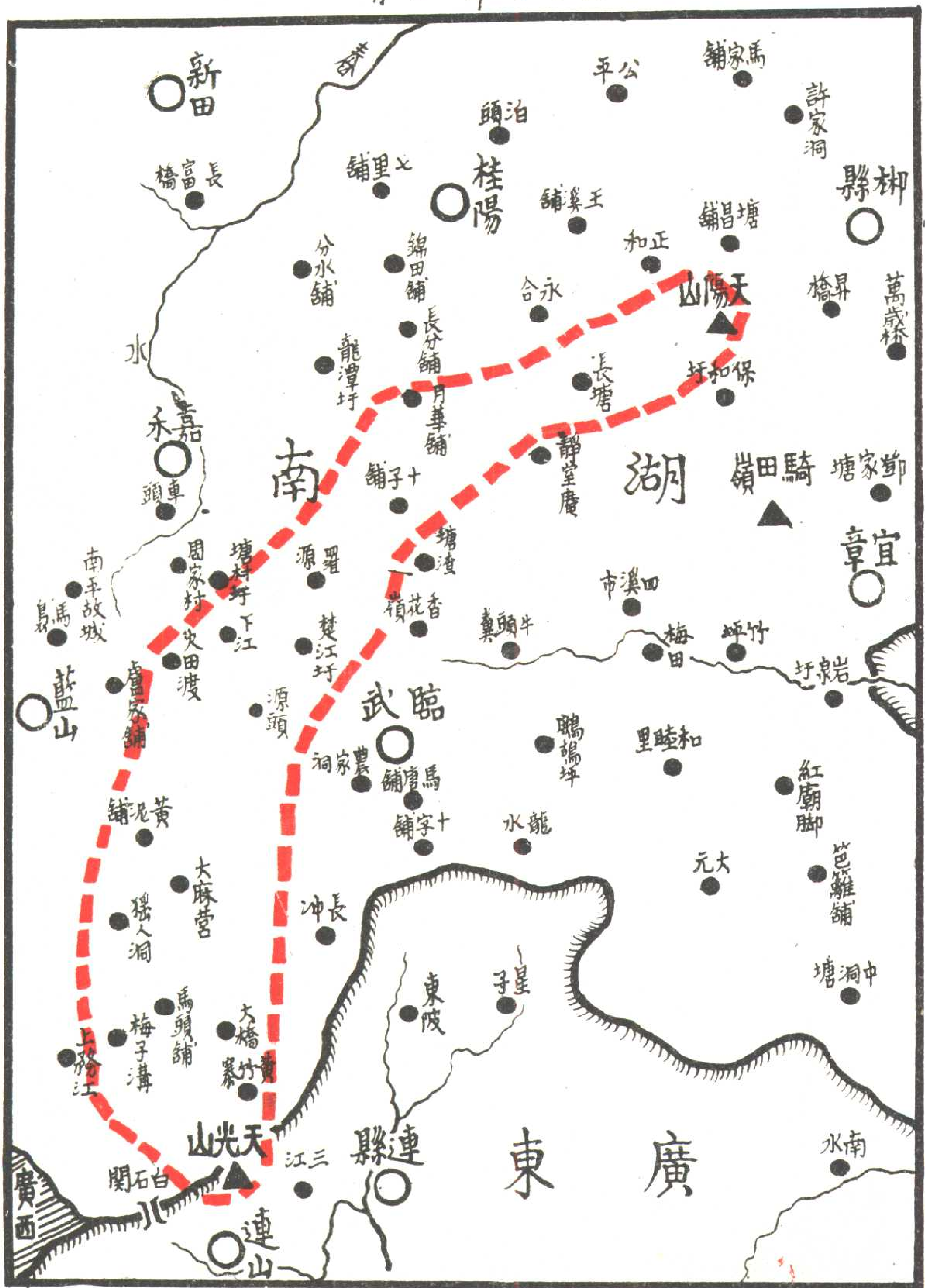


今日的中國人民



# 湘粵桂邊游擊區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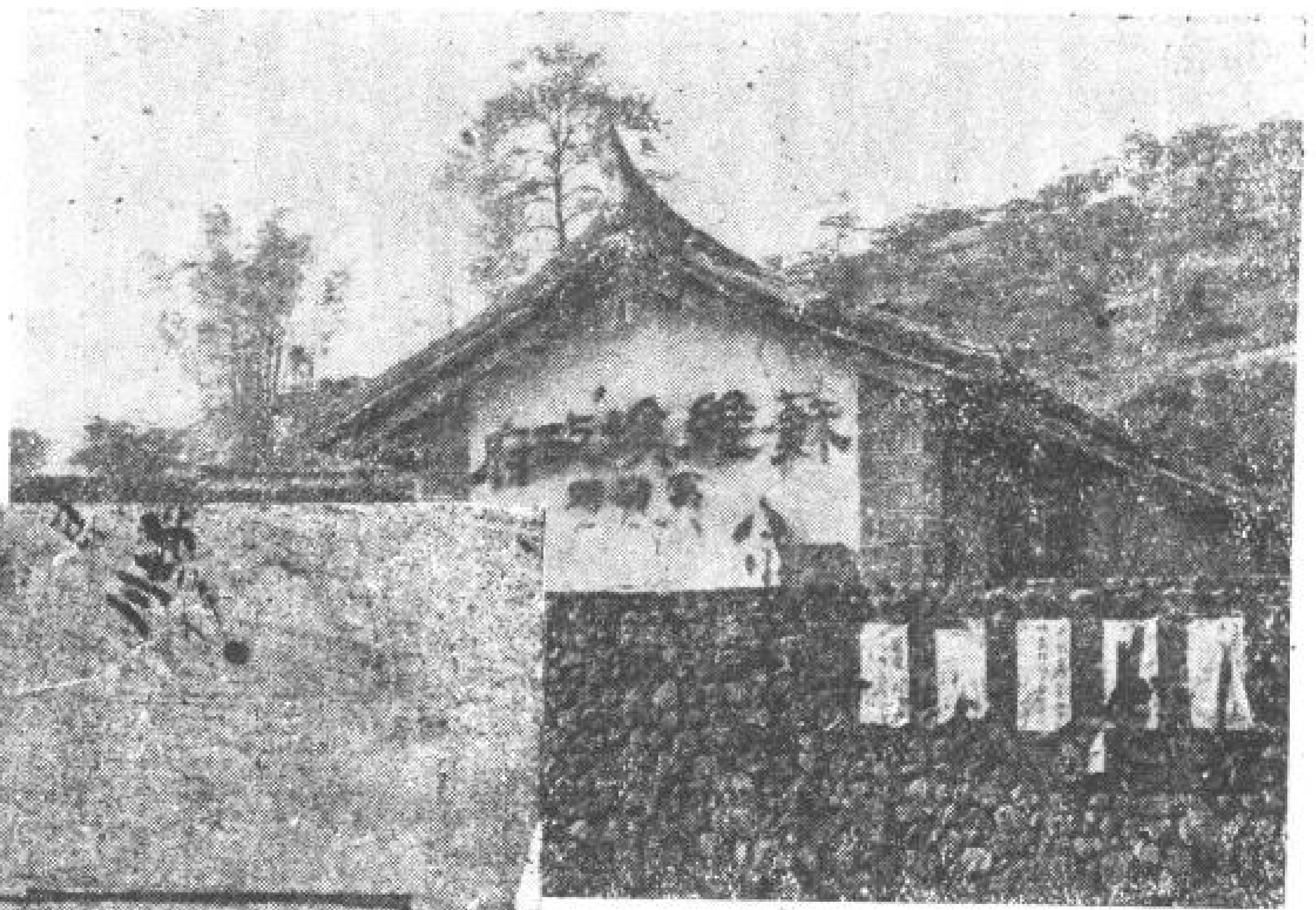
一九三五年二月



中共中央蘇維埃政府所發的公債票



一個典型的赤衛隊




↑農村中的蘇維埃政府

土地納稅證

福建省[illegible]縣[illegible]區[illegible]鄉[illegible]村

納稅人姓名 黃[illegible] 什么成分 貧

該鄉每人平均分田幾担 今年收穫幾成

全家分田共幾個人 人 全家分田共折田多少担

[illegible]

除免稅幾人 除減稅幾

應納稅谷幾担 應納稅款幾多

公曆一九三[illegible]年一月 日 鄉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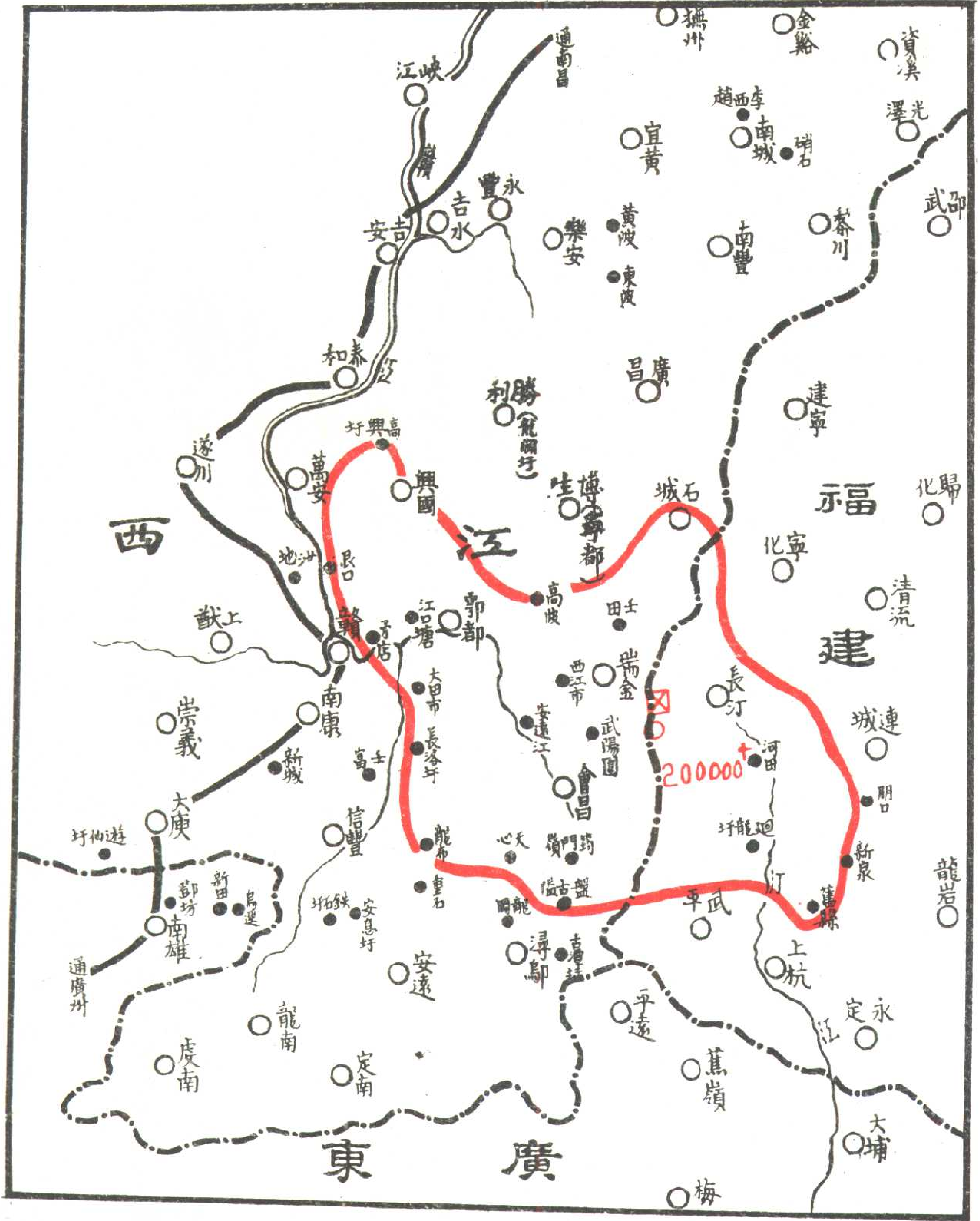
此聯給納稅人[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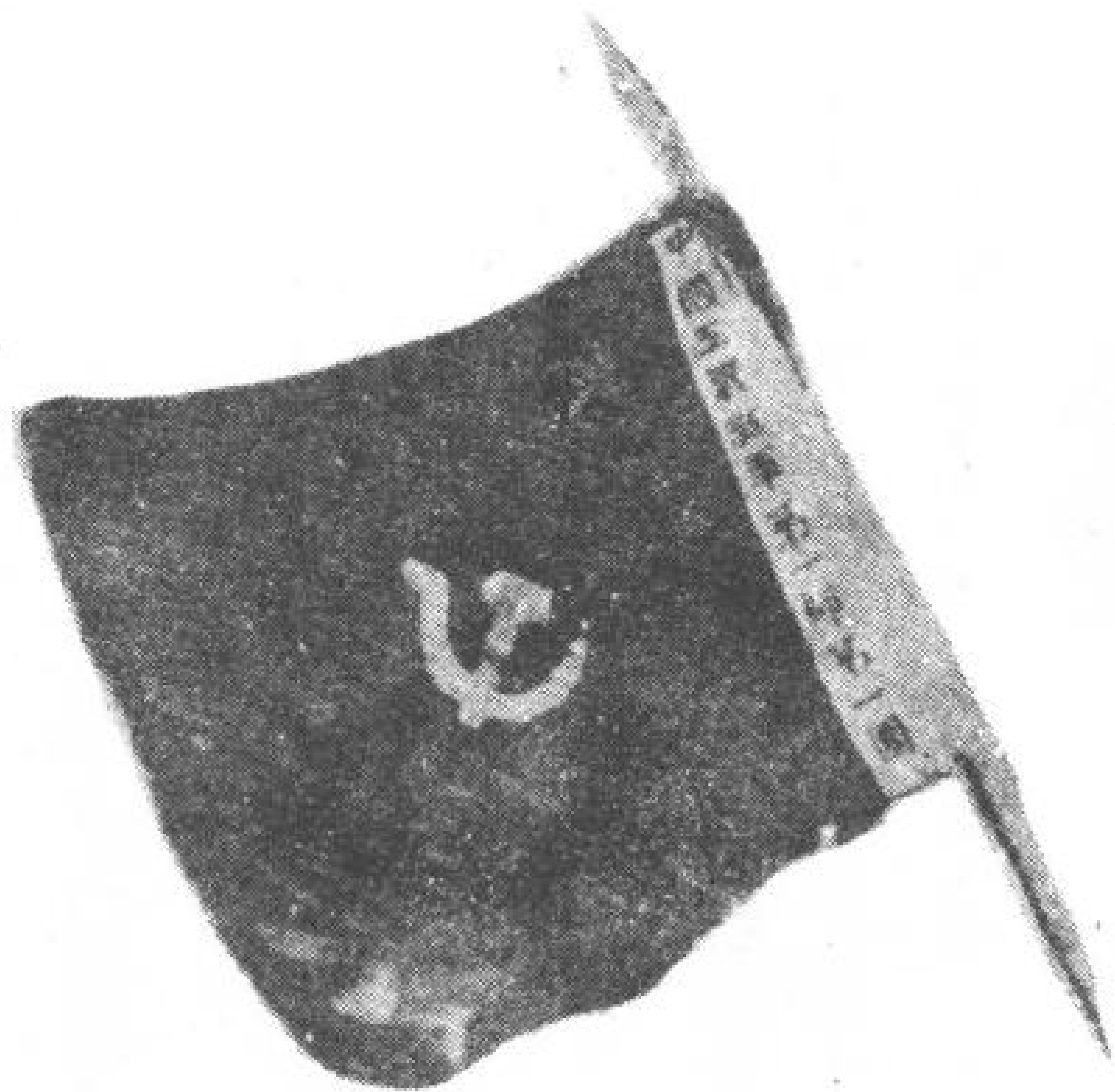
←中共蘇區的土地納稅証

……還公粮，納穀勞軍，獻金買子彈，慰勞紅軍家屬，一次又一次的壓搾，將人民的存粮和金錢，完全搾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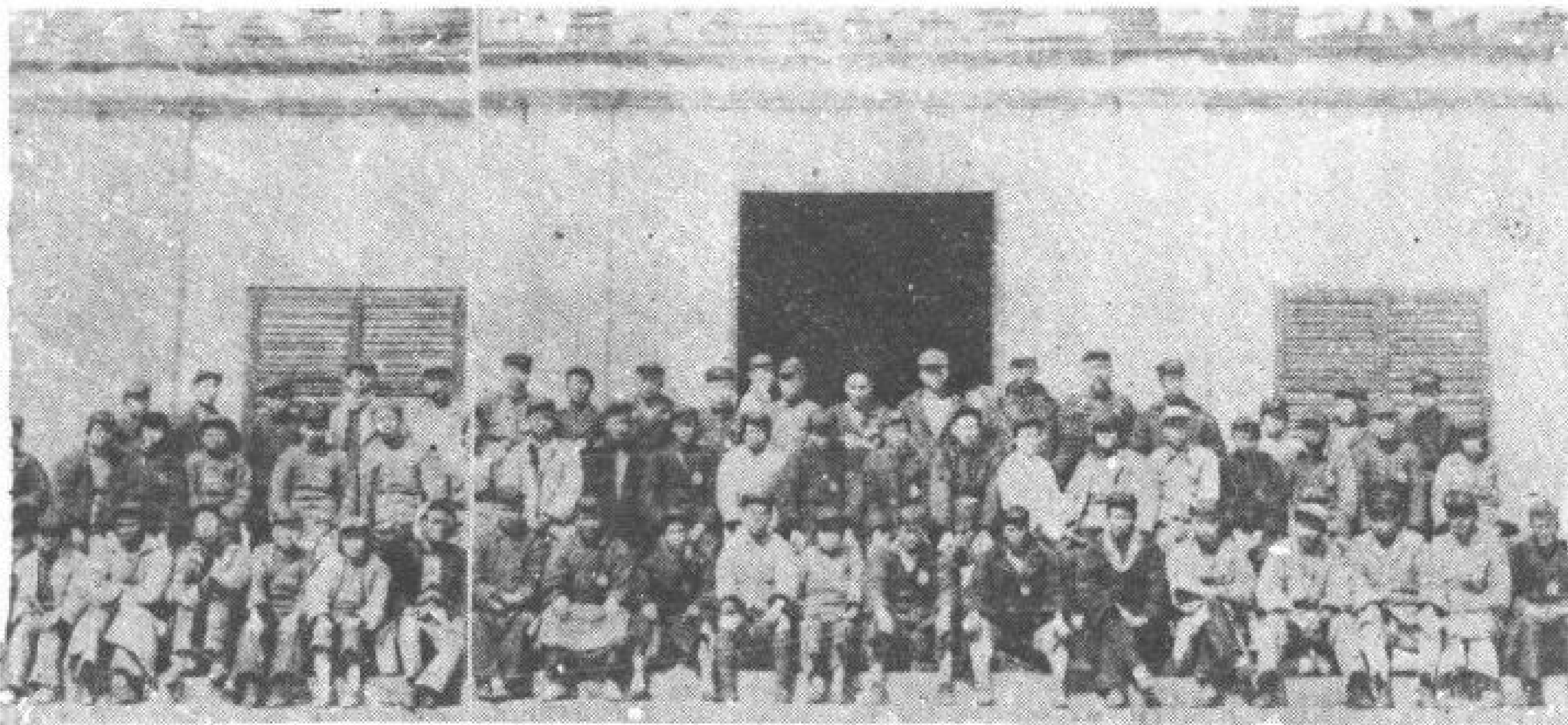
# 紅軍西竄前態勢圖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





民國十七年毛澤東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一師第一團」旗，上有鐵鎚，鐮刀標幟，此種標幟至抗戰後纔取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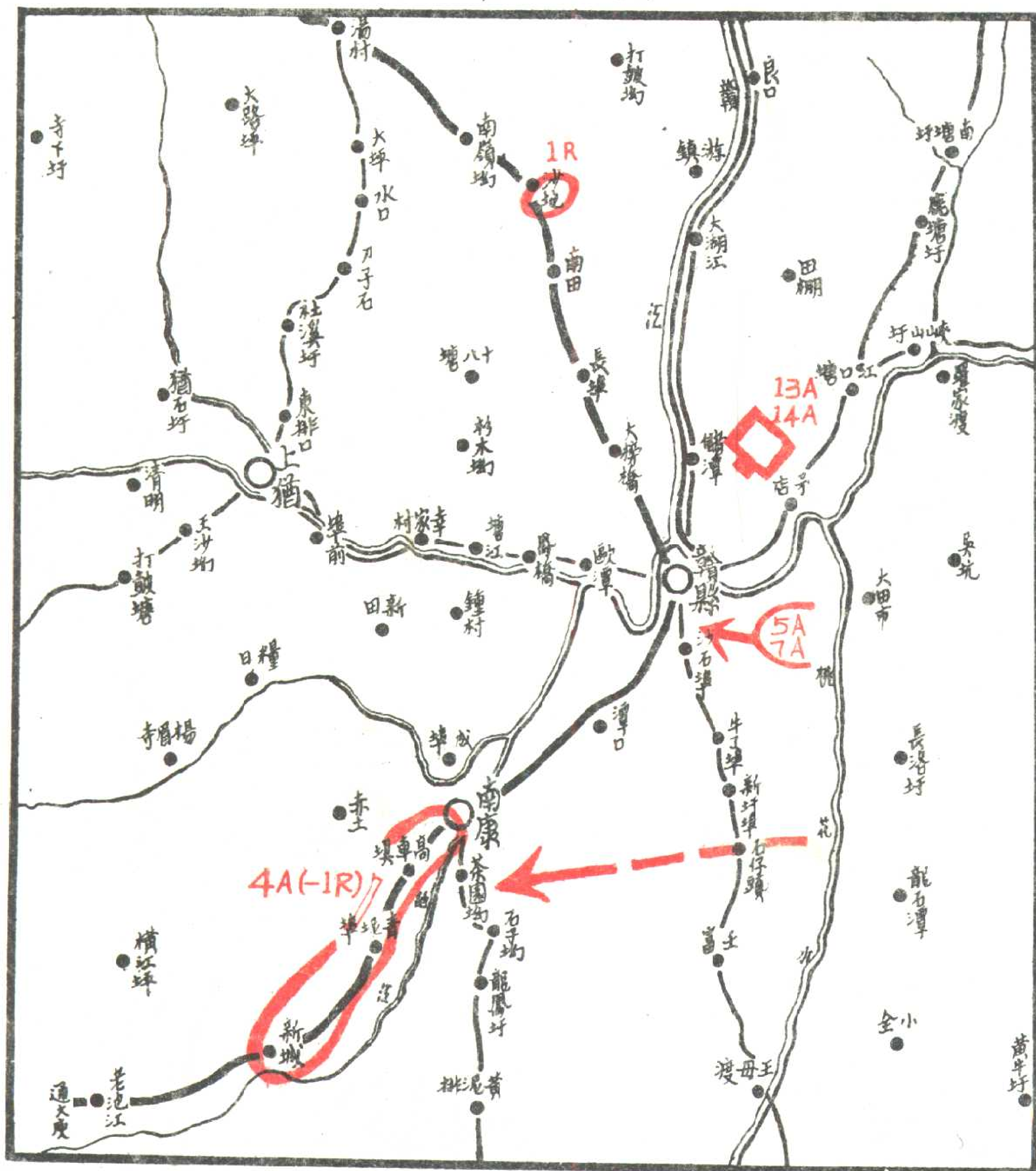


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

（民國廿三年在瑞金舉行）

# 進攻贛縣部署圖

一九三二年



# 赤潮中的桃色波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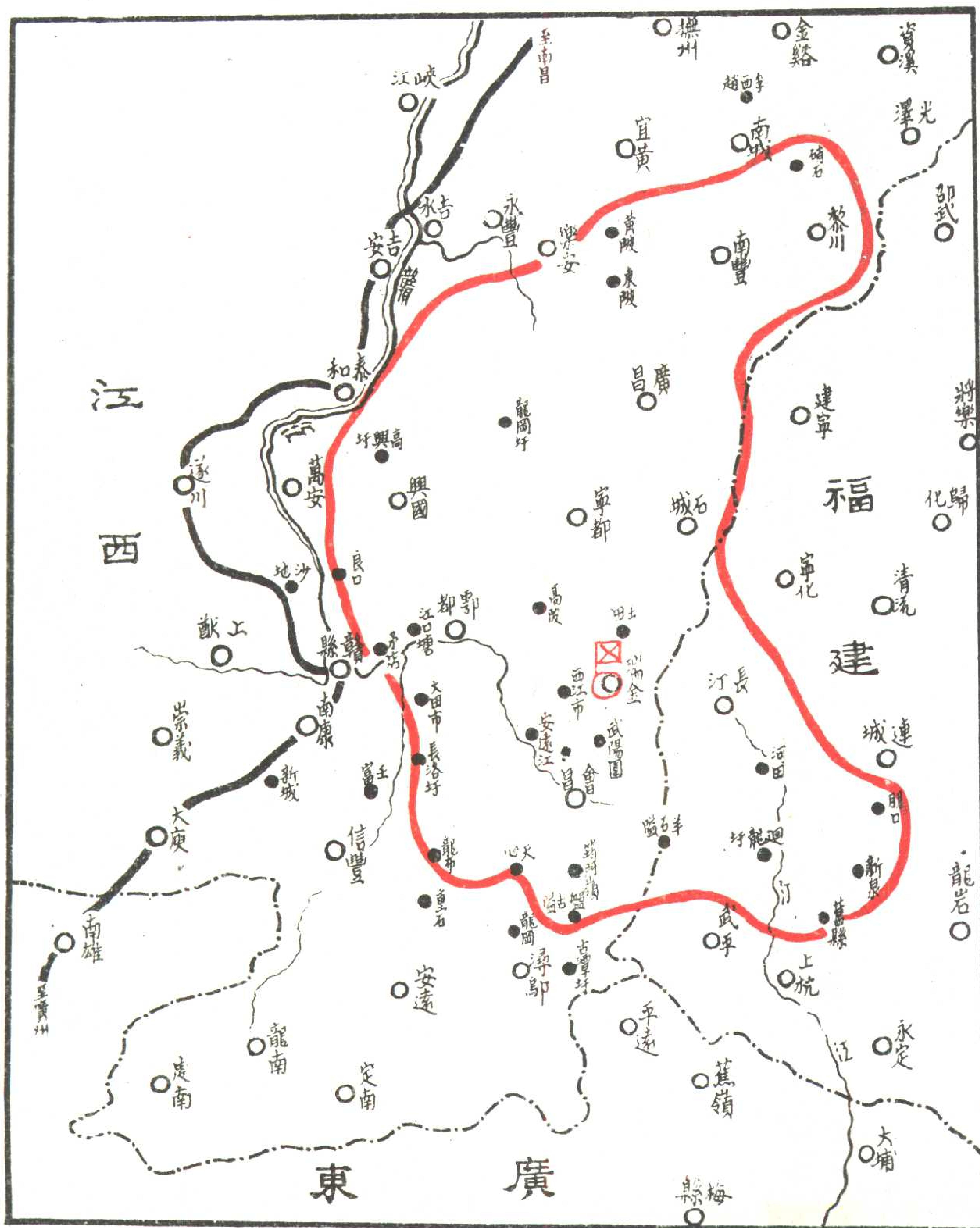


毛澤東與其新「愛侶」電影明星藍蘋



朱德與其現任夫人康克清

中共中央蘇維埃區（江西福建邊區）圖 一九二九月至一九三四年



# 幾個紅軍的重要將領



羅炳輝與其隨從
（一九三六年）



林彪



劉伯承



葉劍英



聶榮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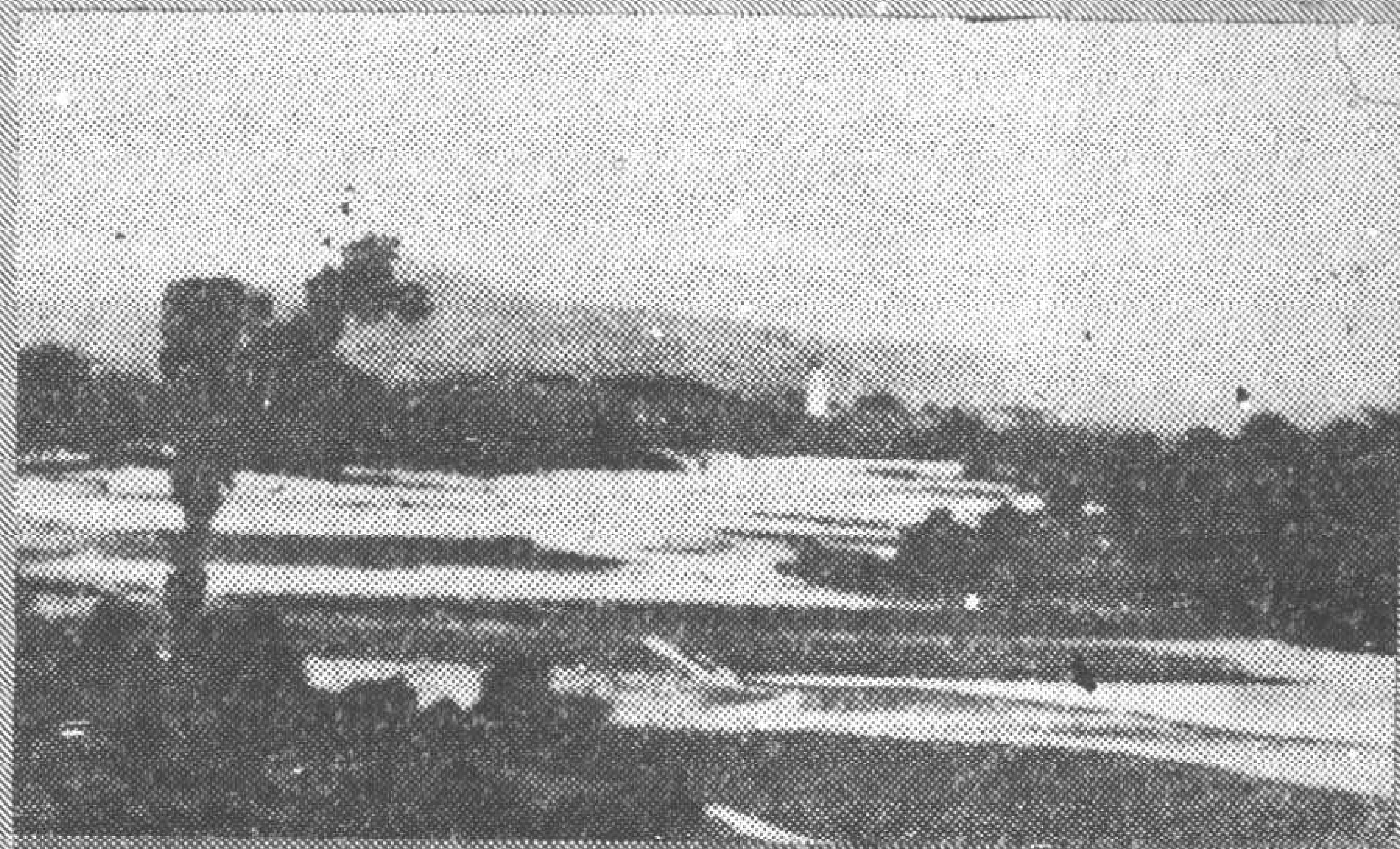


陳毅



徐向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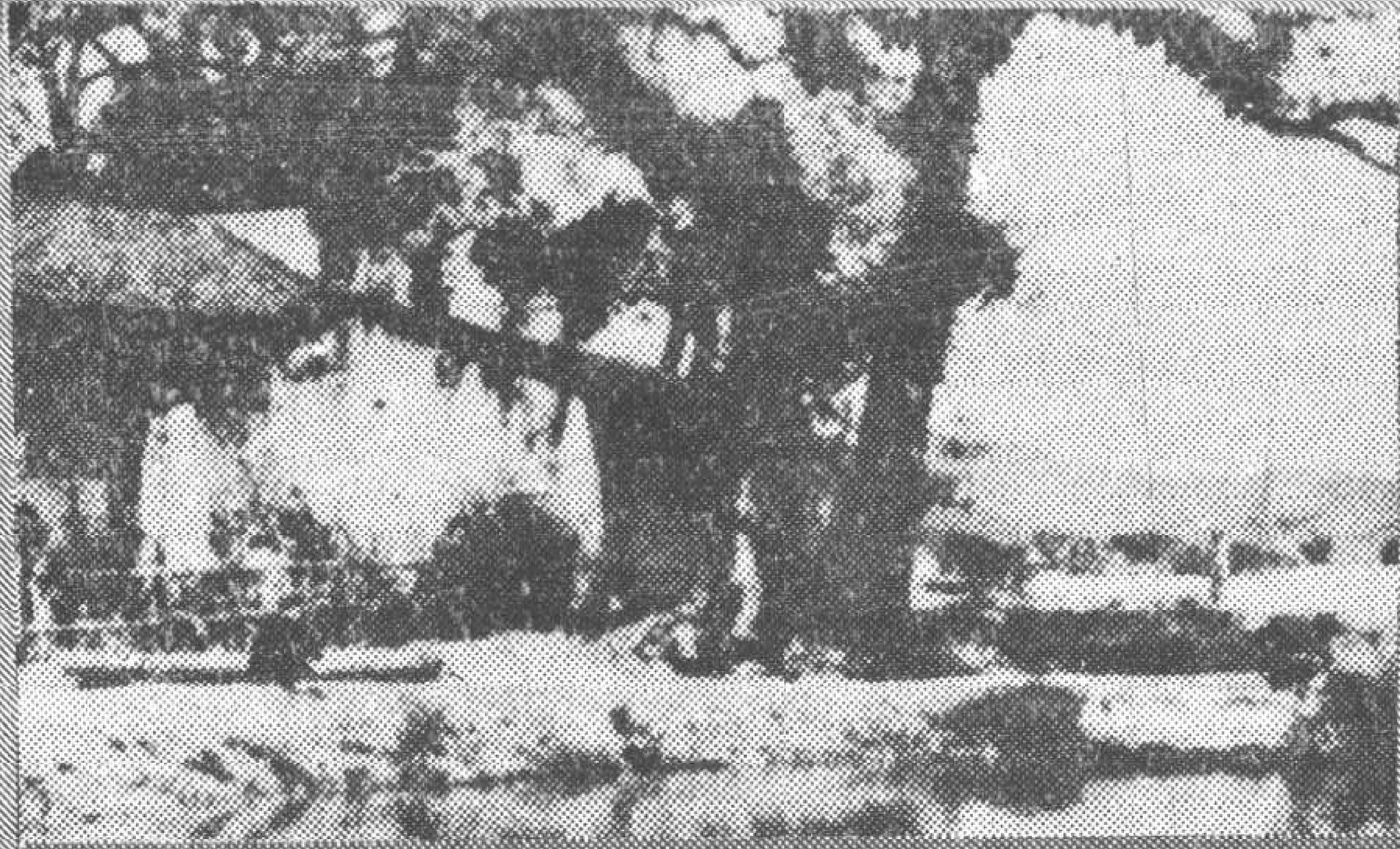
# 中共中央蘇維埃政府所在地—瑞金



1. 瑞金縣城郊外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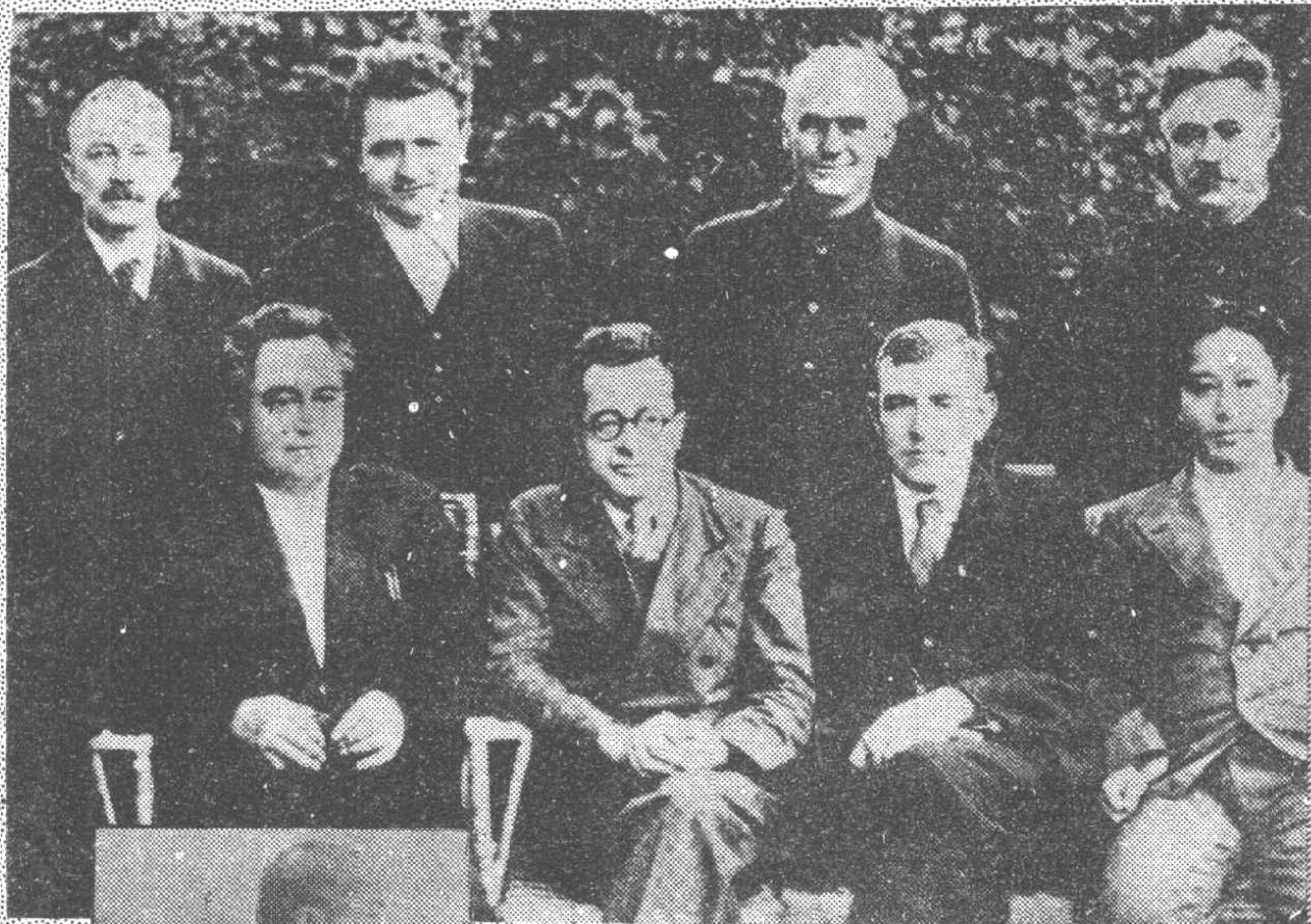
2. 瑞金杭村紅軍內務部舊址



3. 毛澤東在瑞金茅家屋的住宅



4. 朱德在瑞金時的辦公室外景



↑在莫斯科共產國際代表中共的陳紹禹（王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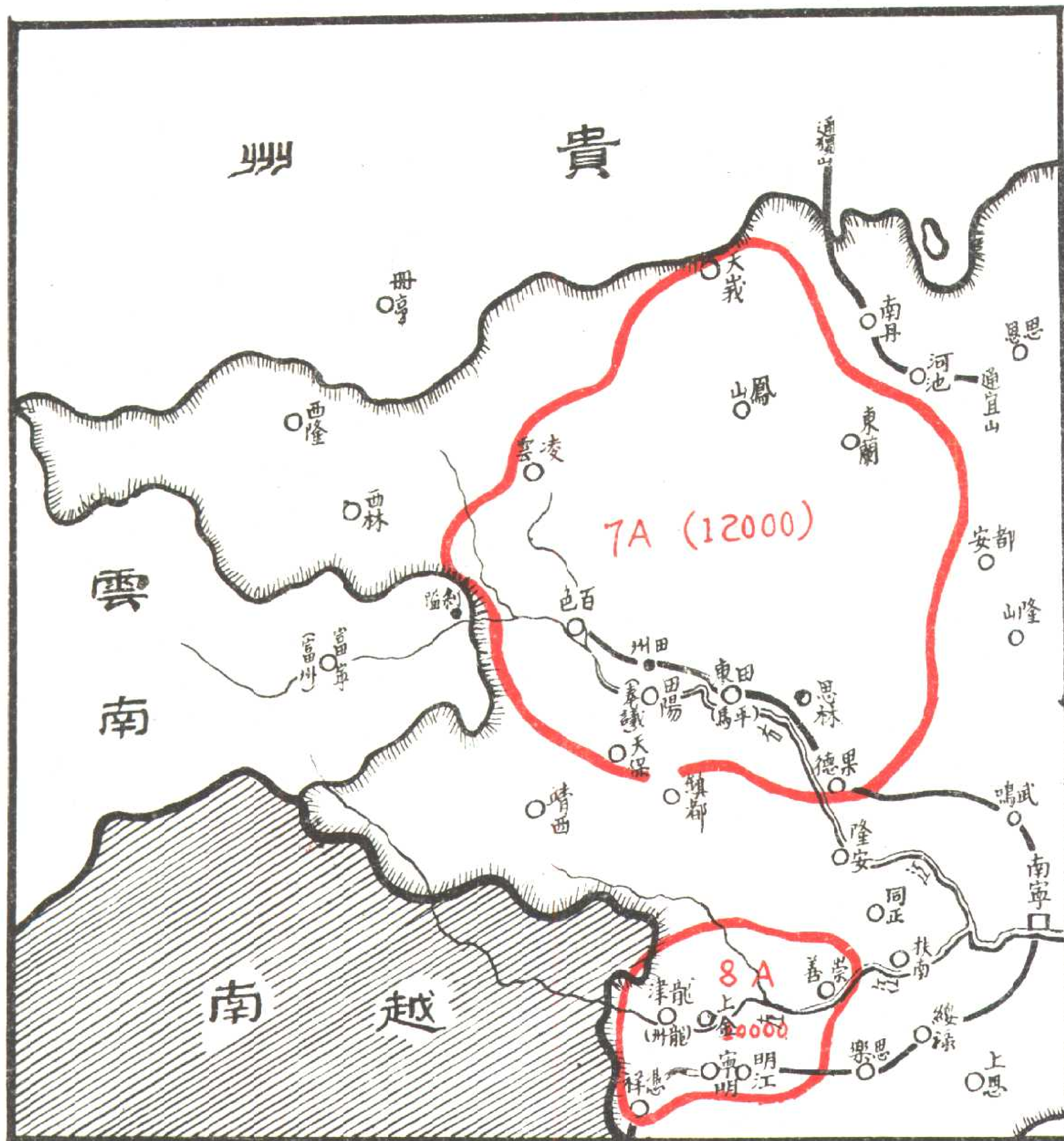
任八路軍副司令時的彭德懷→

毛澤東與朱德在延安↓（民國廿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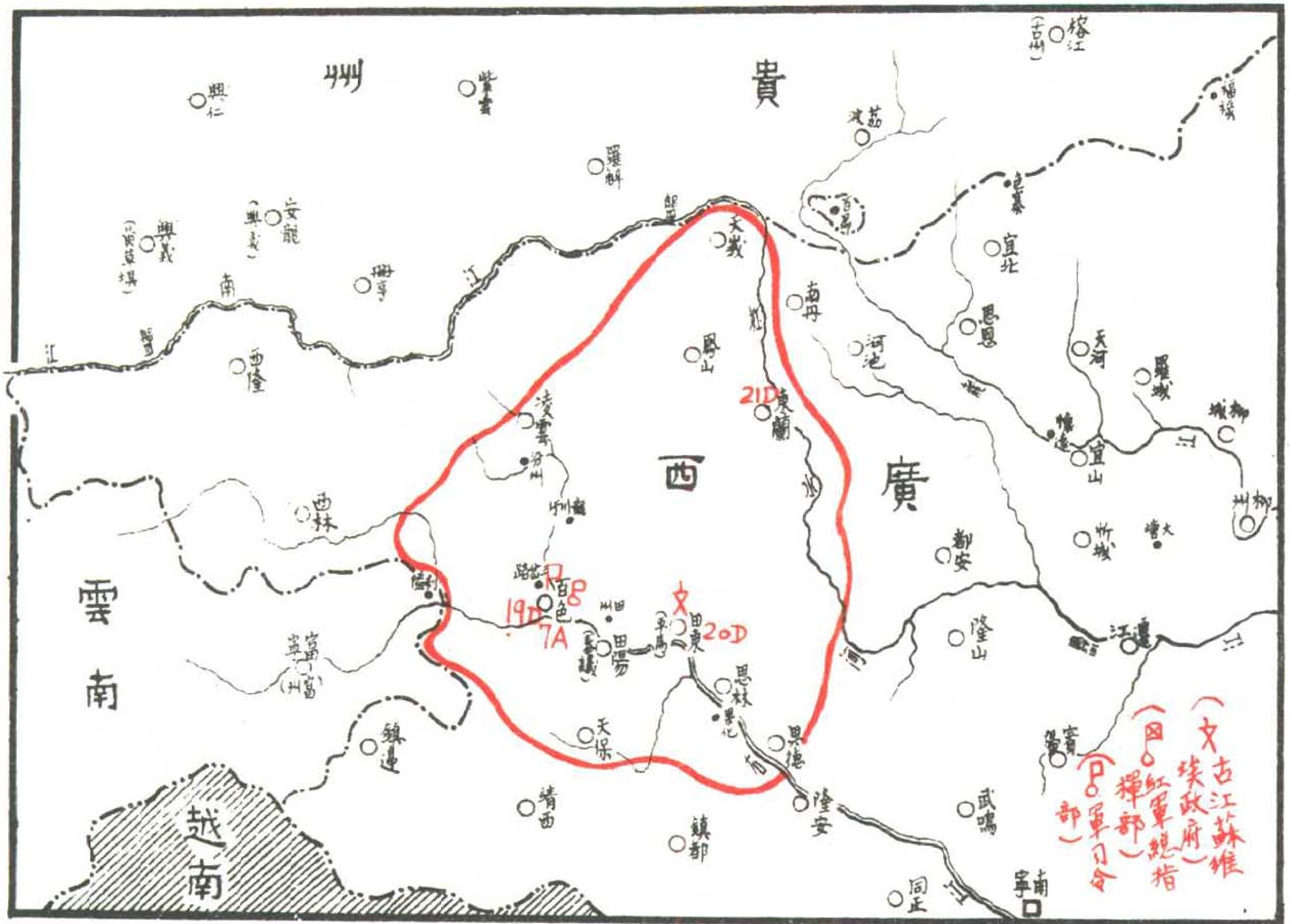
# 廣西左右江兩蘇維埃區域圖

一九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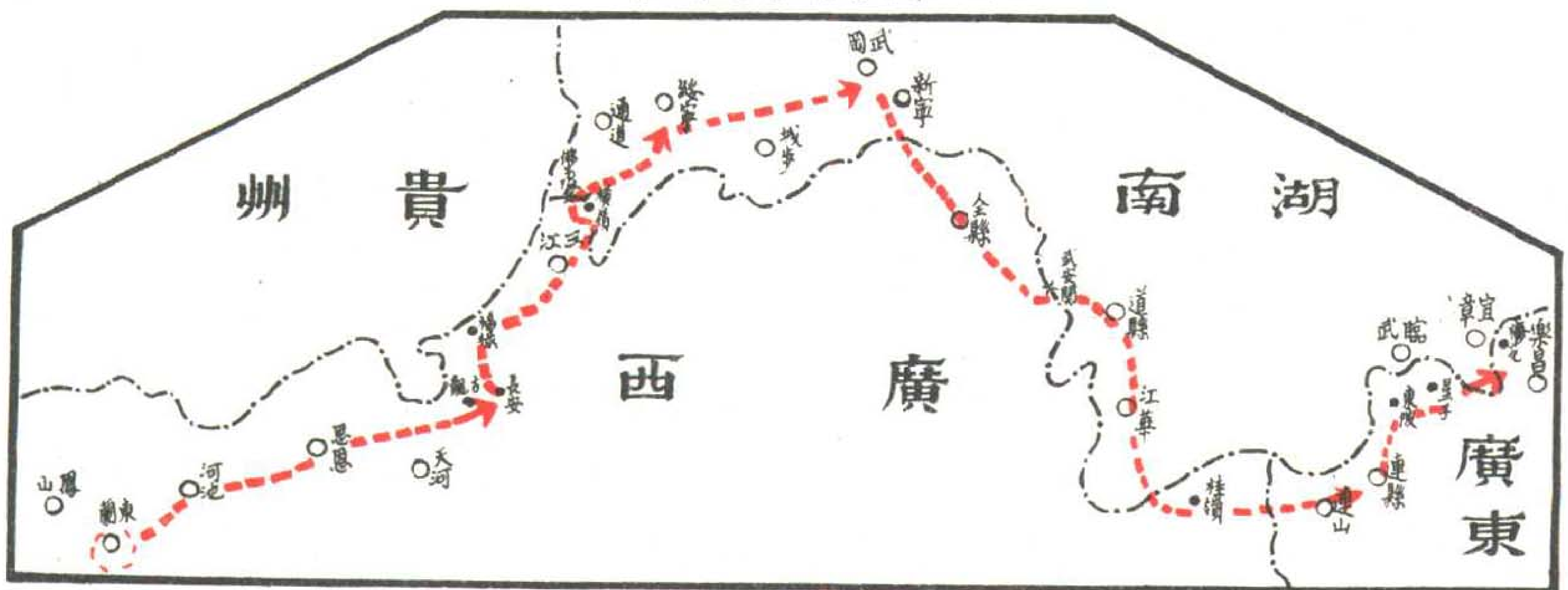
紅七軍兵力駐地图

一九三〇年八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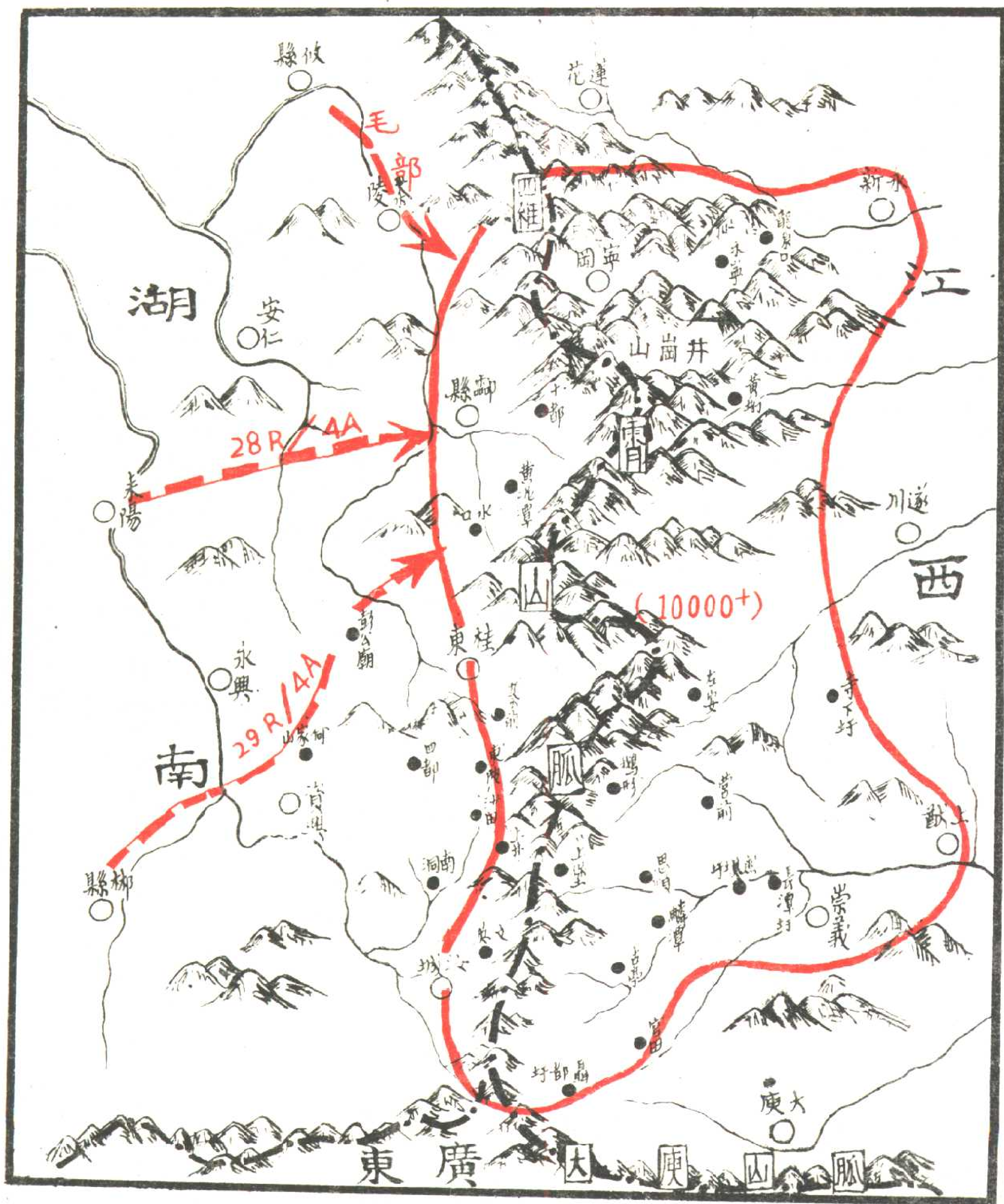

紅七軍東調路線图

一九三〇年十月至一九三一年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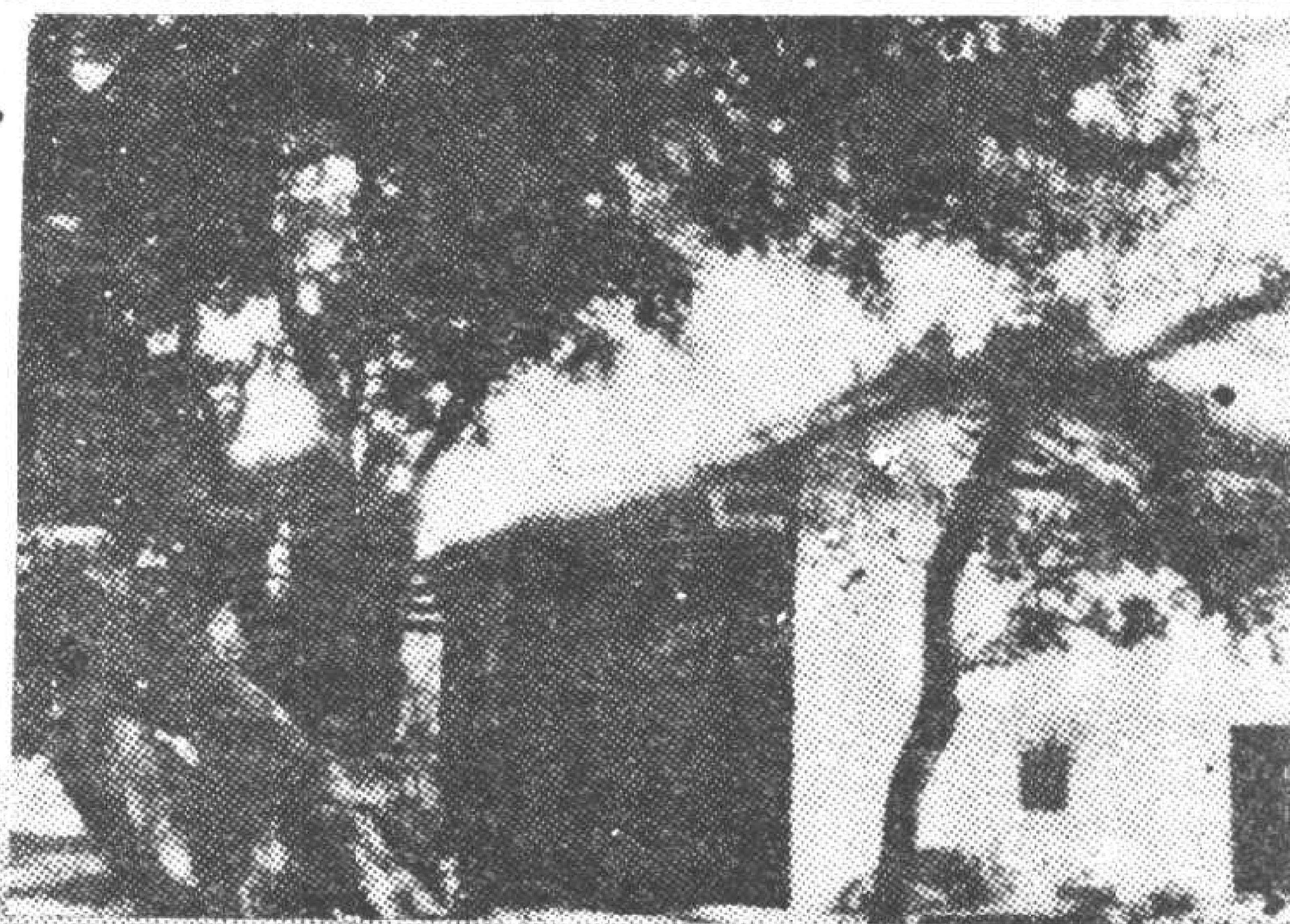


# 羅霄山脈中段蘇維埃區域圖

一九二八年五月至一九二九年二月



毛澤東及其「愛侶」賀士珍在井崗山的住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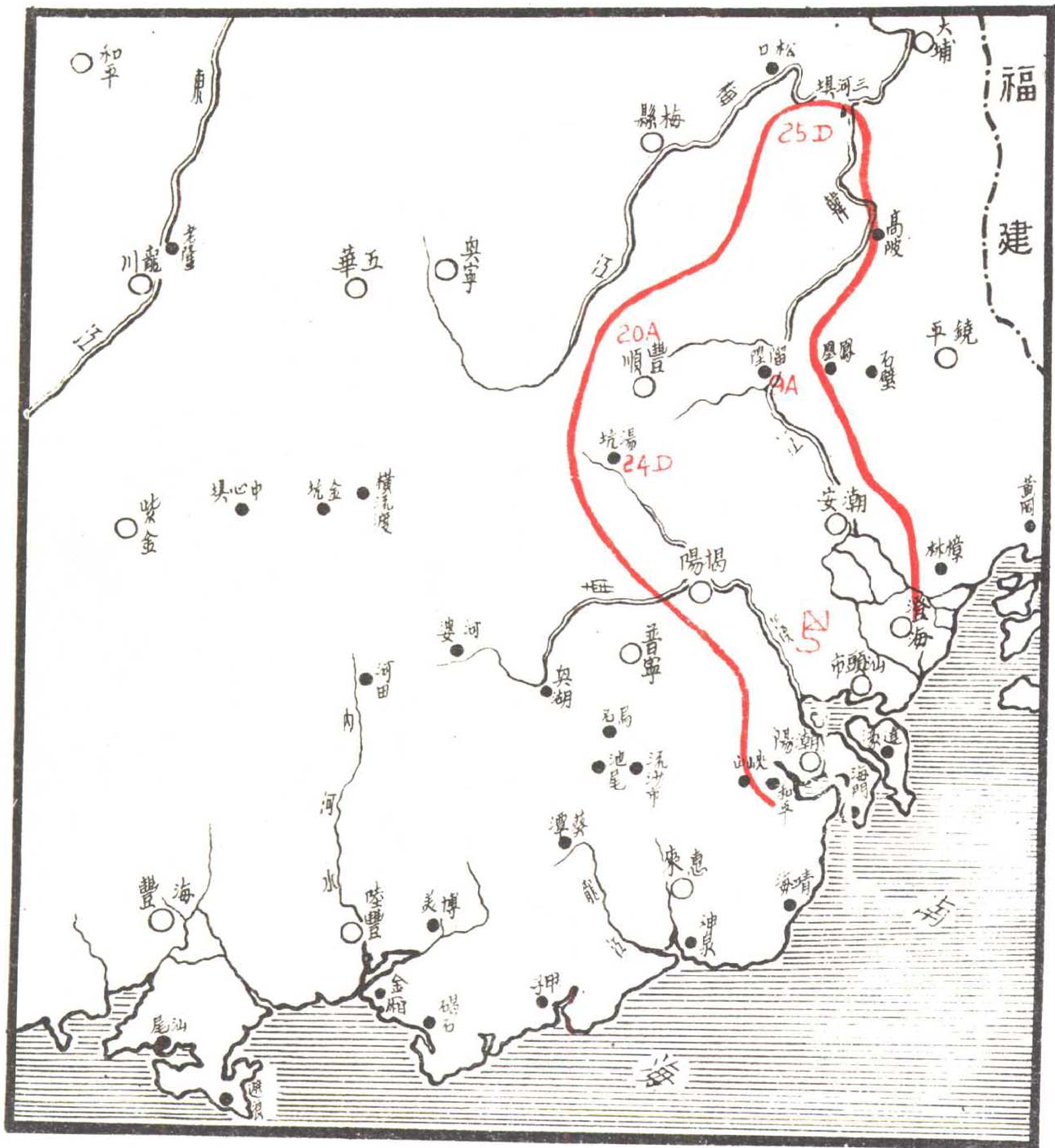
井崗山的龍源口



朱德與毛澤東在井崗山會師的地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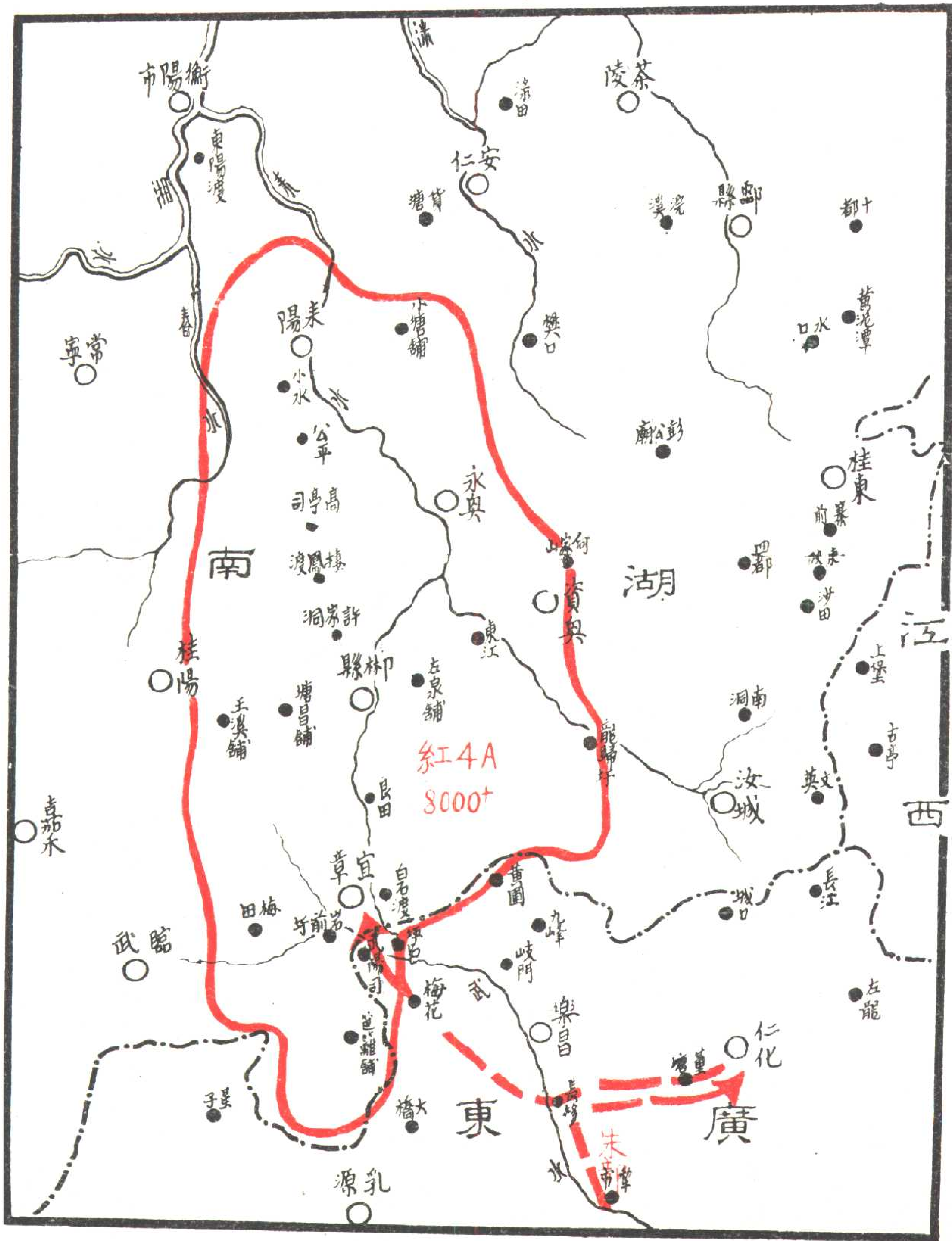
# 賀葉軍進佔潮汕部署圖

一九二七年八月



# 湘南蘇維埃區域圖

一九二八年二至五月



# 「八一」南昌暴動的人物

## 政治方面


周恩來


李立三


林祖涵


張國燾

領導「南昌暴動」的是所謂「中國革命委員會」。譚平山任主席，委員有鄧演達，宋慶齡，何香凝，張國燾，林祖涵，李立三，周恩來……等。軍事方面由賀龍爲總指揮，葉挺副之，劉伯承任參謀長，郭沫若任政治部主任。中共官方所稱係由朱德，周恩來領導，事實上並不如此。

## 軍事方面


郭沫若


劉伯承


葉挺


賀龍

# 賀葉軍南進路線圖

一九二七年八月



# 中共早期的幕後操縱者



遙遙控制的共產國際首腦

布哈林



太上皇鮑羅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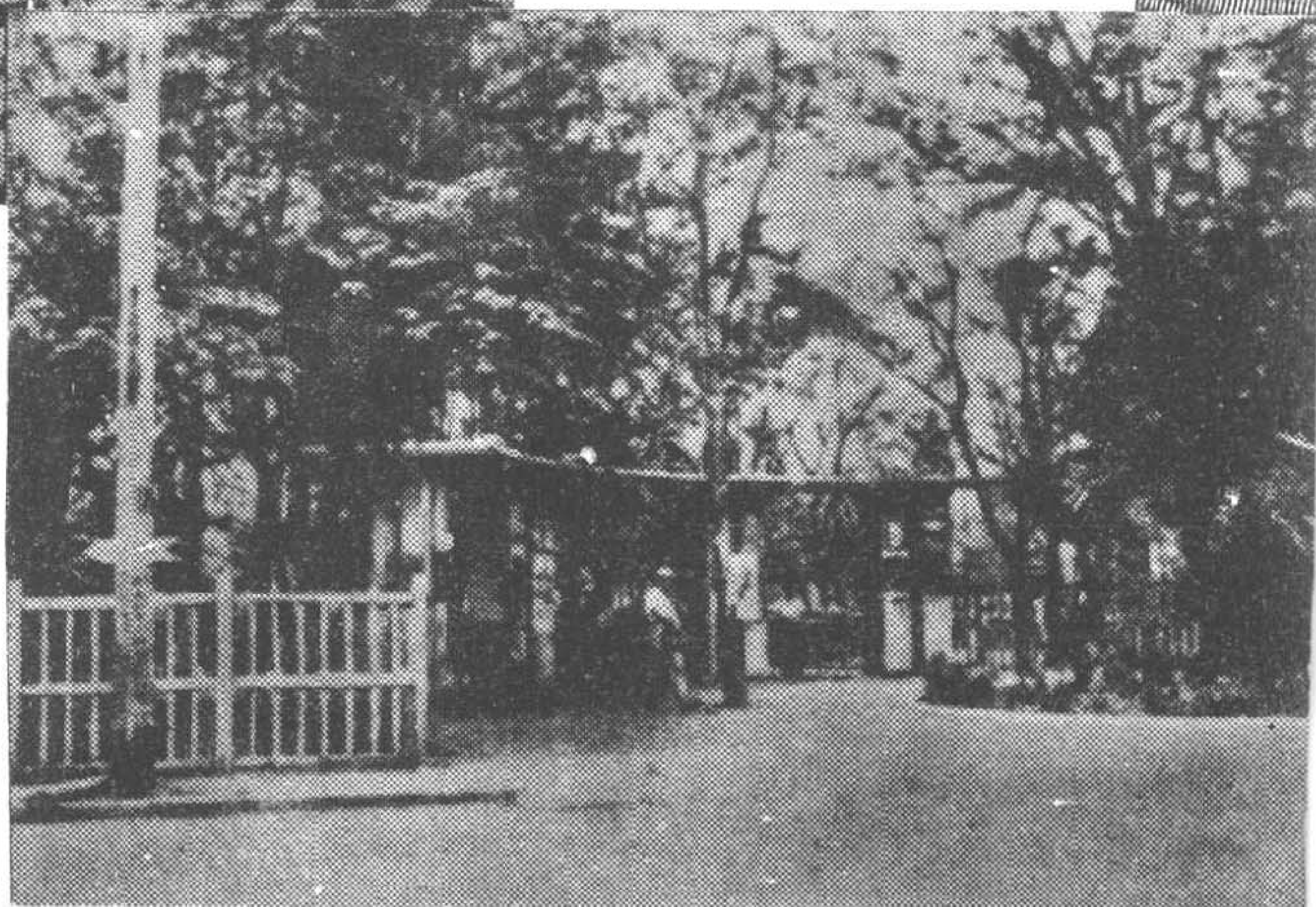


軍事顧問
加倫將軍

# 八一「南昌暴動」的陳跡



← 賀龍葉挺的司令部



**南昌公園** →
雙方激戰的地點



孫中山先生創立黃埔軍校時（民國十三年）留影

後立者：（中）蔣中正（左）何應欽（右）王柏齡

#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民國十年在北平成立的→
馬克斯學說研究會



**一九二五年初期國共合作**

自左至右第四人汪精衛，第六人蔣中正
第七人鮑羅廷，第八人林祖涵。



中國共產黨的創立人

陳獨秀

（民國十八年被中共開除黨籍）

# 目錄

第四章　紅軍由催生到壯大



第五章　井岡山「革命聖地」

第十六章　瘋狂的大屠殺



第十七章　出亡前後

# 插圖目錄

我與紅軍　插圖目錄

# 地圖目錄

# 第一章　少年生活的回憶

## 一　我的童年

一九〇一年秋天，我出生在廣東省北部的樂昌縣長垑村。長垑村在樂昌城南十五華里。村東北是一片蒼翠的山林，南面的靈江，和西面的武水，在村西南兩華里的地方合流。武水又名武溪，或稱武陽溪，亦名溱水，發源於湖南省的臨武縣西，東南流經宜章縣入廣東境，經乳源，樂昌至曲江，會湞水而爲北江。當粵漢鐵路和韶樂公路還沒有修築的時期，廣東和湖南兩省的水陸交通，都要經過長垑村。村的面積不大，居民只有一千多人，因爲地當兩省的商旅衝途，又爲四境的農民經常買賣之所，所以，每逢墟期，非常熱鬧。

我家在村內也開設了一小間雜貨店，村外還有一些農田。我的父親，一面經商，一面務農，全家過活，頗有餘裕。

我的父親，一生非常勤儉。他的記憶力很強，性情尤爲豪爽。對於貧苦的人，很富有同情心，時常以金錢或糧食，予以周濟。因此，村中男女老幼，都對他非常敬重。遇有困難問題，常時來請求他代爲解决。我的母親，是舊家庭中賢妻良母型的女性。她帮助丈夫，撫育子女，終年勤勞，從無倦容。尤其是對於周濟貧苦的親友，和父親一樣，是非常的熱心的。

我有兩個哥哥，一個姊姊，一個妹妹，大哥隨父親經商務農，二哥讀書，因爲我最小，父母特別期望我專心求學。那時，中國還在滿清的統治之下；雖然西方文明已逐漸跨進了中國，新的教育制度也開始萌芽；但鄉村中的風氣，還是非常的保守。長坨村在宣統元年開辦了一間初級小學，我便進了這個小學讀書。

學校名爲陵武初等小學堂，所授的課本，新舊參半。但有一個最好的現象，就是教員的思想，都比私塾先生爲開明。當時影响我最深的，則是我的國文老師潘先生，他是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組織——同盟會的地下工作者，在滿清的高壓統治下，他不畏權威，以傳道者的精神，作革命的宣傳，使我們這些天眞無邪的孩子們的心坎中，對祖國激發起至高的熱

愛；使我們對當時反抗滿清建立民國的革命運動，更發生了無限的期待和嚮往！

同盟會對於推翻滿清的革命鬥爭，雖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却一次比一次的擴大。每當革命消息傳到樂昌時，潘先生便帶領着他所最鍾愛的我們十幾個學生，圍坐在僻靜的江邊，將革命烈士們，如何拚頭顱，洒熱血，前仆後繼，視死如歸的事蹟，說給我們聽。說到悲壯激烈的時候，他往往搥胸振臂，熱淚雙流，使得我們這群一個個的小眼睛中，也流出了感激的淚珠。

一九一一年是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的一年，那時革命的風氣瀰漫了全國，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的一把火，便燒毀了愛新覺羅氏二百年的王朝而建立了五族共和的中華民國。我雖然祇有十一歲，但政治制度的變換，對一個年輕的孩子的影响也是很深刻的。「皇帝萬歲」的牌位燒毀了；我的辮子也在學校裏剪去了；小學教科書中「蒙學初階」的「我是大清國民」這一類的文字也删去了；一切新的事物，對於我全有着極大的鼓舞。

## 二　到軍營中去

一九一六年夏天，我在樂昌縣立高等小學畢業後，便考入了廣州市立第一中學。此時，民國成立已五年，中國初期革命雖然成功，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畧並沒有停止。最顯著的是一九一五年五月九日，日本向北京政府提出二十一條無理的要求，使中國遭受了重大的損害，蒙受了莫大的恥辱。同時，殘餘的封建勢力也沒有澈底肅清，首先是袁世凱在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恢復帝制，改元洪憲，幸而雲南首先起義，各省相繼響應，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凱，於宣佈恢復民國之頃，卒憂憤而死。繼之，一九一七年又有張勳擁戴滿清廢帝溥儀「復辟」之舉，賴段祺瑞馬廠誓師，各省繼起聲討，張勳便被驅逐，民國依然無恙。惟兩次帝制雖告失敗，但中國的政權却由北洋軍閥輪流掌握。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並沒有實現。

一九一七年，北京政府廢除「臨時約法」（註一），解散國會。大部分國會議員遂南下

廣州，倡導護法，孫中山先生亦由上海率領海軍艦隊回粵。各國會議員乃在廣州召開非常會議，公推孫中山先生爲大元帥，成立軍政府，領導全國護法運動，西南各省一致响應，革命空氣，一時又蓬勃起來。

在這一革命空氣影响之下，我迫切的希望叅加革命救國的工作。但我除了景仰中山先生偉大的精神並認爲他是中國革命的唯一領袖之外，對於其他複雜紛歧的政治鬥爭無法瞭解。爲了得到進一步的認識，遂想起了小學時的國文教師潘先生。乃特地將我的心情，以及如何爲國家效力的問題，寫信向他請教。他很快的答覆我，大意是：「在軍閥竊國，外患頻仍的局勢中，要完成中國革命，必須要有眞正革命的軍隊，打倒軍閥，方能實現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他這個指示，使我對于投筆從戎，發生了熱情。於是我決心學習軍事，以備將來叅加革命的實際工作。

一九一七年，南、韶、連鎭守使李根源，在韶關籌辦滇軍講武分校，招收第一期學生。我便考入了該校，正式接受軍事訓練。第二年的秋天，我患了腸熱症，在軍校中醫治了兩個

月，仍未痊癒。加以身體虛弱，非短時間所能康復，校長張桂鎔特准我回家療養。我受軍事教育，雖然祇有一年的時間，但因我努力學習，在軍事學術方面，算是打下了初步基礎。

當時，各省擁兵自雄的軍閥，爲了保持其個人的權位與地盤，不惜運用種種手段來破壞革命。廣西軍閥陸榮廷領導的莫榮新、陳炳昆、林虎等，原先曾參加擁護中山先生的護法運動，後爲北洋軍閥所收買，乘粵軍援閩，後方空虛之際，於一九一八年秋，率領桂軍盤踞廣州。莫榮新任廣東省長，聯合李根源，把持着廣東的政權。於是，中山先生辭去大元帥，離粵赴滬，其後雖又成立了七總裁的政務會，但廣東的局面依然無起色，當時滇軍講武分校遷往瓊州，我便沒有隨校出發，軍事學程因而沒有繼續完成。

## 二 五四運動的影响

革命策源地的廣州，既爲軍閥所割據，中國革命事業乃復趨於低沉。我住在樂昌家鄉，爲了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運動橫受挫折，內心萬分痛苦，且因久病新癒，體力還沒有復元，

在寧靜的田園生活中，每天祇有閱讀書報來消磨寂寞的日子。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日下午，一位在樂昌縣立高等小學讀書經常為我傳遞書報的堂兄弟，帶來幾份廣州的報紙，上面登載着五四運動（註二）的經過和各地响應的消息。這個反帝、反賣國賊的運動，使我起了極大的衝動。

五四運動所幅射出來的火花，燃遍了中國每一個角落。偏僻的粵北樂昌，也燃起了愛國反帝的火炬。樂昌縣立高等小學的學生們在縣城和鄉村，到處散發傳單，擴大宣傳。負責檢查日貨的學生，更英勇無畏的將經營日貨商店的貨物，如魷魚、鮑魚、布匹、玩具……等，在公共場所中焚燒。使廣大群衆的反日情緒飛揚高漲。我在這運動的漩渦中，也有了極大的覺悟、激奮、和衝動。它教育了我，也教育了千千萬萬的中國青年，使大家認識了自己的力量。

同時，因為蘇聯在十月革命後，宣佈放棄帝俄時代一切在華的特權，並願意和中國政府建立平等互惠的外交關係，這裏着砒霜與蒙了糖衣的政治手段，皷舞了中國的智識份子，對

蘇聯的成功與友誼，發生了欽仰和感激的心情。五四運動領導份子所主編的「新青年」和「每週評論」等刊物，大事鼓吹「民主」與「科學」，並提倡白話文，反對迷信，介紹社會主義學說。從此時起，馬克思主義便潛入了中國的思想界。上海首先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學會。各省也有類似的組織。「五四」反帝反賣國賊運動，便進而成爲後來更廣泛的政治運動的開端了。

我當時對這些宣傳革命理論的書籍非常愛好，經常手不釋卷的仔細閱讀。那時，我還是憧憬着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天天盼望着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軍打回廣東，以便投身革命軍的陣營中去，我對蘇聯的革命與馬克思主義，只認爲是可以增強中國革命的信心，並可以與三民主義互相參証的東西。我的這種心情，也可說代表了極大多數中國青年當時的心情，更可以說是當時社會心理最敏感最普遍的反應。

一九二〇年秋天，粵軍由福建打回廣東，驅逐了廣西軍閥莫榮新、陳炳昆等，恢復了廣東地方政權。是年冬，中山先生與伍廷芳唐紹儀等，在廣州重開軍政府政務會議，廣東的局

面、又有了新的開展。我得到粵軍第二旅關營長的賞識，充任該營第二連的排長職務。一年後，由排長擢升爲上尉連長。

一九二一年，非常國會在廣州開會，推選孫中山先生爲大總統，五月五日成立革命政府於廣州，重整革命陣營。六月粵軍西攻入梧州，七月攻佔南寧，八月滇軍李烈鈞攻下桂林，整個廣西爲革命軍所光復。十一月，中山先生親自率領軍隊駐節桂林，準備經過湖南北伐。湖南省長趙恒惕，原與革命軍有聯絡，但又與北洋軍閥通聲氣，以致假道湖南之舉，受到阻撓。翌年三月，粵軍第一師師長鄧鏗在廣州被刺逝世，中山先生乃移師回粵，設大本營於韶關，並擬改道向江西進軍北伐。

當北伐軍越過了江西大庾、南康、信豐之線，進攻贛州之時，掌握粵桂兩省軍權的高級將領陳炯明，受北洋軍閥唆使，堅決主張聯省自治，反對北伐，並乘廣州空虛，指揮葉舉、林虎等叛軍進佔廣州。中山先生認爲陳炯明是同盟會的老同志，不致悍然背叛革命，親自由韶關回到廣州，希望以人格來感化他們。

不料陳烱明竟於六月十六日，指揮叛軍炮轟總統府。時機危急，總統府秘書林直勉，強挽中山先生冒險步出總統府，到達海軍軍艦，指揮各艦砲轟白鵝潭叛軍陣地。因陸上部隊不能協同向叛軍進攻，海軍艦隻只得退至黃浦港，堅守待援。

我們北伐部隊，奉到中山先生的緊急命令，放棄進攻贛州，回師討逆。當時陳烱明的勢力雄大，討逆軍事失利，因分別向閩湘等地撤退。蒙難五十多天的中山先生，懷着悲愴的心情，離開廣州到上海去了。我也在討逆失敗後，回到樂昌故鄉。

## 四　萌芽時的中共

一九二三年春，滇、桂、湘、粵各省討逆軍聯合攻粵，叛軍陳烱明部潰退惠、潮、梅等地區。革命策源地的廣州，又為革命勢力所光復。中山先生乃再返粵，設大本營，復大元帥職，對於革命軍事力量的擴充，特別注意，是時，廣東省境內有楊希閔的滇軍，劉鎮寰的桂軍，許崇智的粵軍，譚延闓的湘軍，還增編了李明揚的贛軍，柏文蔚的山陝軍，程潛的攻鄂

軍。與時我由攻鄂軍前敵指揮官郭步高的介紹，充任該軍總司令部的少校參謀。

是年，中山先生爲了加強革命領導，充實革命陣容，與蘇聯大使越飛共同發表宣言，及准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並於十一月發佈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

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通過「聯俄」「容共」和「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中共黨員被選爲國民黨的中央委員者，有張國燾、瞿秋白、譚平山、林伯渠、李大釗、毛澤東、于方舟、于樹德、韓麟符等九人，並任譚平山爲組織部長，林伯渠爲農民部長，又聘請蘇聯人鮑羅廷爲顧問，加倫將軍爲軍事顧問。由此，國民黨與共產黨便密切合作。是時，我被派往廣州，担任攻鄂軍的後方聯絡工作，這使我有靜靜地研究這些事情的機會。參加革命軍三年的親身經歷，我深深地感到所追求的理想與事實不相符合。

當時的政權還掌握在擁兵自雄的高級將領手中，他們表面上擁護孫中山先生作元首，內心裏却時時計劃着利用元首，甚至打倒元首。如陸榮廷、龍濟光、沈鴻英等破壞護法運動於先，陳烱明在廣州叛亂於後，都使中國革命受到重大的損失。

這時，廣東省境內，大軍雲集。每個軍佔據一塊地盤，成爲當地的土皇帝，無饜的向人民籌糧籌餉，公開販賣雅片和開賭。全省烟賭林立，社會風氣，糜爛到了極點。

高級將領既不顧國家，不惜民命，終日沉迷在烟、酒、女人的圈子裏作威作福；中下級軍官及士兵，也上行下效，任意欺壓民衆，紀律蕩然。這樣的「革命軍」，本身就是被革命的對象。尤其滇軍楊希閔部爲最腐敗，人民畏之如虎，恨之入骨。

另一個主要的原因，是當時國民黨還沒有嚴密的組織，缺乏紀律的約束性。軍隊中沒有政治工作，並不瞭解革命是什麽一回事。

我見到當時這種情勢，對革命漸漸發生懷疑；在現實的苦惱中，使我有着無窮的迷惘和困惑。

在這一個時期，就讀廣州的樂昌籍學生，因爲同鄉的關係，經常與我保持聯繫，每星期日，我們便生活在一起。其中有一位工專學生陳德釗，開始介紹我看共產黨的讀物「嚮導」雜誌。我對這本雜誌的理論和文藝都感到滿意。不僅是每星期必讀，而且反復研究。遇到問

題不能了解或有意見時，便和這些同鄉的學生討論。經過了四個多月的時間，陳德釗便鄭重而秘密的對我說：

「你既然喜歡研究共產黨的理論，最好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以後便可得到更多的研究材料和同志們的幇助。你意見如何？」

我當時立卽表明我自己的態度：

「我是一個軍人，而且是國民黨黨員，到今天我還沒有看到第二個比中山先生更偉大的人可以作爲中國的革命領袖。我敬仰中山先生爲革命而犧牲奮鬥的精神，和他手創的三民主義的主張。孫越宣言明白的說：共產黨組織和蘇維埃政權不適合於中國社會。因此，我對你的意見要作深長的考慮。」

一星期過去，陳德釗又偕同一位樂昌籍的學生丘鑑志來找我。丘鑑志的口才比陳德釗好些，他悄悄地問我：

「上星期日，陳同志請你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事，你考慮淸楚了嗎？」

「讓我再考慮一個時間答覆你們。」我婉轉地推託，事實上，我對當時的共產黨還沒有十分明白。

沉默了幾分鐘，丘鑑志懇切地說：

「我們今天來訪問你，是希望你進一步瞭解當前中國的趨勢。不錯，孫中山先生確是救國救民的革命領袖；但是，國民黨積重難返的惡習，要想藉此來完成中國革命是不可能的。中山先生說的：「共產黨組織和蘇維埃政權不適合於中國社會。那是三年前的說法，三年後情勢已經變了。中山先生不是說過：『我黨今後革命非以俄爲師，斷無成就！』這句話嗎？在三民主義中不是也有『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話嗎？

「現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的中央委員，有不少是共產黨員，並通過中共提出的「聯俄」「容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中央黨部的組織部長、農民部長還是中共的黨員呢！這情勢實在太顯明了。此後要革命就要參加中共，才能發揮我們青年的才能和懷抱，才能對中國革命有所貢獻，你以爲對嗎？……」

他這一篇話，說得頭頭是道，我當時確實爲他的言語和熱情所感動。但我還不明白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和共產黨員的分別，在我們漫長的談話中，我要他答覆這個問題。

「青年團員就是共產黨的預備黨員。青年人加入青年團後，一面研究共產主義，一面做青年運動。你的年齡已可入黨，不過需要經過半年或一年的時間，認爲你的思想和工作可爲黨員時，便可轉入黨的組織中去，進而成爲一個共產黨員。從這裏你也可以看到，共產黨的組織是多麼嚴密，吸收黨員是多麼認眞，比你所見到的國民黨的組織工作，是有很大的區別的。

他的說話都是那麼有力，那麼富於煽動性，深深地打動了我的心弦，我便肯定的答應他們，願意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他們也就將這件事情向組織覆命。

當時的入團手續，並不完備。在一張白紙上寫好了姓名、年齡、學歷、經歷的簡歷表，送給陳德釗轉報組織，便完成了申請手續。六天後的星期六日下午四時，陳德釗陪同我到廣州市惠福西路一家民房的三樓，參加入團宣誓儀式。

我們進入樓內，廳中央掛了一張馬克思像，旁邊是一面長約二尺高約一尺餘的長方形紅旗，旗上有「C．Y．」兩個白字。不久，另外來了四個學生，也是來參加入團宣誓的。我們五個人面對着馬克思的遺像和團旗，莊嚴地舉起左手宣誓：「……服從黨的命令！遵守黨的紀律！……」。監誓人是團支部書記，他親切地和我們握手，並簡單的對我們作訓話式的談話。宣誓儀式便在這簡單而莊嚴的氣氛中完成了。這時，我的心中充滿了喜悅和激奮的熱情，把整個的生命投入了熾熱的革命鬥爭的洪爐中。

我被編入工專的一個小組，組長便是陳德釗，經常通知我參加小組會議。以後又召開了支部團員大會，二十多個青年朋友，交換各人的革命經驗，研究黨的各種政策和理論，眞是虎虎有生氣，比我做國民黨員時大有不同。黨的上級經常發下研究材料給我們，要我們自動的去閱讀和討論。而且着重生活的檢討，在那個風氣糜爛的社會中，我們彼此批評、反省、勉勵；因此，各人的生活，都很嚴肅。在這一時期中，我特別注意查詢與研究中共組黨的經過，綜合所得的材料，畧述如下：

中國靑年所掀起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舊的偶像打倒了，而新的眞理並沒有建立起來。因此，思想界等於眞空。這時，蘇聯革命已經成功，共產主義的思想，乘機侵入中國。五四運動中的一部份領導份子，及各地的靑年，大都對蘇聯發生好感，於是，給予第三國際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組織的一個最好機會。

一九二〇年春天，第三國際派維經斯基和楊明齋（西伯利亞華僑，山東人）來到上海，辦理創組中國共產黨的工作。他們所要物色的人物，必須是嚮往馬克思主義，而對新興的蘇聯有良好的印象者；同時，這個人又必須在中國靑年群衆中具有號召和示範的作用。因此，馬克思主義研究學會的發起人陳獨秀，就是一個最好的人選。一九二〇年五月，雛型的中國共產黨小組便在上海成立。首先加入的有陳獨秀、戴季陶、李漢俊、施存統、陳望道、兪秀松、李達、沈玄廬等八人；接着李大釗、張國燾、張申府等在北京成立小組；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漢成立小組；毛澤東、何叔衡等在長沙成立小組；王中美、鄧思銘等在山東成立小組；譚平山、陳公博等在廣州成立小組；施存統、周佛海等在日本成立小組，後來

寫信到法國，在勤工儉學的學生中建立黨的小組；周恩來、李立三、徐特立、李維漢、李富春、王一飛等，都是在法國加入的。

中國共產黨各地小組成立後，即展開各地勞工運動，青年運動和宣傳工作。這時還沒有成立全國性的統一機構，但是陳獨秀已成爲公認的領袖。

一九二一年，蘇聯派遣第三國際殖民地問題委員會秘書馬林，及其助手尼可夫來中國。於七月一日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同時，建立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凡有黨組織的地方，也有了團的組織。

## 附　註

註一：臨時約法——孫中山先生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就任臨時大總統後，三月公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註二：五四運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一九一九年一月，召開和會於巴黎。中國雖爲戰勝國之一，但強國外交家所把持的和會，竟出賣了中國的利益，將德國在華應歸還的權益轉讓

給日本。這個奇耻大辱的外交失敗，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怒。一方面不滿當時北京政府的軟弱外交和腐敗政治；更痛恨帝國主義的擴張政策，深感亡國的危機迫在眉睫。於是，中國青年知識份子與廣大羣衆所結合的反帝愛國運動，由最初的留法學生反對巴黎和會的簽字抗議開始，繼由北京的大、中學生，在五月四日發動了示威遊行，向北京政府請願，幷搗毀賣國賊曹汝霖（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件時，中國政府的簽字代表。）的住宅。當時遭受到北京政府的干涉，逮捕了很多學生，這運動幷沒有爲反動的統治階級所遏阻，反而因北京學生的緊急呼援，引起了全國青年學生、工人、商人的普遍響應。北京學生爲了擴大這一反帝運動的政治影响，成立了學生代表會議，組織了劇團、宣傳隊、檢查日貨隊，分赴各地進行反日、反賣國賊的宣傳，和檢查日貨、焚燒日貨、抵制日貨的廣泛運動。上海的學生，工人，商人發動了罷課，罷工，罷市來支援北京學生，幷向北京政府提出廢除二十一條件，懲辦賣國賊；外交公開；言論、集會、出版自由等要求。因爲這運動適應中國廣大人民的意願，很快在全國各地形成波濤洶湧的行動，使中國文化界、思想界起了空前的革命。

# 第二章　參加中共革命鬥爭的開始

## 一　正式成爲共產黨員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中山先生接受北京政府執政段祺瑞之邀請赴北京，籌商曹錕政府被推翻後的善後事宜。中山先生於行前發表宣言，主張召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迨抵天津，宿疾復發，仍抱病入京，籌劃國民會議，以謀國家之和平統一。惟當時北京政府並無誠意，中山先生因憂勞過度，病益加劇，不幸于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逝世。當時國民黨由胡漢民在粵主持一切。因北京政府既無誠意接受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乃放棄和平談判方式，仍以廣東爲革命根據地，積極整刷內部，準備北伐。

中國共產黨，在中山先生逝世後，認爲這是奪取國民革命領導權的最好時機，于是一面積極爭取國民黨左派，更廣泛的滲入國民黨的軍事組織及黃埔軍校以吸收優秀的軍事幹部；

一面則擴大工農運動，文化運動，以爭取廣大的民衆力量，加強革命的基礎。我就在中共這一個鬥爭決策下，便開始參加了實際鬥爭的工作。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日，共產主義青年團廣東省委書記沈寶同通知我：

「你已經核准轉爲正式的共產黨員了。爲了工作上的需要，黨的省委書記將親自與你見面。在今天下午，你就將接受一個光榮而神聖的任務。」

聽到他的話，我心中充滿着喜悅和興奮，多年來準備爲革命事業獻身的願望達到了。因此，我對於未來那光輝的遠景，平添了無限的希望與信心。

當天晚上，在廣州文明路的一所住屋二樓的客廳裏，我會見了中國共產黨廣東省委書記陳延年（註一）。他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的兒子，他的革命的熱情很高，曾親身加入廣州市人力車工會，與人力車工人的生活打成一片，每天拖着人力車到處找人力車工人談話，從而去了解他們，組織他們，這種堅決艱苦的革命行爲，引起了青年們對他的向心力。他的身材壯健，個子不高，滿面的麻子像橘子皮一樣的難看，咖啡色的皮膚，表示他會

經在烈日下從事過長久的工作，態度沉着，眉宇間洋溢着堅定的毅力，穿着一件殘舊帶着黃色的線衫。我進入廳內的時候，他正在寫字枱上工作。他停下筆抬起頭來問我：

「你是龔楚同志嗎？」聲音親切而和靄。

「是的！」

「對不起！我還有點事情沒辦完。請你坐一會！」

說完，他又繼續去寫他的文件。他的額上流滿着汗珠，一會兒皺眉沉思，一會兒又振筆疾書，十五分鐘左右，他放了筆站起身來，笑容可掬的緊緊地握住我的手：

「龔同志！現在你已經核定轉爲正式黨員了！你應該爲取得這一資格而感到光榮！目前黨的政策，是在國民黨一切組織中取得實權與工作，亦即是利用國民黨各級黨部以掌握工農運動的領導權，使廣大工農群衆，圍繞在本黨週圍，以實現本黨主張。

「你今後的工作，是以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特派員的名義，前往廣東省農會北江辦事處，參加北江工農運動。經過我們確切的調查，你的地位與人事關係，極適合這一職務。相信你

必能達成本黨付託的使命！

「但必須注意的是：應該在工農運動中，吸收勇敢優秀的青年加入本黨，建立與健全黨的各級基層組織；目前每縣須建立一個支部，幷在國民黨及一切組織及民衆團體中，建立本黨的黨團組織，使本黨一切政策，都能運用黨團的作用，得以澈底實現。

「關於黨團工作的主要內容是：依照本黨的主張，適應客觀的環境，對每一件事，每一問題，決定適當的對策；幷具體的分配每一個黨員的工作，使全體黨員的行動言論都能一致；最重要的是使每一個黨員都能確實的深入群衆，爭取群衆、掌握群衆、使群衆同意本黨的主張，跟隨本黨的行動而行動，在羣衆中發生核心領導作用。」

他溫和地連續的說着，一句句深印在我的心中；他並且從容地詢問我關於北江地方上的一般情形，最後囑付我與省委組織部和省農會的同志連絡。

第二天，省委組織部的一位同志（已忘其名），和廣東省農民協會的阮嘯仙同志，告訴我關於目前北江農運工運的一般情形；如何去打擊機器工會的幹部，爭取工人群衆（中共認

爲機器工會是國民黨右派份子，與中共爭取群衆，對抗中共工運。）；如何去運絡當地防軍中的本黨同志，取得協助；進而運用群衆的力量，去打擊當地的土豪劣紳，壯大革命的陣營。

我欣然接受了這個艱巨的任務。毅然向攻鄂軍總司令部呈遞了一個長假的辭呈，摒擋行裝，踏上了向北江的旅程。此後，我便披着國民黨的外衣，做着共產黨的實際工作。

我由共產主義青年團員轉爲共產黨員，沒有經過其他儀式，祇由廣東省委寫了一封介紹信給農民協會北江辦事處及中共支部，編入了黨的組織之內。

## 二　開展北江工農運動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我到達了韶關。分頭與省農會北江辦事處和韶關縣農會籌備處取得連絡。晚上，召集農會的人員開了一次會議，會議中，我被分配的任務是：協助陳德釗同志開展樂昌縣工農運動；並指導仁化縣農會的工作。第二天，我穿上草鞋，冒着炎風烈

日，步行一百二十華里，回到我的故鄉樂昌。

北江地區橫亘着五嶺山脈，這一帶大部份是起伏不斷的山巒。樂昌是北江地區最北的一個縣份，與湖南省的宜章、汝城毘連，農民都具有中國農民的勤勞樸實的品質，他們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以上，因爲土地並不肥沃，所以長年都生活在窮困的日子裏，吃的是青菜飯和雜糧，穿的是破爛的布衣，住的是泥土築成的古老房子，中國傳統的「樂天知命」的思想保持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在沒有外在的力量來掀起一個革命的高潮時，他們是很少能自發的從事一項要求改革生活方式的革命運動的。

北江的可耕地很少而且很分散；擁有二百畝以上土地的地主爲數很少，多半是十畝至五十畝的自耕農。他們的生活雖然比較普通的農民好些，但由於近百年來帝國主義的侵略及中國社會的變亂相乘，農村經濟破產，正如中山先生所說的，只有「大貧和小貧」的分別而已。

豪紳是農村中的特殊階級。他們與貪官汚吏狼狽爲奸，把持着地方政權。國家的糧賦和

捐款，全部由窮人負担，他們不願拿出分文，還要從中竊騙。屬於人民大衆的教育基金、義賑基金、積谷基金，他們可以無饜的侵吞，縱情的浪費。同時，有些人還要在鄉間利用人與人間的矛盾，挑撥離間，製造爭訟，使人民傾家蕩產，而他們却從中漁利，以增加他們在農村中的權威。至於放高利貸和藉故強奪民產，更是很普遍而尋常的事。

農民耕種着地主的土地，每年要將土地收益的由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繳納給地主作田租。許多刻溥的地主用他們剩餘的金錢和粮食，在青黄不接的夏荒時候，將粮食或相等於粮食的金錢，貸放給窮苦的農民。最普遍的是在夏荒時借一担谷子，秋收後還給債主一担半，僅三四個月的時間，利息等於貸金的百分之五十。如果沒有田契或屋契作抵押，月息常高達百分之十，每年的利息卽達貸金一百分之一百二十，有田契或屋契作抵押時，年息亦達百分之三十六以上。農民終年辛勞，秋收後所得的穀物，除了繳付地租和利息外，便所得無幾了。農村中流行着一首民歌：「農民收了谷，家中無粒粟，田主家裏堆滿屋！」從這短短的歌謠裏，是充滿着斑斑血淚的。

農民在秋收後，必須以收穫的谷物去換取日用必需品，如油、鹽、火柴、布匹等。因爲運輸困難，農民無法將穀子運送到城市中去售賣，而且窮苦的農民很少有儲藏糧食的穀倉，祇好忍痛的賣給附近的豪紳地主及替豪紳地主收買的小商人。貪狠的豪紳地主們，利用他們優勢的金錢，故意壓低穀價，大量收購廉價的穀米；到夏荒時，又以超過原價百分之七十或八十的高價賣給缺糧的農民。無錢購買的農民，祇好忍受高利貸的剝削，這樣循環下去，許多農民永遠是負債者，他們的勞動力也永無休止的被剝削下去了。

農民並不心甘情願的忍受這種無限制的剝削，他們心中也隱伏着憤怒和怨恨。可是他們缺乏積極的革命性與組織性，如果沒有外在的力量來衝擊起他們內在的反抗意識時，他們是不可能也無力量來掀起一次驚天動地的革命運動的。根據中國的歷史，每一個朝代，都發生過農民的革命運動，但是每一次的農民革命運動，都是由中產階級或知識份子首先發難，並不是農民自己所主動；北江農民運動的開展情形，也是如此。

因此，這一階段中的國民黨的農民運動，可以說全部爲共產黨員所包辦。中共老黨員林祖涵（卽林伯渠，現任中共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當時便是中央農民部的部長，中共爲了實際掌握廣大農民，準備奪取中國革命的領導權，適應當時中國革命的實際需要，提出農民運動的口號，那便是：「反對豪紳地主壓迫！厲行減租減息！實行耕者有其田！改良農村組織！增進農民生活！」這些動人的口號。雖然當時農民運動的手段還溫和，但在農民看來，已經是非常滿足了。

樂昌最初負責農運的陳德釗同志，也是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的特派員。因爲祇注意到吸收小資產階級的靑年幹部，沒有將農運工作深入農村中去，他到樂昌三個月，祇有一個空架子的農民協會籌備處，附設在民團總局之內，毫無工作成績表現。我和他檢討了過去的缺點，經過縝密的策劃和思考，決定將我們在一年多靑年團的訓練中，所接受到的共產黨的政治鬥爭手段，完全施展出來。首先，我認爲爲要在那個半封建的社會上立定脚跟，爭取羣衆，必須利用國民黨的機關，憑藉國民黨這塊正統的招牌，來推動工會與農民協會的組織。且當時

樂昌民團總局長李傳楷先生，早年曾參加中山先生的中華革命黨，並負責樂昌黨務。中華革命黨改組後，樂昌縣黨務亦同時解體，新的國民黨機構尙未成立，在此眞空時期，正是我們最好發展的機會。

李傳楷先生是富於革命性的。他在地方上很有威望，而且掌握了實際的地方武力。陳德釗同志在樂昌工作三個月，得過他的帮助不少。我們便與他緊密連繫起來，在他的協助下來組織國民黨樂昌縣黨部。

這一工作計劃很快就完成了。選出朱節山（共產主義青年團員）爲常務委員，李傳楷、陳德釗、譚甯署、龔無害、丘劍一及樂昌縣長等爲委員。我被選爲監察委員，全體委員除李傳楷及樂昌縣長外，都是中共黨員或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因爲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是中共黨員譚平山，樂昌縣黨部成立的報告很快就批被準了。這一個國民黨的樂昌縣黨部，完全由共產黨所控制，我們就利用着國民黨的縣黨部來做共產黨的工作。

關於開展工農運動，我認爲首先要去深切的瞭解農民的問題，解決農民的問題，深入到

他們的生活中去。於是，我們便粗布短衣的裝扮起來，穿着草鞋，天天到農村去。利用農暇的時候，先和青年農民們談話，不拘任何場合，在田塍邊、在稻田裏、在卑濕破敗的農民家中，由一個人兩個人的個別談話，到二十人、三十人的集體演講，向他們灌輸簡單的革命知識，引導和鼓勵他們參加農運工作。經過了多時的訪問工作，便選定了其中三個熱心農運受過初等教育的農民爲幹部，負責組織村農民協會。由村農會選出鄉農會的籌備員，成立鄉農會。遞次成立區農民協會。

樂昌的農運工作，從附城鄉西門老虎頭村起，接着，便是我的故鄉長垑村，由於鄉村小資產階級青年的積極參加，很快的就在全縣普遍展開了。經過八個月的時間，成立了八個鄉農會，五十七個村農會，和船員工會、店員工會、理髮工會等。樂昌縣約有十萬人口，加入了工會、農會的男女會員竟達二萬餘人。革命的熱情，沸騰在全縣的每一角落。

是年十二月下旬，廣東省共產主義青年團，在廣州市召開全省代表大會，我奉調出席。那次會議由陳延年，任卓宣、沈寶同等主持，會議連續開了三天，指出了過去的工作錯誤：

「祗注意學生青年運動，忽視了農村青年工作。」因此，決議中主要的有：「迅速開展農村青年運動，吸收青年農民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建立共產主義青年團農村支部……。」并提出：「知識青年團員到農村去！」的口號。我因爲已在北江建立了兩個共產主義青年團農村支部，而受到大會熱烈的贊許。會後我代表樂昌縣國民黨，出席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對這次大會有周密的計劃，所有出席代表的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均參加中共的黨團組織，在會議中一切問題的討論發言，及選舉中央執監委員，均由黨團指示規定，行動言論絕對的一致，并積極拉攏國民黨左派代表，採取一致行動，企圖在這次大會中將國民黨右派打倒。可是我病了，沒有繼續出席。但大會的結果，中共雖然沒有將國民黨右派完全打倒，但在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中，中共黨員比第一屆增加了不少的席位，農民部與組織部仍爲林伯渠譚平山掌握，至是年三月十二日以後才國民黨中央黨部下令取銷。

一九二六年一月中旬我又同北江，二月到仁化視察。仁化的農民運動是由一位仁化籍的

中共黨員蔡正文負責。因為國民黨的縣黨部被當地豪紳掌握着，農運受到阻碍，工作不能普遍，祇成立了附城，董塘兩個鄉農民協會，十二個村農民協會。經我視察後，我們共同檢討過去工作的缺點，决議要蔡同志選幾位積極優秀的地方黨員幹部，分赴長江、扶溪、城口三個鄉開展農運工作。

我和蔡同志親到董塘、石塘一帶農村工作 分別訪問當地的智識份子和開明地主，用說服的方式去爭取他們。三天中，爭取了很多智識份子參加農運；甚至石塘村一位姓李的大地主，他有可容五百人的水寨及二十多枝步槍，也樂意協助農民運動，首先自動減租，停止收息，自置的全部槍械也全部借交農會使用。我佈置好了仁化的工作後，才轉回樂昌去。

這一年三月，仁化董塘鄉的農民，向地主要求減租停息——借債不還息，與該鄉瀝連村的地主發生武裝衝突，互有死傷。我由樂昌趕到仁化，協同該縣縣長調解，結果雙方讓步，減租百分之二十，借債的老本歸還不要息。這一械鬥才平息下來。但農民的鬥爭情緒仍極激烈，相互間的仇恨並沒有消除，種下了日後互相殘殺的惡果。

北江各縣的農民運動，祗有連縣、連山、陽山三縣，因缺乏適當的領導人選，沒有顯著的成績；其它如曲江、南雄、始興、英德等縣均普遍開展。尤以樂昌、曲江爲最好。

當時農民加入農民協會，每人繳入會費銀洋二毫。待會員名册造好，便由我們轉報省農會，每個會員發給圓形的銅質證章一枚，作爲會員的憑證。每個農會都有一面很大的紅旗，旗桿尖端的紅纓下，是一張鐮刀斧頭的小標幟，僅及紅旗的二十分之一，紅旗的正中是一個農民耕田所用的犂的圖案。迎風招展的紅旗，像三月的杜鵑花，遍佈在北江的原野上。鄉村農民襟上掛着圓形農會會員證的人一天天的增多了，他們自動的有組織的起來反抗一切不合理的壓迫和剝削，豪紳地主們全在農民強大的力量之前低下頭來，悄然地潛伏着。早日爲豪紳地主把持着的鄉村政權，現在全輕輕地和平地轉移到農民們的手裏了。

一九二六年春天，中共中央決定了武裝工農、奪取政權的計劃和步驟。一方面派一個姓朱的黃埔一期學生到韶關，協同省農會北江辦事處開辦農軍幹部訓練所；一方面命令各縣農民協會，積極組織農民自衞軍，并選調優秀青年，入農軍幹部訓練所受軍事訓練。農民們爲

了解除痛苦，實現革命主張，保衛自己的利益，無不熱烈參加。

駐防在韶關的國軍教導師師長陳嘉佑，是國民黨的左派份子，追隨中山先生革命多年，對於工農運動是積極援助的。北江農軍幹部訓練所，很順利的於一九二六年三月成立。第一期收訓了青年學生三百二十八。北江農民自衛軍的編組是：每村編一個分隊至一個小隊，每鄉編一個小隊至一個中隊，每區編一個大隊，轄區內各中隊。大隊是農軍編組的最大單位，受縣農會軍事部指揮。

農軍編隊的人數沒有固定的限額，以鄉村壯丁之數量而決定。有些中隊有三百多人，有些是一百餘人。從農軍單位的多寡，是看不出實有人數的。

同時，對於農軍的編組，事前欠缺縝密的計劃，採取志願方式，發動青年農民參加。農軍的任務也沒有具體明確的指示，祇是負責維持地方治安，及鎮壓豪紳地主對工農運動的破壞。這便是今日中共「民兵隊」的前身。各縣農軍陸續組成，中共在北江的勢力便迅速的膨脹起來。

是年二月，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兩廣統一委員會，廣西將領李宗仁、黃紹雄、白崇禧等均參加國民革命運動，增加了國民革命軍的實力不少。七月九日蔣中正氏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在廣州誓師北伐；當時國民革命軍共有七個軍，由何應欽、譚延闓、朱培德、李濟琛、李福林、程潛、李宗仁等分任軍長。是時湖南軍閥，力謀消滅唐生智軍，唐被迫退守衡陽，向廣州國民政府告急，國民政府即任命唐生智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兼前敵總指揮，率師北伐，國民政府並派第四軍十二師張發奎部由粵援湘，七月攻克湖南、攸縣、醴陵、第七軍李宗仁部亦于七月攻克長沙，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部於是年八月向江西進發，北伐軍繼續分向武漢、江西、福建進攻，聲勢浩大，勢如破竹。

秋天，我出席廣東省農會擴大會議，這次會議議決了擴大農軍組織、武裝農民、立即實行二五減租、迅速成立各縣的縣農民協會……等方案。會後，省農會常委羅綺園單獨和我商討有關壯大的北江革命鬥爭陣容的計劃。決定：一、借用各縣豪紳地主自置的與民間團體公置的民槍，充實農軍的裝備。二、與防軍陳嘉佑師切取連絡，並迅速開辦北江政治幹部訓練

班，動員各縣優秀智識份子參加，以造成大量政治工作幹部，適應北江革命鬥爭的需要。

為了遵從中共中央奪取革命領導權的指示，我們便加速的進行壯大革命武力的工作。北江政治幹部訓練班在十月成立，第一期受訓的學生有二百多人。農軍幹部訓練所的第一期學生，訓練了八個月便提前畢業，分派到各農軍部隊充任初級幹部，接着再招收第二期學生加緊訓練。

各縣的農軍已實施了利用農暇分區訓練的計劃，但是裝備問題却無法解决。於是，我們進一步發動各縣鄉村將祠堂廟宇的部份公欵提出，購買槍械彈藥充實農軍裝備。

我籌好了經費，便去廣州購買軍火，但因此却坐了三天監獄。當時，樂昌縣長劉應福，是國民黨的右派份子，吸食鴉片，生活極端腐化，官僚習氣十足，他對農民自衛軍的壯大更是深惡痛絕。我到廣州購買軍械的行動為他偵悉，等到我將軍械購妥準備北運的時候，他就向廣州公安局密報說：「樂昌著匪龔楚、薛仰聖、楊高林三人，在廣州購有大批械彈，準備由西村上車，北運韶關，該匪現住廣州市西湖路西湖旅店。…………」廣州公安局接到樂昌縣

長的密報，未經調查便馬上扣留了待運的械彈，幷於當晚將我和樂昌農會的薛仰聖、楊高林三人逮捕，拘禁在廣州公安局的拘留所內。

我被捕的消息很快的由省農會轉報給中共廣東省委，他們聞訊立即設法營救。當時國民黨上級負責人對中共的積極發展組織，內心雖表不滿，但表面上仍須敷衍。何況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中共跨黨份子在中央委員中佔了極大的比例，因之，中共中央一方面派人疏通；另一方面正式通知廣東民政廳長陳樹人，說明我是中央農民部派赴北江組織農軍的特派員，不能隨便扣留。陳樹人祇好照辦，轉飭廣州公安局將我和其他兩位同志釋放，武器彈藥亦全部發還了。

這是我爲組織農軍武裝的第一次入獄，失去自由的時間有三天，雖然飽嘗了臭氣薰人、空氣惡劣的鐵窗風味；但沒有受到刑罰，也沒有任何驚險，算是被捕生活中最幸運的一次。

我回到韶關，又在國軍陳嘉佑師部購買了各式步槍二百五十枝。在中共方面，旣有中共中央暗中支持策動與公開庇護，而地方上又得到廣大農民擁護和參加，因而北江農軍的實力

就逐漸加強了。

## 二　寧漢分裂與農軍北上

一九二六年的秋末，國民革命軍攻入武漢後，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將國民政府由廣州遷設武漢，中央黨部及政府人員即於十二月分批出發，先一批抵達武漢，後一批則在南昌停留下來。

一九二七年一月，國民政府中央政治會議忽在南昌召開，決定中央黨部暫駐南昌，武漢方面設置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國民政府聯席會議，代行中央黨部職權，因此，國民黨便開始分裂了。左派份子與中共跨黨份子，集中於武漢，右派份子，則集中於南昌。三月十日國民黨又於武漢，召開第二屆中央第三次全體會議，主要的決議有：黨務方面——廢除主席制，改設常務委員五人。政治方面——改組國民政府，廢除主席制，設常務委員五人。軍事方面——廢除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制，改組軍事委員會，設委員九人，由黨政方面五人，軍事方面四

人組成之。

這次會議的結果，國民黨左派佔了優勢，削減了蔣中正氏的軍權。至此，國民黨兩派的政治鬥爭，及國民黨右派與共產黨的鬥爭更尖銳化了。

三月二十三日，南京，上海，鎮江，光復後，四月，上海的工人在中共策動下，發生了兩次騷動，工人糾察隊的武裝，發展到擁有一萬多枝步槍。這股力量，對于國民黨當然是一個最大的威脅。國民黨的監察委員，即在南京舉行緊急會議，通過處置共產黨的決議案；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于四月十二日，在上海爆發清黨運動，大舉逮捕中共及親共份子，中共稱之謂「四一二菩迭擡」（註二），那時國民黨左派領袖汪精衞由海外歸國，抵達上海，為中共所拉擕，與中共領袖陳獨秀聯合發表宣言，反對清黨屠殺，并即趕赴武漢，與譚延闓、孫科、宋慶齡、何香凝等領導國民黨左派份子與共產黨合作，從新組織國民黨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

同時，蔣中正氏亦於四月十五日，召開國民黨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國民政府建

都的法案，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建都南京。這便造成了「寧漢分裂」形成了國民黨兩派對立的形勢。

中共中央在上海南京開始清黨的時候，立即下達了緊急命令，將整個廣東區的農軍動員起來，全盤的計劃是：以駐防北江的國民黨左派份子陳嘉佑師爲主力，調集各路農軍進攻廣州，奪取廣東省的地方政權，以廣東爲革命基地。廣東農軍的部署是：東路指揮彭湃。南路指揮黃學增。西路指揮周其鑑。北路指揮便是我。中區各縣由省農會直接指揮。全省農軍總指揮羅綺園。候命會師廣州。

在各路農軍緊急動員集中的時候，廣州國民黨當局李濟琛，緊接着上海的清黨運動，在四月十六日也大舉捕殺中共及親共份子。中共準備奪取廣東政權，以繼續進行鬥爭的計劃，因而完全失敗。廣東農軍總指揮羅綺園率領清遠、英德兩縣農民自衛軍，及粵漢鐵路工人糾察隊，共約三百人，狼狽逃到韶關，與北江區曲江縣的農軍會合。

羅綺園與陳嘉佑會商的結果，決定北上武漢，與國民黨左派份子汪精衛、宋慶齡等主持

的武漢政府合作，集中革命力量，與南京國民政府對抗。

四月十六日，我接到羅總指揮的急電，要我星夜趕往韶關商討北上的事宜。這時，韶樂邊界的八里排，有豪紳武裝四百多人，佔據週頭嶺上，深溝高壘，防備農軍進攻；并設卡在武江邊檢查來往船隻，勒收行水。農軍同志都勸我從陸路繞道前往韶關。為了時間限制，而且正值武江春汛時期，決定利用夜間乘小船冒險偷過週頭嶺敵方哨位赴韶。隨行的僅是副官包平同志一人。所幸船行很快，祗八小時便到達了曲江。與羅綺園陳嘉佑商妥了北上的行軍計劃後，又怱促地動身趕回防地。

回程中我携帶了銀元二千元，準備作為北江農軍開拔的行軍費用。步行至桂頭，僱了一隻小船，化裝商民冒險上溯樂昌。經過週頭嶺時，因船小未被檢查。可是到了距離樂昌二十里水程的麻風洲，突然從後而追來了五個手執駁壳槍的匪徒，大聲喝令停船；抓住背纜的船伕，將小船拉至右岸。這時，我和副官包平同志都沒有携帶武器，無法抵抗。匪徒上了船，即將我們綑綁，威逼船伕將船開至江中的麻風洲，準備脅刼我們上麻風洲去槍斃。船靠了

岸，我們像待死的囚犯，靜候死的降臨。幸而，正在將要押着我們上岸的時候，忽然救星來了。因爲這時已進入緊急狀態，樂昌農軍已經動員，組成了武裝巡邏隊在各交通要道巡邏，防範反動地主的進攻。當我們懷着悲憤的心情，被匪徒劫持的千鈞一髮的時候，一隊武裝農民巡邏隊沿河岸迎面走來。他們是認識我的，看見我被匪徒刼持，卽向匪徒射擊。匪徒見勢不佳，卽丟下我們狼狽逃去。於是，我們便由武裝農民營救脫險。

趕至樂昌縣城，我們沒有休息，通宵不寐的進行關於農軍北上的工作。

四月二十一日，曲江、樂昌、仁化、淸遠四縣的農軍，及粵漢鐵路工人糾察隊，全部集中樂昌，我向他們作了一次激動的演說，宣佈出省作戰的計劃。并說明不願北上作戰的農軍可自由回去原籍。許多農軍因有家室之累，不願離開鄉士，因此志願參加北上的計有一千一百多人，槍枝子彈都很齊全，士氣也很旺盛。

仁化的農民鬥爭的手段很激烈。當農軍集中時，少數急進份子竟捕殺了兩個勢力很大的土豪。後來國民黨軍隊范石生派一團的兵力及砲兵圍攻石塘水寨，該寨沒有參加北上的農軍

二百多人及家屬三百多人，頑強的固守抵抗，相持了三個月，等到彈盡糧絕，才突圍上雞山打游擊，老弱的農軍家屬被國軍追殺了百多人。其他地區的農民運動因爲手段比較温和，沒有與地方各階層結下什麼仇恨，遺下的農軍，遭遇沒有像仁化的那麼慘，祇是鄉村中農民協會的會長及與農民協會合作的工會領袖、商會領袖被捕殺了不少。

廣東農軍與陳嘉佑教導師是受武漢國民政府指揮的軍隊。北上的行軍計劃，是以廣東省的農民自衞軍、粵漢鐵路工人糾察隊、和北江政治幹部訓練班的學生作爲前衞部隊，陳嘉佑教導師作本隊，並以陳師駐英德警戒的一個團作後衞。行軍的路線是經湖南北上，由長沙直趨武漢。

我們的部隊在四月廿五日到達湖南郴縣，當地中共縣委會領導工農民衆萬人開會歡迎，情形非常熱烈。不過當時正是「馬日事變」之後，（國軍許克祥團奉命澈底打垮湖南的農民運動，在四月廿一日，圍攻長沙的工農團體和中共機關，大舉捕殺中共份子、親共份子、和農民協會的會員。因爲是二十一日發生的事件，代日韻目爲馬日，所以稱爲馬日事件。）中

共在湘東地區的實力大爲削弱，公開活動也全部停止。因爲有許克祥團阻梗在長沙，我們不能通過，陳嘉佑師祇好進駐衡陽，廣東農軍則分駐耒陽與永興。

陳嘉佑師到達衡陽時，奉到武漢國民政府的命令，擴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十三軍；廣東農軍也奉令改編爲十三軍補充第一團，由我充任團長。

不久，長沙事件也很快的解決了。我們的部隊在五月下旬推進到了武漢。這時，中共中央派黃埔軍校學生——中共黨員陳東日接充我的團長職務，調我爲團政治指導員，并奉令加緊訓練，等待新的任務。

## 附註

註一：陳延年當時二十多歲，由國外歸國到廣州後，即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至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國民黨淸黨時在廣州被捕殺，（見中國現代史研究委員會編之「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第七講「四一二」的「苦迭𨔶」紀載中有「上海屠殺後，接着廣東亦於四月十五日大舉

逮捕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份子。………革命英雄陳延年趙世炎就在此時先後犧牲了的。）

註二：三苦迭撻——是法文 Caup dètat 的譯音，是「大政變」的意思。

# 第三章　南昌暴動到潮汕失敗

## 一　武漢國共分家的原因

寧漢分裂時期，中共的決策是：「拉攏國民黨的左派，武裝二萬五千中共黨員及五萬農民，與南京方面進行武裝鬥爭。」當時各地的農民武裝暴動，便是遵照這決策的指示而發動的。由於共產黨缺乏正確的領導，農民運動多操縱在地方上游手好閒的流氓地痞手上，造成刼掠式與報復式的無紀律無原則的行動。以致在暴動過程中，不但沒收土地與財物，還要擄人勒索，焚燒屋宇，甚至屠殺豪紳地主和富裕的人民，這種無理燒殺的殘暴行爲，波及於國民黨軍官的家屬，引起了國民黨軍官的憤怒和反抗。許克祥闓的激烈反共行爲，也是爲了這個原因。

更重要的是：中共發動武裝暴動的計劃，使當時國民黨左派的領袖汪精衞，不得不有所戒懼（註一）。因而，中共與國民黨左派，也發生了裂痕。

中共與國民黨左派，雖然發生了裂痕，但由一九二七年七月初到月底止，國共雙方的高級人員仍然很友誼的共處在武漢，各自積極的半公開的準備下一次行動。國民黨左派的宋慶齡還發表一篇宣言，表示惋惜。中共在南昌起義時準備爭取國民黨左派份子參加，所以在南昌起義後成立的中國革命委員會（註二），還發表宋慶齡，何香凝等爲委員。這種政治鬥爭上的微妙關係，是政治手腕？還是革命意識的模糊？我當時只是個中級幹部，是無從明白其中眞諦的。

中共過去利用國民黨的左派與右派間的矛盾，以壯大了自己的勢力。但鑒於「四一二」淸黨的教訓，如果國民黨左派再對中共來一次淸黨，情勢是更爲不利的。於是，決定將其所能領導的軍隊集中南昌，準備南下奪取兩廣爲基地，與寧、漢兩政府抗衡。不過，中共所能掌握的軍隊實力非常薄弱，除了葉挺任二十四師長，及幾個團長之外，就祇有二十軍軍長賀

龍是可以掌握的，雖然那時賀龍還不是共產黨員。

綜合起來，力量還嫌不夠，因之，中共積極爭取國民黨左派的開明軍官，主要的對象是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因爲那時候張發奎所部有第四軍，第十一軍，第二十軍共三個軍，爲戰鬥力最强的軍隊，確有左右全局的力量。中共所派出游說煽動的人員，便分頭暗中進行這一個重要的計劃。

## 二　「八一」南昌暴動的史實

七月二十一日，廣東農軍，奉到中共中央的命令，要我們迅速脫離十三軍，開赴南昌集中。接到這個指示，我們便頗費苦心的研究離開武漢的方法。因爲部隊不遵守命令而擅自行動是要遭受軍法嚴厲的制裁的。武漢近郊的國軍又很多，我們一個團的兵力，力量太孤單，將無法與追擊的部隊作戰。怎樣離開武漢，這確是一個難題！

我想了一個通宵，想出了一個最有效的辦法。暗中以「回廣東去」的口號去煽動士兵的

思鄉情緒，拿士兵不服水土，農軍家庭觀念太深這些理由，與十三軍陳嘉佑軍長公開談判，要求准許農軍官兵離漢回粵。

陳軍長與農軍的關係很深，感情融洽。因爲農軍全部官兵，都是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大部份是中小學生，革命熱情很高，戰鬥力很強，比較北伐時的普通軍隊，素質上有極大的區別。他極不願意我們離去；親自到農軍駐地的武昌跑馬廳，召集全體官兵訓話兩次，要我們繼續留在十三軍，爲完成北伐的使命而共同奮鬥。訓話時聲淚俱下，言詞懇切。可是，我們已在全體官兵中掀起了一個要求回粵的高潮，對於陳軍長的慰留無動於衷。最後，陳軍長見無法挽留，又不願與中共發生衝突，乃慷慨的答應我們自由行動，不加干涉和阻撓。這是政治鬥爭史中絕無僅有的奇蹟。

這時，不少農軍幹部知道國共分家的消息，對中共的領導沒有信心，紛紛另尋出路。數日之間散去了三百多個士兵和下級幹部。團長陳東日亦由黨的上級調去。我以政治指導員代行團長職權，與副團長李資，率領着剩下的官兵六百多人，於七月二十九日乘船到九江。那

天晚上，汪精衛亦到達九江，勸諭張發奎勿爲中共所誘惑。三十日晨，街道上貼滿了擁護汪主席的標語，情勢爲之突變。是日午後三時，由南昌開來一列接運我們農軍的空車，我忽促地率隊搭上南潯路火車轉赴南昌，連我的弟弟和幾位戰友也拋下在九江了。

到南昌時，奉到中共中央的指示，與二十四師敎導團駐在南昌新營房內；此時，賀龍的二十軍第一第二兩個師全部，葉挺的第二十四師全部，蔡廷楷的十一師全部均先後到達。三十一日下午，二十五師副師長兼七十三團團長周士第率該團忽忽趕到了。這四個師和另一個團，便是南昌暴動的主力。

爲中共極力爭取的張發奎，見到兩湖農民搶擄地主財物，焚燒屋宇，屠殺地主豪紳的殘暴行爲，同時，又見到中共部隊的調動與集中，判定了中共行將變幹的趨勢；就毅然將其主力停止在九江至德安一帶地區，并向南潯線佈防，監視中共軍隊的行動。三十一日那天，張發奎隨帶衞士及俄顧問搭火車赴馬廻嶺，巡視及督導駐在馬廻嶺的十一師李漢魂部。當火車經馬廻嶺繼續向德安駛去時，才發覺這列火車已被二十五師的一個連武裝控制了，乃不顧危

險，跳下火車，步行回馬廻嶺。他的衛士及俄顧問在火車到達德安後，即被二十五師之周士第團繳去槍械，俄顧問的衣服也被剝光，讓他們步行返馬廻嶺十一師師部。周士第這種處置，眞是莫明其妙。

張發奎不受中共的煽惑，引起了中共的徬徨與失望。而駐在南昌城外國軍朱培德之王均師態度不明，更是中共中央非常憂慮的心腹大患。因之，先發制人的行動是勢在必行的。

三十一日晚上十點鐘，「總指揮部」（註三），送給我一份最機密的緊急作戰命令。略爲：

『我軍爲達成解決南昌敵軍的目的。決於明（一）日一時開始向城內外所駐敵軍進攻，一舉而殲滅之。

該部農車於攻擊開始前，完成新營房駐區之防禦配備，幷有相機增援二十四師教導團對新營房南端敵軍攻擊之任務。

署名：總指揮是賀龍，副總指揮爲葉挺』

我接到命令，立即與二十四師教導團長洽商連絡計劃；并於零時三十分，秘密的完成了一切準備工作。秋初的深夜，晚風吹在身上有着無限涼意，我們爲着這一緊急任務所激動，熱情像火一樣的燃燒，個個磨拳擦掌，準備迎接一塲慘酷的厮殺。

我們的駐地附近，另有國軍王均師的一個營，這個營，就正是我們奉到命令將要圍攻繳械的對象。我們雖同駐新營房兵舍，但各有一個大門出進，大門的方向，一個在南一個在北，操塲中間隔了一道短牆；新營房的地區很大，每座兵房都有足夠集合部隊的廣塲。因此，我們與敵軍實際上就只隔了一百公尺的距離，而且這一道短牆遮住了彼此的視線。我們爲了謹愼起見，所以命令和指示，都是以耳語傳達的；集合時躡手躡脚，不准有過大的聲响；裝子彈上刺刀也在黑暗中摸索進行；恐怕被國軍發覺而有所準備。

八月一日晨一時，城內城外的槍聲都响起來了。接着，連續的重機關槍聲，衝鋒叫殺聲，在靜寂的黑夜裡，激起軒然的巨浪，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八一南昌暴動便開始了。

我們農軍所担任的任務是：守備新營房及協助二十四師教導團解決新營房敵軍一個營。

剛一時正，負責衝鋒的教導團一個營，僅以兩响駁壳手槍便解决了敵軍的衞兵，然後飛速的衝進了兵房，由於敵軍營長事前毫無戒備，全營官兵，從夢中驚醒。我軍壹面控制了敵軍的武器，一面命令敵軍官兵到操塲中集合，經過搜身，便一批批地押送着進入我們所駐營房的操塲。被俘的敵軍官兵都垂頭喪氣，滿面驚慌，有些連衣服的鈕扣也沒有扣上，在晨風中顫慄。他們的武器像木柴似的一綑綑由我們的戰士與高彩烈的協助着敎導團士兵抬進營房。

這時，還不到四點鐘，全面戰鬥尙未結束，不時有疏疏落落的槍聲。爲了防備敵軍的反攻，我所率領的農軍，專負責營房週圍的警戒任務。

天亮之後，市區已無槍聲，我們這一個戰鬥單位所派出的人員，才與「總指揮部」（設於江西大旅店）及參謀團取得連絡。他們接到報告後，非常高興。因爲在南昌暴動的整個戰鬥中，解决敵人迅速，而自己幷無傷亡的祇有敎導團和我們這一個戰鬥單位。九時左右，郊區槍聲也聽不到了。駐在南昌城內外的國軍部隊，大部份已被繳械，一部份衝出了包圍圈向

北逃竄。「八一起義」（註四），便意外的順利成功了。

上午十一時，南昌全市已經解嚴，祇是交通要道佈下了少數哨崗。我特地到市區去巡視，整個南昌市，冷清清的像一座死城，全市商店住宅都關門閉戶，街上除了少數軍人在踱步巡邏之外，看不到一個老百姓。

十二時後，在小街上的幾間小飯館才開門營業。那些餓了一個上午的窮苦市民和苦力，陸續到飯館中來吃飯。我也到一家小飯館，見到來吃飯的市民，都顯得很胆怯，他們也不敢向飯館中的軍人打探消息，更不知道夜來的戰鬥究竟是幹的什麼。

下午二時左右，挑着菜蔬食物的農民，三三兩兩的入市了。這時，總政治部派出的宣傳隊，沿街拍着商店的舖門，叫商人開門做生意。南昌全市逐漸的復甦過來。部份商店已開門營業，好奇的市民們，來往街衢，以欣賞戲劇似的心情，觀看滿街的紅綠標語；或聚在一堆看「中國革命委員會」的安民佈告。

一個好的現象是：在暴動開始以迄終止時，沒有發生乘機刧掠的情事。市面秩序，仍很

安定，市民除了當戰鬥時遭受意外的驚恐以外，再沒有其他的事情影响到他們。一夜之間政權的變換，對於他們祇好像一塲戲劇的演出，國軍和共軍是劇中的主角，南昌市民算是觀劇的人。

這次暴動，因爲事前極端秘密，沒有一個工農民衆參加，事後也沒有召開民衆大會，告訴人民這次暴動的意義，以擴大暴動的政治影响。連軍隊中的政治工作，也很少注意到這一點，所以軍隊中的初級軍官和士兵，根本不知道暴動的目的。市民更不瞭解其中眞相了。

這一天，正式宣佈「中國革命委員會」成立，以譚平山爲主席，鄧演達，宋慶齡，何香凝，張國燾，林祖涵，李立三，周恩來……等爲委員，吳玉章爲秘書長，內設工農運動委員會：主任張國燾；參謀團：主任周恩來；財務委員會：主任林祖涵；政治保衛局：局長李立三；幷公佈政治主張：如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實行土地革命，沒收二百畝以上地主的土地。建立鄉村工農政權。鞏固革命陣線。保障人民言論，出版，信仰，結社，集會，罷工之自由等。

同時成立「總指揮部」，以賀龍為總指揮兼二十軍軍長，葉挺為副總指揮兼第四軍軍長，劉伯承為參謀長，郭沫若為總政治部主任。我們農軍奉命改編為第四軍教導團新編第二營，以張駿為營長，我為政治指導員，李奇中為副營長，李資另有任務。

這一階段中共仍希望與國民黨左派合作，所以其所採用的政策，性質還比較溫和，與資產階級性民權革命的方式，大致相同。俄羅斯式的「蘇維埃政府」的招牌，還沒有明目張胆的掛出來。革命的目標也並不顯明。

參加這次暴動的官兵，共產黨員或青年團員約佔有百分之一（註五）。軍官方面，國民黨左派份子佔了最大部份，他們大多數是被動的服從命令而已；至於士兵方面，因為當時的軍隊是在募兵制度下募集而編成的，當兵是一種職業，士兵們的腦海裏，祇存着一個概念，便是吃飯、領餉、打仗、升官或者戰死，所謂革命也者，與他們是不相干的。對於共產黨奮鬥的目標，他們更是一無所知。在這種情形下所進行的革命事業，它的基礎是不穩固的。

## 三　動搖混亂中的轉進

南昌暴動結束了中共與「武漢國民政府」的合作，同時，由於輕舉妄動而樹立了兩方面的敵人。那時中共所領導的賀，葉軍總數爲三萬多人，是無法分頭迎擊來自寧，漢兩方面的進攻的。在南潯線佈防的國軍第二方面軍張發奎部，更是賀葉軍的最大威脅。因此，祇有退向兵力薄弱的廣東尋找根據地，才是最安全的策畧。它們提出了「打回廣東去」的口號，使大部學籍軍官更爲興奮。

八月五日淸晨四時，賀葉軍全部撤離南昌。只有被裹脅而參加南昌暴動的第四軍第十一師師長蔡廷楷（註六），却率部脫離賀葉軍，單獨向廣東方面行動（註七），幷捕殺該師的共產黨員團長一人及營連長政治指導員數人。這個突變，給予賀葉軍士氣的打擊是很大的。其實，在當時除了少數共產黨員所控制的部隊之外，其他非共產黨員，像蔡廷楷之流對這一行動發生動搖懷疑的份子，還是很不少，足證這次南昌暴動是幷不成熟的。

大軍出發的第一個目的地是撫州，教導團編入行軍序列的本隊之內，隨着總指揮部，參謀團，革命委員會各機關行進。前衛部隊中的二十軍一、二兩個師，大部是湘西的土匪，在北伐時爲國民黨收編。他們沒有什麼紀律，完全是以黑社會中特殊關係來維繫，他們雖然由土匪變爲國民革命軍，但還沒有改變土匪的行爲。在向撫州行軍的途中，沿途隨便放槍，有些官兵更乘機向人民搶刼衣物，每進入一個村莊，他們便用刺刀宰殺人民的肥猪，鷄鴨，弄得鷄鴨亂飛，猪嘷犬吠，童婦哭叫，秩序大亂。尤其是他們隨地大小便，到處都臭氣薰天，中人欲嘔。民衆敢怒而不敢言，憤恨不已。

同時，因爲繳獲國軍的槍彈太多，一綑綑一箱箱裝在舊式的手推木車上，强拉民伕推運，把民衆當作奴隸一樣看待。這一來，人民對於從南昌退出的賀葉軍，視同土匪一般的畏懼。因而，行軍路線兩旁村落的人民，在葉賀軍未到達前，男女老幼，携帶着粮食，衣物和牲畜，紛紛向山林逃避。因爲先頭部隊的紀律太壞，使本隊和後衛的部隊受到影響。老百姓旣然跑了，於是，粮食發生問題，油鹽和蔬菜更難買到，甚至連一杯茶水也須到達宿營地時自

行煮沸，方有得喝。

這時，葉賀軍還沒有建立兵站補給制度。由政治部派員在各師成立徵發隊，以達爲補給單位，每單位派炊事兵隨徵發隊到較遠的富戶家中或公粮倉去，强行打開倉門，按每單位的需用量分配谷子。由各部隊派兵自行礱磨。軍隊太多而磨谷的礱子少，往往到深夜時才吃晚餐。因沒有經過篩除谷壳的精密手續，飯內谷壳很多，簡直無法下咽。菜蔬也是極少量的。大部份的官兵都是用開水泡飯。爲了充飢，只好狼吞虎嚥的吃下去。經過這樣的磨折，官兵們的精神和體力，自然受到不良的影响。

賀葉軍所使用的鈔票，是「武漢國民政府」的「國庫劵」。在武漢還作九折使用。南昌暴動後，信用全失，人民拒絕接受。官兵們窮得連購買草鞋的錢也沒有。我的草鞋爛了，祇好赤足行軍。在砂石的路上行走，脚掌被磨穿了，幷且腫脹起來，眞是痛苦萬分。當軍官的尙且如此，士兵們的痛苦就更可想而知了。

大兵團的行進，最感困難的是宿營的房舍不敷分配，我們沒有帳幕，每晚都是在空曠的

草坪或樹林裡集體露營。江西山岳地區的秋夜，風寒露冷，我們的被氈單薄，往往從夢中凍醒，恍惚睡在水中一樣，不能入寐。

我們經過三天的行軍，七日下午到達了撫州。我這一營，又奉到命令改編爲第二十軍第三師第六團第三營。八日在撫州休息，下午四時，全軍集合由總指揮賀龍訓話；并行佈達式，派周逸群爲第三師師長，傅維鈺爲第六團團長，同時宣佈第九軍成立，派朱德（註十）爲軍長。這時，撫州城內，到處貼滿了第九軍教導團的標語。有一則上面寫的是：「打倒朱培德！擁護朱德！」我當時對朱德毫無認識，特地去向參謀團的同志查問，他對朱德也無深切了解，祇簡畧的告訴我：

「朱德是本黨的同志。原先做過南昌公安局長，及國軍朱培德軍的副軍長兼軍官教導團長，該團駐在撫州訓練，我們在南昌起義，他在撫州响應。這次與大軍會合，所以派他爲第九軍軍長。」

我聽了，雖然不能詳細了解朱德的過去歷史和個性，但一個確切的事實是：南昌「八一

」暴動時，朱德並沒有在南昌參加。

今天，中共所有的黨史資料中，故意歪曲的記載：八一南昌起義是朱德所領導的。不過是借此來提高他的聲譽和穩固他在中共軍隊中的「正統」地位而已。在當時，賀葉軍各單位中實力最薄弱的就是朱德的第九軍。因爲他的教導團學員大部逃亡，隨他起義的祇有二百多人，第九軍只是一個空頭番號。行軍時的任務：不是隨先頭部隊打前站設營；便是在後衞部隊中押運革命委員會的行李，當作特務營一樣使用。比諸我領導參加南昌暴動時的廣東農軍，還相差了兩倍的人數哩！

在經宜黃到廣昌的行軍途中，領到了行軍零用金，我分配到十元銀洋。在市場買了一雙布鞋，這才解除了赤足行軍之苦；並買了一些猪肉和鷄蛋，與營部官佐進了一次豐富的晚餐。

飯後，我接到通知參加中共黨員幹部會議。會場擇定在廣昌城內的一間學校。革命委員會各單位首長，及軍隊中的黨員幹部，共有百多人出席。首先是歡迎賀龍同志入黨的隆重儀

式。賀龍宣誓之後，在全場的熱烈掌聲中，便正式成爲中共黨員了。

二十軍是賀龍的基本部隊，官兵對「黑鬍子」（賀龍的渾號，二十軍官兵對賀龍的親密稱呼）的趣聞軼事，比知道他自己父親的經歷還清楚。談起「黑鬍子」，那些跟隨賀龍由土匪出身的官兵便會口沫橫飛，津津有味的說出來，因之，我對賀龍的認識便有了個大概的輪廓。

賀龍生長在號稱難治的湘西桑植縣，那一帶民性强悍，勇武好鬥，人民對於打家刼舍的「山大王」生活，幷不認爲可恥，反之，因爲近百年來湘西所出的將軍一類的人物，大都先經過土匪的階段，再受政府招安而封官。這種風氣造成了人民對武力的盲目崇拜。賀龍就在這個風氣橫煽下而成功了，他是中國近代史上靠土匪起家的人物之一。

少年時代的賀龍，家庭窮困，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他孔武有力，他的發跡是極富於傳奇性的，因爲他是靠着一把菜刀起家的。

偏僻的湘西，政治素來腐敗，「縣知事衙門」照例在秋收後要派糧警下鄉催收田賦。糧

警在鄉村中作威作福，魚肉人民，是最普遍的現象。一次，秋收後的某天，桑植縣衙門的粮警正在賀龍的家鄉多端苛索的時候，孔武有力性情剛强的黑鬍子，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一把菜刀結果了粮警的性命。奪取了粮警的一枝毛瑟單响步槍，到深山中去落草，開始其打家刼舍的土匪生涯。不久，附近的貧民，都來入夥，勢力便一天天的擴大起來，他居然成爲一個威鎮湘西的土匪首領。

當時的政府，政治旣不修明，淸剿又不認眞，所以土匪的勢力，祗有一天天的坐大。到了無法收拾的時候，便以一紙招安的命令，與土匪妥協，賀龍也不例外。他經湖南省地方當局招安後，便受任澧州鎮守使，指揮着湘西十餘縣的地方部隊。

國民革命軍北伐時，因爲賀龍這股力量相當强大，便又收編他的部隊爲國民革命軍獨立十五師，調離湘西的防地，參加北伐。當寧漢分裂時，汪精衛拉緊賀龍，升他爲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以後，中共又再度拉緊他，成爲南昌暴動的軍事總指揮。他就是這樣的變來變去，憑着他的土匪本錢，在政治紛爭的夾縫中，爬上顯赫的位置。中共常常宣傳說他有「

先天的革命性」，恐怕連他自己也不相信呢！

他是一個中等而壯健的身材，圓圓的面龐，表情很遲純，兩眼稜稜有光，相當威嚴，上唇蓄着短髮，戴着圓形的大帽，十足是一個軍閥的典型。他最不善於說話，談話時總愛將「而」字冠在每句話上：「而這個，而那個，而我們，而你們，而……」因此常常辭不達意。

他的優點是：待人很厚道，脫不了綠林豪傑的豪爽氣概。這也許就是他成功的唯一條件。

## 四　臨刑前的救星

部隊從廣昌出發時，我們的營長張駿病倒了。我奉令代理營長，連指導員卓慶堅代理營指導員，繼續向瑞金前進。到達隆崗墟宿營的晚上，奉到總指揮部的命令：

「據報壬田市（瑞金北三拾華里）有敵軍第三師錢大鈞部步兵一個團，其前哨營在周家排附近向我方警戒。………

「該營歸朱軍長指揮為前衞，於明日拂曉六時向壬田市搜索前進。……」

「二十軍為本隊繼續跟進。……」

那天晚上，我們的部隊在墟外的松林內露營，那是一個月明星稀的秋夜，景色如畫。但是，我們那有安閒的心情去欣賞，很早便休息，準備早起出發，負担明天的前衞戰鬥任務。

第二天，我派出一個連為尖兵，自己率前衞本隊向目的地搜索前進。下午四時到達胡坡，尖兵連的連長報告周家排附近確有敵軍警戒部隊。我一方面派人向朱軍長報告情况；同時，親赴尖兵連指揮。

尖兵連派出的搜索排，這時還沒有再將敵情繼續報告，我急於明瞭敵情和地形，便偕同代理營指導員卓慶堅，及傳達兵鄧松，改穿便衣親赴前方偵察。

我們離開尖兵連的位置，前進了三百碼左右，尚未發現我方的搜索排（搜索排分向兩翼搜索，忽視了大路），正感奇怪的時候，埋伏在大路旁叢林裏的國軍一個排，突將我們包圍。我與鄧松放了兩槍，便被敵軍完全控制，將我們的武器繳去，接着把我們送到周家排敵軍

的前哨營營部。我淸晰的記得，那個營部駐在一個山坡下的小廟內，廟後是個小樹林。剛將我們押解到廟門外時，我方的搜索部隊和這個營的前哨部隊接觸的槍聲，連續着傳到我的耳鼓裡。

從廟裡跑出來的那個國軍的營長，聽完了押解我們三個俘虜的排長報告後，怒容滿面圓睜兩眼用手向我們三個俘虜一指，對他的排長說：

「將他們拖到後面通通槍斃！」

「是！」那個排長答應一聲。立即指揮着一個班長和幾個士兵，將我們三人推向廟後去。

那時候，我的血在沸騰，心在急跳，神經像被針刺一般的刺痛，已經無法控制自己的全身官能。是痛苦也是辛酸，一種生的最後絕望的感想，不自覺的衝口說出了一句話：

「唉！想唔到我呢條命今日死喺呢處！」

我吐出的每個字，自然是濃厚家鄉口音——廣東話。

那個營長聽到我說的是廣東話，忙叫：

「把那個高佬拖回來！」

這一來，我的生命便從死神的魔掌內脫逃了。兩個士兵將我推了回來，而營指導員和傳達兵仍被他們推往樹林中去。當我被押回來時，那營長坐在一張木櫈上，親自用廣東話問我：

「你係邊處人？做咩嘢職務？為咩嘢要做共產黨？」

我聽到他的說話是韶關口音，意想到他為什麼要將我拖回來。靈機一動，便編了一套謊話：

「官長！我係韶關人。响教導師當特務長。呢次聽說部隊要返廣東，也就跟住行。我唔係共產黨，共產黨係咩嘢我都唔知道。今日渠地要我走到前面來睇情形，就俾你地部隊捉住。為咩嘢事幹將我槍斃，我自己都唔知！」

我說話時完全用廣東韶關的口音，態度學成很誠實而天眞。那營長果然被我瞞過，吩士兵將我鬆了綁縛。這一刹那，猛聽得廟後附近地方响了幾槍，我方被俘的政治指導員和傳

達兵的生命便完結了。生死異途，心裏有說不出的辛酸。那營長親切地對我說：

「我姓張。我係韶關人。我地係小同鄉！你既然要返去，就跟住我行啦！」

這時，傳來的槍聲，由遠而近，由疏而密，前線的戰鬥顯然是國軍失利了。接着，這營的傳達兵急速的跑回營部報告，共軍已突破了前哨的陣地。張營長從衣袋裡拿了三塊銀元給我，叫我隨同營部的行李和伙食担先行退往壬田市。我如同逢到大赦，內心有無限的喜悅。但外表上仍力持鎮定，動作學成緩慢而帶稚氣，離開了那個「生死塲」。

由周家排至壬田市，沿途都是山地，林深草密。行李和伙食担的行列由一個副官率領着。他們對我也沒有什麼注意。在半山的小路上，轉了幾個灣，將要到達山坳的時候，我選定了一處山坑下有草叢的地方，即從山腰的路邊滾下山坑，迅速躲入草叢中匐伏着；押着行李的副官隨便的向山坑放了兩槍，便率領了這行列怱促的退走。

我由草際中看到行李行列走過了山坳，站起身來。我的衣服被荊棘勾爛了，手脚和面部也受刺傷；我忘記了痛楚與疲勞，辨明了方向，沿着山坑跑回我軍部隊去。

同志們見我生還，都非常高興。朱德正在前衛指揮，激動地握住我的手，好半天才說：

「龔同志！你眞有本領！你眞有本領！據搜索排的報告，他們在山上看見你和兩個同志被敵軍俘虜。我們都以爲你已犧牲了呢！」

我簡畧的將我脫險的經過告訴他，即繼續指揮部隊作戰，經過兩小時的戰鬥，我的前衛部隊配合本隊的二十軍，以强大的壓力佔領了壬田市，消滅敵軍兩個營以上的兵力。嗣後，第二十軍的一個師，繼續追擊向瑞金潰退的敵軍，本營奉命在壬田市宿營。這天晚上歸還建制。這次戰鬥，本營損失了兩枝漢造駁殼，犧牲一官一兵；鹵獲了敵方四十八枝步槍，一枝德造駁殼手槍。

第二天，張營長已病愈回營，我依舊回復到政治指導員的崗位，繼續向瑞金前進。

## 五　光榮的警衛營

我軍到達瑞金，接到情報：國軍第三師錢大鈞部集中主力，固守會昌縣城，武陽圍有一個團向我方警戒。

這時，我軍的作戰部署，是以第四軍葉挺部爲右縱隊，從會昌河下游渡河，攻擊會昌之西南門，幷截斷敵軍退路；二十軍之第三師及教導團爲左縱隊，先行掃盪武陽圍之敵軍，向會昌正面攻擊；二十軍第一第二兩個師爲總預備隊，隨左縱隊跟進；第九軍及總指揮部直屬部隊，隨革命委員會留駐瑞金。

第三師由瑞金出發的第一天，驅逐了武陽圍的敵軍，佔領了武陽圍及謝坊，本營在謝坊宿營幷對會昌警戒。是晚有微雨，星月無光。午夜一時向會昌出發，摸索着前進，行軍很緩，心裏異常焦急。拂曉前，到達了會昌城北的五里排及青山敵軍陣地前約一千碼的山邊，團長給予本營的任務：攻擊青山敵軍陣地的正面。

我們奉命後，由張營長率領一連先行，我率着兩個連跟進。我們的左翼是教導團；右翼是我第六團第二營。本營接近到青山山脚時，卽以兩個連展開向青山之敵攻擊。戰鬥開始就

很快的接近敵軍陣地投入衝鋒。戰鬥約三十分鐘，佔領了敵軍的警戒陣地青山，繼續擴張戰果，向五里排敵軍之主陣地中央攻擊。

五里排的敵軍有約兩個團的兵力固守頑抗。戰鬥到上午八時，敵軍的增援部隊趕到，將本營左翼的教導團擊退。這時右縱隊葉挺部還沒有接近會昌，我第六團爭奪五里排得而復失者四次，雙方傷亡慘重，陣地上堆滿了死屍。

下午三時，右縱隊葉挺部已向會昌城猛攻，我總預備隊亦已參加作戰。是時五里排之敵即全線崩潰，向會昌縣城敗退。我軍毫不停留的跟踪追擊。追擊時雙方的部隊混雜着，我們越過了小股敵軍的前頭，敵軍已失去戰鬥意志，不敢放槍射擊，被我們發覺了便自動的繳械。我軍前進至會昌城北河邊，葉挺的部隊已攻入縣城。由五里排敗退的敵軍殘部，在會昌北門一帶投降繳械。我軍便佔領了會昌縣城。

在攻防戰的最後一剎那，戰鬥的情況眞是慘烈極了。我軍猛烈砲火的集中攻擊，敵軍死傷無數。會昌的河水飄流着無數的死屍。同時，我軍的死傷也很多。本營參加戰鬥的官兵三

百二十八人，生還者只八十三人。兩個連長陣亡，一個連長重傷，排長祇存五人。而我在早上九時就負傷，傷處在足部，敷了救急藥後，還能勉强行動，繼續作戰到底。

總指揮部以本營傷亡最重，即日調返瑞金休息整補。幷將總指揮部直屬的兩個監護連撥歸本營，爲紀念本營的英勇戰績，改編爲革命委員會警衛營。

我軍佔領會昌的第二天，增援會昌的敵軍黃紹竑部，獲悉錢大鈞部潰敗及會昌失陷的消息，即停駐於會昌西南地區，準備反攻，與我右縱隊葉挺部遭遇後展開大戰。結果被我軍擊潰，傷亡亦很慘重。當時如能乘勝追擊，不難將共澈底消滅。這一戰役雖然我沒有參加，但是這個敎訓給予我很深的印象，促成我在研究紅軍戰術原則時，發現了「猛打猛追」戰術的遠因。

## 六 運用失敗的戰畧

會昌之戰，本已奠定了攻粤軍事勝利的基礎。因當時由會昌經平遠、興寧至廣州之線，

沿途無大軍駐守。廣東國軍力量不大，且分散於西北江一帶，調集需時。而張發奎率領回粵的大軍，還在吉安泰和途中。假如我軍能乘勢追擊由會昌經潯鄔、平遠、梅縣、興寧、五華、惠陽、直搗廣州，勝利的公算極大。而且，在佔領廣州後，再以大軍佈防北江，對張發奎部警戒，使張軍進退維谷，然後運用政治手段，爭取與張發奎軍合作，而以廣東為基地，徐圖發展。那麼，二十年來中國軍事政治變革的面貌，或許就完全不同了。

可是，當時中共還缺乏有遠見的戰畧策劃人材，沒有觀察到這個極有利的軍事局勢，竟放棄了這一有利的戰畧行動，採取「繞道福建長汀，進攻廣東的潮安汕頭，佔領東江一帶沿海各縣，鞏固這一基地後，再向廣州進軍。」的戰畧；他們所持的主要理由是：潮汕是一個海港，可獲蘇聯接濟，同時海陸豐及東江一帶，有很好的民衆基礎，可以穩步地向前發展，不做軍事冒險。事實上他們沒有認清：（一）．潮汕是濱海地區，本身既無海軍，而在陸軍作戰的地理上，也是處於不利的形勢。（二）．大軍繞道迂廻，給予廣東國軍充分集中兵力及部署作戰建立戰地的時間，我軍轉主動為被動，轉進攻為防禦，隨時有遭受挨打可能。因

之，中共潮汕地區武裝鬥爭的失敗，這一錯誤戰略是極重要的原因。

## 七　一敗塗地的潮汕鬥爭

由瑞金經福建長汀，上杭進入廣東的賀葉軍，於九月廿四日順利的佔領了潮安、汕頭。革命委員會及黨政高級機關，均設於汕頭市。賀葉軍主力繼續進佔豐順，揭陽之線，準備向普寧、潮陽、海豐、陸豐各地發展。周士第之二十五師留駐三河壩，朱德之第九軍教導團留駐溜隍市，向梅縣方面警戒。

我於到達汕頭後，奉命以本營為基礎，將革命委員會所有直屬部隊合編為警衞團，派我為團長，負責汕頭市的警衞，并保護由汕頭至揭陽的運輸船。

廿九日午後一時，中共高級人員正在汕頭市嘉應州會館開會的時候，國軍之飛鷹艦突然進攻汕頭。海軍陸戰隊三百餘人在汕市强行登陸。我指揮警衞團與敵軍展開激烈巷戰，經過三小時的戰鬥，將登陸的敵軍陸戰隊殲滅一部，其餘登艦逃去。

汕市戰鬥才告結束。而另一方面，廣東國軍大部，及廣西黃紹竑軍聯合。亦於廿九日大舉向豐順之湯坑進攻。苦戰一晝夜，我軍陣線卒於三十日被敵軍突破，部隊潰敗。因爲情勢突變，汕市各機關部隊，於是日黃昏後倉惶向普寧及海陸豐撤退。（註九）

我的警衛團，大部派出護送運輸船赴揭陽，和負責潮汕鐵路一帶的警戒任務，一時無法集中。僅掌握一個營的兵力，掩護革命委員會各機關乘船至普寧，轉由陸路至流沙，中午在流沙稍事休息、幷進午餐，掩護中共黨政軍高級人員在流沙基督教堂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軍隊由賀龍、葉挺、彭湃指揮，開赴海陸豐，與民衆打成一片，繼續進行鬥爭；其餘各高級黨政人員，卽在沿海覓帆船赴香港候命。

我們在流沙休息時，第二十軍一二兩個師已通過流沙，向海陸豐前進。待高級人員會議完畢，我便率部掩護他們繼續行進。可是，情況又有變化。我們剛離 流沙五華里，從左方截擊的粵軍佘漢謀旅已經在二十軍一二兩師通過後，佔領了我們前面的高地，截斷我們與前頭部隊的連繫，阻止我們前進，戰鬥又再開始。

我們的兵力實在太單薄了，祇有二十四師一個營，和我的一個營，而所有黨政軍的首腦和各機關人員，全部在這一行軍序列之內。所幸時已黃昏，而派出爭奪正面高地的一個營經過一小時激戰之後，將道路兩旁的高地佔領，但疏疏密密的槍聲，仍不斷的從我們的側面送來。

我們愼重沈着地掩護各高級人員通過這危險地區時，所有行李輜重盡皆拋棄，幾十担銀洋也丟掉，請形非常狼狽。參謀團主任周恩來正在病中，原先他是坐担架的，在戰鬥激烈情形混亂時，抬担架的民伕乘機逃跑，祇由他的隨從扶着他在小溝中艱難而喘息地走着，在深秋的夜裡，海風凄厲，寒氣襲人，他的病更為加重，發着高熱，不斷的呻吟。我們的部隊，在黑茫茫的田野裏，摸索行進，部隊建制完全散亂，落伍的人也很多。村莊中的碉樓，更不時向我們射擊，有些同志便在黑夜的冷槍中無聲的倒下去了。

第二天早晨，纔狼狽的到達了甲子。高級人員如譚平山、張國燾吳玉章、惲代英、郭沫若、徐特立、劉伯承、李立三等，即分批陸續由甲子僱帆船出海赴香港。

葉挺隨同彭湃另　小路潛入海陸豐鄉村，企圖再收散兵，與賀龍的二十軍一二兩師取得連絡，繼續進行鬥爭。

帶病的周恩來隨我們的隊伍離開甲子，到達一個小鎮宿營。他因病不能再繼續隨部隊行動，也祇好單獨僱船赴香港療治。臨走時他吩咐：剩下的黨政軍各機關幹部一百多人，和二十多個士兵，要我和周其鑑負責率領，赴陸豐的金廂鎮，將武器交與當地區農會，然後覓船赴香港再行聯絡。

在赴金廂的途中，我們多改換便衣，將步槍交與地方農會，只携帶駁壳手槍三十餘枝自衞，可恨天不作美，下着傾盆大雨，我們的衣服都濕透了。經過路旁的一個村莊，向村民收買兩笠，每頂代價銀洋一元，這樣才畧減雨淋之苦。

午後四時抵達何村村外，帶路同志先行入村，找到了當地負責的中共支部書記接洽。可是該村農民百餘人竟蜂擁而來，準備强搶我們的手槍和隨身財物。當時我若命令開槍抵抗，勢必發生流血慘劇；但爲自衞計，只得命令所有携帶武器的員兵集合，就地散開做一個準備

；同時拉着那個地方負責同志的手，叫他着各農民退後五十碼，否則造成不幸事件，須由他負完全責任。在我這一處置下，各農民才後退數十步，聽候解決。結果送了三枝手槍給當地農會，農民才陸續散去。我們見情勢不利，無法再留，時間雖已接近黃昏，但仍冒雨繼續向金廂前進。

黃昏時到達一個小村莊，當地也有中共同志出來接洽，代為佈置宿營，並替我們買米買菜。吃過晚飯，突然發覺連指導員宋華失踪了。派人四處找尋，才知道被人綑綁在隔鄰的樓上，手槍也被搶去。我即派隊將他救回，幷集中宿營，嚴密戒備。次日到達金廂，由當地農會同志招待，集中住宿在區農會內。

金廂是海邊一個小鎮，人烟甚密，農會及中共組織均較健全。但我們這一羣落難的「賀葉軍」，祇要單獨的散步到靜僻的街道，隨時可被當地農民搶光身邊的財物。說這一帶是土匪的巢穴罷，市面秩序又很安靜；如說不是土匪區，而我們的同志被搶去了東西，連區農會的同志也無法保護。我們曾詢問當地中共負責同志，據說：這種搶劫是農民專門對付我們而

來的。因爲謠傳我們每人身上都有手槍，還有很多銀洋，而且百分之九十是外省人。於是，農民們便從我們身上起了「劏肥猪」的念頭，公開的搶刼而不以爲耻。然而，這也是中共對農民的工作做得不夠。在這樣的「民衆基礎」上，要想建立爲武裝鬥爭根據地，那有不失敗的道理。

我們在金厢住了三天，獲悉「第二十軍一二兩師在陸豐被粵軍繳械。賀龍被俘（後被廣東國軍將領將他釋放後逃往香港。）師長以下官兵全部投降」的消息。我們再不能久留，只有照周恩來臨行前的指示，將所有槍械交給區農民協會，僱了兩艘帆船赴香港。

當潮汕撤退時，担任潮汕北面防衞的第九軍朱德及第二十五師周士第兩部，即向江西方面逃竄。周士第在中途脫離部隊個人私逃，部隊也跟着瓦解了，祗有少數隨朱德的第九軍殘部滙合共一千餘人，竄至贛南的上猶，崇義一帶崇山峻嶺地區，成爲以後中國紅軍的基本部隊。

## 八　瞞過審訊者的眼睛

我們由金廂乘帆船來到香港，在筲箕灣的海邊登陸，準備去與香港中共人員連絡，設法安頓。我們這一羣都是衣衫不整精神疲憊，一望即知是剛從潮汕戰敗逃亡來港的官兵，而當時廣州當局已與香港當局取得中共逃亡者引渡的默契，這種情勢對我們是極端不利的。

我們上了岸走到太古船塢附近，香港警署的大隊警探便開來了。祇有周其鑑一人見勢不好，一溜烟搭上電車逃脫；我和其他的一百二十多個同志全部被捕，在維多利亞監獄監禁了三天。監房很淸潔，地上是地板，我們七個人住在一間監房內，飽經苦楚的我們，睡在地板上亦覺很舒服。每天兩餐囚粮，每餐每人有一大碗白米飯，還有足夠送飯的豆芽及小鹹魚。

第三天晚上，我們便被港方當局用囚車送上港穗輪船，引渡到廣州。

廣州公安局對這批引渡歸來的逃亡者是非常重視的，他們認爲其中必定有高級的中共負責人。那時張發奎軍已入駐廣州，公安局長朱暉日原是張發奎部十一軍的軍長，親自主持審

訊，將我們押到公安局裁判庭外的走廊上，一個個加以嚴格的詢問。我心裏暗暗着急：「完了！這次必然凶多吉少。」想到這裏，生存的信心已經動搖了。心裏有一些冷冰冰的感覺。想起了家，想起了年老的母親，更加覺得難過。唯一願望，是希望能逃過審訊者的嚴格偵訊，最好最後輪到審訊，比較容易應付。於是，我緩緩地從人叢中溜到後面的冷僻的角落裡。

因為人數太多，經過的時間甚長。朱暉日審訊了一百人左右，便由副局長黃啓光接着審訊。我喜出望外，化名林福川，詭稱是教導師的准尉司書。恰好連日勞頓，我的形容枯槁；時值深夜，審訊者也打不起精神，被我瞞過了真實的身份，被編入從犯之列。而另外二十多個地位較我為低的同志，在嚴格審訊下，查出身份，反列為情節重大的主犯，全被秘密的處決了。我們九十餘人從輕處置，監禁了五天後，在一天的清晨，每人連貫的縛了一只手臂，在大隊警察押送下，解至觀音山的工兵團，仍然禁閉起來。

七天之後，該團團長蕭祖強向我們訓話。我們十個人被撥入第九連當二等列兵。在上操時，該連連長發覺我的術科還不錯，馬上升我為第八班班長。他對我說：

「你好好的幹吧！第三排排長的空缺還沒有適當的人選，你們是鐵軍的幹部，我準備向團長報告，保你在最近升爲排長。」

我聽了非常高興，我有逃跑的機會了。因爲列兵非經連長批准，是不能離開部隊在外行動的。

這時候，廣州中共黨方派人四處打探我的下落，以便取得聯繫。有幾次調査的人找到第九連，査問有沒有龔楚這個人，我聽了也不便承認，深恐身份暴露，影响安全。因之，廣州暴動我便沒有參加。

一天早上，輪到我爲值日採買班長，在特務長處領了全連士兵的伙食錢，帶了兩個伙事兵到東山去買米買菜。東西買好了，我將剩下的幾毫錢給伙事兵，讓他們歡天喜地的去喝茶。我趁此時間，一溜烟由東山逃到惠愛西路，走到西門一個表親家中換了便服，拿了五塊錢作爲路費，乘搭早班的火車北上，於十一月下旬潛返樂昌故鄉。

離開故鄉七個月了。村裏顯出無限的荒凉。因爲我北上武漢參加革命鬥爭，家裡給樂昌

縣長劉應福搜查了兩次，將我所存下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和先世遺留下的很多存書全部燒燬了。最可恨的是本鄉反動土豪的武裝，將我家裡搶刼一空；給予我的家屬以極大的侮辱；甚至連累全村亦遭兩次洗刼，村裏所有農民的耕牛悉被搶去，而且擄人勒索，樂昌縣政府亦置之不理。

那時我的父親和大哥已先後去世，二哥在國民黨湘軍中工作，家裏只留下母親和寡嫂，靠磨豆腐維持最窮困的日子。幾個青年朋友，在國民黨淸黨的時候被屠殺了，這些青年都是無辜被害的。土豪劣紳更耀武揚威的在鄉中橫行不法。我一次又一次的聽着親友們傾訴這些不幸和辛酸的事。我的血管幾乎要炸裂，我的仇恨在高漲。我想，我個人「犯了法」，爲什麼要迫害到我的親屬，甚至我全村的鄰人呢？這時，我的路只有一條，便是堅決的向殘酷暴虐的統治階級，和橫行鄉里的封建土豪劣紳進行鬥爭！以鬥爭的手段，來謀取社會制度的改革，和廣大勞苦人民的福利。

很快的我便和中共北江特委書記盧克平取得連絡。不久又聞廣州暴動已經失敗，中國革

命無疑的已進入低潮，正是中共所稱「廣州暴動是這一階段革命退兵的一戰」的時期。短時間內我祇得潛伏在北江，晝伏夜出，經常在夜間步行百里往返長圬村至韶關犂市，與北江特委盧克平商討黨務的恢復與組織的建立。

從盧克平的談話中，關於這幾個月來的整個革命情勢，使我約畧的明白了大概。當葉賀軍潮汕失敗後，中共黨軍政首要陸續逃往香港者：譚平山，張國燾，李立三，惲代英，吳玉章，郭沫若，徐特立，周恩來賀昌諸氏，我是知道的，接着聽說葉挺，賀龍亦先後逃抵香港了。那時中共中央黨部已秘密設在上海。這批逃抵香港的中共首要，抵港後已與中共廣東省委取得連絡，但香港不是他們久居的地方，他們祇有到上海的共黨中央去，而譚平山以潮汕失敗有責，畏懼處分，仍潛留香港，李立三，惲代英，葉挺三人，則以散在海陸豐地區之葉挺部，正由彭湃收容指揮，準備今後行動，因此暫留香港，協同廣東省委設法連絡指導。其餘人員均赴上海中央集中。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瞿秋白（八七緊急會議淸算了陳獨秀後由瞿秋白任總書記）召開了一次潮汕失敗檢討會議，并於十月廿四日發出「為葉賀軍失敗」通告

。賀龍於會後即被派赴湘西他的老巢鶴峯，桑植，重組紅軍，發展游擊戰。

註一：當時共產國際代表路易（印度人），將共產國際關於武裝工農及共產黨員的電文給汪看，汪即將之公佈幷表示反對。

註二：中國革命委員會包括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共二十五人。

註三：南昌暴動時，中共所領導的軍隊，仍保存國民革命軍番號，僅成立一個總指揮部，統一指揮各參加暴動之部隊。以後一般人將南昌暴動之部隊統稱為賀葉軍。

註四：「八一起義」——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中共在南昌發動暴動，稱為「八一起義」。中共囊括大陸後，定八月一日為建軍節。

註五：當時軍隊中共產黨員甚少。

註六：蔡廷楷當時事前幷未與聞，故中途脫離。後投入廣東李濟琛部下。

註七：賀龍——現任中共西北軍區司令員。

註八：朱德——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

註九：湯坑作戰，是由葉挺指揮廿四師五千餘人開始，廿九日晚，曾將粵軍擊潰，三十日粵軍會

同黃紹竑，錢大鈞等軍增援反攻，賀龍之二十軍第一第二兩師共有五個團亦增援二十四師作戰，葉賀軍共約一萬二千人，敵軍共約二萬五千人，戰鬥極慘烈，葉賀軍卒以衆寡懸殊而失敗。

按中共中央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通告：「爲葉賀軍失敗事件」第二節「葉賀軍南征的經過及其失敗」之末段：葉賀軍雖然在九月二十四日先鋒即到達汕頭，汕頭工農亦起來暴動，然而到九月三十日即被反動軍隊所逼，不得不拋棄汕頭，而竭全力到湯坑去禦戰。（這一點是與事實不符，事實是湯坑作戰失敗，革命委員會各機關才退出汕頭。）這最後一次的戰鬥，敵人方面有一萬五千，我軍祇有五千，（這一點與事實不符，敵我兵力均大得多。）苦戰一晝夜，而我軍更完全解體，現在的情形是：二十五師一千餘人到汕頭時尚留駐三河垻，不久即被敵軍隔斷，現在退向閩邊。（這就是朱德和周仕第率領向贛南逃竄的部隊，不是退向閩邊。）湯坑之戰敗後，葉挺只餘七，八百人退甲子港而潰散。尚有賀龍二十軍之第一二師，三千人奔往海港來……。（這亦不明當時實際形情者，蓋向海港撤退的僅有汕頭撤退的黨政軍高級人員及我的警衛團少數官兵。賀龍的第二十軍全部退至陸豐附近時向粵軍投誠繳械。賀龍亦被俘，但當時粵軍高級將領立即將他釋放，逃赴香港。該軍被繳械的情形，知道的人甚多）。

# 第四章　紅軍由催生到壯大

## 一　朱德的「光榮」投降

一九二七年的秋末，朱德率賀葉軍殘部千餘人，從潮汕逃到贛南，輾轉流竄於上猶，崇義兩縣之鵞形上堡一帶偏僻地區，入冬，官兵被服無法補充，糧食也全靠到有存糧的人家去搜刮，形成流寇式的生活。不能刻苦耐勞的官兵，相率離去。在這最困難的時候，忽然有了一線新的生機，那便是駐韶關的國軍十六軍軍長范石生，派一姓何的軍官携帶范的親筆函件，到鵞形來會見朱德。姓何的軍官轉達范軍長對朱德境況的關懷，擬請率部來歸，共同為國家効力。

這個從天上飛來的佳音，使朱德大喜過望，答應馬上攷慮，殷勤欵待來使，當晚與王爾卓，陳毅召開會議，商討是否投降問題。朱德即席說明：

「范軍長是我少年時候雲南講武堂的同學，而且是結拜兄弟，情誼甚深。同時他是雲南的軍隊，素為南京政府所歧視，我軍由南昌回粵，途經上杭時，范軍長已專差送信給我，相約若賀葉軍能攻佔廣州，他（指范石生）即在韶關響應：如賀葉軍失敗，即請我率部歸他。這是他過去的諾言，必不欺我。現在我們的處境極端困難，暫時從權歸范，保存實力，將來駐紮曲江，又可與黨方取到連絡。」

朱德這主張當為王爾卓，陳毅二人所同意，因為在當時再沒有比這更好的路走。但是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乃向范石生提出了以下三個條件：

一、本部編為一個團，不得分散。軍司令部不得干涉人事權。

二、本部政治工作保持獨立性質，軍政治部不得干涉。

三、本團械彈被服請從速補給，并須先發經費一個月，以便開拔赴韶。

這三個條件，由朱德寫成覆信，交由來使何某帶返韶關。這時，中共廣東省委也派人到鶯形來找朱德，着他率部隊到廣州參加廣州暴動。朱德便決定藉投降范軍為名開赴韶關，然

後相機行動。

過了十多天，何某帶着武裝士兵十名，押解銀洋伍千元到鶯形，將范軍長復函併銀洋交朱德接收。范軍長復函內容是「所提條件全部接納，先送上銀洋伍千元，以爲開拔費用，請速率部來韶北三十里之犂市整訓。」朱德接信即于次日開拔，經大庾，南雄、行軍八天，于十一月十九日抵達犂市駐紮。

當朱德率部開赴犂市途中，廣州暴動已於十二月十三日失敗，未能依照中共廣東省委的指示而參加廣州暴動。關於廣州暴動的經過情形，畧述如下：

自武漢國共分裂後，蔣中正氏於八月十四日發表宣言，促請武漢的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遷都南京，與南京的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合併，幷聲稱卸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旋即離京。武漢的中央黨政機關，以蔣既引退，乃遷赴南京。但國民黨右派份子李烈鈞等仍把持黨政機關，幷停止第二屆中央委員會職權，另組中央特別委員會執行中央黨部職權，致又引起黨內衝突。幷於十月初旬發動西征軍事，討伐唐生智，企圖消滅國民黨左派所指揮的軍隊。

那時張發奎駐在廣州，倡議護黨，主張立卽召開國民黨第二屆第四次中央執監委員全體會議，恢復中央黨部，取消中央特別委員會，停止西征軍事行動，並通電敦促各中央委員來粵主持護黨大計。當時得到湘鄂兩省先後響應，國民黨的中央委員二十餘人相繼蒞粵，改組了李濟琛，陳銘樞等所控制的廣東省黨部及廣州市黨部，廣州政治分會，廣東省政府等機構。設立軍事委員會由張發奎任主席，統一護黨軍事指揮。因此引起原在廣東的軍政首長李濟琛、陳濟棠、陳銘樞、錢大鈞等反對，並相繼離去。李、陳、錢等統轄的軍隊，大部分駐防東江一帶，一部退駐西江，有向廣州進攻的趨勢。張發奎乃先行將駐在廣州及虎門的反對軍隊繳械，安定廣州；然後將其第四軍的三個師及教導師兩個師分駐東、西、北各江，以防反對軍的進襲。廣州市內祇有葉劍英的軍官教導團和第四軍警衛團梁炳樞部，以及廣州公安局的警察總隊等部隊，維持廣州治安。另有李福林的第五軍駐在廣州河南，等於地方部隊，維持河南治安。

中共以葉劍英，梁炳樞都是中共黨員，便乘此廣州空虛的機會，派徐冠英葉挺潛入廣州

，會同中共廣東省委張太雷，蘇兆徵等負責策劃，並派德俄顧問各一人參加指揮。以葉劍英，梁炳樞兩個團為主力，發動廣州工人和近郊農民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拂曉實行暴動（葉劍英已於暴動前潛赴香港，未參加行動）。成立廣州蘇維埃政府，以蘇兆徵為主席，惲代英為秘書長，楊殷為肅反委員，周文雍為勞動委員，彭湃為土地委員，何來為經濟委員，陳郁為司法委員。又成立紅軍總司令部，葉挺為總司令，徐冠英為參謀長，張太雷為黨代表。發表宣言；提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一切政權歸工農兵蘇維埃」，「飯給工人吃」及「土地給農民耕」等口號。并於暴動時立即分兵圍攻國軍第四軍軍部，第十二第二十六等師後方辦事處，廣州市公安局和一切軍政機關銀行等。當時，全市和郊區的工農勞苦羣衆，青年學生，都頸圍紅帶，熱烈參加，惟因缺乏嚴密組織和正確領導，一時秩序混亂。甚而太平沙的中央銀行被焚，參加暴動者，亦任意搶掠商民財物，形同土匪式的搶刼行動。

由十一日至十三日晨，第四軍軍部和各師後方辦事處，均未被暴動的部隊攻入。張發奎

和黃琪翔倉促走河南，留黃琪翔指揮部隊，他自己則趕赴肇慶調動部隊反攻廣州。幷親乘軍艦至廣州指揮。於十三日拂曉開始攻擊，以教導第一師薛岳部的兩個團由靖海門渡河，第二十六師的林祥團由黃沙渡河，原駐廣州西村的教導第一師莫雄團進攻觀音山，駐防河南的第五軍李福林部，亦派兵渡河協同進攻。在這種情勢下，紅軍被迫退守維新北路公安局附近一帶，堅强抵抗，戰鬥異常慘烈。至下午五時，紅軍傷亡甚大，張太雷作戰陣亡。是時，觀音山早已被莫雄團佔領，紅軍陷入被包圍狀態，葉挺乃下令撤退向海豐轉進，所有部隊由陳鬬長率領指揮，但除正式軍隊千餘人遵令撤退外，所有工農武裝及部份軍隊，均不肯撤退，繼續抵抗，是晚已大部犧牲，殘餘之紅軍，乃向龍眼洞撤退，各路國軍跟踪追擊，將紅軍在龍眼洞包圍繳械。廣州蘇維埃政府經時三日，便被消滅了。

此次暴動，不僅中共黨員及官兵死亡甚多，一般頸掛紅帶的工農羣衆，青年學生，亦在混亂的情形下被殺不少，廣州市內的中華路、惠愛路、永漢路、天字碼頭一帶，遍地屍骸，慘不忍睹。失敗後，徐冠英隱匿於西關妓館內，一個月後才潛逃香港，葉挺藏匿於財政廳附

近其妹家，後亦潛逃赴香港。徐向前，那時名徐像謙，亦隨徐冠英至廣州，暴動時任連長。廣州暴動既已失敗，朱德即正式接受范石生的改編命令，將該部改編爲國軍十六軍一百四十團，朱德化名王楷爲團長（朱別字玉楷，故改此名。）王爾卓爲參謀長，陳毅（註一）爲政治指導員，第一營營長李子文，第二營營長袁某，第三營營長何某。林彪（註二）當時在第一營第三連充當連長。

全團官兵一千二百餘人。裝備有俄式重機關槍兩挺，手提機槍四挺，駁殼手槍一百弍十餘枝，步槍伍百餘枝。由范石生軍長授給一面靑天白日滿地紅標誌的「國民革命軍第一百四十團」團旗，被服、經費均如數發給，幷補充了六萬發步槍子彈。

一切問題解決，士氣爲之一振。便積極從事部隊整訓，幷暗中進行黨的政治訓練，準備等待有利的時機再行舉事。

## 二　縱虎容易縛虎難

朱德駐地的犂市，正是中共北江特委的所在地。當朱德初到犂市時，北江特委不明瞭其眞實態度，而且沒有接到省委的指示，不敢貿然與他接洽；但經常派有黨員偵察他們的動態，特別注意他們的政治工作。有一天，陳毅在他的政治室召集軍政幹部開會，就當前的環境表明此次歸編的態度。略說：

「……革命是有波折的，不能全走直線，要適應客觀情勢來決定我們的革命方法，現在我們就是適應環境，爲了保全實力，以求將來的發展，所以走的是曲線。但最緊要的是：我們不要被環境所屈服，而忘記我們在中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應該担負的偉大任務。……」

這段話爲北江特委派出的偵察員知道了。便向特委書記報告，才明白朱德他們是迫不得已才投降的，而且幷未放棄黨的立場，於是派了一位充任小學教員的同志去設法與陳毅密談。經過相互間很投機的洽談後，才表明身份是北江特委書記派來連絡的。陳毅再帶他去見朱德，由朱德詳細說明了投降經過和投降條件，同時他表示絕對服從黨的命令，請求特委轉報廣東省委，指示他們今後的行動，幷要求派熟悉地方情形的軍事同志參加工作。這樣，朱德

與北江特委便有了密切的連絡。交談中，朱德知道我已回到樂昌，便請北江特委轉知我來犂市會面及參加軍事工作。

北江特委派了一位連絡員於十二月廿五日到我家裡，找到我的母親，轉而找到了我，苦悶的我，得知朱德的消息，喜歡得很，幷覺得參加軍事工作，總比做地方秘密工作有興趣而適當。我就偕同來人趁黑夜踏上旅程。走了一個通宵，天還沒有亮，就抵達了犂市。稍事休息，卽到團部會晤朱德。兩人相見，有着說不出的興奮和喜悅。我化名爲林芝，由朱德呈報石生給我以中校團附的級職而共同工作。

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我們全團官兵很熱烈的慶祝新年。官兵自行組織的劇團，在一日至三日間，演出話劇招待犂市的民衆。三日下午，朱德應該師師長趙超之約，到韶關城去會宴，餐後幷作痲雀牌游戲。就在三日上午七時許，范石生由廣州專人送給朱德一封最緊急的密信，由我和王爾卓，陳毅三人會同拆閱，信中紙有寥寥幾個字：「請朱德迅速離開犂市自謀出路」。原來那時廣州政局已變，張發奎的護黨運動，已因張靜江，吳敬恒等通電呼籲，

停止紛爭，主張召集第四次中央委員全體在上海開預備會議，並電在粵中委赴滬出席，國民黨的內部紛爭遂告一段落。護黨運動結束，張發奎，黄琪翔卽辭職出國考察。其所屬國軍第四軍三個師及教導第一第二兩個師，交由第四軍軍長繆培南率領，電請中央繼續北伐，以竟全功。斯時蔣中正氏已準備復任總司令，復電嘉許，並令該軍部隊北上，開赴南京集中待命，該軍遂於十二月下旬全部出發北上。李濟深，陳銘樞等又回廣州，主持軍政。李濟深得悉范石生收編朱德部，乃嚴令范石生將朱德部繳械，范石生爲顧全與朱德的友誼，才暗中派人通知這機密的消息給朱德，叫他離開犂市。

朱德在韶關接到我們轉知的秘密消息，於次晨趕回團部，立卽準備行動。召集我與王爾卓，陳毅三人商議今後的行動時，我提出意見—部隊先入仁化，然後繞道樂昌經長垞村渡過武江，沿樂昌乳源邊境大山區入湖南活動。各人都同意我的建議。我卽介紹一位湖南籍朋友胡少海參加本團工作，以備入湘時得其協助。因爲胡少海是湖南宜章人，曾任國軍團長，爲人勇敢有爲，雖然不是中共黨員，但爲本黨的同情者。朱德對此非常同意，於是將部隊緊急

集合，向外宣稱是「野外演習」，就這樣堂而皇之的離開犁市向仁化進發。下午六時到仁化董塘墟宿營，在董塘墟與當地的中共同志以一個短少的時間，迅速的策動組織了農民五百餘人，次日向仁化縣城進攻。該縣地方團隊并無準備，祇與警戒部隊發生戰鬥，即佔領了縣城。鹵獲了步槍三十二枝。我們將所鹵獲的地方團隊的武器，分配給參加的農民。在縣城住了一天，籌集了二千多元現欵。第二天回駐董塘墟。第三天繼續前進，在樂昌長垺村渡過武江，沿樂乳邊境的黃坪，大小洞，經五日的行軍，進入乳源縣北的梅花鄉，暫時休息，幷派出偵察人員，打探坪石及湖南方面國軍的動態，再定行動計劃。

在梅花鄉休息五天，當地擁有相當勢力的區長鄧光漢，對我們相當同情。在供應糧食和偵察敵情方面，給予我們以很多協助。當時我們想爭取他加入中共，建立以梅花鄉爲中心的湘粵邊區根據地；可是他對共產黨總還是表示懷疑和恐懼。由於我們積極爭取，反而促使他逃離了梅花村，因此增加我們採購糧食和建立與當地民衆關係的困難。這時，宜章縣籍的中共黨員陳東日由栗源埠來連絡。他也是參加南昌暴動至潮汕失敗後跑回宜章原籍的。他與我

是武漢時期的同事，重會於流竄的生活中，正是一個最好的助手。我立即介紹他與朱德相見，朱德亦感到安慰。為因他的來，使我們明瞭宜章縣城祇有民團四百人駐守。我們便決定進佔宜章，作為我們的根據地，開展湘南的革命鬥爭。

## 三　除夕夜宴的喜劇

決定了進佔宜章縣城的決策後，應該如何行動呢．我詳細向陳東日查詢，得知宜章沒有無線電台，也沒有接通廣東的電話線。我們脫離十六軍的消息，宜章方面尚未知道。我與朱德商量為了出敵不意而解決宜章民團，以胡少海偽充團長，扯着國軍一四零團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軍旗，向宜章進發。因為胡少海和陳東日都是宜章人，沿途民衆都很歡迎。農曆十二月三十日（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二日）的正午，我們的部隊一路無阻的進駐了宜章縣城。

宜章縣長赴省述職未返，城內的官紳都以為是國軍到來駐防，非常高興，沿街燃放炮竹歡迎，正逢中國農曆的除夕，紳商為了表示他們的敬意，送猪送酒，犒賞官兵，并於是晚八

時設宴於縣政府內，歡宴營長以上官長。我們便乘這一機會，佈置匪繳民團槍械，逮捕官紳的計劃。

當晚的宴會，朱德、陳毅都不參加，他們負責指揮部隊匪繳民團槍械。我與胡少海、袁營長帶了十四個幹練的士兵，佩帶駁壳手槍，不動聲色的前往赴宴。酒席還沒有吃完，警察局長縣政府科長和十多位紳商，正在歡愉的氣氛中向我們敬酒請菜的時候，突聞外面拍拍的槍聲响了。我們的衛士早已準備了，一聞槍聲，立即將席旁的兩名縣府衛士的手槍繳去。在座的官紳看見情形突變，多想起身逃跑；再見到我們帶來的衛士已守住了兩條出路的門，各人又復坐下。那位警察局局長神色慌張，聲音顫顫地向胡少海問道：「胡團長！有什麼對不起的地方嗎？」那時，我坐在胡少海的左側，便用手輕托胡少海的手臂，示意請他宣佈。他立即站起來說：「請各位不要驚慌；各位的安全，我負完全責任。今晚的事變是對宜章縣民團局鄺團長而發，可惜鄺團長不在此。今晚請各位屈駕一晚，明天再與各位詳談。」「各官紳聞語，神色稍定，要求准許各人回家度歲，明晨親到團部拜年。胡少海又眼望着我，表示要

我答覆。我乃起立說：「很抱歉！這是公事，我們不能答允各位的要求，一待事情完成，我們再向各位道歉。」各人面面相覷。那時，進攻縣府內警察的一連兵，已將駐守縣府的警察繳械。袁營長便指揮該連將槍械集中，幷將宴會上的各官紳全部扣留。五分鐘前的主人，這時便變成失去自由的堦下囚了。

因爲維持治安的地方團隊首長都給我們一網成擒，民團無人領導、毫無抵抗。我們回到團部不久，戰事已告結束。城內的民團全部繳械，城外民團僅逃出一小部。這次的收獲可不算少，總共繳獲步槍三百五十多枝，駁売手槍七枝，俘虜警察和民團三百多人，我軍毫無傷亡。

當天晚上，朱德、王爾卓、陳毅和我四個人連夜開會，商討成立紅軍開展革命鬥爭的問題。因爲沒有中共中央的指示，決定用中國紅軍第四軍的番號，幷即派員去趕製一面斧頭刀的紅軍旗，共產黨的革命武力——中國紅軍，便在這一夜的研究計劃中，正式產生了。

## 四　中國紅軍的成立

第二天是農曆的新年初一，（一九二八年一月廿三日），我們於上午八時在宜章縣立中學的操場上集合了全團官兵，幷發動了四百多個民衆參加，舉行中國紅軍第四軍成立典禮。集中了全團的號兵爲樂隊，奏樂，升旗，行禮，繼由朱德致詞：大意如下：

「同志們！今天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武力——紅軍第四軍成立的日子。回想我們由潮汕失敗，退到贛南，困處上保驚形山區，沒有衣穿，沒有飯吃，部隊內的搖動份子都跑了，幸賴各位能團結一致同艱共苦。這一期間，我們曾忍辱受編，保存實力。可是時機一到，我們就又重新舉起革命的旗幟，爲中國以至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而奮鬥。我們現在的力量雖小，但我們有千千萬萬的中國勞苦羣衆擁護；有世界無產階級祖國——蘇聯的幫助；更有全世界無產階級做後盾；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現在本軍的編組和人事，經過了我與陳龔各同志開會決定；朱德爲紅軍第四軍軍長，將一四零團改編爲紅軍第四軍第二十八團，王爾卓任團長，陳毅爲黨代表；將粵北湘南參加的農民編爲紅軍第四軍第二十九團，胡少海任團長，龔楚爲

黨代表，二十八團的營連排長照舊，二十九團的各級幹部另令發表。……」

他說完後，獲得全體鼓掌。我們高呼「紅軍萬歲」，燃燒爆竹散會。那天晚上，全體官兵聚餐，並開游藝晚會。參加的民衆三千餘人，由此便在湘南掀起了轟轟烈烈的革命怒潮。

中共宜章縣支部書記胡世健，組織彭祜，當夜由崎石彭家趕來縣城與我們接洽，共同展開宜章的工農運動。經過了一天的討論，決定了一系列的鬥爭政策；以「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無故不得開除工人」，「增加工人工資」等口號爭取工人；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策動農民鬥爭，以「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口號爭取青年男女；幷宣傳馬克思主義和蘇維埃政府，號召工農兵聯合起來組織自已的蘇維埃政府；收繳豪紳地主自置武器和地方的民槍，將已加入農會工會組織內的十九歲至三十歲的壯丁編組爲赤衞隊，十四歲至十八歲的少年編組爲少年先鋒隊，以爲工農羣衆向豪紳地主鬥爭、實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民衆革命武裝力量。

這些富有煽感性的口號，在這個樸實古老的宜章掀起了軒然大波。那些被豪紳地主壓

了很久的工人和農民，那些被舊禮教所束縛的青年男女，都熱烈的响應我們的革命運動；不到十天的時間，成立了很多工會、農會、赤衞隊、少年先鋒隊。並成立了各鄉村的蘇維埃政府，接着，又成立宜章縣蘇維埃政府，並由農民引導軍隊，收繳各地民團和警察所的槍械，以武裝赤衞隊和少年先鋒隊。

初期的赤衞隊，因隨時要準備和殘餘的豪紳地主的武裝鬪爭，並且天天要去打土豪，鄉政府內經常集中有一小隊兵力——約三十人，區政府集中有一中隊兵力——六十至一百二十人，縣政府集中兩個至三個中隊兵力。這些隊員因而無形中脫離了生產，他們的給養，是由各級蘇維埃政府自行籌措，主要的來源，是打土豪沒收來的穀米猪牛和罰欵。

赤衞隊的裝備，是由紅軍送給他們一部份步槍和他們自己收繳豪紳地主的槍彈。每十個赤衞隊員中約有二枝至四枝步槍，其餘的是鳥槍、大刀、梭標……等古老兵器。

少年先鋒隊多數是後備的，但各級政府都設有隊部，每個隊部有三至五個隊長副隊長文書等職員。遇鬥爭需要他們時，即集結以配合赤衞隊行動，至任務完畢後再解散回家，他

們的武器多是梭標和大刀，間或有兩三枝步槍和手槍，鄉村間的檢査哨，多數是由少年先鋒隊員輪流担任，負責鄉村間警戒的步哨，軍士哨。則由赤衞隊員輪流担任，隨時準備着戰鬥。

除夕夜宴上被俘虜的宜章官紳，經過審問後分別罰欵釋放。其中有位教育局督學曾日山，因與宜章中共同志有私交，而且是個有爲的青年，釋放後便參加了我們的工作，以後成爲中共黨的高級幹部，長征時陣亡。

在紅四軍成立的當天，我們便將宜章縣監獄打開，卸除了囚犯們的脚鐐手銬，由我向他們訓話，要他們回家去繼續爲反抗統治階級而鬥爭。行前每人發給一斤米，不論輕重罪刑，全部將他們釋放。看到犯人們與高采烈的離去，我感到無限的喜悅。

這一階段參加革命的女同志，有彭堃、彭謙、劉琛、彭娟、彭儒、郭懷振、吳統蓮、楊佩蘭、李青、廖彩蘭等，因爲彭氏姊妹工作積極，紅四軍中便傳出「彭家將」的稱號。她們都是衡陽第三師範畢業的學生和中共青年團團員。參加紅軍後，便從事組織婦女和農村訪

問的工作；或者管理官兵伙食和抄寫文件。他們的熱情很高，對於軍隊政治工作的影響很大。後來有些在革命鬥爭中不幸犧牲，有些成為紅軍婦運的主幹，有幾個還與紅四軍的高級幹部結為革命的戰侶。

## 五　紅軍旗開得勝

一九二八年二月上旬，宜章的工農運動，正在如火如荼的開展；胡南省主席何鍵調兵一師進駐郴縣，粵北方面國軍第二十四師許克祥部也進駐坪石，許克祥原是湖南國軍的團長，因發動長沙馬日事件反共有功，於一九二七年冬，晉升為國民革命軍二十四師師長。那時，反對李烈鈞領導的南京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的唐生智軍，正駐在湖南，許克祥部被迫移駐樂昌縣城，當他知道唐生智軍已退守湘西南地區時，南京政府西征軍何健部便佔領衡陽，進駐郴縣，準備進攻宜章的紅軍，又率部由樂昌開回坪石，企圖配合何健從南北兩面夾攻宜章。我們見國軍兵力過大，便分令各赤衛隊化整為零，潛伏鄉村或山地，待機配合紅軍作戰；紅四軍亦即由宜章轉移至宜章乳源邊界芭籬舖以西一帶山地的小村落（胡少海的家鄉），避開

敵人的包圍攻擊。

從南北兩路進攻宜章的國軍，本就存着輕敵的心理，湖南的部隊未遇紅軍抵抗，長驅進駐宜章。且被我們所散佈「紅軍打回東去」的謠言所惑，以爲紅軍的主力原由廣東來，現在退回廣東去，因爲省境和任務的限制，湖南的部隊不便越境追擊，實際上，他們也要防備唐生智軍的反攻，不能分兵與紅軍作戰，且可乘機對上級呈報「克復宜章」「驅逐共匪回竄廣東」的功積。湖南省當局據報，卽將該師調回衡陽。坪石的許克祥師得到湘軍進駐宜章的情報，也停止了圍攻宜章的行動。

紅軍獲悉湘軍調離宜章的消息，朱德又於二月中旬率師轉回宜章縣城。第一天預定到岩泉墟宿營，而許克祥師的教導團賀國光部也於同日同時到達，兩軍卽在岩泉墟北端高地展開遭遇戰。紅軍以堅決迅速的戰鬥行動，在黃昏前擊潰教導團主力並向其殘部追擊，實施「猛打猛追」的戰術。在栗源舖附近又殲滅了該團之一部，引起了紅軍無限的勇氣。是晚紅軍在栗源舖宿營。第二天上午八時許，紅軍由栗源舖向宜章前進中，又與許師兩個團遭遇。依然

是使用堅決迅速的戰鬬行動向敵攻擊。于正午十二時突破其主陣地，許師增援部隊一個團還沒有展開，便被他們自己敗潰的部隊所衝亂。我與朱德立即分左右兩翼向敵包圍，敵軍無力抵抗，殘部向坪石方面敗退。紅軍並不淸理戰場，繼續追擊，直搗坪石。敵軍二十四師師部和直屬部隊，因時機急迫，無法抵抗，狼狽地從東南突圍向樂昌的黃圃方面逃竄。該師經過此次戰鬥後，僅師長許克祥和少數官兵逃脫，其餘全被紅軍擊斃或俘虜。「猛打猛追」的戰術，第一次發揮了輝煌的戰果。

這次戰役，紅軍以不足二千人的兵力，消滅了優勢四倍的國軍。鹵獲了步槍一千五百餘枝，重機槍十餘挺，八一迫擊砲八門，各式手槍百餘枝，馬十三匹，彈藥被服不計其數。栗源舖的農民，也繳獲散兵的步槍五十多枝；被俘的國軍官兵共有八百多人。這一勝利，不僅充實了紅四軍的實力，且振奮了整個湘南工農羣衆的革命情緒。

戰事結束，紅軍官兵都有無上的興奮。這是我們成立紅四軍後第一次作戰便獲得了偉大的勝利，這象徵着前途有無限的光輝。朱德時時露出愉快的笑容，並對我們表示：紅四軍正

缺少迫擊砲和機關槍，現在都有了，而且足夠兩個團的裝備，今後更有把握了。

在坪石休息一天，接到宜章中共縣支部的通報和紅軍所派出諜報人員的報告，宜章縣城已沒有國軍，少數維持治安的民團也聞風逃去；赤衛隊已經入城維持秩序，蘇維埃政府也恢復辦公，並動員了五百民衆趕來坪石，幫助紅軍搬運戰利品，歡迎紅軍回去。

紅軍在湘南民衆的熱烈歡迎和幫助之下，光榮的回師宜章縣城。

## 六　展開湘南革命鬥爭

紅軍回師宜章的晚上，朱德、陳毅、王爾卓和我四個人，舉行了一次特別會議，對黨政軍各方面通過了如下的決策：

關於黨、政方面：

一、普遍建立湘南各縣、區、鄉、村、各級蘇維埃政權

二、策動農民向地主鬥爭，實行土地改革。

三、策動工人爲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及增加工資而鬥爭。

四、普遍組織各職業工會，各縣成立總工會以團結工人和督導其革命工作的進展。

五、保存黨的地下組織，但須有部份黨員公開活動，以擴大黨的政治影响，鞏固黨的領導權。

關於軍事方面：

一、作戰方針——乘國軍何健與唐生智兩部內爭無暇南顧的機會，我軍對北面取攻勢，掃蕩郴縣、耒陽、永興各縣的敵軍和民團，向衡陽游擊，以開展蘇維埃運動。對南面取守勢，以鞏固宜章政權。

二、部隊區分——紅四軍第二十八團向北發展，由朱德同志指揮。紅四軍二十九團固守宜章，並須注意坪石方面敵軍動態，由龔楚、胡少海兩同志指揮。

三、軍事建設——發動工農組織赤衛隊和少年先鋒隊，收繳民槍以武裝人民，並利用大刀、梭標、鳥槍等舊式武器，充實鬥爭力量。

四、號召青年工農參加紅軍，充實紅軍戰力。
五、目前參加的青年工農，儘先補充第二十八團和二十九團，並迅速組成宜章獨立營。
關於俘虜處置：
一、立即由宜章縣人民團體，發動物資慰勞和精神慰問。
二、由紅軍政工人員進行政治宣傳，揭發敵軍軍官尅扣軍餉虐待士兵的罪惡，煽動俘虜檢舉潛伏俘虜內的軍官，並宣佈本黨及紅軍的宗旨。
三、待一二兩項工作完成後，由朱德同志對全體俘虜訓話，並宣佈：如願參加紅軍者，一律平等待遇，不加歧視；如要求回家者，給以必需的旅費遣散。
這是我們第一次的宜章特別會議的決策，也就是湘南鬥爭的總方針；尤其是對俘虜處置一項，更成了以後紅軍對俘虜政策的先例，這樣，便爭取了被俘國軍的同情，逐步的瓦解了部份國軍的軍心。
以這幾項決策爲中心，第二天的黨政軍幹部聯席會議上，由朱德報告今後的鬥爭工作路

線，我報告軍隊員兵協助地方工作和建立地方革命武裝的方針，分配給與會幹部以適當的任務。

經過向俘虜的教育和宣傳，潛伏在俘虜羣中的國軍官佐三十餘人，很快的被清查出來。有士兵三百餘人和排長七人志願參加紅軍；其餘四百餘人請求准予回家，每人發給三塊銀洋遣散。這種舉動引起當地民衆的贊許，都說紅軍的作風比國軍不同，因而也增加了他們對紅軍的向心力。

紅四軍重新調整裝備，每個團增加一個重機槍連，一個步砲連，步軍連的槍彈人員儘量補充齊全，剩下的一百多枝步槍便送給了宜章的赤衞隊。

坪石是湘南入粤的門戶，廣東的鹽和工業製成品，經此輸入湘南，湘南的土產如糧食、牛皮等，亦經坪石入粤，市面旺盛。國軍許克祥師潰散後，即爲土匪胡鳳璋部佔踞，並積極構築碉堡等防禦工事。坪石的人民對胡部的所作所爲，非常不滿。當地中共黨員李光中，特地前來宜章報告，請求紅軍向盤踞坪石的胡部進攻，並說有很多民衆參加作戰。朱德聽了，

以胡部兵力不大，且有民衆協助，決定先行進攻坪石，消滅胡鳳璋部，再向郴縣發展。我當時，提出反對的意見。認爲：（一）、胡鳳璋佔領坪石，他的兵力薄弱，絕不會也不敢進攻宜章，反而有防阻廣東國軍向我進擊的作用。（二）、坪石有幾個碉堡，我軍無攻堅武器，難操勝算，倘遷延時日，徒遭不利。（三）、坪石是廣東地境，非我軍應守之地，卽使佔領，也得放棄，不如乘湘南空虛，士氣民氣沸騰的時候，迅速向北發展，以展開整個湘南地區的革命鬥爭，在政治上的作用有極大的意義。可是朱德不以爲然。認爲對坪石地形熟悉，並有民衆幫助，滅此朝食，必有把握。他獨自率領了紅軍第二十八團的三個營，在陰雨連綿的天氣下向坪石進攻。土匪胡鳳璋部利用既有的碉堡和商店屋宇進行抵抗。街道上分段用鹽包阻絕，築成巷戰的防禦工事；紅軍雖有坪石皈塘村的民衆二百多人，携步槍土砲協同攻擊，經過兩晝夜的艱苦戰鬥，僅佔領了坪石的一半街道，無法迅將胡部解決。朱德記起了我的話，「倘遷延時日，徒遭不利」；於是決心放棄攻擊，將部隊撤回宜章。他見了我的時候，帶着疲勞的神情，拍着我的肩膀說道：「你不錯！你的估計很對！我們還是北攻郴縣罷。」

這時，宜章獨立營已經編成，由黃埔軍校畢業學生龔楷任營長。嘉禾縣的蕭克（註三）也來參加紅軍，派充第二十九團第二連連長。附近各縣的中共負責人，亦多來宜章接洽。各縣中共黨員的回鄉軍官，也陸續來宜章集中。我們的軍事幹部便不感缺乏了，軍隊的組織也就更健全了。

因爲我是粵北人，對湘南地形熟悉，在率領農軍北上時，曾與中共湘南特委書記夏民正，及耒陽郴縣永興地方黨部和當地民衆團體有過聯繫。爲了開展湘南區蘇維埃運動，我便忽忽的由這個鄉村跑到那個鄉村，積極恢復黨的地下組織和過去的農民協會，爲朱德的軍事發展，鋪平了道路。

朱德率領紅軍第二十八團，很順利的佔領了郴縣、永興、耒陽等縣，紅軍所到的地方，當地的中共黨員立卽起來領導民衆，很快的便恢復了他們過去的工會和農民協會的組織，自動組成了赤衞隊、少年先鋒隊、各級蘇維埃政府。水口山的煤礦工人亦武裝暴動，奪取礦警步槍手槍百餘枝，組織工人赤衞隊，響應各縣農民暴動。湘南的革命鬥爭，一時風起雲湧，

展開如火如荼的壯觀。

在國共合作時期，中共所實際領導的農民運動，祇是要求減租減息，希望達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其手段比較溫和，還不失爲改良主義的土地改革運動。然而因妨碍了地主階級的利益，引起了地主們的不滿，而其中少數平日爲富不仁，作威作福的土豪劣紳，他們初期企圖把持農民運動，直接向省農會活動，請求派任爲縣農會籌備員。省農會當時是被中共所控制，當然不會接納他們的請求。他們向上走不通，便又想在地方加入農民協會，以便從中操縱，誰知，這一企圖，又被農民拒絕。因此，他們便把農民運動視爲眼中釘，必去之而後快。

到國民黨展開淸黨行動時，各地的土豪劣紳便利用這機會向農民協會的首要和積極份子開刀。同時進一步以補租加息和收回耕地等方法，壓迫農民羣衆，使地主與農民兩個階級間的裂痕更加深刻。紅軍到達的地區，農民們認爲是翻身的日子來到了，抱着報復的心理，向豪紳地主們儘量的反攻。「打土豪」，是他們最積極的工作，他們捉到土豪，可以勒索罰

歘，可以在土豪家裡搜尋密藏的現金，可以沒收其衣物穀米猪牛……等，不僅報了仇恨，而且解决了衣食，雖然是盜賊的行爲，但是並不負盜賊的罪名，這是何等便宜的事呢？所以他們的報復行爲，便如瘋如狂的進行着。

我從郴縣趕回宜章時，有人報告我，宜章縣蘇維埃政府殺了三個土豪，是用大刀梭標殺的，手段非常殘酷。我是個由人道主義立塲出發的革命者，認爲非罪大惡極爲害社會人類者不能任意屠殺，更不應以殘忍的方法來殺人。因此對他們這種沒有人性的殘酷行爲非常不滿。我告訴黨的負責同志胡世健：「以後殺人要經過縣蘇維埃政府審查，黨在各級政府中要有絕對的領導作用，看這個人是不是該殺；即使要殺，也應用槍來行刑，不宜過於殘忍。黨是領導羣衆的，我們要克復羣衆的報復心理，防止報復行爲，不要做羣衆的尾巴，要領導羣衆走上革命鬥爭的正軌。」經過我這番指示，在宜章縣支部的各種會議中進行了熱烈的討論，以後他們的激烈行動，才稍稍有所修正。

但其他各縣的情形就不同了。報復的行動似流行性傳染病般的向四處散播。有些村農會

的農民不經呈報上級農會和政府的批准，沒收豪紳地主的財物，逮捕豪紳地主，濫用刑法，強迫他們繳欵，繳債約，焚燒地主們繳出的借欵借穀債約，擅將豪紳地主處死，甚至燒燬豪紳地主房屋。鬥爭的行動越來越激烈，恐怖的氣氛越來越嚴重，簡直無法控制。要農民們停止殘酷的鬥爭？他們根本不聽指示；如果將負責的同志加以處罰？事實上又行不通。這時，我便陷入深深的苦悶困惑中。經驗告訴我，領導革命鬥爭，不僅要有正確的政治路線，而且要有很高的指導原理，否則，就會造成不可收拾的違背革命理想的嚴重現象。

## 附註

註一：陳毅——四川省人，高個子，性豪放，與周恩來同一時期留學法國，歸國後曾在江西省任縣長，南昌暴動後參加葉賀軍任團政治指導員，潮汕失敗後隨朱德行動，爲當時朱德的政治工作負責者，現任中共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司令員兼上海市長。

註二：林彪——現任中共第四野戰軍司令員。

註三：蕭克——湖南嘉禾縣人。現任中共第四野戰軍參謀長。

# 第五章　井崗山「革命聖地」

## 一　井崗山毛澤東初立基地

當我和朱德在湘南發動工農鬥爭的時候；毛澤東已以井崗山爲根據地，在湘贛邊區打游擊。先是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漢國共分家後，中共黨員所能領導的一個湖北省政府警備團，因沒有趕上南昌暴動，跑到江西西部之銅鼓，修水兩縣，與湖南省瀏陽，平江兩縣農民武裝所編成的獨立團取到連絡，受朱培德收編爲江西省防軍暫編第一師，駐在江西之銅鼓、修水，及湖南平江縣之長壽墟一帶，這個部隊是有共產黨員領導的。中共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召開緊急會議（中共稱爲「八七」會議）後，派毛澤東到湖南策動秋收暴動。（註一）他到了湘東後，便將這一師的部隊改編爲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發動瀏陽，平江的工農群衆與統治階級及豪紳地主進行武裝鬥爭，但因他在開展鬥爭時的殺人放火的殘暴行爲，僅有少數農村

中的流氓地痞參加，不爲眞正的廣大農民所同情。結果被何鍵派出的部隊團剿而失散。毛澤東帶着殘餘部隊和少數武裝農民共七百多人，向南流竄。經茶陵、攸縣、逃入江西。於是年冬佔領了偏僻而兵力薄弱的寧岡縣。（註二）

寧岡縣東南之井崗山，是羅霄山脈的中段，周圍二百多里，橫貫江西之寧岡、永新、蓮花、遂川、和湖南的酃縣、桂東、汝城相毘連。山上有五個較大的村莊，稱爲大小五井。以大井、小井、茨坪爲較大。每村各有數十戶人家。小井和茨坪還有十多間小商店，經營一些農村的日用品。

井崗山的居民並不多，誠樸保守，與世無爭，靠着山坡上的梯田收獲一些農作物，過着最貧苦的日子。大部份的居民很少有米吃，終年吃的是紅薯和粟米。但他們在這種生活方式下，相當滿足，並沒有其他的妄想。

無數座巍峨高聳的山峯，巉巖峭壁，溪谷縱橫，構成了井崗山的險要地勢。通達井崗山的道路祇有三條：一條是由寧岡縣經汪洋界，上山十五里，方到井崗山腰的村莊小井；一條

是由永新縣經龍源口，而到小井；另有一條是由遂川經黃坳到井崗山。三條路都是崎嶇的山徑，碎石嶙峋，步行非常艱難。祇要憑險固守，很難攻破，卽使新式武器也難發揮它的威力。所以，這區域向來都是匪徒們的理想根據地。

歷史上，明朝武宗時代，朱宸濠在江西南昌叛變，失敗後卽逃到井崗山落草，後被王陽明所勦滅。王氏削石爲碑，記載勦匪的史實，這個古跡至今尙存。由此可以想見井崗山的軍事價值，在很早以前便被人所重視了。

一九二八年二月以前，盤踞在井崗山的一批土匪，數約八九十人。匪首王佐，與寧岡縣擁有步槍百餘枝的土豪袁文才互通聲氣，以井崗山這個險要的地形爲憑藉，作爲他們刦搶商旅和富戶們的根據地。附近各縣人民，視爲畏途，稱王佐爲「王老虎」。因爲紳匪勾結，使地方團隊無法進勦，遂令坐大，井崗山幾乎成了王佐，袁文才二人的私產。

毛澤東是明瞭井崗山的軍事價值的。當他從湖南茶陵竄入寧岡縣城，便首先送了兩枝手槍和一些禮物給袁文才，聯絡感情，再由袁文才介紹王佐與毛澤東見面。王佐是一個頭腦簡

單的土匪，袁文才有濃厚的個人英雄主義思想，三個人一拍即合，大塊肉大碗酒的結拜起兄弟來了。毛澤東運用與流氓打交道的手法，滿口仁義道德，騙得王袁二人服服貼貼，都接受了毛澤東所委派的營長職務，而毛澤東從此便在井崗山立定了脚跟，井崗山附近的人民都稱他爲毛司令。

## 二　毛澤東給我的最初印象

在宜章成立的紅四軍，迅速建立了耒陽、永興、郴縣、宜章四縣的蘇維埃政權；並發動了資興，桂陽的民衆鬥爭；擊潰了南北兩面國軍的進攻；一時聲勢大振。毛澤東聞訊即派人到郴縣和朱德連絡，并準備率部來湘南會合。朱德將湘南發展的情形和紅四軍現狀，詳細的報告了他，希望他來領導。而我對毛澤東的前來也很高興。因爲兩部份的革命武力集中，將更增加了我們的戰鬥力量。而且他是一個黨的高級幹部，政治鬥爭的經驗，一定會比我們多，對於我所面臨的政治領導上的困難，他也許能夠指示解決，使我的責任減輕，免得發生

錯誤。

五月中旬，衡陽國軍大舉向蘇區進攻，朱德與陳毅，王爾卓率紅軍第二十八團在耒陽衡陽間作戰。同時，粵北方面的十六軍范石生部也由坪石向宜章進犯，我與胡少海指揮第二十九團和宜章獨立營赤衛隊等部隊三千餘人，在郴宜間的樟橋、摺嶺一帶與范軍作戰。苦戰一日，因衆寡懸殊，被迫向郴縣撤退。范石生軍以到處都遭受民衆赤衛隊的抵抗，不敢跟踪追擊，遂回師佔領宜章。我們趁着這個空隙，在郴縣休息了一天。當我們離開郴縣時，除了二十九團、宜章獨立營和郴宜兩縣赤衛隊外，郴宜兩縣蘇維埃政府、工會、農會負責人和眷屬也隨軍行動，男女老幼四千八百多人，經東江、何家山、向水口前進。

二十九團第一營營長朱舍我率該營先到達水口，發現鎮上都住滿了頸圍紅領帶的紅軍。經過連絡，才知道是毛澤東的工農革命軍第一師。於是迅速通知正在行進中的我們，并告訴毛澤東知道，紅四軍的大部隊卽將到來。

我與胡少海進入水口市區，吩咐部隊在路旁休息，正準備去與毛澤東見面，這時，四個

工農革命軍的衞士，簇擁着一個身材畧高，肩濶手長，頭髮散亂，很久沒有刮過鬍鬚，穿着褪了色的淺灰布中山裝的漢子走近來。我與他互通姓名，才知道他便是毛澤東。雖然他不修邊幅，但是他那溫和的態度，使人一見便對他發生好感。

他緊緊地握着我的手，手心熱灼灼的。開頭便問我：「你是龔楚同志嗎？朱德同志呢？他的情形你知道嗎？」聲音雖不宏亮，但乾脆爽朗，有着濃厚的湘潭土音。我告訴他：朱德日內要來酃縣。他很高興，拉着我的手，說道：「龔同志先到我住的地方坐一會，佈置宿營警戒的事情，請胡同志負責好了。」說罷，我同他一道兒到他住的一間商店去。

圍坐在一張四方桌旁，衞士爲我們送上兩碗白開水，毛澤東急急的問我：「這次你們太辛苦了，湘南的情形怎麼樣呢？」我用手指在桌面上簡單地劃出湘南的態勢，將紅四軍成立的情形，最近與南北兩路國軍作戰的經過，和撤退時的情形說了一遍。他二十分鐘前的微笑消逝了，臉上有着無限焦急的形色：「朱德同志率二十八團不會被敵人截擊嗎？」我堅定的答覆他：「不會的！我由郴縣撤退前，他已退出耒陽向永興前進，而且朱同志是個老軍人，

沉着機警，絕對不會有大的失敗，請你放心！我們已約定在酃縣集中，再來與你連絡呢！」這句話像一顆定心丸，使他焦急的心情安定下去，便又滿面笑容的說：「這樣就好了！我們今後可以共同一起為革命而奮鬥啊！」喝了幾口開水，他又接着說：「我帶着第一師準備佔領汝城，與四軍聯成一片，不知湘南已發生了變化。現在總算好，我們依然保存着力量，革命者是不怕失敗的。」他的誠懇的談吐，親熱的態度，深深地使我感動。而且他是黨的中央委員，有長遠的鬥爭歷史，我因激動的對他說：「我們今後能够和毛同志在一起，有毛同志來領導，我們的責任就輕了。毛同志有豐富的鬥爭經驗，今後的革命前途更有希望了。」喜悅洋溢在他的眉睫，含笑的對我說：「好的，我們大家努力創造一個新的局面來！」

這時，他的衞士報告：晚飯已經弄好了；他馬上叫衞士請胡團長過來吃飯。於是，我們三個人便愉快的邊吃邊談。那次晚餐非常豐富，他在我們未到之先，早就派人買好一隻大鷄，另外還有醃肉，鷄蛋和一罐米酒。在一個戰鬥失利的撤退中，享受到一次豐富的晚餐，應是極難得的了。

晚餐時，他問起紅四軍官兵的生活情形。我告訴他過去的時候，紅四軍官兵每月一律發給薪餉十二元，他覺得今後必須改變此種給養方法，因爲他的部隊每月僅發三塊大洋，贛南地區，非常貧瘠，大部隊的薪餉籌給不易，將來應加以調整。我們對這個主張也都表同意。餐後，我便和胡少海回團部駐地去洗澡。

晚上九時，毛澤東又跑到我們宿營的地方來談天。我們的團部，住在街尾一家大商店內。我住客廳中，朝南開着個大窗子。那時是初夏的夜晚，微微的涼風，拂過我們的頭面，消除了白日行軍的疲勞。衛士們爲毛澤東送上好茶，但却沒有香烟奉客。因爲我和胡少海都是不吸香烟的。

毛澤東笑道：「你們眞是革命陣營裏的好同志！連香烟都不會吸。」說完，他自己從衣袋中拿出一包美麗牌香烟，一面吸烟一面同我們談話。由他的言談中判定，他確是個深謀遠慮，富於想像力的人。

他問及我們二十九團的人數和裝備。胡少海便詳細的告訴他：「我們共有三個營，一個

特務連，一個步砲連，一個衛生隊，一個通訊排，全團官兵有一千八百餘人。武器方面有迫擊砲四門，重機槍八挺，步槍八百七十餘枝，駁壳手槍三十二枝。同來的還有宜章獨立營，宜章、郴縣赤衛隊和各機關人員三千人，步槍千餘枝。」

毛澤東聽到我們有如此強大的力量，喜出望外。因為他的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祇有六百四十多人，僅及我所率領的部隊的六分之一。他的臉上充滿了笑容，似乎已看見了未來的一個美麗的遠景。

毛澤東有異於常人的特徵：他的肩膀很寬濶，雙手特別長，下頷有一顆黑痣，鬍鬚不加刮剃時，不坐在近側是很難看得清楚的。他說話很風趣，善於抓住每個問題的關鍵，激起對方的共鳴，使人有一見如故之感。我們談談過去，研究將來，直到午夜，他才告辭。臨行前互相約定，他率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先赴酃縣，我率紅軍第二十九團和隨行部隊，人員眷屬等隨後跟進。

送走了毛澤東，我和胡少海都很高與，覺得以後的政治領導更有辦法。對於毛澤東這個

人，我們久聞其名而沒有見過面，這一次的晤面，他給我們的印象很好，好像有一種特別的吸引力，樂於接受他的領導，這是他的不可抹殺的組織天才，也奠定了他成功的基礎。

## 三　朱毛會合的新局面

朱德在衡陽、耒陽間作戰也受到挫折，率領第二十八團和耒陽，永興兩縣赤衛隊、水口山鑛區工人赤衛隊等，在酃縣與毛澤東及我們會合。決定先回寧岡縣城，整編部隊，安頓各非戰鬥員的老弱婦孺，然後再向外發展。爲了解决糧食問題，派隊在酃縣四鄉，沒收了一些地主的谷米，每人携帶五天口粮，回駐寧岡。爲了要起帶頭作用，由朱德起每人皆以布袋裝着五斤米，自行背負着行軍。

寧岡是井崗山西北面山脚下的一個小山城。城外有一條小溪。城區面積很小，小商店和住宅共有百多間。市面貨物很少，呈現着凋零衰敗的景象。

我們到達寧岡後，中共中央也派了代表杜修經（湖南慈利人）携帶中共中央的指示到達

寧岡，這時中共中央總書記瞿秋白，已因領導各地暴動，被第三國際指爲犯了左傾盲動主義的嚴重錯誤，撤職調赴莫斯科檢討，所遺總書記缺由向忠發代理，他接任後，在李立三、周恩來協助策劃之下，決定暫時停止暴動奪取城市的錯誤政策，改爲發展紅軍組織，建立鄉村蘇維埃政權，實行土地革命，發展農村武裝鬥爭……等新的鬥爭路線，并派員分赴各地與中共份子所領導的武裝部隊連絡，井崗山的朱，毛紅軍當然是主要的部隊。在杜修經到達寧岡的當晚，便召開會議，出席者爲毛澤東、朱德、龔楚、陳毅、王爾卓、胡少海、（胡在宜章已正式加入中共爲黨員）杜修經等七八。先由杜修經報告國際形勢，國內動態，本黨的政治路線，紅四軍的任務和成立中國共產黨紅軍前敵委員會，指定毛澤東、朱德、龔楚爲常務委員，陳毅、王爾卓等爲委員，并檢討湖南失敗的原因，認爲：

（一）沒有澈底沒收地主土地分給農民，以致農民得不到革命的果實，而動搖了革命鬥爭的意志。

（二）蘇維埃政府內仍爲知識份子所操縱，沒有大胆的提拔工農份子參加，故革命陣營

的基礎依然脆弱。

（三）沒有嚴密的保存各縣黨的地下組織，致紅軍退出後整個解體。

會後進行紅四軍整編工作：（一）、紅二十八團二十九團保存原有組織，以水口山工人赤衛隊編爲三十團，合編爲紅四軍第十師。（二）、宜章獨立營，郴縣、耒陽、宜章三縣赤衛隊改編爲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團，合編爲第十一師。（三）、以工農革命軍第一師（毛澤東的基本部隊）改編爲三拾四團，王佐、袁文才兩部編爲三拾五團，永與赤衛隊編爲三拾六團，合編爲第十二師。幷決定紅軍給養統一籌措，各部隊沒收的糧食、布匹，儘量運至井崗山儲存，同時停止官兵發餉制。因爲在湘南時，紅四軍官兵每人月發銀洋十二元，進入井崗山區，已無法籌措薪餉，改訂官兵主副食由紅軍統籌，官兵每月發給零用金三元。

紅軍在整編工作進行中，因各縣赤衛隊的員兵，地方觀念濃厚，不願編爲正式紅軍，逃亡甚多。前敵委員會乃再開會討論，決定：

（一）紅四軍暫不編師，軍部直轄三個團。

（二）水口山工人赤衛隊和原有的二十八團合併編爲一團，仍冠以第二十八團番號，

（三）宜章縣獨立營和原有的二十九團合併編爲一團，仍冠以第二十九團番號。

（四）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和袁文才王佐兩部合併編爲一團，仍冠以第三十四團番號。

（五）各赤衛隊改編爲各縣游擊隊，由各縣黨政負責人員領導，統受紅四軍軍部指揮。

（六）在紅軍和赤衛隊中，遴選優秀青年成立紅四軍教導隊，訓練初級軍事幹部。

部隊整編後仍以朱德爲紅四軍軍長，毛澤東爲黨代表，我仍任第二十九團黨代表。并即與胡少海率領第二十九團到鄠縣十都工作。一面整訓部隊，一面策動民衆鬥爭，建立蘇維埃政權工作。在發動民衆打土豪中，除分發一部份沒收豪紳地主所得的衣物糧食給予民衆外，其餘的主要的糧食——谷米，運往寧岡，作爲儲備的軍糧。十都是一個富庶的地區，有錢的豪紳地主不少，使我們對收集糧食的工作得到了很大的收獲。

一天，毛澤東帶着幾個衛士來到十都，我和他到各營連巡視，他看見二十九團十幾位女同志笑着對我說：「你天天和她們在一起，艷福不淺！你有特殊的感想和艷遇嗎？」我說：「

這都是革命同志，每人都有做不完的工作，男女間的情愛是感不到興趣的。」他搶着說：「你的年紀比我還輕，我見了尚且不免有動於心，你能無感於中嗎？我不相信；哈哈！」他神秘地笑着，看來他已是有寂寞之感了。

## 四　紅軍初期的政畧戰畧與戰術

井崗山時期，一切政治軍事主要決策，仍由前敵委員會常務委員商討決定。在這一期間，對政畧、戰畧和戰術，都有新的創作。

在政畧上，依據中共中央指示的：組織紅軍、策動農村鬥爭、實行土地改革、建立蘇維埃政府、武裝民衆、摧毀國民黨政權等六項原則。決定建立以井崗山爲中心的羅霄山脈中段蘇維埃政府，以實行土地革命，策動農村階級鬥爭，普遍建立鄉村蘇維埃政府，孤立城市，進而奪取城市。於是，推定毛澤東爲蘇維埃政府主席。蘇維埃政府印就佈告到處張貼，從此井崗山區的軍民，全改稱「毛司令」爲「毛主席」了。

在戰畧上，檢討過去失敗和成功的作戰經驗，決定今後的戰畧：在運用廣大的運動戰，以襲擊、伏擊、突然向分散宿營或運動中的敵軍進攻，消滅其一部或全部；展開廣泛的游擊戰，消滅地方豪紳武力——守望隊、挨戶團、自衛團等，對民衆進行武裝組織工作，建立地方革命武力。摧毀國民黨鄉村政府，建立鄉村蘇維埃政府，配合政畧，由鄉村的控制進爲城市的奪取。

在戰術上，定出了八大原則：

1. 敵進我退！當敵軍向我進攻時，其兵力必優於我；且其銳氣正盛，我軍應主動的撤退，以保存實力，待機轉移攻勢。

2. 敵退我追！敵軍撤退時，其銳氣已減，我軍應主動的追擊，相機消滅其一部，打擊其士氣。並可積小勝爲大勝。以補充自己，壯大自己。

3. 敵駐我擾！敵軍宿營時，我軍應以小部隊輪迴於夜間襲擊，使敵軍無法休息。以麻痺敵人神經，疲勞敵人，造成對我有利形勢。

4.敵疲我打：當敵軍因被我軍擾亂，已陷入極疲勞狀態，我軍有可乘之機時，應即集中力量，主動的進攻，以殲滅敵人。

以上四項是朱德最先提出的。稱爲游擊戰術十六字訣。

5.化整爲零；集零爲整：當敵軍大舉向我圍剿，我無法脫離敵人時，應利用自己優越的民衆條件，及複雜的山林河川地形，將部隊分散潛伏於民間，或避匿於山林河谷，使敵人找不到進攻目標，以待其撤退；或爲工作的需要分散工作，或爲敵情的嚴重，暫爲分散行動。

當敵人分散駐紮，有利於我進攻時：或有集中行動的需要時，應將分散的個人或小部隊，迅速集中，一致行動。

6.旋磨打圈，脫離敵人：敵軍向我追擊，我們利用民衆條件，地形條件，敵向西、我轉南，敵向東、我轉北，任我旋轉，以迷惑敵人，脫離敵人。

以上兩項是毛澤東補充的。

7.猛打猛追：我軍於進攻敵人，投入戰鬥時，必須立即以勇猛堅決的精神，施行衝鋒，發揮最高的威力以壓倒敵人，迅速解決戰鬥；敵人退却時，必須絕無猶豫的猛烈追擊，（包括戰場內與戰場外）使敵人無集中喘息的機會，一鼓而殲滅之。

8.飄忽無常：我軍爲求得主動，無論進攻敵人或避開敵人進攻，均須行踪飄忽，出敵意表，乘敵之虛，避敵之實，處處尋敵弱點，而施以堅強之攻擊，以短促之時間解決戰鬥，旋卽迅速撤退，以保障已得的勝利。要能做到飄忽無常，必須經常明瞭敵情，（番號、數量、裝備、動態，主官姓名和主官特性等）根據敵情，來決定自己的行動與計劃，幷要使自己的行動和計劃，能絕對的機密和迅速，這是最重要的先決條件。

這兩項，是我補充的意見。從此，游擊戰術的內容更爲充實了，成爲紅軍決定一切軍事行動和訓練官兵的原則。某些記載中共發展史的人，往往說「猛打猛追」「飄忽無常」這兩項戰術原則是林彪補充的。那是因爲不明瞭當時情形所發生的錯誤。那時林彪僅是我們所認

爲「中級幹部中的優秀者」是朱德所率紅四十八團的一個營長。

關於土地改革，過去祇有口號，沒有實施的具體計劃，毛澤東擬定了一個臨時試辦的簡單辦法：

一·以村爲單位，平均分配土地。

二·由村蘇維埃政府召集全村農民開會，舉報各人所耕的田畝數量與質量，（分上中下三級）會後各人回去自行在每坵田上插竹簽一條，書明畝數。

三·調查人員將全村總人口和田地數量，加以統計。

四·根據各戶所報人口與田地數量，決定每戶應得各級土地之總數。

五·由村政府準備編號之竹簽，帶同人民到田間插簽分配。

六·人民旣分得田地，須儘可能將舊有田基剷去。但因高低關係，不能剷去者，須保留舊田基。

七·旣分得田地之後，如發現有不均的現象，得請求村政府再行調整。

八・農民分田後，僅向蘇維埃政府納稅，不另繳付田租。
九・田稅由各地方政府按實際情形決定徵收，以最高不超過總收入百分之三十爲原則。
十・土豪劣紳不准分田。

這便是紅軍控制區初期分田的辦法。在實施時，毛澤東常親到村政府去指導監督，紅軍的軍政人員，亦以協助指導人民分田工作爲任務之一。當時尙無政府公田，及富農分壞田、中農分中田、貧僱農分好田的規定，以後才逐漸修訂。

## 五　戰鬪在七級嶺上

正當井崗山的各項制度草創，土地革命逐步開始的時候，駐湖南國軍一個師，由安仁向酃縣進攻。駐守酃縣的紅軍，以情況不明，全部退回寧岡縣城。這天晚上八時，又接到永新方面的情報：國軍金漢鼎軍的楊池生楊如軒兩個師，已進入永新縣城，正在強拉民伕，有向井崗山進攻的企圖。

面臨着這個兩面作戰的情勢，前敵委員會立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對湖南方面取守勢，因該方面情況不明，不便作戰。對江西永新方面取攻勢，并準備不得已時向黃坳撤退。各部隊分配的任務爲：（一）朱德、龔楚率二十八、二十九兩個團，佔領新老七級嶺，迎擊由永新向寧岡及井崗山進攻之敵。（二）毛澤東率三十四團固守井崗山，對湖南方面嚴密戒備。（三）湖南各縣游擊隊（赤衞隊所改稱）分路向酃縣游擊，迷惑敵人，阻滯向寧岡縣城前進之敵，以配合固守井崗山之三十四團，掩護七級嶺方面主力作戰。（四）迅速疏散寧岡縣的物資，并完成必要時撤退的準備。

會後，立即分令二十八・二十九兩個團於第二天在寧岡縣城集中，是晚我和朱德率領兩個團出發，向七級嶺前進。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拂曉・朱德率二十八團佔領了老七級嶺，我率二十九團趕速去佔領新七級嶺。兩個七級嶺相隔有十里，中間隔着大山。我率廿九團到達新七級嶺的最高山坳時，發現敵軍正在相距約四百碼的山坳口搜索前進中・我先頭部隊立即佔領陣地，向敵射擊，敵軍亦佔領路側的高地，與我軍對峙。

老七級嶺方面亦同時被敵攻擊，展開戰鬥。由拂曉至薄暮，經過了十二小時的激烈爭奪戰，結果將來犯的國軍楊池生楊如軒兩個師擊潰，紅軍繼續追擊，佔領了龍源口，主力仍向永新縣城方面窮追。我正在龍源口收集部隊，處理陣地警戒的時候，二十九團第二連黨代表彭晒報告：「我由七級嶺下山時遙見國軍一部在龍源口東南方相距不遠的山谷中。」這時，我祇掌握了第二連一個連的兵力。除留一班士兵在原地駐守外，其餘各班由我率領冒險向東南山地搜索。在龍源口外約千碼的山谷中，確有國軍約兩個營的殘部正在收容集結。我命令各班沿山頂散開，幷親率一個班和携同僅有的一挺輕機槍，下山去喝令國軍繳槍。散開在山頂的士兵也同時大喊「同志們！繳槍！」。「繳槍」的聲音在山谷中激起浪潮，聲澈雲霄。國軍官兵疲憊已極，而且不明我軍實力，祇好集中架槍，不加抵抗。連黨代表彭晒率領士兵一班，先將國軍步槍機柄除去，裝在伙食籮內挑走，然後叫俘虜將槍枝綑紮，背負上山。我才將第二連官兵集合，押着俘虜的國軍四百九十二人和戰利品步槍三百餘枝重機槍二挺回龍源口。俘虜們看到我們祇有一百多人，全似乎非常後悔的樣子。

是役，廿九團負傷的官兵計第二連連長蕭克等共七十餘人，陣亡官兵二十餘人。敵軍傷亡枕藉，山上那條隘路，遍地屍骸，戰鬥時都踐踏着屍骸前進，可想見戰事的激烈。廿九團虜獲步機槍四百餘枝，俘虜國軍五百餘人。廿八團亦斬獲甚多。那是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二日（農曆五月初五日）的事。這是湘贛國軍對井崗山第一次的會剿。

次日拂曉，紅軍乘勝攻陷永新縣城。再分路由廿八團向安福進擊，廿九團向蓮花推進并佔領了該縣縣城，湖南酃縣的國軍一個師，聞金漢鼎軍戰敗，自動放棄酃縣，退駐安仁。當時，軍中的署曉文墨的人，曾胡謅了一副俚俗的對聯：「不用紅軍三分力，消滅江西兩隻羊。」蓋而指楊如軒與楊池生而言的。

這一戰役的勝利，使紅四軍在械彈方面得到很多的補充，并開展了湘贛邊區四個縣的工作，鞏固和發展了以井崗山爲中心的羅霄山脉中段蘇維埃政權。

休息整補了二十多天的國軍金漢鼎軍，在七月中旬又集中進攻永新。這時，紅軍正在蓮花，永新兩縣鄉村，領導中共地方幹部，策動工農鬥爭，分配土地，建立鄉村蘇維埃政府，

部隊一時難以集中。於是迅速放棄了永新縣城，轉而控制鄉村，并將駐在蓮花的二十九團調回龍源口集中，準備隨時消滅國軍的出擊部隊。

紅軍在永新的鄉村二十餘天，鄉村工作在毛澤東直接領導之下有了極好的成績。所有各鄉村的農民協會、蘇維埃政府、赤衛隊、共黨支部等均已建立起來，民衆的革命鬥爭情緒，非常積極。

國軍雖佔領了永新縣城，但各鄉村仍爲紅軍控制，造成了紅軍包圍國軍的形勢。國軍對安福方面的後方交通，常被紅軍和地方民衆武裝所截斷。城內的糧食、菜蔬、肉食等完全來自鄉村，鄉村的紅軍對縣城施行封鎖，國軍無法得到供應，曾經三次派出一營以上的兵力出城到鄉村採購食物，均被紅軍以優勢的兵力圍殲。國軍困守孤城二十餘天，廹得放棄永新縣城。撤退時，前有民衆武裝阻截，後有紅軍主力追擊，損失慘重。金漢鼎部一個軍，經過兩次失敗，已無法再組織反攻力量了。那時國軍主力北伐，江西方面兵力單薄，我們隨又克復了永新縣城，到處看見貼着金漢鼎軍部的佈告，上面的大意是：

「奉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電令：軍民人等，凡生擒匪首朱德、毛澤東、驥楚等三名，每名賞金大洋弍萬元。殺死者每名賞金壹萬元。通風報訊而捕獲者賞金伍千元。……
……」

我們看了不免發笑，因為我們幷沒有被俘，而金漢鼎軍的官兵却被我們俘虜了不少。

## 六　毛賀結婚趣聞

江西永新縣有中共黨和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團的支部書記是永新中學女生賀士珍，她有兄妹三人，她的哥哥賀敏學，曾畢業於永新中學，也是個共產黨員，她的父親是一個小地主，幷在永新縣城裏開了一間書店，生活很優裕，一九二八年六月初，紅軍第一次攻下永新縣城時，賀士珍才十八歲，長得嬌小玲瓏，活潑可愛，說話很有條理，加上她天生的清脆悅耳的聲音，和一雙晶瑩的眼睛，一見即令人有甜蜜之感，我們佔領了永新的那天下午五時，她率領着四個女生和五個青年，帶了兩担菜蔬一担豬肉來慰勞紅軍，我和她見了一面，

第二天早上，我率領了二十九團出發蓮花工作，七月中旬，敵軍反攻永新後，奉命由蓮花開回永新龍源口集中，那時，毛澤東住在龍源口東北約五里的一個鄉村，指揮地下工作。我佈置了宿營後便去找他，當到達他的駐地時，他適外出未返，我便和隨從他工作的一位何同志談天，詢問永新的一般情況，他答覆了我所問的一切事情，並對我說：「龔同志！我告訴你一件事，毛主席已有了一位漂亮的女同志呢！你知道嗎？」我聽了接着說：「那好極了！朱德同志有位蕭貴蓮女同志，毛同志不免有寂寞之感，現在找到了一位革命愛侶，使他的精神得到安慰，生活得到調劑，對於領導革命事業，更加增強他的活力呢！但不知是那一位，我當時以為是我們紅軍中的女政工同志」？他便源源本本的告訴我：「毛主席連續接到你們擊潰了金漢鼎軍和佔領了永新的消息，他喜歡極了。嗣後，又接到酃縣游擊隊的報告，進佔酃縣的湘軍已往安仁撤退，他便於第二天帶着我們及一連兵來永新，展開蘇維埃運動。到達永新後，我們住在縣政府內，永新的地方同志，都來見主席，其中一位女同志賀士珍，漂亮而活潑，是團的支部書記，和主席談得很投機。那天晚上他送了兩隻雞、兩瓶酒給主席，主席留

她一起吃晚飯，她倆談得更親密。第二天晚上，主席召開永新黨團會議，商討開展蘇維埃運動和發展黨團組織……等問題，這位女同志發言最多，而且又有見解，深夜十一時才散會。會後，毛主席便請那位賀同志稍候片刻，說有要事同她談談，那晚賀同志單獨同毛主席在臥室裏密談了很久。次日早餐後，賀同志又來了，陪着毛主席工作了一整天，晚上也沒有回去。第二天的早上九時才起床，毛主席洗過臉後，喜氣洋洋春風滿面的對我們說：「我和賀同志兩人愛上了，由同志的愛轉變為夫婦的愛，這是我們革命鬥爭共同生活的起點。」那時賀士珍站在毛主席的左邊，帶着羞人答答的笑容。」何同志說完了這段話，時間快要入夜，毛主席尚未回來，我不再候着他，留下了一個簡單的報告，并約定明晨再來面報，我便回龍源口去了。翌晨八時，我再往訪毛主席，他正坐着辦公（他每天早上六時便起床），見我來了，馬上站起來和我握手：「龔同志！辛苦你了！昨天你來時適我不在家裏，今天正好，我們可詳細的談談。」說時笑容滿面。我們坐了下來，我和他談完公事後，就笑着對他說：「毛同志！我們的正事談完了，現在我向你道喜呢！」他哈哈的笑着說：「誰告訴你的！」我說：

「這是我們革命陣營中一件大喜事，誰不知道！但你應該請我吃喜酒、看新娘、才對呀！」他笑着說：「那容易得很！可惜賀同志已到寧岡去了，今天早上弄多點菜，先請你吃飯，將來回到寧岡時，再請你喝酒，好不好？」我笑着說：「好極了！」他馬上對隨從說：「弄多些菜！請龔同志吃早飯。」

這是毛賀結合的一段經過。在寂寞艱苦的革命鬥爭生涯中，毛澤東得到這樣聰明活潑的女同志做伴侶，他的歡愉是可想而知的。

## 七　紅軍營長叛變

紅軍的初期，由於發展迅速，組成份子非常複雜，官兵中有老兵，有土匪，有流氓，有農民，工人。一般對革命意識都很模糊，而部份農民的參加，更是爲解决生活而來。在湘南時，官兵薪餉每人月發銀洋十二元，沒收地主土豪劣紳家中的肥豬鷄鴨，幾全部爲紅軍官兵所專用。這種生活，對於思想單純窮苦已久的農民，是一種極大的誘惑。自從紅軍進駐井崗

山後，財源銳減，部隊增多，便將官兵的餉項削減了四分之三，每人月發銀洋三元，而且不准隨便沒收民間牛羊，必須統一分配，這便影响了部份思想落伍官兵的不滿。

經歷了井崗山的兩次血戰，這一帶稍有存糧的人都逃走了。剩下的是一些一年四季吃紅薯雜粮過活的人民。紅軍的粮食發生了問題，生活更加艱苦。不僅意志薄弱的官兵心生怨懟，連中級幹部也發生了動搖。紅二十八團第二營袁營長槍殺團長王爾卓叛變的事件，便是顯著的例證。

廿八團在永新第二次擊潰國軍金漢鼎部後，部隊駐紮在崇義縣思順以西的小村莊中。一天拂曉，第二營袁營長擅自率領第六連官兵向上猶，遂川方向脫離部隊私逃。王爾卓團長聞訊，認為自己與袁營長曾同生死共患難，感情不壞，親自帶了兩個傳達兵跑步追去。見到袁的部隊時，大呼請他停止，有事當面商談，勿做反叛行為，第六連的部隊聞聲即停止於路旁。惟袁營長和傳達兵四人繼續逃跑，在相距二十步時，袁營長即拔駁壳手槍對王團長連放三槍，將王擊斃在地，逃跑無踪。第六連連長知道袁營長叛變，即率部回營向朱德報告。王

爾卓是朱德最親密的戰友，王的不幸罹難，對朱德是一個嚴重的打擊。朱德爲此痛哭流涕，抑鬱不歡了數天。

這時林彪充任廿八團第一營營長，在廿八團的營長中林彪是一個出色的幹部。他出身於黃埔軍校，當連長時，朱德就看重了他。因爲他待人和順，做事認眞，幷勤於學習。平日部隊的管理很嚴而又得到士兵的愛戴，訓練亦有辦法而積極，他的部隊特別整齊而有蓬勃的朝氣。作戰時，身先士卒，勇敢善戰，每次給他的任務，雖艱險而不辭，且均能澈底執行，完成任務。我們對他的期望甚大。王爾卓死後，他是一個最適合遞補的人選，但以他任營長時間不久，資歷尙淺，故暫時由朱德兼任廿八團團長。

自發生了袁營長叛變的不幸事件，使我有許多感觸。深感紅軍內部所存在的軍閥殘餘思想，和地痞流氓的積習，必須及早淸除。唯一補救的辦法，卽是加強政治敎育，健全黨的組織，加強黨的領導作用。我與朱德交換了意見，寫了一封長信，通知毛澤東，請他加以注意。

於是，毛澤東便起草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三大紀律是：一、絕對服從命令。二、不取人民一針一線。三、一切繳獲都歸公。八大注意是：一、說話要和氣。二、買賣要公平。三、借東西要還。四、損壞東西要賠。五、不打人不罵人。六、不損壞靑苗。七、不調戲婦女。八、不虐待俘虜。

同時幷積極的開展政治訓練，要造成每一個官兵都是中共的宣傳者和組織者。從此紅軍的紀律逐步提高，紅軍所到之處，如無敵情顧慮，卽分散做民衆工作；如有敵情，卽集中作戰。當時情報的迅速和確實，完全由各地黨的組織和民衆所供給。而紅軍的行動，民衆都自動的予以封鎖或加以掩飾，使國軍不易偵察。紅軍經過時，民衆幫助外圍警戒，掩護紅軍休息。

紅軍的政治工作人員，在作戰時，卽運用一切方法鼓勵士氣；對國軍則進行瓦解宣傳，火線喊話，散發傳單標語。主要的口號是：「窮人不打窮人！」「掉轉槍頭打虐待士兵，尅扣軍餉的官長！」「紅軍是窮人的救星！」「歡迎你們到紅軍來！」「分田地，打土豪！」

……等等。幷動員民衆協助運輸，和戰後淸理戰場，搬運傷兵，管理俘虜，發動慰勞等工作，實行黨政軍一元化。

井崗山初期的勝利，就是因爲紅軍使用了一套動人的名詞迷惑了人民，政治宣傳工作亦配合得很好，確得到一般人民的同情和協助。到後來中央蘇區全部崩潰，紅軍被迫西竄，也完全是因爲人民已經認淸了中共的欺騙技倆，不再合作和幫助，才走上了失敗的道路。

## 八　以怨報德

當紅軍將政權逐步向湘南推進時，毗連井崗山的各縣全被赤化，毛澤東和朱德爲這個勝利的局勢所迷惑，決定奪取湘南，將蘇維埃政府從山區搬到城中去。當時湘南僅有國軍十六軍范石生部駐防，其軍部設在郴縣，是紅軍進攻的目標。作戰的計劃是：由毛澤東率三十四團駐守井崗山根據地，朱德和我率二十八、二十九團及湘南各縣游擊隊（赤衞隊改稱）由汝城之南洞，越過羅霄山脈南段，經龍溪十二洞，出東江，進攻郴縣。戰鬥經五小時，卽攻陷

郴縣縣城。國軍十六軍直屬部隊多被殲滅，僅守北門的步兵兩個團突圍向北逃去。紅軍繳獲械彈甚多，俘虜七百餘人。

我軍攻佔郴縣時，我與朱德便到十六軍軍部巡視。甫抵門外，即見范軍的副官長陳屍於血泊中。我囘想朱德與范石生結義情深，范待朱德甚厚，以前朱德在范部一四零團充任團長時，范本奉命將朱部繳械而竟密函通知朱離犂市自謀出路一事，可說是仁至義盡。今天反被朱德襲擊潰敗，可說是以怨報德。我的心中不免感覺到歉疚。乃打趣的對朱德說：「范軍今天被我們打得大敗，你還憶及曲江犂市時否？」他很堅定的囘答我：「革命是沒有恩怨和私情的，階級立塲不同，就是生身父母，也要革命，何况是結義兄弟。」我聽了他的話，心中像潑了一盆冷水似的，不禁暗暗的打了一個寒噤，令我想起捉放曹一劇中曹操說的話：「寧使我負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負我。」的那句話。

我軍佔領郴縣後，卽以二十八團向北追擊，廿九團的第一營向南追擊；幷清理勝利物資，維持市面秩序。可是因連日晝夜行軍，廿八團過於疲勞，祗向北追擊了十餘里，卽囘縣

城宿營，沒有貫澈「猛打猛追」的戰術，致使敗退的國軍，在棲鳳渡收容集結與高亭司增援的部隊兩個團會合，乘夜向郴縣反攻。紅軍因疲勞太甚，且在夜間敵情不明，棄城向東撤退。

我正在郴縣南門集合部隊，國軍已攻陷北門入城。我率廿九團的部隊即向雅茨坪撤退。因退却時太匆忙，所獲的戰利品既無法搬運，而廿九團向宜章方面追擊的第一營朱舍我部又失却了連絡。以致該部逃至湘粵邊境，被國軍將其全部消滅。男女政工人員被俘去二十餘人，其中的女政工員楊佩蘭，彭娟二人，遭受最殘酷的罪刑而犧牲。

據云：楊佩蘭，彭娟二人被俘後，由國軍將其交回原籍的宜章縣政府處理。宜章縣政府將這兩個被俘的女政工員，加以刑訊和褪去她們的上衣裸體遊行示衆後，再行凌虐處死。

這種殘酷的虐俘行為，引起了紅軍員兵的普遍憤怒，增加了紅軍員兵同仇敵愾的情緒和勇敢戰鬥的精神。許多意志薄弱準備隨時私逃回家的員兵，受到這個慘痛的教訓，再也不敢私逃回家了。

從這一點，使我深深的理解到，殘酷虐待無抵抗力的俘虜，是一種怯弱的野蠻行爲。它的後果是相反的。不僅不能嚇倒敵人，反而增加了更多的敵人。紅軍貫澈了前敵委員會「不虐待俘虜」的決議，在以後對抗國軍的戰鬥中，取得了攻心戰中的主要勝利，而國軍因爲俘虜政策不完善，往往因一時的憤怒而屠殺俘虜，便就種下了失敗的惡果。

## 九　火海餘生

紅軍在龍溪洞休息兩日，開到湘南的桂東，中共中央代表杜修經，第二次來到紅四軍，帶來中共中央的指示：「調龔楚赴長沙，任中國共產黨湖南省委會書記」。杜修經告訴我，湖南省委設在長沙的秘密機關，近來被國民黨政府破獲了，省委負責同志多數被捕去，湖南籍的同志都不能到長沙工作，你曾領導湘南鬥爭，因此，中央決調你任湖南省委書記，幷將長沙的連絡地址告訴我，着我先到郴縣的良田墟與郴縣地方黨部連絡，然後再赴長沙。

朱德聞訊，依依不捨，派了一排兵護送我到山區之外。從此，我離開了井崗山，離開了

我自己手創的紅二十九團，走到另一個秘密活動的環境中去了。

離開紅四軍的大隊，帶着護送的一排武裝同志和一位女政工員彭堃（準備在長沙秘密活動時的助手）在陰雨迷濛的早上，向着資興縣龍溪十二洞進發。

在龍溪洞找到資興縣游擊隊長李奇中。他是我們在南昌暴動時的老同志。他告訴我：「從這兒直向前走，沿途都是國軍的封鎖線。反動地主組織的挨戶團、自衞隊、守望隊、到處都設下哨崗。最可惱的就是以前的土匪胡鳳璋部隊。因爲他曾與紅軍數度作戰，和紅軍是死對頭，被湖南省主席何健賞識而利用，收編爲湖南保安團，并委派胡鳳璋爲湘南保安副司令名義。這時他正駐在汝城，虎視眈眈的窺伺着紅軍的動態。因之你們的行動要非常機警、秘密和謹愼，否則就有生命危險。」我們雖感兵力單薄，而且「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因爲我負有重要的使命，祗有硬着頭皮前進。

在龍溪洞休息了一天，由一位資興的同志帶路，沿着山僻小徑行走。當晚到達汝城縣屬距山店八里的一個祗有七戶人家的小村落休息。那個小村四面環山，有一條涓涓的小溪流過

村前。竹籬茅舍，非常幽靜。我們便在這小村裏宿營。我爲了謹愼起見，派了一個覆哨向山店警戒。另着一位同志化裝農民去山店偵察。那位同志午夜囘來報告，說山店幷無敵情，我們便毫無顧慮的安心去睡了。

第二天晨光曦微中，哨兵已發現敵人，放槍示警。跟着拍拍的槍聲與喊殺聲在山谷中轟動起來。我們已被包圍在這個山谷中的小村了。幸喜有松林和野草可作掩蔽。我卽率領隊伍向屋後高山爬越，準備突出敵人的包圍圈，幷可在山上居高臨下的抵禦敵人的攻擊。可是，我們到達山腹，山頂已被很多服裝不整齊的敵人佔領了。上下都受敵人射擊。在敵人密集的火網下，我所率領的二十多個武裝同志已有五六個負傷，其餘的四散奔逃。女政工員彭堃也踪跡不明。時機不容我遲緩，我順勢一滾，鑽入草叢深處，避免敵人的發現。

許多同志在包圍圈內被敵俘虜了，我潛匿在草叢中淸晰地聽到他們被捕時的掙扎和遭受辱打的呼聲，他們的慘叫的聲音好像一根利針不住的刺痛着我的心。而在這極端不利的情勢下，我只有含着仇恨的眼淚忍受這慘痛的不測之變。

經過敵軍的兩次搜索，因草叢深密高大，始終沒有發現我。到了下午四時許，敵人顧慮草叢中仍有我們潛伏着，放火將草叢燃燒。風助火威，頃刻間猛烈的燃燒起來。不久，火勢已逼近到我潛匿的地方了。在不遠的小高地上，還有兩個敵人的哨兵橫着槍上了刺刀向燃燒的草叢注視着。我祇有向着尚未着火的草叢裏慢慢地爬過去。火在四週蔓延，我的衣服也着了火。我急速用兩手將它按熄。一股熾烈的熱浪，幾乎將我窒息。在這生死嚴重關頭，忽然那個守望的哨兵，自動地退到他們後面的另一高地上去，大概他是避開火勢的襲擾。可是，這却給我一個好的機會，我便鼓起勇氣，從火海中一直滾回山脚下的田邊，很快的藏入一個尚能遮蔽的土洞中，昏昏沉沉的伏着。

黃昏過後，明月已經升空了。這天是十月廿八日（農曆的九月十六日），晚風拂過我的臉，不覺打了幾個寒噤。這時，我才發覺到自己上身的衣服燒壞了，頭部，手部，足部均被火灼傷，再仔細一摸索，中共中央派我赴郴縣良田墟和長沙的介紹信與絡連地址，全在火塲中遺失了。孤另另地呆坐在荒凉的山野，萬念紛集，百感叢生。

呆了很久，略一定神，才辨清了方向，估計此地離開樂昌我的家鄉約有一百多華里。決心先回家去，療治火傷，休息些時，再作打算。想到這裏，我便拖着疲憊和傷痛的身軀，一步高一步低地走着。因為又顧慮沿途村莊的守望隊等等民團組織發現我的行踪。祇有在黑夜間行動，天未亮前，便躲到偏僻山間的稻田草堆中。飢餓時，專靠喝些泉水來維持這一線的生命。如此走了兩個通宵，總算幸運的抵達家門。母親見到我歸來，含着眼淚為我裹傷搽藥，慈愛與憐惜，使我忘記了一切的痛苦。

我的母親雖然所受的是舊式的教育，但她很鍾愛兒子，並了解兒子正從事着革命的工作，她不但不表示反對，而且鼓勵我要慎密的進行。因之，她對我的行踪極端保持秘密，祇將我回到樂昌的消息秘密地轉告黨的地下工作同志。我很快的便與中共北江特委取得連絡。廣東省委的視察黃甦，也到我家裏來探望我。我在家中秘密的休養了二十一天。

與我同村的青年朋友們，雖因我參加中共革命工作，連累他們遭受政府的罰欵和其他損失，但他們幷沒有怨尤。在我養傷期間，他們為了我的安全，自動的輪流在村外放哨，提防

敵人的搜查。熱情厚誼，使我感到無限的安慰。

## 十　謎一樣的難題

我從一九二五年六月十日加入中國共產黨開始，便將生命投入一個不斷高漲的革命浪潮中，由組織北江農民運動，農軍北上，南昌暴動，潮汕失敗，湘南鬥爭，開展井岡山蘇區工作，以迄汝城山店附近的火海餘生。在這一段不短的日子中，每天都在緊張而危險的情況下工作。唯一的願望是怎樣地去達成黨所賦予我的任務；所以從沒能靜靜地去反省過一下，究竟我所做的工作，它的代價是什麼？而在這次廿一天的病榻中，却使我想起了許多問題：

我參加革命的志願，是預備將全部的生命，投入火熱的革命鬥爭中，以堅決的意志和行動，來創造一個幸福美好的社會。而當時存在社會上的很多不合理的現象，更也支持了我這一思想的繼續發展。可是，在這幾年的鬥爭過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時，農民向地主豪紳的激烈淸算；和地主豪紳伺機向農民的慘酷報復，在這樣循環不已的鬥爭中，既

違背了人道主義的精神，也沒有增進整個社會的幸福，反而使生產萎縮，農村經濟破產，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壞了，而新的生活不但沒有固有的生活安定，而且完全陷入一個彼此猜忌，彼此防範，除了聽從中共的命令而外，幾乎變成了一個奴隸的社會。人性毀滅了；人道毀滅了，人格也毀滅了，平等自由，更談不到，這樣的革命手段，難道是我所應追求的理想嗎？因此，使我感覺到無限的困惑與煩擾！

尤其是我們革命的政權，爲什麼要叫做「蘇維埃」？令我回想起井崗山茨坪一個客籍農民的談話！他問我：「龔同志！埃政府是不是我們的政府？」（埃政府是井崗山人民對普遍蘇維埃政府的簡稱。客家話「埃」與「我」同音，他的意思是——蘇維埃政府是不是我們的政府）。我想了很久，才機械的說：俄文「蘇維埃的意義是工農兵代表會議」。誰知他更進一步的說：「爲什麼我們要用俄國人的名詞呢？爲什麼我們不能用一個中國人所知道的名詞呢？」這個問題，確使我難於答覆。我的心中暗想：「對呀！爲什麼不用中國工農兵政府的名稱？或者工農民主政府的名稱呢？現用的蘇維埃三字是個譯音，在政府的名義上加一個譯

音的名詞，究竟是中國的政府呢？還是俄國的政府？」我心中雖然這樣想，但是我表面上祇好支支吾吾的告訴那個農民：「這個問題呢……還得請示中央」。事實上，我怎能以這個問題請示中央呢？如果我這個所謂高級幹部的人，對於蘇維埃這個名詞居然提出異議，居然和一般人民一樣表示懷疑，豈不要給同志們笑話嗎？

同時我更想起我們的紅軍，是共產革命的武裝，它的任務是要以戰爭的手段，來消滅敵人的軍事力量，以推翻舊的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但是在不斷的戰爭中，戰死沙場的，並不是高級統治者的本身，而是破了產的工農貧苦大衆的士兵，和中下級的軍官。戰爭的結果，還不是貧苦工農的自相殘殺嗎？誰無父母，誰無兄弟，螻蟻倘且貪生，何況人類？

睡在病床上回想起來，越想越是想不通，使我對於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開始發生了懷疑！不過，這時候國民政府方面，已出了二萬元的賞金通緝我，勢成騎虎，不得不繼續跟着共產黨走！

在病榻中我派出了一位汝城籍的老工人，到汝城去打探在山店附近被捕的同志的下落。

他回來告訴我，在山店附近戰役中被俘的紅軍，都解到汝城槍殺了。其中還有一位女共產黨員，她臨刑時，還高呼共產黨萬歲呢！我聽了這個消息，心裏非常難過。懷念着那些在生死患難中的親密同志，雖然我這時對共產黨的作風，已有了懷疑，但卻給滿腔憤怒的火焰所燒毀了。

## 一一　參加廣東省委工作

在慈母的愛護下，我在家中休養了廿一天，身體已經復原。臉上灼傷的疤痕，也已經褪去。當時我接到中共廣東省委的通知，要我到樂昌黃圃鄉，出席指導樂昌縣全縣黨員代表會議。當時樂昌的縣委書記李光中，已建立了三個支部。我參加了兩天的會議，檢討了過去的工作擬定了發展組織的計劃，便又乘夜趕回家中。母親告訴我：「剛才接到在樂昌縣府工作的親戚通知，韶關的中共秘密機關已被破獲，捕去中共的負責人二名，并供出你已潛回樂昌。樂昌縣長劉應福，正在派人查緝中」。我聞訊之後，立即搬到一個親友家藏匿，并派人

與韶關東河壩北江特委通信連絡站連絡；知道韶關中共機關確被破獲。搜出印刷機和很多印刷文件，捕去兩位同志。但特委通訊處，尚未影响。當晚我步行到韶關，匿居在韶關東河壩一個農民劉福家裏。由一個共產黨員的國軍軍官，借了一套軍服及胸章；第二天的早晨，我便化裝爲國軍軍官，搭上南下的火車，經廣州到達香港。我所担任的湖南省委書記，也由中共中央另行派人充任。

共產黨員對于黨齡歷史關係，是很重視的。那時的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黃超，省委組織部長盧永次。他們兩人都是工人出身，中共中央沒有指定我在廣東省委担任職務，但一切重要的決策，他們都常來與我商討，徵詢我的意見。在這一階段，我主持了一個軍事研究班。積極訓練武裝鬥爭的幹部！訓練的課目：特別注意大城市中暴動時的巷戰戰術，與夜間作戰的通訊連絡之研究。爲了展開宣傳工作，首先籌辦了一種四開的正義報。在一九二九年二月，又創辦了一張對開的香港日報。都是我暗中策動，因爲沒有公開出面，也就很少人能够認識我的眞面目。由於我一向都是從事民衆運動與軍事工作。參加地方黨務工作，爲時很短；而在

香港參加廣東省委工作時的觀察，使我認識了中國社會上存在着許多普遍的品質上的毛病，中國工人階級，亦不能例外。換句話說，黨方所宣揚的工人階級的革命品質最高！以及惟有由工人階級領導的革命，才能澈底實現的說法，實有問題。

因爲中國是個農業社會的國家，由於農村經濟破產與雛型工業的興起，農民才流入城市，蛻變爲工人。所以他們都還保留着濃厚的農民意識，和半封建的保守觀念。正因爲他們的無產階級意識薄弱，所以在革命過程中的表現上，有時反不及小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的富於革命性與堅強的毅力。我所見到的從工人階級中提拔出來的幹部，很多都是犯了這個毛病。

## 附註

註一：秋收暴動——中共「八七」緊急會議，決定秋收起義，以不交租，不還債，實行土地革命等口號發動農民暴動，當時正值秋收期間，故名之謂秋收暴動。

註二：毛澤東於一九二七年多佔領江西寧岡縣，接着建立了井崗山游擊根據地。

按：中共出版的中央老根據地訪問記，「偉大的星星之火」一節紀載，一九二七年秋．毛澤東

同志領導湖南農民秋收起義，九月，他把湖南農民自衛軍，安源煤礦工人，以及一部起義士兵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第一師，以這支不滿一千人的武裝，向江西寧岡進軍，九月十二日，他們在湘贛邊界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崗山，建立了第一個革命根據地。

又按：共產黨胡華主編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參考資料第三編，二，其中一段：八七會議決定秋收起義之後，毛澤東主席代表黨中央指導湖南的革命運動，先是平江，瀏陽一帶農民成立了一個獨立團，和自武昌退出的警備團會合，由朱培德收編爲省防軍暫編第一師，這個部隊裡是有共產黨領導的，秋收起義發動後，各地農民都在共產黨領導下紛紛舉行武裝起義。這個部隊響應農民起義，進攻長沙。……在遭受敵人襲擊後大部潰散了，剩下基本隊伍不過幾百人，集中在瀏陽的文家市。毛澤東趕到軍中，把部隊帶到三灣進行改編，成立工農革命軍第一團……帶到湘贛交界處羅霄山脈中的井崗山上，建立根據地………。

以上兩段中共文獻均有錯誤，前一段說毛澤東是九月十二日到井崗山，參照後一段的情形，可證明他在時間上是不可能的。事實上，毛澤東在平江瀏陽領導秋收暴動有三個月的時間。後一段毛澤東改編的部隊是工農革命軍第一師（不是第一團）。

# 第六章　廣西蘇區的創造

## 一　在夾縫中長成

一九二九年春天，南京國民政府扣留了李濟琛。他是廣西省的領袖人物；在廣東也有深長的歷史，他一經扣留，桂系將領李宗仁白崇禧等，便在武漢發動了反對政府運動。南京政府一面派兵征剿，一面起用與李宗仁白崇禧不睦之桂籍將領俞作柏，向桂系基本部隊第七軍進行策反工作。俞作柏在桂系軍隊中有相當的潛勢力，尤其是當時第七軍副軍長李明瑞，是他的姑表兄弟，早年受俞的栽培，一九二六年北伐時，已在第七軍任旅長，嗣以北伐軍功，升任十五師師長；但因他是俞作柏的表親，爲李白所歧視，名雖調升爲副軍長，實則削奪其實權。由於他的勇敢善戰，及和藹待人，該師的官兵均對他有堅强的信仰。另有五十七師師

長楊騰輝，亦與俞李有深交；因而俞作柏便很順利的說服了李明瑞，很快的策動了十五師，及楊騰輝之五十七師，同在漢口起義，歸附南京政府；迫使李白桂系的軍隊，退守荊沙，一敗塗地。南京政府即以俞作柏爲廣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爲第八路軍副總指揮兼廣西省國軍編遣特派員，啣命回師攻桂。

俞作柏是個思想左傾的人，當孫中山先生在廣州領導革命時，歷任廣西討逆軍縱隊司令與總指揮等職。國共合作期間，曾任廣西省政府農工廳長，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一分校校長，與中共素有連絡。國民黨淸黨時，被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等所排斥，寄居香港。他既與桂系當權將領，不能合作；而南京當局，又以他沒有實力，對他幷不重視。是以他的心情，頗爲苦悶；中共駐香港的高級人員如惲代英，李立三，黃平等，看淸了俞作柏的心理，即向他進行爭取工作；俞亦樂與合作，等於一個中共黨員。他的胞弟俞作預，是一個正式中共黨員，他們手足情殷，互相勉勵。故當南京政府起用俞作柏時，他就先行向中共示意，得到中共同意，才接受新命。等到他對桂系軍隊的策反成功，與李明瑞率師攻桂時，曾請求中共派

員協助；中共中央即派賀昌來香港，命我參加俞李集團工作，幷給我以如下的任務：

一·積極爭取俞李對本黨之同情，予本黨一切援助。

二·利用俞李之掩護，發展本黨組織，建立本黨直接控制的軍事力量。

三·儘量介紹本黨同志滲入廣西軍政機關及部隊中，掌握實力，準備於可能時創立新蘇區

我接到這個任務的通知，于五月上旬離開香港。隨行的還有香港日報梁，吳兩位同志。準備到廣西創辦報紙，作爲中共的宣傳喉舌。當港梧輪途經廣東三水河口時，突有廣州公安局偵探課長林子光，帶武裝偵緝員多人上船，將梁吳兩人拘去。（解返廣州後，他們便被槍斃了。）我幸而住在另一個客艙內，且因在香港時，沒有公開活動過的關係，便幸運地逃過這「鬼門關，」而安全到達了梧州。

抵梧後，我以龔鶴村的代名，由俞作預陪同往謁俞作柏；他即予我以廣西省政府主席辦公室機要秘書的名義，協助他工作。五月中旬，李明瑞率軍攻下桂平，桂軍呂煥炎，梁朝璣兩個旅投降，順利的攻克南寧，很快的統一了廣西全省。

這時，廣西省政府中，成了個間諜戰的大本營。南京政府要緊握他，防範他再叛變。汪精衛的改組派，也拉緊他，要策動他「反蔣」。中共要爭取他，利用他，創立新的局面。省府秘書長黃健君，是國民黨改組派汪精衛派去的代表；教育廳長曾如柏，是第八路軍總指揮陳濟棠介紹去的探員；國軍編遣特派員公署政治部主任鄭介民，是南京政府所派的代表，監督俞李的行爲；另一個便是我，先任省府船務處長，後調南寧公安局長。這三個政治集團所派出的代表，外表上見面時，還是嘻嘻哈哈；骨子裏卻都是使盡心機，積極去爭取俞作柏和李明瑞，結果國民黨兩派所做的，僅是上層的工作，沒有下層的群衆基礎。而中共的工作，卻比較高明得多。一方面在上層取得信任，一方面在下層從事組織。陸續派到廣西的，有賀昌，（註一）鄧小平（註二）。徐冠英，石遲鋒，史書元，張雲逸（註三）。陳豪人（註四）等；他們帶來大批下級軍政幹部，使中共滲透廣西軍政的工作，得以順利展開。

自中共中央大批的工作幹部派來廣西後，便成立了中共廣西行動委員會，由賀昌，鄧小平，陳豪人，俞作預，和我五人負責，并具體的分配工作任務，以陳豪人任省府機要秘書，

隨從俞作柏工作，藉以明瞭省府一切動態，以徐冠英任編遣特派員公署總務科長，隨從李明瑞，藉以明瞭特派員公署的一切動態，以俞作預，張雲逸，史書元負責軍事運動工作、賀昌，鄧小平，與我爲常務委員，同住在我所負責的南寧公安局之內，負責全般工作的策劃和領導，那時因人少事繁，工作極爲緊張，每天晚上均須秘密開會，非至午夜不能休息，尤其是我，一方面要辦理公安局的職務，一方面要對外應酬，一方面還要負責行動委員會的工作策劃，初時我和我的妻子尚未結婚，曾因工作繁忙失約而發生誤會，幾至破裂，嗣經鄧小平，賀昌等人從中解釋，乃恢復和好，於是年九月二十一日結婚，完成了我的終生大事。

## 二　成功與失敗的分野

俞作柏鑒於過去失敗的經驗，他認爲在混亂的中國局勢下，沒有軍事上的實力，是不能發揮自己的革命抱負的。所以他佔領了廣西省會的南寧，統一了廣西之後，第一個措施，便是遴選優秀青年，破格委充各縣試署縣長，以整刷行政風氣。第二個措施，即決定編組廣西

警衞軍，建立自己的基本軍隊，以俞作預負責組軍事宜。一面立卽派員分赴桂南各縣招募新兵，充實兵源；一面將南寧軍校從新整理，改組爲軍官敎導總隊，派編遣特派員公署總務科長徐開先（徐冠英之化名）兼敎導總隊的主任；敎導總隊的學生，由各師旅挑選優秀班排長及地方智識靑年，參加訓練，藉以培養警衞軍的下級軍事幹部。

我們對廣西的軍事工作，也就集中精力於從事警衞軍的建立，及軍官敎導總隊的編組。爲了工作上的需要，立卽通知中共廣西地方黨部協助，發動黨員領導靑年參軍。最先成立的省府警衞連，便以中共黨員石遲鋒爲連長。以後新兵源源而來，由警衞連擴編爲警衞營，很快的編成了三個營，卽正式成立警衞軍第四大隊，轄三個營十二個連。初時以石遲鋒爲大隊長，張雲逸爲副大隊長。嗣以石遲鋒生活腐化，中共黨方面決定將他撤職，改以張雲逸爲大隊長。按照部隊編制，大隊實等於一個營的兵力。爲了減少外間的注意，掩蔽本身的力量，警衞隊的組織，仍以大隊名義編組，實則等於一個團的兵力。第四大隊編成後，繼續編組第五大隊，以俞作預爲大隊長，史書元爲副大隊長。兩個大隊的各級幹部，除了少數係俞作柏

早年的軍校學生外，大部份是中共黨員；于是中共的軍事工作便打下了穩固的初步基礎。

一九二九年秋末，汪精衛爲首的改組派，積極煽動俞作柏李明瑞聯合「反蔣」；而中共的主張，則是暫時觀望；爭取南京政府經濟和軍械的援助，以壯大自己的軍事力量。同時加緊整理降軍呂煥炎梁朝磯兩個旅，使能確實控制，然後創造新的革命局面。并把這個主張交由俞作預，向俞作柏條陳。可是俞作柏因已與在荊沙枝江起義護黨「反蔣」的張發奎，取得連絡；而張部起義後將南下廣西，共同合作。若廣西不響應，以分散南京政府的兵力的話；則張部有被南京集中力量殲滅的可能。因此，俞作柏基於道義上和形勢上的需要，當即決心與張合作，並興兵攻粵。這一決策，是他成功與失敗的分野。若他當時依照我們的主張，拒絕汪精衛立即「反蔣」；而仍與南京政府敷衍，則成功的可能是很大的。可惜在內部基礎未固，實力未充之前，便要輕舉；他的失敗，就成了定局。

當俞作柏李明瑞在南寧舉行隆重「討蔣」大會，閱兵宣佈就職的時候，獨立旅長呂煥炎，五十七師師長楊騰輝，十五師某高級軍官等人，在南京政府的策動下，便兵不血刃的促

成了俞李的失敗。

俞李失敗的局勢已定，中共雖然損失了一個建立軍事實力，和創造新局面的機會，但已經掌握了警衛軍兩個大隊，相等於兩團的兵力；乃請求俞李將可能掌握的部隊，如降軍梁朝璣部的蒙志仁團，及編遣特派員公署的衛隊，交與俞作預指揮。同時將警衛軍第五大隊，開赴左江龍州；警衛第四大隊張雲逸部，開赴右江百色；幷將所存軍械彈藥服裝，分運左右兩江，以爲將來擴軍之用。俞李毫無異議的接受了這一個請求，中共便以左右兩江爲基地，準備建立新的蘇維埃區域。而我們參加廣西工作的結果，也算是得到了收穫。

南京政府方面，雖得到一時的成功；但結果却又造成了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等恢復桂系實力，重握廣西政權的機會。在俞李失敗後不久，李白黃便再與廣西軍隊連絡，說服了楊騰輝，及十五師的將領。讓他們由香港再回廣西，張發奎由荊沙經湘入桂抵達廣西時，由桂系領導的廣西「反蔣」運動又爆發了，因之南京政府，仍一無所得。只是形式上由俞李的與戎，變爲李白黃張的稱亂局面而已。

## 三　廣西紅軍成立

廣西左右兩江，四面多山，峯巒起伏；北與貴州，西與雲南及越南毗連，地勢險峻。而左右江流向東南在南寧之西合流。小輪船由南寧直達右江之百色，左江之龍州，運輸交通，尙稱便利。兩江沿岸，有肥美的稻田，產谷甚豐。各山區盛產什粮；加以人民勤儉樸素，粮食足以自給。右江的居民，除漢族外，還有少數的苗，猺，侗，僮四族。這四種民族中，以僮族人口爲最多，佔右江人口之半數。右江東蘭縣的中共游擊隊領袖韋拔羣，便是僮族的領袖人物。他以東蘭鳳山邊境的西山爲基地，自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後，便打游擊。黃紹竑時代的廣西省政府，無法將他消滅。迨至俞作柏佔領廣西，便由中共的關係，而給予小量的械彈接濟，提高了他在右江的地位。這是我們建立右江蘇區的最有利條件！

百色，是右江的首邑。扼雲南貴州兩省入桂的要衝，商業繁盛。行政機關，除縣府外，另有清鄉督辦署的設置。稅收機關，除田粮局外，還有禁烟局，徵收雲貴兩省鴉片烟土入桂

過境稅；每月稅收極大。我與張雲逸率第四大隊，到達百色後，便控制了一切的稅收機關。軍費政費，不虞缺乏；便積極的開展附近各縣工農運動，及建立共黨組織工作。

龍州，是左江的首邑。除縣政府外，有對訊督辦公署，辦理中國與越南出入口護照，且爲雲南入桂要道之一，商業亦尚繁盛。稅收機關，除田粮局外，亦有禁烟局，徵收雲南烟土入桂過境稅，且還有防務經費（賭捐）。中共爲了要解決經費來源，對這種害民的捐稅，仍暫照舊辦理。因此在龍州方面的軍政費，也足以自籌自給了。

沿左右兩江這兩個地區，有二十多個縣份；但因地方遼闊，我們的兵力人力，均不足分配；致蘇維埃運動，和民衆組織工作，一時不能全部展開。右江方面，僅能控制百色附近幾個縣；左江方面，也僅能控制龍州附近幾個縣；使兩江的蘇區，不能打成一片，這是當時最大的損失。

因爲地形與民衆的條件，右江比左江優越。中共的指揮重心，設在右江，我也就在右江工作。右江各縣，東蘭是有民衆基礎的。我們到了百色，更提高了羣衆的鬥爭情緒；打土豪

分田地的工作，普遍的在鄉村自動的幹起來。百色，奉議，田東（平馬）思林各縣，我們領導着當地的中共黨員，積極編組自衛團，建立工農羣衆自己的武力。同時我們採取了官兵平等待遇，提高士兵待遇的辦法；官兵薪餉，每月一律發銀洋二十元。在提高士兵待遇影响之下，廣泛的發動民衆參軍。動員民衆參軍的結果，不僅是當地工農民衆熱烈參加，而且桂系軍隊中的士兵，亦有由南寧開小差，遠道逃來百色參軍的。不到三個月的時間，由一個團擴充到二萬多人，編組成兩個師，幷將右江游擊隊韋拔群部編爲一個師，共有三個師。軍部轄有一個特務營，一個教導隊，每師轄三個步兵團，一個野戰炮兵營，一個特務連，一個通信連（電話排，旗語排，傳達排，）每團轄三個步兵營，一個迫擊炮連，一個特務連，一個衛生隊。每營轄三個步兵連，一個重機關槍連。每連轄三個步兵排，每排三個步槍班，每班有士兵十二人。軍部的編制，設軍長一人，參謀長一人。下設參謀，副官，經理，軍法，四處及政治部。軍部成立時，張雲逸任軍長，我任參謀長兼十九師師長，李謙任二十師師長，韋拔群任廿一師師長，參謀處長唐濬，副官處長陳伯度，經理處長張某（後因貪污撤職，改調

葉季莊接充），軍法處長葉季莊（註五），政治部主任陳豪人。

當我們在左右兩江積極建軍的時候，廣西政權，又落入了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之手。由於他們與兵攻粵；粵軍陳濟棠部，又攻廣西；國民黨內部的紛爭不息，兵連禍結，遂給予我們從容發展的時間和空間。

中共中央見到廣西的中共武力已經逐漸長大，特派代表龔仁，于一九三〇年二月五日到達百色。携來中共中央的指示，着右江張雲逸部成立紅七軍，左江俞作預部成立紅八軍；幷以左右兩江爲基地，展開廣西革命鬥爭以建立新蘇區。

我們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後，立卽召集會議，決定以下實行辦法：

一、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一日爲廣西紅軍成立日。右江現有部隊，編爲紅軍第七軍；幷電左江俞作預部，同日成立紅軍第八軍。

二、現爲本黨完全控制之百色，東蘭，田東，思林四個縣，于是日先行懸掛蘇維埃紅旗。然後召集工農兵代表會議，選舉蘇維埃政府主席。在過渡期間，行政部門由現任縣長

以蘇維埃政府籌備委員會主席名義，負責執行。

三、凡成立蘇維埃政府之縣，卽行按人口分田，廢除一切契約和債約。

四、暫未成立蘇維埃政府之縣，實行二五減租，及停止付息。

五、土地分配，以村爲單位。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已分之田，由耕種者于收成後，向政府繳納總收成百分之十五的地稅

六、田州（奉議縣屬）駐有廣西民團編成的警衞軍第三大隊，由紅七軍派兵於同月十一日拂曉，將其全部繳械，俘擄官兵解軍部處理，不得虐待。

七、成立七八兩軍總指揮部，以李明瑞爲總指揮；其餘人事，另行議定。

八、各項工作準備，負責人如下：

1 政治工作，由陳豪人負責。

2 軍事工作，由張雲逸，龔楚負責。

九、將本議案及中央指示，專人送龍州兪作預同志，參照辦理。

這一會議結束後，就分頭秘密進行準備。幷於十日晚，派李師長率兩個團赴田州，于翌（十一）晨解決警衞軍第三大隊。

十日晚由我以春酌名義，假商會俱樂部柬請百色，奉議兩縣縣長（非中共黨員）及紳商領袖晚餐。餐後宣佈「本軍明晨改組紅軍，並成立蘇維埃政府，請各位協助。但今晚則請屈駕在俱樂部，玩一個通宵，以免明晨有所誤會，而影响各位的安全」。本來他們早已知道我們是中共份子，但見我說話溫和，幷無惡意；各人雖心裡不安，但亦無大驚恐，她們軟禁在俱樂部內，有食有睡（俱樂部內設有寢室）有玩的過了兩天，然後恢復自由。

十一日晨八時集合軍政官兵及工農羣衆，在原督辦公署前舉行蘇維埃紅旗升旗禮。升旗後由張雲逸宣佈紅七軍正式成立的意義，由我宣佈紅七軍各級主官姓名後，鳴爆散會。

同日上午十時接到田州李師長電話，報告圍繳警衞軍第三大隊的任務已完成。雖曾發生戰鬬，現已全部解决，未逃一人。該隊傷亡官兵十餘人，羅大隊長及所有官兵，均已被俘，我軍亦畧有傷亡等語。

紅軍第七第八兩軍總指揮部及各軍人事如下：

紅軍第七八兩軍總指揮李明瑞

參謀長龔　楚

紅七軍軍長張雲逸

參謀長龔　楚（兼）

政治部主任陳豪人

第十九師師長龔　楚（兼）

參謀長張運楫

五十五團團長何子礽

五十六團團長李　顯

五十七團團長王子榮

第二十師師長李　湛（即李隆光，立三之弟）

參謀長胡　元

第廿一師師長韋拔群

紅八軍軍長俞作預

紅軍成立後，蘇維埃政府也宣佈在百色，東蘭，奉議，田東，思林，果德各縣組成。繼之，在平馬成立右江蘇維埃政府，以雷經天爲主席，領導右江蘇維埃運動。

一九三〇年四月間，我率十九師在思林擊潰桂軍向蘇區進擾的一個團，消滅其一部。五月中旬，據南寧密探報告：「桂軍李白及張發奎等與北方的馮玉祥，閻錫山等，聯合反對南京政府，又決定出兵進攻湖南，準備與馮玉祥會師武漢。各部桂軍已開赴柳州桂林一帶集中，不日向湖南進發，現南寧空虛」等語。紅軍接到報告後，查明南寧附近僅有桂軍十五軍副軍長兼四十五師師長黃旭初的四個團兵力。我軍乃決定集中七八兩軍進攻南寧。紅七軍十九，二十兩師集中平馬向隆安前進。剛進抵隆安縣境，桂軍副總司令黃紹竑，派清鄉司令李奇等兩個團，固守縣城。激戰兩日未能將隆安城攻克。而從右江南下的紅八軍，因蒙志仁團

叛變，影响了原定計劃；不能與紅七軍採一致行動。于是紅七軍乃停止攻擊，撤回思林，百色一帶整訓。出師不利，不免感到遺憾。這次作戰，我軍撤退後，桂軍亦即撤退，隆安僅由當地團隊駐守。

## 四　有禮貌的追擊

一九三零年六月下旬，紅七軍（缺廿一師）以進攻榕江爲目的，取道河池，思恩，到宜北。在宜北準備了三天粮食。經色寨入貴州省境。由色寨出發到榕江，倘有三日的行程，都是在萬山叢中的猺人住區行進。第一天宿營的猺紂，因猺民全數逃避深山，找不到猺人購買菜蔬，迫得通令部隊，可在民家及菜田裡收集青菜，幷准許每團殺一個猪，爲兩餐飯菜。但必須以團爲單位，負責將菜價加倍留置銀洋於菜地，及民房內，以免引起猺民反感，與維持我們鐵的軍紀。可是我們殺猪的消息，很快的傳播了猺區，而我們留下銀洋的消息，猺民却還不知道。第二天行軍到達一個有百戶人家的猺村時，即被當地猺人封閉道路及村外柵

閘。幷集中了數百猺人，携帶鳥槍劍戟，堆集大石，阻止我軍通過。而那個猺村建築在大山中部的横排上。祇有一條傾斜很急的羊腸小路可走，進攻非常的困難。我接到了前頭部隊的報告，立卽命令他們集結停止前進。然後我和李明瑞前往視察形勢，認定猺民是出於自衞性質，可以談判解決。我乃獨自冒險走進第一度柵門，請猺民派人來洽商。經過了十多分鐘時間，有位四十多歲的農民來到，據稱他是這一個猺區的猺人代表；他本人却是漢人。我告訴他我們是經過猺區到榕江去的軍隊，紀律很好，絕不侵犯民間的一草一木。買東西給錢，公平交易，更不會强買强賣；昨晚殺了人民的猪及蔬菜，均留下了現銀；請轉告他們不要恐懼。今天因被阻遲了時間，除了一個師繼續前進外；總指揮部及一個師，是要在該地宿營，請他轉告猺人不要誤會。那人去了約廿分鐘，便有猺人下來開閘門，給我們進入村莊。時間已是下午，烈日西斜，照射着村外的大樹，和猺民收成時掛稻谷的竹架上，構成了一道廣闊的陰影。數百猺人，無分男女老幼，站滿了那些竹影之下，帶着好奇的眼光，觀看我們第廿師軍隊一隊一隊的通過。這是他們有生以來沒有見過這樣多的軍隊。廿師全部通過了後開

總指揮部，軍部直屬隊，十九師跟着來了。猺民見我們廿師的官兵，沒有一個進入鄉村，而一個一個的跟着前進，也就相信了我們所說過的話了。同時昨晚宿營留下銀洋的消息，他們也已聽到。那位漢人代表，便帶着一位五十多歲的猺人來見我。這位猺人是此地附近二百里猺區的酋長（我祇好稱他爲酋長），他派了五個猺人帶我們各單位的設營人員進入村莊內，分配營房。我見猺民中，男的束髮，女的袒胸；（她們的服裝如和尚衣，上胸外露）短衣短裙。壯年的男女腰間，均佩有尺多長的古劍，如見唐漢以前的古人。在我所見過的猺人中從未見過如此古老的裝束的。由於語言不通，雖不無隔閡之感；但那些猺人的熱情洋溢，使我並不感到陌生。到了負責設營的副官出來通知我，設營就緒；我便隨着他們進入村內。見猺人屋宇，全是板木建築，上蓋杉皮，一座一座的不相連接；有樓有地，樓上住人樓下住牛，每屋僅有一扇門，兩個不足一尺直徑的圓形窗；門的上面掛着牛角，屋內就是一個大廳，中間築着一個小小的土灶，灶旁有一張四方木檯，幾張木櫈。沒有臥室牀帳設備，晚上圍繞在灶的旁邊席地而睡。他們的生活，眞是艱苦到極點。等我佈置好了營地後，

我便去訪問那位猺人的酋長。因爲我們尊重他的緣故，他的家裡沒有駐軍。他的房子很大；一連有五間，中間的樓上樓下都是大廳，上下兩廳，可容兩百人的集會；樓下的左右房屋，是飼養着豬牛鷄鴨的，及放置農具。樓上的左右房間，是臥室及儲藏室，堆滿了油鹽酒什糧（他們的稻谷，是連禾心一束一束的掛在村外的竹架上）及食物，獵具等物。大廳的中間牆上，掛着兩對牛角：廳的兩旁有兩張四方木檯，圍擺着成十張的木櫈；中間亦有一個大土灶。當我到達時，他一家三男五女，圍坐在灶旁；酋長見我來了，立即站起，作有禮貌的歡迎。笑着拉上一條櫈請我坐下，女人們也不廻避，跟大家坐在一起談天。兩位青年是他的兒子，身體壯健，約廿餘歲；五個年輕的婦女，雖然穿着猺人的古老服裝，但她們的臉形體態，和雪白的肌膚，却是具有美人的條件。（據說兩個是酋長的妻妾，兩個是媳婦，一個是女兒）酋長因不大懂得我的話，馬上叫他的兒子去請那位漢人來。（他是專替酋長完糧納稅及傳語兼教猺民讀書）我從談話中知道猺人是信奉獸神的，他們的契約，還存下有結繩爲憑的草結，和象形時代的古文字。許多年前，猺漢民族間的仇恨很深，常發生嚴重的械鬬；漢

人名之謂「殘猺瘋」。近十多年來，猺王遷居于漢人居住的城市內，這種械鬥才沒有發生。但在猺人心目中，漢人都是很壞的。那些專做猺人生意的小販，以廉價買來的鹽布故衣，要換取猺民很多的穀物。這樣的生意，有幾倍的利益。可是他們賣給猺人的鹽，還是入白沙。政府派來收糧收稅的人員，又是作威作福，勒索壓搾猺民的錢財，無所不至，這些，都是最令猺人痛恨的事。我聽了這話，便告訴他：我們主張各民族一律平等。將來中國革命成功時，歡迎猺人到大洞去住居，照漢人同等待遇。分田，教育，選舉與被選舉爲政府官吏的權利，猺人同等享受。各弱小民族，一律平等。現在那些漢人的貪官汚吏，惡覇，奸商，全要打倒！他聽了我的話，亦非常興奮。立卽宰牛殺猪，準備歡宴我們。那三位青年婦女聽着。向酋長說了幾句話，酋長點了頭，她們便跑進住房去，背了鳥槍和獸皮袋，帶着兩條狗出門去了。那時天尙未黑，但已接近黃昏，我問她們到那裡去？那位漢人說，她們說你是個漢人中最好的人，要去打野獸送你呢！我乃告辭。臨走時酋長約我今晚約同幾位官長到他家裡飲酒。我只好答應晚上必來。回到營房不到一小時，正和李明瑞張雲逸談天之際，那三位婦女

便送來了一頭野猪和兩只雉鷄。我們送了她們每人兩塊光洋，她們喜極歸去。

那天晚上九時，會長派那位漢人來請我們去飲酒，我和李明瑞同去。到會長家裡時，樓上樓下擺着大鍋的猪肉牛肉，大罎的燒酒，聚集着男女近百人。樓上廳的中間灶邊，放着三個高約一尺六寸的銅鼓；據會長自稱是傳家之寶。是漢末孔明征南蠻時遺留下來的戰鼓（或係狄青南征時遺下）。幷請我們坐在鼓上！這是表示最尊敬之意。大家圍着喝酒食肉，直至深夜二時才散。猺人的盛意隆情，至今我還不能忘懷。

第二天我們出發時，通知會長，請他派壯丁來榕江，他答應明天派來

我們于六月中旬。進抵榕江城郊。這時適值貴州省主席王家烈，由貴陽出巡至榕江。城內有步兵兩團，砲兵一營，固守頑抗。紅軍以志在必得的決心，前仆後繼；以原始的攻城方法，抬着竹梯爬城；第十九師第二營營長王震，便在攻城時負了傷（王現爲中共的新疆軍區司令員）。但紅軍再接再厲，終於將榕江城攻下來了。王家烈愴惶突圍逃竄，幾爲紅軍生俘。是役紅軍俘獲步槍五百餘枝，重機槍二挺，七五糎山砲二門，無綫電機一座，及俘虜七

百餘人。

佔領榕江的那天晚上，來了很多猺民，我們派員預備住所，好好的招待他們的住宿和吃飯；并在榕江城內搜購了很多鹽糖布匹，送給猺民担回家去。還告訴他們，如願意參加軍隊工作的，隨時可來入伍。于是他們都很高興挑着東西回去。以後參加紅七軍的有三十多人；均能克苦耐勞，勇敢善戰。尤其是上高山如履平地，步行快速，非漢人所能及。以後還有幾個在紅七軍，幹得很出色，做了連營長。

在榕江準備乘勝繼續擴大佔領區的我們，突接韋拔群自右江來信（當時紅軍中還沒有無線電機器材，來溝通部隊間的連繫。）說：「百色已被右江民團司令岑建英攻陷，我師退守東蘭。」這個形勢的突變，使我們非常焦急。因右江是紅軍的主要根據地！百色失陷，整個右江將無從保存。于是紅七軍又回師右江，準備收復失地。

行前，貴州省主席王家烈送來一信，要求李明瑞發還電台與山砲，免傷感情。并云追擊部隊，決不向紅軍攻擊，當時情勢，紅軍本身有一個砲兵營，砲彈儲備并不充足，補充更感

困難。而無線電人材，紅軍中更沒有。俘虜過來的貴州省府電台人員，都是穿着長袍的文弱書生，隨軍行動是很不方便的。何況他們對革命。根本沒有認識，很難改造過來。這時王家烈所派的五個步兵團，每天都是跟着紅軍後頭前進；在五里或十里外的地方宿營。雖然他們也不敢與紅軍主力作戰，但究竟對紅軍的士氣有影响。於是到達福祿墟的時候，我們便將繳獲的無綫電機與兩門山炮棄于榕江河內，并將無線電人員全部遣返。繼續經天河，懷遠，回師廣西東蘭。而王家烈的五個團的部隊，在撈回了無線電機與山炮後，沒有再尾隨紅軍行動了。這種「有禮貌的追擊。」眞是戰場上不可多見的奇蹟！

## 五　紅八軍夭折了

反攻右江的部署，是以十九師爲主力進攻百色，二十師攻擊田東，二十一師以一團留守東蘭，其餘的爲總豫備隊，隨十九師跟進。那時已是七月的下旬。

百色縣城被右江民團司令岑建英佔領後，即在城外西北高地構築碉堡二座，每座派步兵

一個連駐守，與守城部隊構成火網連繫，封鎖攻城要道。其守城總兵力一個團約二千人。

我率紅軍十九師三個團．及一個野戰炮營。（有七五糎山炮四門）在百色以北之三岔路展開，首先以野戰炮摧燬敵軍碉堡陣地，然後延伸射程向守城之敵射擊。各團步兵炮連，每連有八一迫擊炮四門，亦同時集中射擊，掩護步兵攻城，戰鬥約四小時，敵軍即由南門突圍逃竄，紅軍遂光復了百色縣城。

紅二十師由師長李湛率領，同時佔領田東。三天內，將紅軍前所放棄的右江各縣，完全克復。

溯我軍於六月下旬，由百色出發，至八月上旬回師，反攻右江各縣；相隔雖僅一個月，各縣市場已表現着冷落的氣象，尤以百色爲甚。查其原因，是由於多數商人對共產黨抱着懷疑與恐懼的心理，不敢到百色來做買賣，而土貨外銷，亦受戰爭的影响，運輸交通困難，遂陷於停滯。同時許多豪紳地主，亦以不滿中共的減租，停息，分田等措施；在民團進駐時，却乘機向工農勒迫賠償損失。紅軍復來，更恐懼中共殺害，而逃往南寧。一般工農民衆的心

理，亦以曾經受民團與豪紳地主的威迫，顧慮將來紅軍離去或失敗時，又必然重受豪紳地主更大的廹害；因此，影響了他們的鬥爭的情緒。

我們面對着這些問題，一切均感到棘手。且稅收銳減，經濟益覺困難。乃將各師分防整訓；并負責各駐地的民衆組訓工作。軍食的維持，先就地籌借軍粮。至秋收後，粮食徵集，自無問題。當時給予各部隊的民衆工作任務是：

一、協助民衆秋收。（派官兵替農民割稻穀）

二、恢復一切民衆組織。

三、利用民團及豪紳地主向農民報復的事實，擴大宣傳，以提高民衆鬥爭情緒。

四、秋收後發動民衆，繳納地稅。

五、發動農民參軍，就地補充各部隊缺額。

六、對曾被民團及豪紳地主摧殘的人民，須派工作隊，詳細訪問；發動民衆幫助他們，解除他們的困難。

各師的駐地分配如下：

一、十九師（缺一團）分駐百色，奉議兩縣，對雲南方面警戒。

二、廿師分駐平馬，思林，果德三縣，對南寧方面警戒。

三、廿一師分駐東蘭，鳳山兩縣，進行鞏固基地工作。

四、龔師長率一個團，向左江方面游擊，設法與第八軍俞作預軍長連絡，幷收容該軍散兵

這個計劃决定後，各部隊便分別調動，部署工作；我率一個團（五十五團）佔領向都，迫近鎭結，就茗等縣；幷以連爲單位，派出四個連，分途游擊。經過了五天時間，收容了紅八軍官兵一百二十餘人，幷得悉俞作預已逃赴安南。其餘部隊已爲桂軍繳械，我乃率部回百色。曇花一現的紅八軍，便瓦解了。（註六）

## 六　西林附近游擊戰

紅軍派赴雲南的密探，在八月中旬送來緊急情報：「南京政府，命雲南朱曉東軍，分由

龍州，百色，沿左右兩江進攻南寧。其經右江之張聰師，已到富州，將經剝隘入百色。」第二天滇軍張聰師長來信，畧云：「敝軍假道百色，沿右江南下進攻南寧，絕不侵犯貴治及騷擾軍民，希勿誤會。」

滇軍究竟是否實際進攻紅軍呢？還是眞的假道百色進攻桂系軍隊？經過我們研究的結果，無論張聰師的企圖怎樣，打擊國民黨部隊壯大自己，是紅軍的已定方針。滇軍以長途行軍的疲勞之師，乘機將其擊潰，正是紅軍擴充實力的機會。決定退出百色縣城，在思林果化間之山谷，殲滅國軍，並作如下之戰畧部署：

一、總指揮部軍部第十九師（缺五十五團）及二十師全部集結于百色以北之凌雲汾州，龍川墟一帶。準備於張聰師離開百色沿右江南下時，我軍尾敵追擊。配合思林以南之五十五團，在右江左岸殲滅之。

二、襲師長率五十五團，卽移思林至馱層大路以東之山村，準備在思林自馱層之谷地；伏擊由思林至果化運動中之敵人，並配合主力追擊部隊，一舉而殲滅之。

三、二十一師，在駐地繼續整訓。

四、百色，田東，平馬，思林各縣，沿右江交通大路鄉村之粮食，全部運上深山疏散收藏，不得資敵。

五、百色至果化沿江船隻，立即移至百色以北，勿為敵軍所利用。但少數交通渡船，可保留維持交通，必要時予以破壞。

六、各縣赤衞隊，須利用沿江及大路兩側山地埋伏，進行擾敵工作。特別是當敵軍宿營時，利用夜晚向敵駐地進襲，以擾亂敵人。

這個作戰計劃决定之後，我率五十五團，迅速的在思林以南之山谷，依據有利地形，將伏擊的準備工作完成之後，便隱蔽在小山村裏休息。

滇軍張聰師，在百色休息兩天，與廣西右江民團司令岑建英，取得連絡，讓民團進駐百色，然後沿右江左岸南下，經田州，田東，平馬至思林。由思林至果化的三十華里間沿路的兩旁，都是嶙峋的石山，中間為一條狹隘的谷道，部隊不易展開，利於守而不利於攻！眞是

天造地設的良好的伏擊戰地。

張師的先頭部隊，進入了我們佈置的口袋地區時，五十五團卽以猛烈的炮火，加以阻擊。同時組織步兵衝鋒，喊殺連天，震動山谷。混戰二小時，滇軍先頭部隊，拚死衝出包圍，佔領果化對岸之小山，控制渡河點，掩護其後續部隊突圍。其未進入谷道的部隊，卽退回思林，改道渡河沿右岸至果化。紅軍主力部隊，因行動遲緩，僅在思林附近消滅其後衛部隊一部。

這次伏擊，雖然沒有全殲張師；但滇軍傷亡官兵七百多人，陣亡了一個團長，重傷了一個特務營長。紅軍俘獲了步槍四百多枝和其他軍用品，俘擄滇軍官兵五百多人。

戰鬥結束後，我們開了一次檢討會。認爲這次作戰，沒有將滇軍全部消滅，以致失去了一個很好的殲敵機會。檢討的結論是：

缺點方面：

一、使用於伏擊的兵力太少，致敵人進入伏擊地區，因火力稀薄與兵力不足，仍被其突圍

而出。倘能以一師以上的兵力，埋伏于這十五華里長的谷道內，必可將其全部聚殲。

二、主力跟敵尾追，行動遲緩，不能及時趕至思林，配合伏擊部隊作戰，且使其後衛部隊，大部逃去。

三、擾敵工作沒有切實執行！堅壁淸野的工作，也不够激底。致予敵人精神上的打擊不大，敵軍官兵的戰鬪意志，尙屬堅强。

優點方面：

一、伏擊部隊對戰地偵察週密，伏擊部署適當。

二、伏擊部隊動作堅决，在短兵肉搏時，沒有一人後退；雖傷亡數十人，仍戰鬥至結束而後止。

雖在伏擊張師時獲得了勝利，而作爲紅軍根據地的百色，却在滇軍到達時，爲岑建英的民團所佔領。要怎樣奪回這個右江的重鎭？是紅軍下一次重要的作戰計劃。

由於紅軍對于失去的百色，是志在必得的緣故；盤踞在百色的右江民團約二千人，在民

團司令岑建英的指揮下，正在積極修復碉堡，構築城內外及河邊障碍工事，與作戰準備。并向凌雲，西隆，鎮邊，天保各縣徵調民團協助防守，準備以百色作爲打擊紅軍的核心基地。他們雖祇有二千人，但戰鬥力，并不弱于正規軍部隊。據險抵抗，使紅軍不能達到作戰目的。紅軍因彈藥消耗過大，補充不易，迫得放棄進攻百色之計劃，回駐右江左岸各縣。

## 七　奉調江西集中

一九三零年正是中共執行立三路線的時期，他要集中紅軍力量進攻武漢，派鄧小平來廣西蘇區，傳達命令，但因爲沿途要經過國民黨的統治區，中共中央于六月底發出的由鄧小平帶來的指示，到九月中旬才遞送到我們手裡。其內容大約如下：

一、國內反動統治階級，內戰頻仍；已走向崩潮的道路！革命鬥爭形勢；由於江西蘇區，洪湖蘇區，鄂豫皖蘇區的發展，與各地紅軍的壯大；國民黨統治區內與蘇區工農鬥爭的積極化，中國革命高潮卽將到來。本黨號召全國紅軍及一切革命力量，集中起來，向武漢進

發，建立以武漢爲中心的革命政權，進而推翻國民黨整個政權，以完成全國革命的勝利。

二、各地紅軍立即由分散游擊，轉爲集中作戰，由游擊戰，運動戰；轉爲打硬戰，攻城戰。

三、江西蘇區紅軍，爲現階段革命戰爭之主力！廣西之紅七軍，紅八軍主力，應即調江西蘇區集中，以執行新的戰爭任務。

四、紅七軍紅八軍，在東調行軍途中，應選擇敵軍弱點攻打城市，以策動群衆鬥爭，促成國民黨政權之崩潰。

五、紅七軍紅八軍東調時，應留置一部繼續保守與發展廣西左右兩江蘇維埃運動。

這個指示遲到了三個月，紅八軍已全部瓦解，成爲歷史上的名辭了。僅剩下紅七軍的一個軍，支持着廣西蘇區的鬥爭任務。我們接到指示後，經過了三天的會議；首先是討論關於紅七軍是否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開赴江西集中的問題？當時我和李明瑞的主張，是向貴州發展！把貴州全省的政權奪取過來，以與江西蘇區相呼應。理由是貴州省府主席王家烈，腐

敗無能，軍事實力薄弱，加上民衆對王的不滿；我軍若集中兩個師的兵力，先佔領羅斛，紫雲，安順各縣，與右江蘇區連成一片，造成黔桂邊區的廣大蘇區政權，然後再攻貴陽，成功的可能極大。若由右江調到江西集中，經過長途行軍作戰，難免不受損失。且七軍主力離開右江後，現有之右江蘇區，恐亦不保，損失更大。可是鄧小平陳豪人等，堅持執行中央的命令，迅速開往江西集中，攻打大城市，爭取全國革命勝利爲宜。對于右江蘇區，可留一個師的兵力，連合現有的赤衞隊，共有萬餘人，儘足保衞這一蘇區。對于奪取貴州一省的政權，雖然是安全的發展；但政治影响不大！對于配合全國革命的作用也很小。他們以這些理由，打消了我們的建議。他們認爲二十一師韋拔群部，以前本是廣西的游擊部隊；對桂北地形熟悉，極適合留在右江。以東蘭爲基地，繼續領導革命鬥爭；總指揮部應率紅七軍（缺二十一師）取道湘粵桂邊區，前往江西中央蘇區。

關於右江蘇區的工作部署，決定：

一、二十一師爲右江革命鬥爭的軍事主力。派李樸（註七）爲二十一師政治部主任，協同

二十一師師長韋拔群，指揮該師及右江地方團隊，保衛幷發展廣西蘇區的工作。

二、中共的黨務，組織右江特別委員會。以雷經天爲書記，韋拔群李樸等爲委員，領導右江各縣黨部工作。

三、右江蘇維埃運動，仍由右江蘇維埃政府主席及各委員，負責領導。

四、紅軍廿一師，受右江中共特委會領導指揮。

這個執行中共中央命令的計劃決定後，便積極準備出發。那時季節已是秋末，天氣即將寒冷；更因紅七軍近數月來，攻榕江，攻百色，伏擊滇軍，沒有時間和金錢，籌購冬服；百色又未攻下，使我們感覺困惑煩惱。可是行動計劃已決定，祇好在行軍的沿途，再想辦法，陸續補充。

那時中共中央總書記爲向忠發，但實際負責者是李立三，與國際代表馬林。由於他錯誤估計了紅軍的實力，盲目地提早發動攻堅戰，致使紅軍主力大受損傷。後來李立三遭受到嚴厲的處罰，被指爲『以右傾機會主義爲實質的左傾機會主義者』而下台了。

同時從鄧小平的談話裡，井崗山的根據地，已在湘贛兩省三次會剿時放棄了：雖然新的蘇區已建立而且天天在擴展，但那個我所曾經浴血奮戰的山林，雖在這部署轉進的百忙中，却常是惱亂着我。

## 八　廣西鬥爭的總結

中共與俞作柏合作的第一階段，廣西的工作是由我主持領導的。到後來是由中共行動委員會領導，迨至廣西政變我們退守左右兩江，賀昌與鄧小平均返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經過情況，黨務轉由陳豪人負責領導，我則專負策劃創建廣西紅軍的責任。對建立蘇維埃政權與土地革命的意見，陳豪人與我是大致同的；我們幷沒有完全遵照中共中央盲目地開展激烈的階級鬥爭的指示，而採取了溫和的土地改革方針。

廣西右江區有異乎其他各地區的特點：

（一）在紅軍佔領區內，除百色，東蘭，田東，奉議，思林，果德各縣建立蘇維埃政府之外；其他如天峨，凌雲，鳳山，天保各縣，均是貧脊的縣份，文化落後，人民守舊；爲適

合當地的實際情形，并沒有成立蘇維埃政府。仍用縣長制，一切政令，不受影响，仍能順利的推行。

（二）在廣西蘇區內，沒有殘酷的農村階級鬥爭，也沒有普遍的實行分田。很多地區僅實行減租運動；即照地主佃農原議之租額，減少百分之五十繳納。同時焚燬了債劵，取消了債權。在分地區域，凡有自行耕種能力者，不論地主或富農，均予分田。因此，能相安共處，并因此吸引了很多地主豪紳的青年子弟參加革命工作。

（三）除東蘭縣外，其他地區，但將有反革命行爲的份子予以處死外；沒有採取屠殺地主豪紳的政策。土地革命的過程中，僅取消了地主豪紳在農村中把持鄉政的特殊地位，與重租高利的剝削。並沒消滅地主豪紳階級的本人，或其家屬；所以右江蘇區的豪紳地主，仍能自食其力，安居樂業。他們對共產黨，也沒有深切的仇恨觀念。

（四）所有俘虜右江各縣政府機關的職員與各縣縣長，均未加以屠殺，且任其自由離去。其中曾有少數的人願意參加紅軍工作的，亦予收容。如餘利縣長陳叔度，及其兄陳伯

度，兄弟兩人人均參加紅七軍工作多年；結某，陳伯度作戰犧牲，陳叔度作戰失踪。

（五）爭取了苗，猺，侗，僮，各民族的合作。完全打破民族歧視的觀念。紅七軍中不少是各民族官兵。我們當時爲了爭取各民族的團結合作，曾在平馬舉行過各民族聯合大會。除漢，苗，猺，侗，僮五個民族外，尙有回，伶，犽，安南等民族參加。各參加民族的男男女女，都盛裝到會；情形異常熱鬧．融洽。我們的政工人員，對于少數民族的招待、是特別周全。他們得到了從來所未有的尊崇。有位苗族的代表說：「我們苗人沒有夢想到漢人會這樣熱烈的看顧我們！以前我們不僅不能見到漢人的大官，或和漢人官吏一起食飯飲酒，就是鄉長都難得見呢」！他說話的時候，竟流下淚來。可以想見他們內心的感動。

（六）紅七軍沒有建立政治委員或黨代表制度，也沒有實行特務控制的辦法；僅有政治部主任及政治指導員之設置，專負部隊政工之推行。所以紅七軍的官兵之間，感情融洽，沒有發生叛變，或向敵人投降的事跡，甚至沒有逃兵。

（七）蘇區與白區，有時雖因戰爭交通受阻，影响運輸；但戰事結束後，馬上恢復交

通。一切商業上的來往，物資的交流，都不會受到阻滯。如雲南貴州的烟土，仍通過百色，運往南寧出口；右江大量的牛皮，山貨，照常輸出。蘇區所需的西藥布匹食鹽，也沒有中斷。向安南購買軍用品如望遠鏡，西藥等物資，都可平安運入。所以我們在右江一年的時間，人民幷不感到困擾。

（八）紅七軍的衞生設備，由於經濟尙充裕，中西藥及儀器的購買都容易。因自己本身有醫藥，地方上的中西醫生，也很樂意服務，加上官兵的體格强健，營養充足，就醫藥環境上說，還沒發生困難。

（九）對宗教問題，我們採取了信敎自由的政策！在廣西蘇區內，僧，侶，耶穌，天主敎，仍任其自由傳播。它們也常常帮助紅軍，如平馬敎堂經常帮助紅軍救傷醫療工作；以後在廣東連縣，由敎會替紅七軍收容傷兵二百人。但對于迷信拜神用之消耗品，香紙寶燭等，曾採重稅限制辦法，以減少人民的消費。這一宗敎政策，與江西蘇區絕對禁止宗敎活動，沒收宗敎財產者，完全不同！這是值得特別提出的。

這幾個廣西蘇區的特點，是我參加中共工作期間所認爲愉快興奮的事。而所以有這幾個特點，乃是因爲我們在執行政策時，抱着悲天憫人的心懷，人道主義者的立場；或多或少滲進些改良主義的意識。但這些都爲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所不能容忍！認爲是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後來成爲我在江西蘇區被檢討被處分的因素之一。

可是中共中央負責人，對廣西工作的缺點和錯誤，幷沒有正確的認識。廣西工作的缺點和錯誤主要的是：

一、中共中央沒有把握着俞作柏在廣西執政的機會，派遣中央大員到廣西去，協助俞作柏工作。適時的提出本黨的主張，緩和他反對京南政府的行動，積極建立起自己的實力；及派出大批黨員滲透國軍十五師與五十七師，控制這兩個師的實力。同時也未能領導廣西地下黨部，積極發展地下的黨務組織，使與軍事滲進工作與建軍工作相配合。他們祇派了我們幾個幹部到廣西去，担當這種重大的任務，一般工作的進行，當然困難得多。而這種錯誤的產生，是他們對俞作柏方面，抱着不信任的態度，而採取一時利用的决策。當俞作柏執政時，

他們特別注意向他籌錢；俞失敗後住在香港，他們還不斷的向他要錢，由三二千元到一百幾十元。但當俞提議再回左右江領導軍事鬥爭的時候，却被中共所拒絕，這是他們不信任俞的鐵證。其實俞作柏當時是誠意接受中共領導的。由於中共高級人員對俞的認識不够，而失去了一個建立實力，創造新局面的最大機會。

二、俞作柏政權失敗後，對左江工作，沒有配置相當的政治幹部，僅由沒有革命鬥爭經驗的俞作預和史書元負責領導。當時左右江軍隊，除了第五大隊外，還有蒙志仁的一個團；及省政府，特派員公署的警衞部隊，左江的兵力，要比右江多了一倍；因爲沒有正確的領導，致損失了這一個第八軍的力量。

三、右江工作，犯了保守觀念的錯誤；祇注意百色及沿江幾個縣的工作；沒有積極向雲南，貴州，安南邊境的那些山城小邑發展；沒有積極去消滅那些附近縣份的反動民團勢力；而祇消極的保衞着沿江幾個縣的安全。倘若當時能積極肅清雲、貴、及安南邊境如天峨，西隆，西林，凌雲，鎭邊，靖西，鎭都等縣的少數反動民團勢力，向貴州省境發展，則這一蘇

區，決不致受桂軍摧毀的。

四、整個的忽視了民衆教育與文化運動工作。佔領右江一年的長時間，沒有改訂普通教育的教科書，沒有開展成年工農的文化補充教育運動，沒有出版規模較大的報紙和什誌。中共革命鬥爭的理論，沒有普遍的深入到民衆中去；一般的宣傳工作，亦不深入。因此工農羣衆祇知依賴紅軍，保護他們，沒有使這一革命鬥爭，成爲廣大工農本身的鬥爭。以致敵軍來時，羣衆不積極參加反抗，而讓紅軍單獨作戰。

五、廣西中共黨的組織，無論在國民黨統治區，或蘇區，都是很脆弱的。這是忽視了發展黨的組織的事實表現。因爲黨的組織薄弱，自然是黨不能在廣大羣衆中起領導作用！演成紅軍的單純軍事行動。

六、右江蘇維埃運動，因爲黨的領導薄弱，政府組織的不健全；在右江革命鬥爭中，幷沒有起大的作用，亦沒有引起工農民衆重視。

以上這些缺點和錯誤，使廣西革命的工作，不能迅速廣泛的開展；和紅七軍主力在東調

後的失敗主因。站在中共革命的立場，是一個不可彌補的損失。

至於紅七軍調江西集中，並指示沿途奪取城市，打硬戰，這更是中共上級的嚴重錯誤。當時桂系軍隊正在「反蔣」，絕無力量進攻右江，正是一個擴大廣西蘇區的好時機。同時貴州省的統治力量，是西南數省最脆弱的一環。要是積極充實紅七軍三個師的兵力，以廣西右江爲基地，向貴州擴展，進而奪取貴州政權，顯然是可能成功的。最低限度，亦可建立一個鞏固的黔（貴州）桂（廣西）邊區的廣大蘇區，以與江西蘇區相呼應。這對于中共革命運動的作用是何等重大。可是中共中央沒有看清楚這一形勢，因之沒有採取這一有利的政策；却盲目的將紅七軍東調，幷要他們打硬戰，致紅七軍遭受重大的損失，到達江西時僅剩下兩個團的兵力。而右江蘇區，也就于紅七軍主力東調後，不足一年的時間，完全丟光了。並且犧牲了衆多的英勇革命戰士，韋拔群師長，也以身殉黨。

附註

註一：賀昌——天津人。中共的高級幹部。

註二：鄧小平——四川人。身材矮小，善言詞，能幹。當時二十多歲。現任中共政務院副總理。

註三：張雲逸——廣東海南島人。個子矮小。一九二九年北伐時，曾任國民革命軍十二師參謀處長。為人誠實和藹；任事猶預寡斷。在國軍時為各團體各派系高級軍官所歧視，不得志而投共。當時年約四十歲。現任廣西省人民政府主席。

註四：陳豪人——福建人。時廿多歲。曾任福建中共省委書記。於一九三一年不滿中共指施而脫離中共。

註五：葉季莊——廣東新興縣人。現任中共貿易部長

註六：紅八軍瓦解了——紅八軍，除官兵一百二十餘人逃來右江加入紅七軍外。其餘被敵軍消滅了，軍長俞作預逃赴安南轉至香港，　後被廣州公安局的偵緝人員誘騙至廣州捕殺。

按：中共胡華主編之「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參資料」第三編，二，（3），所

載：「八軍在敵人攻擊下也退入右江。」這是與當時事實不符的。

七註：李樸，四川人，黃埔中央軍校畢業，個子矮小，做事精幹，長於軍隊政治工作，與東蘭縣的女同志結婚，故與地方人士甚融洽。

# 第七章　從廣西到上海

## 一　長安受挫

在紅軍離開廣西前往江西之前，我們決定了沿着湘桂邊境通過。爲了要明瞭沿途敵情起見，首先派出六個密探組，化裝行商，前往廣西之懷遠，融縣，全縣；湖南之武岡，道縣一帶偵察敵情。于是，在右江成立並奮鬥了一年多的紅七軍（缺二十一師），於一九三〇年十月下旬，離開右江基地的東蘭，向指定的中央蘇區集中。

紅軍離桂的消息，已爲桂軍所獲悉。路上不時遭受桂軍的正規部隊與民團的襲擊，但都遭紅軍擊退。我們第一步經河池，思恩，天河，而至融縣北之古龍。

自思恩出發後，一連三天行軍，都是崎嶇的山地；古木參天，沿途民居甚少；携帶的糧食，因沿途無法購買補充，至是各部隊多已吃完。古龍的民衆，全數逃匿山林；我們到達

時，已是下午四時，又下着微微的細雨，內心至感焦急。我親自跑出去找民衆，結果找到一位年輕的教員，先行說服了他，然後通知政治部及各部隊政工人員，隨同那位教員到附近山林中去叫民衆回家。經我們的政工人員努力向民衆解釋之後，民衆才陸續地走回家來。

在行軍期間，我們規定是用現金購買糧食；除了著名的反動份子及大土豪，我們必須沒收其財物外；對於民衆，是絕不搔擾的。因此軍紀極好！民衆回家後，我們便先以銀元給他們，動員全體鄉民整夜磨谷作米，好容易籌得了兩天的糧食。

那天下午八時，接到密探組的報告：「長安城內所存的被服布匹及其他的物資甚多，僅有敵軍一團駐守」。這時，已是「已凉天氣未寒時」的舊曆十月初了；紅軍官兵的冬服，還沒有解決。而在山區行軍又特別感到寒意。士兵既急需棉衣，祗有打下長安才是個最好辦法。我們經過了一番研究，爲了要解決這個迫切的問題，不能不來一次軍事上的冒險。

長安是榕江邊的一個墟塲，又是桂黔兩省的交通要道；市廛櫛比，是桂北的重要商塲。守軍雖祇有一團的兵力，但他們深溝高壘，事前早有戒備；市區的巷戰工事，也構築得很堅

困。紅軍兩個師的兵力，經過一日的戰鬥，僅佔領了長安市區西北部份，繼續強攻五日，也祇佔領了長安市區一小部。那天的下午三時，我正在長安東北端沙田柚園內的砲兵陣地指揮，突接密探報告：「桂軍四個團，由柳州開來增援長安。其先頭部隊一個團，已到達長安的對岸，現正開始從浮橋過河，進入市區；其後續部隊，亦在源源到達中，」等語。我即以電話報告李明瑞總指揮和張雲逸軍長。那時我軍在連日作戰中，已傷亡了二百多人。李總指揮立即決定放棄原定作戰計劃，向福祿轉進。幷即分派部隊打掃戰場，掩埋陣亡官兵，撤退傷患者，另由十九師派五十六團，埋伏于長安北十餘里的山地，做好伏擊準備，然後陸續撤退向福祿墟轉進。

敵軍從長安墟所派出的一個團追擊部隊，遭到紅軍的伏擊，倉皇退去；被紅軍俘虜五十餘人，算是這次戰役的最後收穫。此役雖不能攻下長安，達成作戰目的；但我軍的攻擊精神和轉進的部署，使桂軍知所警惕；從此以後，桂軍便不敢輕舉妄動向我軍攻擊了。

## 二　武岡失敗

福祿在黔桂邊境，是榕江左岸的一個墟市。附近多係猺區，該墟爲猺民貿易之所。有商店百餘間，商業繁盛。是年七月間，我軍由貴州榕江縣回師右江時，曾經過一次，并在該墟休息了一天，做了一天的宣傳工作。他們對紅軍的秋毫無犯，買賣公平，官兵和藹，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次見我軍由長安撤退，回到福祿，時間雖已入夜，但全墟商民均開門提燈，燃放爆竹，歡迎紅軍。不少的男女居民，幫助紅軍傷兵換衣洗脚，送茶送飯；他們那種眞誠的熱情，使我們全體官兵們爲之興奮。第二天在福祿休息，商民替紅軍四處下鄉收買粮食。（該墟存粮不多）并集中了全市所有布匹，替紅軍趕製冬衣。僅僅一天的時間，我們已在這小小的市場，準備好了三天的粮食，和三百多套冬衣。還有三十個紅軍的重傷兵士，民衆全替我們留下來掩護療治。到了我們出發時，仍熱烈的歡送。這種民心向背的表現，足以說明：軍隊紀律的嚴明與否，實爲中國內戰勝敗的决定因素。

從福祿墟經三江，橫嶺，進入湖南，紅軍官兵的精神體力、都已恢復。連續攻克綏寧，梅口。沿途雖有小戰鬥，都由前衛部隊十九師擊退。因此紅軍的士氣，又迅速地提高了，不久前鋒便進抵武岡縣境。

武岡縣城，這時祇有地方團隊千人駐守。環繞在武岡周圍的據點邵陽，新寧，城步也沒有國軍。我們判斷：即使國軍從衡陽馳援，以汽車運輸，也需要三天時間才能到達。如果我們能在這有利的時間內，奪得武岡，對紅軍軍需的補充，有很大的幫助。由於這一鼓舞，紅軍以急行軍向武岡突襲，但固守武岡的民團，已有極充分的準備，紅軍的突襲計劃，不能實現。從而重新部署圍攻縣城，希望發揮炮火的威力，掩護步兵以雲梯爬城。不過，武岡縣明末時，曾作爲桂王的皇城；城牆堅固，高達六丈以上；守軍又是沉着應戰，無懈可擊，致攻城戰鬥毫無進展。

到第三天晚上，我建議放棄攻城，繼續南進，以防敵軍增援部隊到達時，內外夾擊。但李明瑞張雲逸兩同志，皆不同意。他們認爲黨中央已有沿途攻奪城市的指示，而敵人的增援

部隊料非五天不能到達；我軍應在兩天內攻下縣城，再打擊其增援部隊。于是一面繼續攻城，一面派出了一個營向寶慶桃花坪方面游擊，偵察敵情。到第五天拂曉，游擊部隊愴惶退回，國軍部隊亦跟着由東西北三面增援，向紅軍攻擊。紅軍至此，已是前有堅城，後有強敵，只有急忙向南撤退。這一次，損失甚大。第十九師五十五團團長何子初陣亡，官兵傷亡者三百餘人；還有兩個營在撤退時失了連絡。以後在全縣時，才有二百人歸隊。

## 三　漫天雪雨中的艱苦進軍

武岡失敗，對于紅軍的士氣影响極大；從後跟踪追擊的湘軍，威脅着紅軍的安全。爲了避免再打硬仗，脫離國軍的追擊，乃經大雲山出廣西，攻克全縣。那時廣西桂系軍隊，已攻湘失敗，退回柳州一帶，受了重大的損失。而攻桂之滇軍，仍在圍攻南寧。粵軍已深入貴縣賓陽一帶，截斷了柳州與南寧的聯系；李，白，（註一）正在積極準備向圍攻南寧的滇軍進攻。桂林沒有大軍，我們也就安心在全縣休息了三天。又添置了五百套冬衣，然後由永安關

入湖南，佔領道縣。像這樣今天湖南，明天廣西，後天又回到湖南的迂迴曲折的路線，完全是在避免戰鬥的處置。

湘粵桂三省毗連的地區，完全是延袤不斷的崇山峻嶺，這一帶的縣城，也都很偏僻、貧瘠，無法一次補足兩個師的冬服。如以流寇式（註二）的強搶手段就地徵發，則沿途經過十餘個縣城和市集，早可設法補足；但這樣對民衆的印象大壞，而且軍紀廢弛，將無法收拾。紅七軍的高級幹部不願這樣做，因此離開廣西右江兩個月以來，紅七軍的士兵，還有百分之八十，沒有冬服禦寒。

季節已進入深冬，風雪載途，使我們無法行軍。士兵們在宿營或中途休息，及警戒哨所，都燒着柴火取暖，一種瑟縮的情狀，不忍卒睹。在道縣休息了兩天，因爲有敵情顧慮，在一片銀白的雪野裏，不得已冒着雨雪前進。途中雪深數寸，由道縣到江華，士兵在進行途中，凍死了三十多人，凍病了的爲數更多。

爲了激勵士氣，我們在江華，動員了全體官佐，將自己多餘的冬服和被褥，分配給士

限。更有些從身上脫下來，送給患病而衣薄的人，高級幹部也是如此。這一來官兵間的界限完全打破，官兵間的感情更加融洽；這一種甘苦共嘗的做法，使全軍的人上下一心，堅決的向中共蘇區前進！

同時爲了二百多個重傷兵的伕力無法解決，我們決定一改當時部隊中「祇重物資不重人」的觀念，將多餘的步槍，和整個野戰砲營的四門山砲及所有砲彈，均埋藏于一個荒山雪野中；將該營運輸兵抬運傷兵。那些睡在帆布床担架上的傷兵，看到紅軍首長這樣對他們的關懷，大多數都感動得哭了起來；聲言傷癒後，誓將生命献給革命戰爭。故紅七軍在流竄的途中，雖然很痛苦，但官兵間的感情，始終打成一片，絕沒有逃亡和背叛的事件發生。

由於雨雪所阻，在江華休息了四天；迨雨雪停止，天氣放晴，才由湖南的江華，穿過廣西之桂嶺，轉入廣東之連山。達到連縣的東陂，探悉連縣僅有民團駐守，沒有國軍，爲了急切解決冬服問題，便于次日進攻連縣。僅有微小的戰鬥，即佔領了城外的街道，但連縣的地方團隊有準備，頑強地固守縣城；並將城外毗連城牆的房屋，噴射火油燒燬，使紅軍無法接

近城邊，在這種情況下，只得放棄攻城計劃，再向北沿着粵湘邊境，向江西前進。

因爲我們和中央蘇區做法不同，不反對宗教，更沒有摧殘宗教，連縣城外基督教醫院，收容了我們二百多個重傷的官兵。這是偉大無私的宗教傳道者們，給予紅軍傷兵以極好的照顧，主持醫院的院長，答應將紅軍治療至傷癒爲止，並向我們保証，在治療期間的安全，絕不會任由國軍將他們屠殺。這樣，我們才放心地將所有傷兵留下。

紅七軍因長期行軍與作戰，傷亡損失極重。爲便於指揮，適合戰場需要，在梅花墟休息時，特將兩個師縮編爲兩個團。十九師合編爲五十五團，由我兼團長，陳漫遠（註三）任政治指導員。以李顯任第一營營長，張翼（註四）任第二營營長，黃子榮任第三營營長，李天祐（註五）任連長。二十師全部合編爲五十八團，以總指揮李明瑞兼團長，袁任遠（註三）任政治指導員，原廿師師長李湛兼第一營營長，黃冕昌（註七）任第二營營長，章健任第三營營長。部署已畢，擬經樂昌出仁化，然後沿湘贛邊境入贛南。

## 四「師長帶花了！」

整編了的紅七軍，正在梅花墟準備出發的早上，忽然湖南國軍的一個旅，廣東國軍的一個團（團長鄧揮），從東北兩面，向紅七軍包圍攻擊。于是激烈的戰鬥，便在梅花墟附近展開了。這一仗，帶給我以無邊的痛苦與辛酸！是我在生命史中極難忘懷的。

從清晨到午後二時，戰鬥激烈地進行着，衝鋒接連着衝鋒，肉搏繼續着肉搏；在反覆衝殺中，雙方的傷亡都很大。五十八團第一營營長李湛（原廿師師長）由左翼出擊敵軍時，不幸陣亡，軍心大受影响，迫得退回原陣地固守。為扭轉戰場形勢，我率五十五團由右翼出擊。在衝鋒時，敵入陣地上一陣密集的機槍响了，我的左腿已中彈，倒在地上；幸而搶救得快，迅速脫離了敵軍火網。

「哎呀！師長帶花了！」這震動而沉痛的消息，迅速傳遍戰地。李湛的死和我的重傷，使軍心搖動，無法再戰。李明瑞迅將部隊脫離戰場，向南撤退，至大平楊家集結。晚上，李

明瑞，張雲逸來到我床前慰問，並商討今後的行動。我仍主張按照我原先擬定的計劃，先到黃坪集結；于拂曉前在樂昌南十五華里之長垑村，渡過武江。因爲那裏是我的故鄉，與當地的人民有深厚的關係；祇要說是我的部隊，人民必踴躍帮助。船隻征集容易，渡河後經仁化直趨江西，途中不致有過多的困難。他們兩人都同意我這個見解和主張。

但我因左腿重傷，流血過多，不能隨軍行動，祇好設法隱蔽身份，療治鎗傷。恰好這時參加湘南革命鬥爭的農民廿多人，接我上大山休養，安全問題，無須顧慮。次日，我被幾位湘南農民抬着，隨軍行至胡洞的分岔路口；李明瑞，張雲逸及各高級幹部，均趨前與我道別。大家都含着眼淚，爲革命鬥爭的勝利和各人的安全祝福，在三岔路口分手了，時間是一九三一年一月上旬。

## 五　驚險中的生活

湘南暴動時的老同志劉耀文，指揮着幾位農民同志，抬我到樂昌乳源邊界的高山上，隨

行的還有十九師軍醫處長吳子玉和四個衞士。

這些純樸的農民們，在湘南暴動失敗後，逃到這十多里無人烟的高山上，靠燒賣木炭過着最困苦的生活。爲着我的安全，他們特別選擇了極隱蔽的叢林中，鋤去了野草，砍了些杉樹，以樹皮爲上蓋，樹心爲枝柱，很快的爲我搭好一間小木屋。用他們自己的床板，爲我鋪床；並替我到胡洞買了五十斤白米，送了兩只雞，一大堆靑菜，好好地安頓了我們，靜心療傷。他們這種難得的友誼，十足的表現了中國農民的純樸的熱情。

我躺在床上，痛苦萬分，全身不能動彈。因爲流血過多，墊着一張鴛鴦毯，給血染紅了一尺多寬的一大塊。人是逐漸消瘦下去，食量減少到一點稀粥都不能下咽。又因藥品缺乏的緣故，受傷的腿不僅未曾痊癒，而且反更腫脹，吳子玉醫生經過四天的細心療治，發現腿骨已斷，但未分開；非另買新藥不可。于是由劉耀文派一個老農民到樂昌長垺村，找到我的母親，領着我的母親和我的堂兄，到山上來看我。

母親見到我這種悽慘情形，傷心的流着眼淚，忙要我堂兄到廣州去買西藥。可是新藥雖

是買來，而且經過十天的治療，還是沒有康復的徵象。飲食無法下咽，僅靠着一點高麗參湯維持着生命的延續。這時我的舅父，也趕到山上來看我，介紹一位專醫鎗傷駁骨的中醫，用藥草敷傷。難得這位中醫的醫術高明，經過他的診治，傷口逐漸消腫生肌。但我又于此時發生鼻流血的病症，時常昏迷不醒。幸我記憶力還強，記得小時候在家中曾讀過中醫書籍，說這病是水不濟火，虛火上升的象徵；口述一個藥方（六味地黃湯加阿膠及血餘），由吳醫生筆錄，派人到樂昌縣城，購得三劑中藥。服第一劑鼻血已止，連服三劑，鼻血症便完全痊癒了。而腿上的傷口，經過中醫廿多天的診治，也平復了傷口，但還不能起床。

從胡洞的小村上，經常傳來國軍搜山的消息；風聲鶴唳，時起恐慌。我的衛士及吳醫生，祇有三枝駁殼手槍和兩挺手提機關槍，隨時準備和搜山的敵人拚命。我的枕畔也經常放了我自己的防身武器左輪手槍，必要時用作自殺。漸漸我在床上已能坐起，但風聲却更緊了，我要吳醫生和四名衛士先行離去，免作無謂犧牲，他們大家都不肯離開我。經過我的一番解釋，告訴他們要以革命前途為重，不要祇顧及個人的情感而忽視了更重要的革命任務之

後，吳醫生和另三名衛士，才答允先走。尚有一名衛士白從根，寧死也要跟隨着我。我也只好把他留下來了。于是我將所存的八百餘元提出三百元，給他們四人使用；叫他們去追赶部隊，或潛伏各地，繼續做革命工作。然後，他們才揮淚分手。

一天，我的舅父又從樂昌帶來兩份上海的申報，國內新聞版上，報導着梅花勦共戰役的戰蹟。說紅七軍二十師師長被擊斃，十九師師長龔楚也重傷斃命。我看了心中暗暗地高興。恰好腿傷新癒，已能扶杖步行；這正是一個化裝潛逃的機會。乃通知我的母親，由我的大姊派一艘漁艇到我住的山下，由幾位農民同志抬我上船，順着武江南下。離開了那位劉耀文老同志，和一群愛護我的農民朋友，結束了荒山療治的生活。

## 六　到國軍醫院中療傷

船過樂昌長圤，在冷僻的地方停留下來，我的母親也親到船上來慰問。這時母親已六十五歲，家中經歷次的搜查和洗刧，生活已成問題。我從剩下的四百元中，留下一百五十元作

慈母的贍養。談到深夜，才請她老人家回家，臨別時再三叮嚀我多寄信回家，省得她倚門遠念，偉大的母愛，眞使我感入心肺。但是這一次的分袂，却成了我們母子的永訣。到了一九三四年的時候，她便與世長辭了。而我那時正在江西的中共蘇區，無法回家奔喪，回想起來，眞有無限的悲愴與追悔。

乘着我大姊所僱的漁艇，通過國軍區的檢查站，到達烏石車站。由衞上白從根買好了兩張車票，等火車快到時，我才離開漁艇，趕赴車站，搭上南下的火車，抵達廣州；旋赴香港，下榻于彌敦酒店。

所幸我曾一度在香港領導過中共的黨務，雖時隔兩年，還有線索可尋。首先找到一位工人同志，輾而找到廣東省委連絡員，將我的情形，通知廣東省委書記，由廣東省委派一位女同志宋維靜（註八）與我聯絡。自和他們取得連絡後，我才知道國軍正發動對江西蘇區的圍剿，這使我非常担心在轉進中的紅七軍的命運，同時，傷病累人，更不禁附髀興感！而我的新癒的腿部，因連日奔走勞動，又發炎了。本擬在香港療治，突然廣州的報紙又登出了消

息，報導紅軍十九師師長龔楚，已傷癒赴港。這條新聞的發佈，對我的安全有問題，只好又再轉移另一個地方療傷。

吳子玉醫生離開樂乳邊境的荒山後，便在廈門海軍醫院工作。他與我取得連絡後，便通知我到廈門去繼續治療。我爲安全計，將我的衛士白從根，託交廣東省委照顧，單身赴廈。冒充是廣西民團的軍官，因剿匪受傷。在國軍海軍醫院診斷，經過七日的療治及檢驗，結果，醫生認爲腿內有碎骨沒有取出，本院無X光設備，應轉赴上海療治。於是我又離開廈門海軍醫院，和吳子玉醫生同往上海。

## 七　這樣「照顧幹部」

一九三一年四月，我偕吳子玉醫生到達上海。按照廣東省委給我的中共中央通訊處，寫了一封長信報告中央。這時中共中央總書記是周恩來（周由蘇聯回國不久），見我抵滬，即派聶榮臻（註九）到旅店與我連絡，介紹我到福民醫院療治，施行過手術，將腿內碎骨取

出，僅七天便已痊癒。但腿部神經麻木，須繼續電療。

我出院後，中共中央每天給我電療費二元，生活費三元。依照上海當時的生活程度，我個人的生活不成問題。但是，紅七軍負傷在滬的幹部，都找到了我。王震（註十）在榕江作戰時打斷左脚，來到上海才治好。他有妻有孩子；因爲地位不高，中共中央每天只給他生活費二元，住旅舘，食飯均在內。又二十師五十八團團參謀長，在隆安作戰打斷了左腿，在上海剛醫好，生活亦很困難。我對他們抱着無限的同情，常和他們一起生活。

還有何畏，李顯兩人，他們都是負了重傷，到上海來治療的。因爲中共中央的照顧並不週到，生活非常困苦。尤其是楊英，他的身體本不很好，而且槍傷肺部，因生活費太少，欠下房租伙食錢很多。急得幾乎要自殺。見到我便哭起來。我見他的境況很可憐，爲他淸結了房租伙食，要他與我同住到旅店，共同生活。我的負担於是更加重了。我的妻子聞我在滬療傷，特自廣州趕來探視；我和她在廣西南寧結婚後僅一個月，因兪、李稱兵失敗，政局突變，她便回廣州娘家居住。離別了兩年，異地重逢，眞是悲喜交集。但是中共中央並不供給

我妻子的生活費用，我祇好減少電療次數，用電療費來維持，後來電療費又停止發給，其困窘之狀，可以想見。

這時上海某小報刊出新聞：「紅軍十九師師長龔楚抵滬療傷，中央政府已派邵力子來滬，勸導龔楚入京。」中共中央閱報，因而對我特別注意，深恐我為國民黨所動搖，同時，租界當局，亦派員四出偵查。尤其使我耽心警惕的是我到上海後，得知本年春，中央書記向忠發、及高級幹部惲代英在上海被政府的特工捕殺，彭湃在福建廈門被捕殺，而且那時國民政府正在利用上海的偵緝人員，和租界的「包打聽」，給他們以隨時捕殺的權力，來對付中共黨員和親共份子。我處在這樣的環境中，行動既不方便，經濟又極拮据，精神上真是痛苦萬分。

想起我參加中共革命，犧牲了一己的幸福，拋棄了家庭的溫暖。在廣西省府工作時，前後籌集了五萬元港幣，毫無保留的貢獻作黨的活動經費。但是在重傷之餘，必需的療養費與生活費都無法維持，未免太刻薄了。可是自己是一個獻身革命的人，對於這些生活的小事是

並不深切地介懷的。

生活的困窮是一回事，而個人的安全問題又得隨時顧慮。遇到什麼風吹草動，又得迅速遷移到另一個旅店中去。即使有時去看一場電影，也往往在看到半場時，中共的特務人員便來通知我，要我迅速離開。這種偷偷摸摸的生活，實在令人厭倦。

同時，據每天報紙記載，國軍對中央蘇區，正進行大規模的三次圍勦，逃避遠道，卑怯爲慚，於是我決定再回前線去，免得悶居在上海。我將這個意思告訴聶榮臻，他聽了非常高興。他說：「紅七軍早已到了江西蘇區，江西蘇區中央分局來了好幾次信，請你早日回去。但我們因你沒有完全康復，所以沒有告訴你。現在你要去，實在好極了。待我報告中央負責同志，解決一切交通費和進入蘇區的路線，再通知你。」

五天後，聶榮臻到我的旅店中見面，要我先到香港，由香港派交通員送我入蘇區。同時託我的妻子帶一位三歲女孩到香港，交給她的爸爸。據他說，有一個小孩作掩護，路上比較方便；最後他交給我一筆旅費：「你是本黨的重要幹部，曾經爲革命付出重大的犧牲；所以

應該買一張西餐房的船票，以免被敵發覺。你的嫂子對革命沒有貢獻，祇能住三等艙，以免浪費。給你的錢便是依照這個原則預算的。」我聽了很不高興，覺得他們太不近情理，太不體諒爲革命犧牲者的心情。

那是一九三一年的八月，我的身體健康雖未恢復，負了重傷的左脚，行路仍很吃力。但爲了減少精神上和生活上的痛苦；當我拿到了這筆旅費時，我就決定冒着危險，將兩張票錢合併，改買兩張唐餐房票，乘太古公司的港滬輪船，離開了上海。

## 附註

註一：李、白、——即當時廣西省當局李宗仁、白崇禧的簡稱。

註二：流寇式——過去匪股流竄到那裏，即搶刦到那裏。這種流動搶刦的行動方式，叫做流寇式。

註三：陳漫遠——現任中共四野十六兵團司令員兼廣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註四：張翼——江蘇阜寧人，日本士官出身。勇敢善戰，後充紅七軍團長等職，曾以一個團的兵力，

繳俘國軍五十二師全部。師長韓德勤團長李守維等，均在被俘後冒充文書特務長被釋回。自李明瑞死，張以與李弟同學原因，涉嫌最重，被調任紅三軍團參謀處長。在五次圍剿初，因獲派赴前方指揮作戰機會，遂逃離蘇區。抗戰時，在蘇北地區任游擊指揮官司令等職，臨敵奮戰，日寇胆寒，而前五十二師舊人亦均在蘇北，張終遭媒孽以死，功在抗日，罪罹挾怨，論者惜之。

註五：李天佑——現任中共廣西軍區司令員。

註六：袁任遠——現任中共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註七：黃冕昌——現任中共華南局第二書記。

註八：宋維靜——現任廣東省人民政府工業廳副廳長。

註九：聶榮臻——四川人。個子高大。現任中共軍事委員會代總參謀長。

註十：王　震——湖南人。黃埔軍事政治學校畢業。原十九師五十五團第二營營長；曾留學蘇聯，歸國後便到紅七軍任營長。他左脚已斷，治癒後短了一寸。現任中共新疆軍區司令員。

# 第八章　中央蘇區的鬥爭

## 一　重上戰場

從上海到香港，住在老地方九龍彌敦酒店。隨伴的有我的妻子。這是我參加中共革命以來最愉快的一次旅行。但是溫馨的家庭生活，我却無法久享。在第五天的上午，我在酒店裏便脫去西裝，換上唐裝便服，帶着簡單行李，先到香港擺花街某號四樓的廣東省委交通機關，由他們派出一位連絡員，偕同我搭船赴汕。爲了追求革命的理想，我不得不拋棄了自己的幸福，踏上征途。妻子祗好要她再回娘家去住。她是一個富有中國舊道德的女子，她有信賴丈夫和尊重丈夫的美德，但結婚了兩年的夫婦，實際共同生活的日子僅有三個月。臨別時不免感着無限的依戀。

兩天的旅程，由香港經汕頭到潮安，正準備搭船赴大埔，而在搭船時與廣東省委所派出

的交通員，竟失了連絡。在碼頭上偏又遭到扒手光顧，身邊的錢都被竊去，當下我眞焦急極了。身上不名一文，怎麼辦呢？迫不得已，賣了自來水筆和手錶，在潮安一間小旅館住了一宵，第二天的下午，才再搭船回到香港。廣東省委又送我廿元港幣作旅費，另派一位交通員同行，繼續經汕頭，潮安到大埔。第二天步行至國軍封鎖綫邊的小鎮靑坑。住在一家小客棧中。這客棧是中共的交通機關。交通員都是本地人，道路熟悉。國軍的駐地，人數，與那座山那條路口有哨兵？他們都很淸楚。我由他們派人帶路，在黑茫茫的夜裏，步行了三十多里崎嶇的山徑，通過了國軍的三道封鎖線，進入福建永定縣內的中共游擊區。

摸索了一個整夜，東方已露出了曙光，帶路的送我到一個小山村的交通站。在那兒休息了二小時。因爲此地是緩衝區，並不十分安全。吃了早飯後，便由這個交通站，改派一位負責交通的農民同志，送我到三十里外游擊區的另一交通站去！

由香港到永定游擊區，直到長汀河田，這一段長長的水陸路程，是中共通過國府統治區進入中央蘇區最主要的交通線，佈置周密，無懈可擊；所有人員來往、及軍用物資，如無線

電器材，電話器材，西藥，炸藥，和銀洋鈔票等，均經由這一路線，運入蘇區。沿途如汕頭，潮安，大埔，由大埔至永定，上坑，直至長汀的河田；均開設有藥房，電器，運輸，旅館等商店。途經各鄉村間，約卅里左右，卽設有交通運輸站，和招待所。他們在城市裏開設的各種商店，祇有縱的關係，沒有橫的關係的。鄉村的交通站亦祇知道前後兩個站的位置。他們工作聯系，完全由交通員負責，交通員亦分兩種，一種是專負責帶人員來往的，一種是負責運輸的，這些交通員，亦互不認識。全條交通綫，最重要的是由大埔縣城起至永定游擊區止，其次是由永定游擊區至長汀河田這一段路程。其中要經過政府的軍隊及地方民團的重重叠叠的封鎖綫；有碉樓，有堡壘，有哨崗。他們交通的路，是沒有人行的嶺上和山坑，彎曲的穿插行進。運輸物資通過嚴重的封鎖區時，他們多數利用婦女上山割草，或農民挑着肥田料石灰等物將物資藏在裏面偷運出去。一段接一段，一站接一站，使國軍無法查覺。

這一條交通運輸綫，自一九二九年夏，朱德毛澤東率紅四軍擊潰了國軍盧鳳鳴師，佔領

上杭永定起，直至一九三四年中央蘇區紅軍西竄止，其中雖曾發生過一時的困難，但始終未被破壞。這種周密的佈置，和善於運用民衆力量，與連絡運輸的技巧，是值得稱道的。

## 二　跨進蘇區大門的印象

我由上一個交通站，走進這個四十多戶人家的山村，我有着喜悅與興奮的感覺。喜悅的是我又重新囘到革命鬥爭的土地上來了！興奮的是這些人家，都打掃得淸淸潔潔，村莊外有持梭標鳥槍的農民在守望；他們都精神抖擻，比較國府統治地區，另有一番氣象。

到了交通站，馬上有一位農村女同志迎接着我，親切的叫着：「龔同志！辛苦了。」接着爲我送來一盆熱水，洗臉洗脚，泡了一壺很好的山茶，又送來一盤鄉村的米餅。並且要我脫去內衣給她洗濯，那種殷勤體貼之情，使疲勞已極的我，得到無限温暖。

我安適地午睡了三小時，醒來已經是夕陽啣山的時候了。我悄悄地踱出大門，門外是一塊小草坪，坪外是一條淸澈可鑑的溪水，溪邊長了一株很高的桂花樹，我坐在樹下的石櫈

上，看着不遠的山崁，覺得鄉村生活，非常安寧而清靜。這時，那位女同志跳跳蹦蹦的跑來，要我去吃晚飯，另外走來兩個青年農民，她給我介紹，他們是當地的赤衞隊長和少年先鋒隊長，又囘過頭向那兩位青年農民說：「這位龍同志是紅七軍的師長」。我問她：「你怎麼知道得這麼詳細」？她笑着說：「前幾天有一位交通員通知我們，要我們好好的招待你；因爲你是紅軍的師長，而且爲革命負了重傷。」聽了她的話，我不得不暗暗讚嘆，蘇區的民衆工作做得的確不錯！

囘到屋裏，桌上已點上一盞小油燈，那位女同志爲我送上飯菜，有兩個煎鴨蛋，一碟魚干煮辣椒，一碗酸菜湯。這些菜都合我的口味，吃了兩碗飯。又來了一位三十多歲的農民，他自我介紹，是黨支部的書記，剛從城裏囘家沒有休息便趕來看我。他告訴我當地赤衞隊的情形和分田的情形，談了很久才走開。

這一晚睡得很舒服，到次日日高三竿的時候才起身，早飯後，在屋前的樹蔭下與一位五十多歲的老農民談天。一位搖着小鼓販賣洋什貨的小販，走過我們面前，村中許多婦女和

小孩，都圍上去購買。我發現他所使用的都是福建省蘇維埃政府發行的紙幣，我便問那位小販：「這種紙幣通行嗎？」他答覆我：「這種蘇幣（註一）不僅在蘇區內通行，在靠近蘇區的白區，（註二）也受歡迎呢！」這件事出於我意料之外。後來我才知道，蘇幣的準備金是糧食和土產。在蘇區內一切交易都使用蘇幣，需要在蘇區購買糧食和土產的國民黨區商人，也樂得使用蘇幣了。

中午時分，由大埔交通站送來一位姓劉的梅縣同志，他是個受過大學教育的文化人，準備到蘇區去工作的。他和我談得很投機。晚餐前，地方赤衞隊同志送來兩只鷄子，二十個鷄蛋，一罐糯米酒，這是他對我表示尊敬的禮物。我便邀當地的工作人員共進晚餐，喝酒吃菜興緻很好。席間，那位少年先鋒隊長自動請求做我的衞士，並說已經得當地負責人和父母的同意。那個孩子名叫阮成，年僅十五歲，活潑伶俐。剛好我的大腿行動還不很靈活，正需要一個人幇忙，做點瑣屑的事。便答允帶他同行。他連忙跑回家去告訴父母，並向當地共產主義青年團取了介紹信來見我，他的父母也跑來感謝我提帶他們的孩子。我想不到中共游擊區

有如此的現象，這當然不能抹煞朱德毛澤東三年來的收穫。然而我自己呢，親手創立的廣西蘇區放棄了，紅七軍經過長途作戰也削弱了。三年鬥爭的結果，並沒有多大的成就，不免感到惆悵。

第三天，我們離開了那可愛的山村，向福建省蘇維埃政府的所在地——長汀——進發。沿途都有交通站招待，一站一站輪流派人帶路，所見到的地方，雖然都有點荒涼，但都整潔有致。赤衞隊，少先隊拿着步槍或梭標，佈滿在各交通要道，盤查行人，沒有蘇維埃政府証明，無法通過。蘇區內的青年婦女多數剪短了頭髮，態度很大方。我們到每一個交通站，馬上便有女同志來慰問。將我們的衣服拿去浣洗。晚上，還給我們唱山歌，使我們的旅途非常愉快。

我到達長汀那天正是中秋佳節的前一天，街上雖有製造月餅出售的小商店，但覺得比之一九二七年中秋節，經過長汀時的熱鬧情形，已冷落了很多。當年我參加南昌暴動後，經過長汀入粵時，正也值中秋佳節。那時長汀非常繁盛，想不到四年之後，顯然大大不同。這反

映着蘇區的農村經濟已開始衰落，而人民生活也日趨艱苦了。

但一路行來，承各地同志與高采烈地爭相告以新近挫敗了國軍的三次圍勦，中央蘇區已日漸擴展，革命的勝利在望，却給我以無上的鼓舞。

## 三　整訓紅軍二十四師

進入了福建蘇維埃政府「省會」長汀，我馬上便到中共福建省委處連絡。當時省委書記盧永次，他在香港任廣東省委組織部長時，與我曾共過事。見我到來，忙在家中弄些好菜爲我接風。我問他關於蘇區政府的社會民生等情形，他答覆我：「福建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張鼎丞，是農民出身，但讀過書，是個老黨員。政府委員中，有工人，有農民，有軍人，紅十二軍軍長羅炳輝，也是委員之一。他們都很負責。農民分了田，生活本當比較好，但是他們因爲缺乏資本，缺乏肥料，且因人力不足，生產上不免要受影響。同時，農民們踴躍繳納政府的地稅，及對勞軍捐輸等都很熱心。由是他們的生活，就自然要比較困難了，豪紳地主呢，

他們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債權，及沒收了他們的財物屋宇；他們的生活，當然是更痛苦。商塲因敵人封鎖，物資出入口極困難；且人民購買力弱，亦自然是不及往昔的繁榮。惟有獨門的西藥商，由於政府特許他們自由買賣，眞是一枝獨秀；其中有少數人，還賺了很多的錢呢！工人爲數不多，但亦多數無工可做，回鄉分田去了。」這是我初到長汀所得知的蘇區社會輪廓。晚飯後，他安置我在汀州醫院一間很雅靜的房間休息。並通知駐長汀的紅十二軍軍長羅炳輝，與我見面。羅是雲南人，體格魁梧，性情直爽坦白；我們雖是初次見面，但談得很投機；直談到午夜，才各自休息。第二天我又病了。幸好正住在教會辦的醫院，設備很好；富有經驗的院長，親自爲我診治。五天之後才病癒。病中，當地各高級同志，常來慰問，關懷備至，減少了病中許多痛苦。

盧永次在我病癒後對我說：「你不需要再到瑞金去了。毛澤東朱德兩同志有電報來，要你暫任十二軍三十四師的師長。」我重上前線的目的，是想回紅七軍工作；但黨的命令是要絕對的服從，只好答應下來。

在羅炳輝的歡宴席上，我與紅十二軍的高級幹部見面。軍政委譚震林（註三）與我第一次見面。參謀長林野是前紅四軍的參謀，我們在湘南時的老同志。三十五師師長張宗遜（註四）也曾任前紅四軍二十八團第三營營長，與我曾共過患難。三十四師政治委員黃甦，曾參加北江工農運動，更是多年的老同志。久別重逢，大家都很高興。但我還是懷念着紅七軍的戰友！特別是李明瑞和張雲逸。

乘着羅炳輝送給我的馬，我與黃甦帶着兩個特務員，（衛士稱爲特務員）第二天早上到河田去，接任三十四師師長。

這裏蘇區的軍隊，與我所創建的廣西紅軍編制不同。該師有三個團，每團轄三個步兵連，一個機關槍連（沒有營的編制）師直屬隊，有特務連，步炮連，通訊隊，衛生隊，全師指戰員（官稱指揮員，兵稱戰鬥員，簡稱指戰員）有三千人。過去因未經訓練，軍風紀不很好，戰鬥力與行軍力均脆弱。三個團中僅有楊遇春團較好，（註五）我接任後，即針對該師情形，定下了訓練計劃。特別注意精神教育，並利用部隊訓練空暇的時間，親自訓練各指揮

員•；經過了三個月的時間，全師的學科術科，均有顯著的進步•

## 四　刺刀指向同志的胸膛

我在三十四師這一期間，發生了兩件使我最痛心的事•使我第一次體味到共產黨中的派系鬥爭，傾軋和迫害的怪劇；也看到了他們那鋒利的屠刀，繼續進行着黨內的整肅•

我初到三十四師時，接到李明瑞和張雲逸的信，他們都盼我早日回紅七軍工作•李明瑞函內有「如兄不回來，七軍前途大有問題」之句；張雲逸信中也說「別後情形，屢經驚險；相見非遙，容作夜長之談」•從這些極含蓄的文字中，我敏感到紅七軍裡面，可能醞釀了極大的不幸的暗潮•時隔不久，又聽到李明瑞被殺的消息，這是使我最痛心的事，經過多方探問，我知道當紅七軍初到江西時，毛澤東要調整紅七軍的幹部，爲全軍同志所反對•他們就指紅七軍內有改組派的反動組織（指汪精衛的組織），要在紅七軍進行「肅清改組派」的清黨運動•起初殺了二十多個幹部，其中還有兩個高級政治幹部，嗣後情形漸漸嚴重•總指揮

李明瑞，眼見情勢不好，絞繩就要套到他的頭上了，準備率特務連向白區逃走。當他集合特務連宣佈脫離蘇區走向白區的時候，跟他多年的心腹衛士林某，竟是一個受過訓練革命監視他的特務人員，受該連指導員龍騰雲的指揮，立卽拔槍把他殺死。我聽了這一血腥的事實，對李總指揮的死于非命；內心深深的痛悼！因爲紅七軍官兵一向都是非常團結的。雖在極艱苦的環境中，對革命的信心，從沒有絲毫的搖動。在黨的領導下，幷沒有小圈子集團，更沒有改組派的組織；所謂「肅清改組派」的淸黨運動，不知從何說起！

事實上，廣西在俞作柏執政時，汪精衞是曾派了幾個幹部，與俞連絡，但汪的幹部，却不能伸進紅七軍來，也無法打入紅七軍的團體。這批與俞連絡的人員，沒有參加紅七軍工作，而且與紅七軍的中共黨員，更是積不相容的冤家對頭。現在共產黨硬將這個「改組派」的罪名，加到紅七軍的頭上，眞是天大的冤枉。李明瑞的不顧一切要出走，就是這種惡劣形勢所促成的；而他的性命，竟葬送在自己同志的手裏！

第二件不幸的事，在九月下旬發生。有一天晚上，本師政治委員黃甦通知我：「現接到

軍政委譚震林的通知：本師官兵有社會民主黨份子五十二人，應即捕殺；已由軍部派特務兵前往，直接執行。」

我聽了不免有無限的感傷！因爲卽使本師發現有社會民主黨份子，也應秘密通知我與政委，愼密偵察，才不致發生錯誤與冤枉。尤其是捕殺本師官兵，更應事先通知我與政委，然後執行才合理。今竟在直接執行之後，才通知我；像這種越權處置的作風，實在是我所不能理解的。由是想來想去，整夜不能入睡；一個可怕的陰影，籠罩着我的心頭。

黎明之後，我親自到各團巡視，知道已捕去排長三人，士兵四十九人，並已於昨晚由特務人員押附赴近的嶺上，秘密處決。這次秘密捕殺事件，使全師官兵情緒，非常低沉。每到一處，他們都眼睜睜的，呆若木鷄似的充滿着乞憐的神色望着我，好像請我饒恕和援救的樣子。眞使我非常難過。在這種恐怖的氣氛下，官兵們都人人自危，禍福莫測。我可以救援人家嗎？我有沒有這個力量？我自己也有點惶惑起來了！

午後，黃政委說已集合全師的指戰員，要我去宣佈昨晚肅淸本師社會民主黨份子的經

過，說明這些反動份子，是受福建社會民主黨傅柏翠所利用，潛入本師工作，現已全部破獲，並將他們處決了。希望全師指戰員同志，安心工作，共同為革命而努力。部隊集合好了，我在政委的導演下，走上講台，面對着三千多官兵，我的喉嚨哽住，隱痛難言。但又不能不說話，祇訥訥地簡單的說了幾句言不由衷的話：「昨晚上級派人來肅清本師社會民主黨份子，這是本師一件不幸的事。我們要自己檢討，自問良心，有沒有反革命的企圖與行動？如果沒有，自然不必驚恐。關於本師肅反詳情，因我接事不久，尚未十分明瞭，請黃政委向各位報告。」之後，便由黃甦作了一個說明，這一幕悲劇才算結束。可是，部隊中指戰員的情緒，仍是非常的不安，陸續的逃了二十多個戰鬥員，兩個排級的指揮員。

## 五　第一個省委書記逃亡

不幸的事件連續發生，使我對中央蘇區的措施，深感困擾與懷疑。弊肅的劫運雖沒有臨到我的頭上，至少也有點心驚肉顫。特別是為了要明白更多的問題，我便跑到長汀去找福建

省委書記盧永次，和他商談，他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知道我不會出賣他，所以就赤裸裸的告訴我：

「爲了黨內的肅反運動，使紅軍及地方黨務同志，都深感不安。肅清AB團（註六）改組派的工作，並未結束。而且還要進行肅清托洛斯基派與社會民主黨份子，更大規模的清黨運動，即將在黨內展開呢！」

我進一步問他：

「究竟所謂AB團、改組派、托洛斯基派（註七）及社會民主黨等反動組織，潛入紅軍與蘇區各機關，有沒有事實的根據？」

「事實上，到今天還沒有確實的証據，不過在發現可疑的同志時，便加以審訊；但他們始終不肯招認，在嚴刑拷問下，被審訊的人也就糊糊塗塗的亂供出十多個同黨。再將這十多個加以逮捕刑訊，各又供招出許多人來。就這樣地反復追究迫供，所謂反動份子，也就越捕越多，迄今未止，江西肅清AB團的運動，殺了近萬人，包括了江西省黨和團的省委書記，

地方黨政工作同志，紅軍指戰員，江西的紅二十軍整個消滅了。」他坦白把眞像說出，詞色也有點傷感。

「主持黨內肅反運動的人是誰呢？」我問他：

「是鄧發同志。不過他自己本人對這個肅反運動的前因後果，也不很淸楚。他是奉毛澤東的命令執行的！」

我聽了他的說話，默不作聲。我想鄧發同志是香港的工人出身，當我參加廣東省委工作時，他還是香港九龍區委書記，一九二九年二月，才調到廣東省委工作。他爲人頗精明，爲什麼做出這些糊塗事呢？當我了解全部肅反運動的秘密時，才明瞭所謂肅反運動，原來是毛澤東對付異己的手段，鄧發不過是一個代理執行的屠夫罷了。因爲鄧發忠實的執行了毛澤東的命令，所以中央蘇維埃政府成立時，這個手上染滿了鮮血的傢伙，便當了首任的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成爲毛澤東手下的一等紅員。

盧永次堅持要我在他家裏吃飯。幷告訴我：「我的妻子不日要回香港，我準備送她到大

埔附近，你買不買東西？我可以替你帶來。」我便問他：「二嫂（指他的太太，這是我們在香港的稱呼）是不是還回來？」他答道：「不一定回來，但我要在大埔附近候她一個星期，將需要買的東西購妥後，我才回來。」當時我便提出：「紅軍正需要添購西藥，可托她在香港購買。我自己也要買一枝墨水筆和一個手錶，並要帶五十元，給我妻子零用。」他聽了滿口答應。

我為此特和羅炳輝軍長商量，在軍部，師部的經理處及福建省黨部，湊集了一百兩黃金，請盧永次的太太購買西藥；另外給她二百元，作購物之用。誰知作為福建省委書記的盧永次，竟一去不返！就這樣堂堂皇皇的以送眷為名，脫離了中共。但我購的手錶水筆，都寄來了，至少他對我還是夠交情的。由是我才知道，他的出走是有計劃的。他已經認清了共產黨的眞面目，在黨的利益高於一切的掩飾下，這些紅色的英雄們，不但有福不能同享，有禍不願共當，更甚的，為保持個人的地位權力，不惜出賣同志，以同志的生命和鮮血作為個人「進取」的禮品。

蘇區第一個高級幹部逃亡了，它使許多不滿中共措施的黨員，知道除了盲目地爲革命去犧牲，悽慘地接受自家同志的毒手外，另有一條光明的道路，那便是逃亡。「盧永次事件」不過是個開始！

## 六　放棄井崗山的經過

毛澤東自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退出井崗山，率領紅四軍轉移到閩贛邊境，創立了江西蘇區以後，又在閩西贛南開闢了新根據地，逐漸將蘇區擴大，奠定了中共蘇區的基礎。

關於井崗山放棄的消息，當鄧小平啣命到右江時，我們已經知道個大概，惟因當時正忙於出發部署，在軍書旁午中，僅也能知道點大概。一自傷病輾轉，重行進入中央蘇區以來，中途受任此間，除深切地關懷生死與共的紅七軍的戰友們外，對井崗山的發難往事，回環往復，却也時時縈繞在心頭。本軍內有好幾個幹部，曾參加保衞井崗山之戰，對於後來轉進擴展經過，頗亦熟悉，整訓之暇，爲述頗詳。

自朱、毛以井崗山為根據地後，江西、湖南兩省國軍，對井崗山會進行了三次會剿：我是在第一次會剿與第二次會剿後，就離開了井崗山的。

到一九二八年的十二月間，彭德懷、黃公畧，率紅五軍由湘東來井崗山與朱毛會合，紅軍的聲勢更為浩大。國軍動員了江西湖南兩省國軍十餘個團，準備對井崗山進行第三次會剿。朱、毛接到這一情報之後，立即在白露開了一次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湘贛邊區特委委員，各縣黨部書記，各軍高級軍政幹部均參加，討論的中心問題，是如何對抗敵人的三次會剿。決定了如下的行動內容：

一、紅四軍轉移至閩贛邊區活動；創造閩贛邊新根據地，發展新蘇區。

二、彭德懷率紅五軍，留湘贛邊區，以游擊戰對抗敵人的圍剿，盡可能保存以井崗山為中心的根據地。

三、湘贛邊區特委，及各縣黨部、政府，地方武裝仍在原地區工作，並由特委領導。

當時最難處置者是傷病官兵問題，最後决定，輕傷病者分散潛匿於附近各縣民家休養，

重傷者選擇了一個險要的山上集中療養、並派武裝兵一連負責保衛，（其地名已忘記，以後亦被國軍攻破。）

朱、毛於會後不久（一九二九年一月），便率紅四軍偷渡贛江，向瑞金，長汀東進。一九二九年二月初旬，湘贛兩省的會剿軍已開始向井崗山進攻，那時井崗山上僅有少數部隊固守隘路，彭德懷率紅五軍主力，在山外游擊，惟時値農歷十二月下旬，雨雪紛飛，寒風刺骨，進剿軍無法進展。江西方面之國軍乃以重賞徵集勇敢官兵編組一個敢死隊，由井崗山的鄉民做嚮導，從人跡不到的山谷間，攀籐附葛，披荊斬棘，爬到井崗山上，向小井襲擊，各路國軍亦同時猛攻，井崗山便於一九二九年二月十日（正是農歷正月初一日）被國軍攻陷。彭德懷，黃公畧亦卽率紅五軍偷渡贛江向閩贛邊東進，再與朱、毛會合。

國軍佔領井崗山後，因山路崎嶇，交通運輸不便，軍糧無法應濟，自不能久駐重兵，乃採取了淸剿政策，將山上居民驅逐下山，辦理連保，在這次淸剿中，北自永新縣的山區，小江山起，經九龍山，寧岡的蔡家甸，井崗山的大，小，上，中，下，五井，荊竹山，南至鄙

縣的大院止，數百里的山村均被搜剿，焚燒屋宇極多，被殺的人民亦不少。可是在國軍退出山區後，中共邊區特委又化零爲整的將分散的武裝游擊隊集中起來，編成數隊，在這一個廣大的羅霄山脈山區上活動，積極去恢復與建立地方民衆組織，又控制着這一個山區，繼續進行游擊戰。以後並恢復了附近各縣蘇區。

在這一期間的艱苦鬥爭中，蘇區黨政軍以及民衆運動，一切決策都由毛澤東控制，當時雖「朱毛」並稱，其實朱不過僅負指揮軍事之責而已。

## 七　中共中央由滬遷贛

中共中央於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批評陳獨秀爲「投降主義」，將他排除出中共，由瞿秋白繼任中央總書記。會後，中共中央卽由漢口遷往上海。（中國共產黨簡史所載：八七緊急會議，在九江召開，完全是記載錯誤。當時的九江是控制在國民政府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手下；張氏並未投共，中共如何能在九江召開會議？）瞿秋白領導

中共期間，他堅決的執行了武裝暴動，推翻國民黨政權，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國際路綫（註八）。因此，他策動了廣東省的海陸豐暴動，廣州暴動，陝西的渭南華陰暴動，湖南湖北的秋收暴動，但全都失敗了。第三國際（註九）認爲廣州暴動，「造成了中國這一階段的革命高潮最後退兵之一戰，而各地暴動失敗的主要因素，是沒有清楚估計群衆的力量，沒有充分發動群衆的鬥爭熱情，成爲單純的軍事冒險（註十），犯了盲動主義（註十一）的錯誤。這一錯誤所招致的結果，是打擊了工農群衆鬥爭情緒，使中國共產革命走向低潮。」便於一九二八年春，調瞿秋白到莫斯科檢討；同年七月，中共在莫斯科召開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撤了瞿秋白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改以向忠發爲總書記，周恩來爲組織部長，李立三爲宣傳部長。

中共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中，由共產國際派布哈林出席指導。大會決議內容：指出「中國現階段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務是武裝暴動，推翻國民黨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它的本質是土地革命！它的中心工作，是宣傳蘇維埃政權，準備于暴動勝利時，建立臨時政府。展開農村

中對豪紳地主軍閥的鬥爭，幷團結廣大工農群衆在黨的領導之下」。

向忠發是武漢船伕出身的工人，頭腦簡單。中共一切政策的擬訂與實際的支配權力，全操在李立三之手。

當時，李立三認爲由一九二八年秋起至一九三〇年終，基於朱德毛澤東在閩浙贛邊的游擊戰爭的發展，及廣西蘇區的創建，紅七軍紅八軍的成立，他就以爲中國革命高潮已將來臨，於是提出了「中國革命鬥爭，應卽由控制鄉村小城市轉變爲佔領大城市，幷應集中紅軍一切力量進攻武漢，進而爭取全國革命勝利」的策畧。故在這一時期中——一九三〇年夏，黃公畧，彭德懷的紅軍曾一度佔領長沙；是年秋又再度圍攻長沙。同時朱毛直接指揮的紅軍，及江西地方武裝，奉令攻打南昌，也曾佔領吉安，迫近省垣；廣西的紅軍，亦奉令調江西集中，準備執行進攻武漢的任務。（李立三這一進攻大城市政策，當時爲毛澤東所反對。李批評毛澤東爲右傾機會主義者，曾給毛以處分，引起了李毛之爭），可是在這階段的鬥爭中，紅軍因打硬仗，而遭了重大損失；地方黨部與群衆中的秘密組織，因參加暴動而解

體。相反的，由於燒殺政策所引起的後患，是民衆的反抗！至是第三國際認爲李立三路綫，是犯了以冇傾機會主義爲實質的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李立三便于一九三〇年尾，被調到莫斯科去接受嚴重的處分！派他到工廠去做工，進行學習改造；幷通令中共黨內開展反立三路綫的鬥爭！同時，蘇聯爲要加强中共無產階級的領導成份，項英亦被調參加中共中央工作了。（項爲漢口工人出身，曾任漢口工人糾察大隊長）一九三一年春，向忠發又在上海爲國民黨所捕殺，中共中央總書記，改由周恩來担任。

周恩來見江西蘇區迅速發展，紅軍也日漸壯大；認爲朱毛守在山區打游擊，沒有積極向外發展的决心和勇氣，黨中央給毛澤東的指示，他又不聽命，大有尾大不掉之勢。爲了加强黨中央對蘇維埃運動與紅軍的領導，卽派項英到蘇區成立中共中央分局，由項英任書記。所有江西福建兩省蘇區與紅軍的黨務，統由中央分局領導指揮，幷籌備成立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可是由於項英能力薄弱，不爲毛澤東重視，致中央分局仍爲毛澤東所支配。

一九三一年九月上旬周恩來接受蘇聯共產國際的指示，將中共中央，由上海遷入江西蘇

區。幷將江西蘇區中央分局撤銷，另以項英爲軍事委員會主席。同一時期，張國燾亦由上海奉命到鄂豫皖蘇區，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領導該地區的蘇維埃運動及紅軍的鬥爭。

## 八　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誕生

自從周恩來將中共中央遷入蘇區後，蘇區內黨政軍一切大計，均取決于中共中央，周恩來成爲最高領導者，毛澤東這個「土共」，便不得不退居次位了。接着蘇聯派了大批中國留俄學生，和久受蘇聯訓練的中共老幹部，如張聞天，秦邦憲，王稼祥，等來到蘇區，在蘇聯的幕後操縱下，中共中央總書記，便由秦邦憲從周恩來的手中奪過來。中共的領導權，於是就落在留俄學生派的手裏。這時不僅是中共中央加強了對江西蘇區的領導，而且是蘇聯加強了對中共的控制。毛澤東便大權旁落，一切聽命於留俄學生組成的中共中央了。

這一時期，好的方面，是蘇區的清黨運動與肅反工作，比較緩和些，黨內的人心，也漸趨安定，而另一方面，因爲毛澤東個人領袖慾特強，他又富於鬥爭經驗，且與蘇區軍政幹

部，有長久的歷史關係；在討論各項問題時，不免時與中共中央的負責同志，發生摩擦。這是成爲毛澤東日後遭受處分的遠因。

在黨的重心移入中央蘇區以後，爲配合革命運動的發展，於是中華蘇維埃中央組府的大計，由醞釀而成熟，而誕生了。

「蘇維埃運動」是個不折不扣的蘇聯的產品！這名詞的第一次出現在中共的正式文件中，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五日，在漢口召開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有「準備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決議。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時，也有「實行土地革命，發動武裝暴動，建立蘇維埃政權」的議案。但這時「蘇維埃政府」還不過是一個徒託空言的名詞，即在南昌暴動時，也沒有成立蘇維埃政府。

中共在潮汕失敗之後，彭湃領導廣東海陸豐兩縣農民武裝暴動，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成立「海陸豐兩縣蘇維埃政府」開始，中國才第一次有了蘇維埃政府的出現。接着十二月十一日廣州暴動時，又成立了「廣東省蘇維埃政府」；高崗，劉志丹在陝西華陰，渭南暴動

時，也成立了蘇維埃政府。但是這三個蘇維埃政府，都祇有三天或半個月的壽命，可稱是最短命的嬰孩。

一九二八年二月，朱德領導湖南暴動，成立了湘南蘇維埃政府，規模較前三次爲大，壽命也較長些！但在紅四軍退出湘南後，也無形瓦解。井崗山朱毛會合，建立羅霄山脈中段蘇維埃政府，到一九二九年二月，也告失敗。因國民黨軍攻陷井崗山。朱毛率紅四軍於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離井崗山轉移到閩贛邊區，擊潰了國軍盧鳳鳴師。開闢了新的根據地；佔領了福建長汀的全縣！和上杭，永定，連城，龍岩的一部。江西的廣昌，石城，鄠都，興國，瑞金，會昌六縣的全部。與贛縣，寧都，潯鄔等縣的一部，在這些地方都成立了蘇維埃政府，統稱爲「中央蘇區」。此外，還有鄂豫皖蘇區，洪湖蘇區，廣西右江蘇區。中共中央爲了廣泛地開展蘇維埃運動，擴大蘇維埃運動的政治影响，于一九三一年夏，積極籌備召開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並在瑞金城西北約五華里之沙洲垻，建築中央政府大厦。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開幕，舉行了六天會議，選出（實際上

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指定）中央政府委員及正副主席各會局首長。毛澤東被指定爲主席，張國燾，項英爲副主席；朱德爲軍事人民委員，項英爲勞動人民委員，張鼎丞爲土地人民委員，周一粟爲內務人民委員，王稼祥爲外交人民委員，瞿秋白爲教育人民委員，鄧子恢爲財務人民委員，張國燾兼司法人民委員，何叔衡爲工農檢查委員，鄧發爲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便于十一月七日正式宣佈成立。以瑞金爲「國都」，在新建的中央政府大厦中，一班新貴權要，便粉墨登場了。

是年國民政府指揮的軍隊，對江西蘇區的三次圍勦都失敗了。國民黨內部，於四月間又發生了鄧澤如，古應芬等四個中央監察委員，通電彈劾蔣中正的事件，并聯合在粵中央執監委員設立非常會議，及成立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於廣州，促成兩廣合作與南京政府對抗的新局面。九月又發生了日本突襲東北，佔領瀋陽的「九一八」事變（註十四）；由於東北軍的毫不抵抗，日軍又繼續佔領了吉林。十一月，日人又自天津挾滿清遜帝溥儀至東北，製造滿洲傀儡政府；（於一九三二年三月，成立滿洲國，溥儀在長春就僞執政。）并繼續進攻

黑龍江。引起了中國軍民的抗日情緒，國軍有名的鐵軍將領張發奎通令援黑抗日，電請國民政府准四軍北上。南京政府在這個內外交迫的形勢下已窮於應付；乃於十二月在南京召開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林森為國民政府主席，以緩和黨內部的爭執。但是東北丟掉了幷沒有收回！兩廣合作與南京對抗的形勢仍沒有改善！中國共產黨的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又在江西成立，分崩離析，這時眞算是中華民國的多事之秋。

## 九　被歧視的孤兒——紅七軍

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成立後的第一個重要措施，是「擴大紅軍組織，改良紅軍素質，提高紅軍戰鬥技術，培養各級軍事幹部，以便應付當前的革命戰爭」。所以訓練工農出身作初級軍事幹部的紅軍學校便成立了。由劉伯承（註十二）担任紅軍學校校長，並調十二軍參謀長林野為教育長。調我去接十二軍的參謀長，我接事僅七天，又調我任紅七軍軍長兼政治委員。

在我接到調職命令的那天晚上，紅七軍第十九師政治委員陳漫遠，特地跑來長汀看我；因爲他是我多年的同事，便很坦白而毫無保留的告訴我，關於紅七軍入贛的全部情形。

紅七軍自一九三一年三月抵達江西蘇區，轉戰數千里，傷亡失踪了的佔全軍三分之二，剩下六千五百人。在比例上，佔整個蘇區紅軍主力的五分之一。與朱毛會合後，即依照江西蘇區紅軍的編制，取銷營的建制，編成十九，二十兩個師。以李明瑞爲軍長，張雲逸爲參謀長，李顯爲十九師師長，黃子榮爲二十師師長。

在整編期間，朱毛對李明瑞並不尊重。紅七軍便成了個被歧視的孤兒。他們並吹毛求疵的認爲紅七軍黨的領導薄弱，指戰員缺乏革命意識。偏重私人情感，必須加以澈底整理。因是便以交換幹部爲名，將紅七軍中下級幹部抽調三分之一，補充其他紅軍；另由其他各軍抽調朱毛認爲忠實可靠的幹部，到紅七軍工作。當時紅七軍幹部，都是廣東廣西籍，因語言習慣的不同，諸多不便。紅七軍政治部主任佘惠（湖南人，紅七軍成立前由中共中央派到廣西工作的），十九師政治部主任許甦魂（廣東潮安人，曾任國民黨中委，中共老黨員），他們

認爲朱毛這種措施不當，影响了紅七軍指戰員的戰鬥情緒；于是向朱毛提出意見，請勿調換幹部（因有部份幹部要求免調），朱毛爲貫澈他們的主張，鎮壓紅七軍幹部的反對，卽以肅清紅七軍潛伏的改組派爲名，將佘惠，許甦魂及中下級幹部二十餘人加以屠殺。

紅七軍整編後，參加了反抗國軍的第二次圍勦與第三次圍勦，戰績很好。在第三次圍勦戰役勝利後，駐紮在鄂都縣屬之黃龍墟。李軍長企圖潛逃，就在黃龍墟被殺。李明瑞軍長被殺後（李被殺詳情已見前），朱毛卽以張雲逸，接任七軍的軍長。

我從上海來到福建長汀，朱毛以我在廣西領導革命鬥爭時，沒有澈底實行蘇維埃運動，沒有積極發動農民的階級鬥爭；對我也起了懷疑，才將我派在十二軍，考察我的思想。見我在十二軍三十四師師長階段，工作積極，言論正確，才釋了他們的疑惑。

張雲逸軍長，本是個參謀人才，中共中央特將他調任紅軍總部第一局局長，主管作戰的事務。

于是將我調囘紅七軍任軍長，同時爲消除我的疑慮，表示黨中央對我絕對信任，政治委

員一職，也由我兼任。

我想起在湖南鬥爭與井崗山一段，我與朱毛曾共同艱苦鬥爭過很久；我的革命意志的堅決，他們應該了解。但他們連我也不相信，實在令我不解。不過，我已經來到了蘇區，也祇好忍耐着幹下去。于是我在奉令後，便帶着特務員阮成，起程回瑞金去。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從長汀到瑞金，有一百二十華里。我和阮成，由拂曉起程，午後五時便趕到了瑞金。沒有休息，逕往紅軍總司令部，見朱德總司令。我和朱已有三年多不見面。他見我到了，忙請我到他住的樓上談話。剛好他的太太康克清出外工作未返，我們便坐在火爐旁邊，滔滔不絕的談起話來。

「你的情形我從七軍同志中，知道得很詳細。每個同志都說你好。張雲逸同志也說你是個軍事政治兩方面都有卓越見解的人才。我老早就想調你回來主持第七軍。但毛同志不同意，認為多年不見，要考查一下。因為聽說你在廣西工作時，政治立場不堅定，走的是改良主義路綫。直到最近，張聞天同志從長汀回來，他說在長汀和你談了一整夜，廣泛討論中國

革命問題；認為你的見識很卓越，思想很正確，主張調你回來主持第七軍。因此，毛同志表示同意，並且說：「倒底是我們井崗山的老同志不錯！」他這個人倒很聰明的。」

然後他又問起我的負傷經過和療治的情形，以及在十二軍三十四師的觀感，我便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他。

已經是吃飯的時候了。特務員送上酒菜，是一礶糯米酒，一盤大蒜炒腊肉，一盤鷄肉生菜火鍋，這些都是他預先吩咐特務員安排的。朱德笑着對我說：「龔同志！你還記得四年前我在長埒村你家中吃飯的情形嗎？你老太太做的腊肉不錯呢！她老人家現在還健康嗎？」我便將在負傷期間，我母親如何愛護我的一切情形告訴他，彼此唏噓了一番。朱德又說：「四年前我在上堡鵝形一帶打游擊；四年後的情形，却不同了！現在革命的勢力一天一天的壯大了。」這幾句話，是他的感慨，也可說是表示得意。

飯後，我準備告辭，他忙拉着我的手說：「我還有很要緊的話跟你談，我的老婆，今天不回來了，我們談個通宵好不好？」這時室外的天氣很冷，屋子裏燒了一盆熊熊的炭火，而

且吃下了好幾杯酒，我們的精神都很興奮。朱德便將我離開紅四軍後，一切的變化說出來！

「你離開紅四軍之後，發生了一連串的不幸事件，這些都是你所關心的。如陳東日，胡世健都是我們湘南革命的老同志，人也全很好，對革命也很熱誠而努力。但在幾次清黨肅反中，都先後被犧牲了。這個幕後主使人，你是會知道的（意思是指毛澤東），由井崗山轉移到福建時，我們紅四軍中曾鬧過擁朱反毛，擁毛反朱的笑話。最令我痛心的，是林彪那個壞傢伙，他竟公開反對我。我當時以最大的忍耐，才沒有使局面破裂。殺AB團引起的富田事變，也完全是老毛一個人所弄出來的。許多同志全給自家人殺害了！」說到這裏，他似乎有無限的傷感。接着，又幸災樂禍的說：「現在好了，中央遷到蘇區來了，一切由黨來解決，不能由一個人來決定了。」停頓了一會，他又繼續說：「現在我們有四個軍，而實際上戰鬥力較強的是四，五，七軍。我兼四軍，你担任七軍，彭德懷的五軍，也馬馬虎虎，祇要這三個軍弄好，我們就有辦法了。」

聽完他這一夕話，我了解了朱毛之間的明爭暗鬥，說穿了還不是「權位」之爭嗎？不過

，朱德爲人比較老實，毛澤東爲人外誠懇而內虛僞，而且詭計多端，會玩弄政治手段。「朱毛之爭」，結果當然是朱德失敗。他們個人的權位爭奪事小，而許多同志却在這兩大勢力的夾縫中無辜犧牲了！

## 附註

註一：蘇幣——當時中共蘇維埃控制區所發行通用的貨幣，稱爲蘇幣。

註二：白區——指當時國民黨統治的區域。

註三：譚震林——湖南人，身材矮小，現任中共江蘇省主席。

註四：張宗遜——身體高大，謹言笑，現任中共軍事委員會副總參謀長。

註五：楊遇春——瑞金武陽圍人。曾充任紅軍獨立師師長；因家裡是小地主，父親和叔父均被中共清算殺掉，家產被沒收，在憤怒之餘，後在浙贛邊投降國軍，抗日戰爭之際，充任廬山區指揮官。

註六：AB團——是國民黨內右派的反共中堅份子所組織。開始於一九二六年，北伐軍佔領南昌時，由顧孟餘、陳果夫、丁維汾所發起。但因沒有嚴密組織，不到半年就瓦解，成爲中國黨爭歷史上

一個名辭而已。毛澤東是借AB團的名辭來打擊中共內的親李立三份子。

註七：托洛斯基派——蘇聯共產黨的反史太林派，以托洛斯基爲中心，故稱托洛斯基派。

註八：國際路線——蘇聯共產國際指示的中共鬥爭路線，名爲國際路線。

註九：第三國際——亦稱共產國際。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爆發之後，第二國際的負責領袖募招各國工人參加戰爭，擁護祖國，並宣佈國際組織在戰爭期內停止存在，第二國際遂告解體。當時，馬克思主義正統派，則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于是他們另外組織第三國際以實現他們的主張。但第三國際是直到俄國十月革命得到勝利，世界大戰經已結束之後，一九一九年才正式成立。

註十：王稼祥——現中共駐蘇聯大使。

註十一：伍修權——湖北人。中等身材。留俄學生。現任中共外交部副部長。曾代表中共於一九五一年列席聯合國大會。

註十四：「九一八」事變——指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突擊東北瀋陽，造成佔領東三省局面，是爲「九一八」事變。

註十二：劉伯承——現任中共第二野戰軍司令員。

# 第九章　重回紅七軍

## 一　紅軍編組情形

駐在會昌的紅七軍指戰員，聽到我即將到來的消息，歡欣若狂，籌備着盛大的歡迎儀式。我帶着特務員阮成，剛到會昌城外，張雲逸率紅七軍營級以上幹部在城外河岸的草坪上，列隊歡迎。我和他們一一握手，內心交流着悲痛與喜悅的情緒。因為自己雖回到了手創的紅七軍，但過去一同奮鬥的高級幹部，現在，死的死了，調的調了，俯仰今昔，感慨何限！

晚上軍部的歡宴，團長以上的幹部都參加。他們全關心我的腿傷和健康，問我分別後的經過。我簡單的告訴了他們。第二天早晨，集合全軍指戰員，佈達了我接任紅七軍軍長兼政委的命令，午後，我與張雲逸到各部隊巡視。指戰員情緒都很興奮。我便決定將軍部剩下的

公積金（是到達江西前存下的），發給全軍指戰員每人一元作敘餐費。在城外已收割的稻田上，聚集全軍指戰員，大碗酒大塊肉，歡天喜地的同進晚餐。各人都感到紅七軍前途，大有希望。

張雲逸是我的老戰友。他對紅七軍的愛護，和我一樣；幹部對他，也非常愛戴；我們交換過去的經驗，暢談今後的發展，流連了三天的時間，還和高級幹部歡敘了好幾次，他才悵然的分手，到紅軍總部去工作。

紅七軍過去祇有十九，二十兩個師，我接長紅七軍不久，朱德將紅三軍的一部，和其他軍事機關的特務營之類，新編成一個師，補充紅七軍，編爲紅七軍第二十一師。師長龍雲是（湖南人，二十多歲），由彭德懷所保荐。這一來，紅七軍的實力，更加強了。當時紅軍的編組情形，是這樣：

紅軍總司令：　朱　德

政治委員：　周恩來

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第一軍團總指揮：朱德（兼）轄第四第十二兩軍

第三軍團總指揮：彭德懷　　轄第五第七兩軍

政治委員：滕代遠

第四軍軍長：朱德（兼）轄第十、十一、十二・三個師

第五軍軍長：鄧平　　轄第十三、十四、十五、三個師

政治委員：彭雪楓

第七軍軍長：龔楚　　轄第十九、二十、二十一、三師

政治委員：龔楚（兼）

第十二軍軍長：羅炳輝　　轄第三十四、三十五、兩個師

政治委員：譚震林

軍部直屬隊，有一個特務團，一個通訊連，一個工兵連。

師轄三個步兵團，師直屬部隊，一個步砲連，一個特務連，一個衛生隊，一個担架隊。步兵團轄三個步兵連，一個重機槍連，一個通訊排。步兵連轄一個特務排，三個步兵排。每排轄三個步槍班，二個輕機槍班，有因輕機槍不足者暫缺。班有戰鬥員十二至十六人。（班長一，副班長一，觀察員二，特等射手二，其餘係步槍手）。

紅三軍軍長黃公略，在國軍第三次圍剿蘇區時陣亡，該軍損失甚大，其部隊分編入紅五軍與紅七軍。

## 二　政治委員與政治部

我接長紅七軍兼政委後，首先必須明瞭的是政治委員的職權，和與政治部的關係問題。當時紅七軍的政治部主任是袁任遠，（他是湖南人，七軍的老同志，現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我馬上到政治部去跟他談話，並查閱上級發下關於紅軍中黨的工作指示，政治委員應

注意的事項，及紅軍中政治工作實施綱領等文件後，才有了深切的認識。

政治委員是中國共產黨在紅軍中的公開代表，他的職權是：監督軍事指揮員及所屬部隊，執行上級給予的一切命令，及其所規定的任務和工作，鞏固黨對紅軍中的控制，及領導所屬軍隊中黨的組織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實施。爲要保障政治委員在紅軍中的職權能够實現，它硬性的規定各軍事指揮員（指揮員就是軍事主官，如軍長，師長……等）所發佈的命令訓令，及對上的報告，均須由政治委員副署（簽名或蓋章于指揮員姓名之左邊），方能生效。有關行動的口頭命令，除了在戰場上執行已定的作戰計劃，戰鬥行動外，均須得政治委員的證明，方能生效。否則，上級固不理會，下級亦不執行。但如遇有特別情形，或受時間限制，又非違背革命利益者，下級得一面執行，一面設法報告政委。政委和同級揮指員，無論平時或戰時，是相處在一起的。在這種制度下，紅軍的指揮員，是有責任而無權力的。但是共產黨爲了要發揮軍事指揮員的軍事學識和技能，以及保持指揮員對下級的威信，俾其命令能够貫澈實現起見，在政治委員工作的規定下有：爲了要發揮指揮員的軍事天才，舉凡軍

隊的作戰，行動，教育，各種計劃和決心，不違背上級意旨和黨的決策者，政治委員必須尊重指揮員的意見，不應妄加干涉。同時，在各種場合中，必須注意保存指揮員的威信。下級政治委員對上級指揮員，必須以長官看待；上級政治委員及指揮員，對下級指揮員如有錯誤，須予以指責或教育者，除錯誤嚴重須予撤職者外；不得當其下級部屬（被指責指揮員之部屬）前指責之，以免損及威信。如有非在萬不得已之情形，損害了同級揮指員威信之政委，須受到黨內和行政上的處分………等指示。

紅軍的組織中，師以上的軍事機構，均設有政治部。團，連有列寧室（註一）。政治部設有主任，受上級政治部的指揮及同級政治委員的領導，負責紅軍中黨的工作及政治工作。政治部主任，又是同級政治委員的第一個代理人。如遇政治委員因故離職或作戰傷亡時，毋須待上級命令，即代理政治委員的職權。團之列寧室，由政治委員兼主任，另設幹事兩人，連之列寧室不設主任，由連政治委員負責；他領導着連內政治戰士，以及全體指戰員，進行教育，訓育，文化，黨務，及對民衆，對敵軍的政治工作。

黨在紅軍中的組織，是軍師團各級均有委員會之組織。書記通常是由政治委員兼任，但指揮員兼政委者，亦有由政治部主任兼書記的。一般的說來，紅軍中黨的組織和黨員，對非黨員是秘密的。各級政治部列寧室，就是黨的辦公廳。連一級設有黨的支部，支部書記通常由連指導員兼任，但亦有連長或排長兼任者；支部下設有黨的小組，通常每班一個小組；但黨員少者，即以排爲單位，編成小組。

紅軍政治工作的目的：是保障與協助軍隊完成其所負的軍事任務；政治部主任與同級參謀長，是經常保持着密切連系的。軍隊中的軍事會議，及重要的情況判斷，通常是指揮員，政治委員，參謀長，政治部主任四人在塲。但政治部主任祇提供政治情報資料，及聽取軍事情報和指揮官最後所下的決心與處置，以便策定政治部的工作計劃。參謀長策定各種作戰行動，教育計劃時，須于下達前通知政治部主任，以便政治部主任根據這些計劃，擬訂政治工作計劃；同時下達政治工作命令，或頒佈政治工作計劃實施。

## 二　紅軍參謀制度與指揮機構的編成

紅軍的制度，沒有副指揮員的設置。參謀長就是指揮員的第一個代理人，這是仿效蘇聯紅軍的制度。師以上軍事機構的編制，均設有參謀長。團設團副，連設連副，以輔助指揮員。如遇指揮員臨時出缺，或因故離職與作戰傷亡時，不須待上級命令之指派，各級參謀長及團連副，立即行使指揮員的職權。參謀長對本軍軍事單位之作戰，情報，教育，補給，通信等一切業務，均須負責研究，並經常提供具體意見，以輔助指揮員。指揮員對于參謀長所提供的意見，必須予以尊重和愼密的考慮。但最後的决定，仍取决于指揮員，幕僚長不應固執己見，以動搖指揮員的决心。指揮員的一切决心和處置的實施，由參謀長負責領導各參謀幕僚人員，分別擬具各項實施計劃，及命令，訓令，電報，通報，報告等，經由指揮員及政治委員簽署後實施，并有監督下級貫徹實施之責任。下級指揮員須接受上級參謀長之指導。所以紅軍中參謀長的地位，是很崇高的，紅軍對于參謀長的遴選，亦特別嚴格。它的條件，

不僅是要有優良的軍事學識和作戰的經驗，而且還要是中共的忠實黨員。

中共黨內最高的軍事領導機關，是軍事委員會。它們當時亦認識了現代戰爭已不是指揮戰鬥時期，而是組織戰鬥時期。對于紅軍各級指揮機構的組織，曾經不斷的研究和改進。但因人才的缺乏，它們亦認爲始終還沒有達到理想。當時紅軍各級指揮機構的編成如下：

一・紅軍總司令部：設有作戰，情報，教育，軍醫四個局（後改設六局），一個事務室及紅軍經理部（後改稱供應部）。

二・軍團總指揮部：僅有參謀處之設置，內分作戰，情報，教育，通信各科，另有管理員兩人，辦理其他事務。

三・軍部：設有參謀處，辦理作戰，情報，教育，通信等業務；軍醫處，辦理衛生行政，醫療，救傷等業務，作戰時改爲臨時野戰醫院；經理處，辦理軍需軍械之補給供應，及前運後送等運輸事宜。管理室，辦理其他事務。

四・師司令部：僅設有參謀長一人，參謀二人，軍需一人，管理員一人，書記一人，分

辦各項業務。初期有經理處之設置，後已撤銷。

紅軍的經理制度是獨立的。軍司令部的經理處對上直屬于總司令部經理部，對下直接指揮到連一級的軍事單位之軍需人員。各級指揮員對經理處或軍需人員，祇在行動上，及所屬部隊之位置，任務，時間，以及所需之糧食彈藥數量，命令他們執行；對于現金收支，糧食出納，預算決算等事項，指揮員均不負責，亦無權過問。紅軍指揮員之調動，沒有經理部門的交待。

如上所述，當時紅軍指揮機構的編成，是不健全的。但因幕僚人員有高度的工作精神，和精密的分工；以及紅軍中的公文簡便；他們辦理各種業務，均能迅速而確實。且在他們的不斷研究中，日趨進步。

## 四　深入國軍統帥部的情報工作

中共的情報工作，一向把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在國共分家以後，便處心積慮的保留

了很多中共黨員在國民黨的軍事機關及軍隊中工作。同時還密令地方青年學生黨員，投考國民黨所辦的軍校，畢業後，滲入國軍中去。這些中共黨員，是以反共爲外表的中共工作者。他們希望由初級軍官逐漸升上去，備爲將來中共之用。這是中共部署於國軍中的情報工作之一。在這工作中所收的效果，如：國軍營長黃公略，是因通報敵情于中共，被其上級軍官懷疑，準備解決他的，但他却與彭德懷聯絡叛變。又如廿六路軍孫連仲部的高級軍官——趙博生，董振堂等，利用官兵不滿國民黨中央的情緒，而策動了大規模的「起義」，皆是顯著的例子。

國民政府統治區內各地的中共黨組織及每一個中共黨員，都是中共的情報工作者。他們除了用秘密設在「白區」的電台與紅軍通訊外，在接近赤區的地方，他們運用工農及婦女黨員，僞裝上山割草，砍柴，或拿着食物盒……等種種方法外，還利用回娘家的婦女，或肩担大糞出田工作的農民，以通過國軍的警戒線，內中多藏着重要的情報遞送給紅軍。這些情報傳遞的方法，雖曾在南城及萍鄉，均被國軍破獲過，但他們所破獲的，還不及萬分之一。這

也是紅軍的情報來源之一。

但收效最大而最迅速的，便是電訊的偵察與破譯。它的主要的辦法是：竊收國民黨最高軍事機關與各總司令部，軍部，師部的來往無線電報，將這些電報設法譯出，使國軍一切動態與計劃，瞭如指掌，故能在國軍未行動前，部署作戰的計劃。這一支無形的赤色第五縱隊（註二），直接伸入了國軍最高統帥的指揮所。

這支無形的赤色第五縱隊的組織，分爲四個部門：

一．偵察組：有電報機三座，負責偵察國軍電台方向位置，來判定國軍的位置與方向。

二．收報組：有收報機四部，日夜不停的竊收國軍高級指揮機構所發出的，及各軍部師部來往的電報，送情報組研究或譯報組翻譯。

三．猜報組：有若干專門研究密碼學的高級技術人才（其中多是蘇聯受訓回來的），他們窮年累月的研究國軍所使用的最新密碼。儘管國民黨最高統帥部經常更換新的密碼，但紅軍的密碼專家，運用了卓越的密碼技術，在無線電偵察中竊收了三至八個電報後，便可將國

軍所使用的密碼的全部編組方法，破譯出來，仿照國軍的密碼方式，製成密碼本交譯報組翻譯。

四・譯報組：使用猜報組交下的仿製國軍密碼本，將收報組送來之電報，翻譯成文，送情報機關研究。

中共對這些高級情報技術部門的人員，特別優待，尤其是注意他們的營養與保護他們的康樂。儘管在瑞金最艱苦的時候，他們的待遇比紅軍總指揮還要好幾倍，使他們安心的從事最有代價的情報工作。同時對於他們安全與居處，也特別保守秘密，經常給與他們最週密的戒備。紅軍中不僅中下級幹部不知道這個機構的存在，連紅軍總指揮，軍長之流，也無法清楚其內部。作者在日後任紅軍總司令部參謀長時，掌握了最高的機密；而且與這些工作人員相處在一塊，所以才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以上是僅就獲取情報而言！其防止情報的方法，同樣周密。紅軍部隊中，佈滿了國家政治保衛局的特務人員，及中共黨員的組織作用；重重的監視着每一個官兵。他們爲了要防止

洩漏軍事秘密，在作戰撤退時及在「白區」長途行軍時，必派出收容隊隨着衛警戒部隊同行，對于落伍的官兵如無法抬運時，便毫不留情的將落伍者槍斃。在戰場撤退時，對于負傷不能行動，又無法搬運時，祇要被紅軍打掃戰場的隊伍見到，必將這些傷兵加上一刺刀將他殺死。所以在作戰時，國軍想俘擄傷兵亦是難事。除了因無打掃戰場的時間，那就是例外。那些担任收容隊及打掃戰場的部隊，是派有政治幹部率領的。

紅軍機關的機密文件與各種計劃，凡未過時間性的，除了負責起草的參謀外，就祇有參謀長，政治委員，和指揮員知道的。很多的秘密文件，是直接由參謀長擬稿和保存的。所以洩漏機密的機會，是很少的。

蘇區內或者是紅軍部隊內，國軍要派一個密探進去，是極困難的事。因爲蘇區的戶口調查和人民的組織，是很嚴密的。人民由甲村到乙村去，必須要報告當地蘇維埃政府，得到許可領得通行證，方能通過村與村間的盤查哨所。蘇區內村與村間每一條大小道路，均由當地赤衞軍，少先隊，以至兒童團分佈着，担任各種警戒，盤查，防奸的任務。如果你的家裏來

了一個生疏人客，亦必須向政府報告，經過特務人員的盤查，許可居留才能居留。在這樣的嚴密組織封鎖之下，國軍的密探們想深入蘇區，比登天還難。這是蘇區內運用民衆防止奸諜的工作。

所以，國軍要想得到紅軍的情報，祇有在蘇區逃出來的人民，和紅軍中不滿中共逃出來的官兵，是唯一搜集情報的對象！

## 五　紅軍待遇和軍需補給

中央蘇區，是個貧瘠的，經濟最落後的農業社會，在這個包括十多個縣份的蘇區內，要供應近廿萬紅軍及十萬以上的地方民衆武裝（赤衛軍，獨立師，獨立團），和政府工作人員的生活消費，與戰爭的消耗，而且從一九二九年起至一九三四年冬止，支持到六年的時間，這奇蹟是外人所不能了解的，我初到紅七軍的時候，亦很爲了軍需補給供應問題顧慮。經過了查詢，全部明瞭了蘇區中的措施之後，才知道它們是在不惜人民的犧牲，來進行革命的戰

爭的。這種毅力和勇氣，我當時亦覺得佩服；但站在人道的立場上來說，總覺得是太殘忍而不合理。

首先說紅軍的待遇吧。紅軍指戰員的待遇是平等的，它們採取了實物供給制度，每人每日發給糙米一斤四兩，青菜半斤，植物油四錢，鹽三錢；另外，每人每月發給零用錢二元，（後改爲一元，到最後兩年是很少發給了）服裝是每年於夏季每兵發一套粗布軍衣，冬季發一件棉衣和一條夾褲。這些衣褲的布料，都是很劣的。內衣內褲，原定是每年兩套，其實是祇有一套。棉被呢，在新兵入伍時，發一張夾布被。天天在行軍作戰中過活的士兵，那一年一套的粗布衣，當然是爛破不堪的了，襪是從來沒有的，鞋是依靠着蘇區的婦女們製造送來慰勞，或可一年分到一對，主要的是靠自己拿着稻草和爛衣服的布條來打草鞋，否則就祇有赤着兩只脚，扒山越嶺，行軍作戰了。可是紅軍官兵，誰也是肉體做的，而不是銅筋鐵骨；吃的不足維持身體所需的營養，穿的不能保持身體所需的體溫，天天在挨飢受寒，而又天天做着超過體力和精神所能負担的工作；他們的身體，也就祇有一天一天的衰弱，走上疾病和

死亡的道路。就算身體壯健的，因爲赤脚短褲扒山打仗，也會刺傷脚板；或因營養關係，脚部生瘡爛脚的，爲數甚多。在一九三三年的統計中，士兵爛脚的佔百分之二十以上。因此紅軍的死亡率極大！這實是由於待遇的惡劣，才使官兵受到這樣痛苦的與死亡的威脅。

其次是紅軍的待遇，雖然微薄；但人數衆多，所需的糧食甚大。怎樣去籌集呢？說穿了——紅軍糧食的主要來源，還不是取諸蘇區內的人民？中共除了在蘇區徵收土地稅外，幷運用統制人民的糧食，廉價收買糧食的辦法。在蘇區內的人民，每人祇限每月存谷二十斤，平均每人每日約有米八両，其餘的就是餘糧，須由政府定價收購。還要運用勞軍，獻金，獻粮各種手段，來搜刮人民的全部所有。這是它們在蘇區內解决軍粮的主要方法。

它們還不斷的深入到國府統治區內去籌糧，籌欵，就食；所以紅軍沒有作戰時，便開到「白區」去打游擊。這是紅軍官兵們最喜歡的工作。因爲到白區去打游擊，就有土豪打。不僅是可以有充足的粮食，而且可以吃一頓猪牛鷄肉下酒。它們打土豪的方式，是由政治部負責調查，某家是土豪之後，再由經理機關派出徵發隊，由政治人員率領，協同紅軍部隊到土

豪的家裏，將其所有盡數沒收。在屋內墻壁裏及地下理藏的金銀首飾，也要搜刮淨盡。要是土豪家小還有人留在家裏，無論男女老少，一律拘囘勒搾罰款，甚至槍斃處死。而它們打土豪的果實，是食物交由經理機關及政治部統一分配；金錢財物，就全數歸公家所有，以充軍餉；這也是紅軍的糧餉來源之一。中共就是這樣的維持了它龐大的軍費政費開支，及長期戰爭的消耗。

紅軍的械彈補充，主要的來源是從國民黨軍隊手中奪取過來。每當彈藥缺乏的時候，官兵都希望打仗來補充自己。紅軍的編組中，每個步槍班，有兩名以梭標大刀爲武器，及携帶四個手榴彈的士兵。在作戰時，紅軍自己傷亡士兵的步槍，或繳獲的槍彈，立即交給他們使用。所以紅軍作戰，不論是戰勝或戰敗，祗有增加槍械，很少損失槍械的。另外蘇區內，設有修械廠，翻製子彈及製造手榴彈廠。紅軍作戰時，非常珍惜子彈；就是子彈殼，他們都能盡力保管以便帶囘了交給經理機關，轉運製彈廠翻製子彈。製彈廠所用的火藥，有黑色藥和黃色藥兩種；黑色藥是在蘇區內收集鹽硝和以硫磺炭末製成。黃色藥是用枯木製成極細的黃

色塵灰，和以硫磺炭末製成的。子彈用黑色藥，手榴彈用黃色藥製成。其爆炸力雖不甚強，但尚可用；這就是蘇區唯一的軍事工業。

這些少量的彈藥生產，當然不能供應長期戰爭的消耗；因此，彈藥補充是紅軍最感困難的一件事。

蘇區內沒有適合運輸的河道，又沒有汽車。糧食，彈藥，傷兵的前運後送，均依靠人力。它們動員蘇區內所有的人民，男的女的，編成運輸傷兵的担架隊，及運輸糧食軍品的運輸隊。共產黨就是這樣不惜人民的生命來克服運輸補給的困難的。

## 附註

註一：列寧室——是紅軍團以下政治工作機構。冠以「列寧室」的名稱。

註二：赤色第五縱隊——共產黨的間諜人員，稱為赤色「第五縱隊」。

# 第十章　被國軍圍剿的紅軍

## 一　國軍三次圍剿的失利

當我回到紅七軍的短短時間裡，職務上的交接與清理，倒並不繁重；而久別重歸，所有過去患難與共的戰友們，在別後的歲月裡，跋涉轉進期間，歷次奮戰之餘，生死凋零，不勝人事滄桑之痛！然為團結圖存，怎麼也得强抑激動的心情。所以當一班舊日部從，紛來探晤時，存問之間，對於李明瑞之慘遭意外，對於本軍中高級幹部之多被分調，全感到迷惘，疑慮與不安。可是更也全因為我此次歸來，似乎又給了他們以無限的慰安與信賴；我對他們也只能說些振奮勵勉的話語，因為別來經年，事情變化得太出人意外了。好在從軍事上連捷之後，士馬歡騰，整肅自殘風潮，漸已成為過去，為了共同的革命信念，為了爭取鬥爭的勝

利，只有奮勉團結以期待來日了。

在清理軍書檔件中，我發現了關於過去一二三次的圍剿記錄，這使我對於離開經年當中所隔膜的戰局演變，得到一個明晰的認識：

一九三〇年秋，華北的馮玉祥與閻錫山反對國府的中原大戰已結束，由廣西進攻衡陽長沙的「反蔣」軍亦已退回廣西柳州，國民政府眼見中共的星星之火，勢將燎原，乃於是年冬對江西朱、毛紅軍進行第一次圍剿，其部署大略如下：

一，以江西省主席魯滌平爲剿匪總司令，總司令部設於南昌。

二，以國軍軍長兼師長張輝瓚爲前敵總指揮，隨進剿軍行動。

三，調集張輝瓚，譚道源，劉和鼎，公秉藩，羅霖，毛炳文，許克祥………等八個師爲圍剿軍。總兵力約十萬人。

四，各圍剿軍以師爲縱隊，先行佔領江西省的吉安，龍崗，陂頭，与福建省的建寧之綫，然後由北向南齊頭併進，以掃蕩江西蘇區紅軍。

國軍各師在十二月廿七日以前之位置如下：

一，羅霖師駐吉安。似準備在贛江西堵截紅軍西竄。

二，公秉藩師進佔富田，東固。（兩地係蘇區，但因AB團事件反對毛澤東）

三，張輝瓚師進佔龍岡。（蘇區）

四，譚道源師進佔原頭。（蘇區）

五，許克祥，毛炳文兩師進駐廣昌，寧都間之須陂，並佔洛口，東韶。（蘇區）

六，劉和鼎師駐福建省之建寧城。

朱，毛當接獲國軍圍剿蘇區的情報後，即按戰畧以「一當十」，戰術以「十當一」的紅軍作戰原則，决心採取「誘敵深入」，集中紅軍全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戰畧，立即將紅軍全部集結於江西寧都縣之黃陂，小佈地區（該地區爲有嚴密組織的蘇區，可保障紅軍行動的秘密）。總兵力約四萬人。紅軍集結後，國軍已進入了上述位置，當時作以下之判斷：國軍八個師以張輝瓚，譚道源兩個師之戰鬥力最强，兵力亦充實，每師約有一萬四千人，且係敵軍

的中央縱隊，爲進剿軍之主力，若將該敵殲滅，則其餘不攻自退。原頭距我軍集結地較近，但原頭之地形不利於我軍進攻，龍岡地形利於我攻，且興國有紅軍獨立師千餘人，相距僅四十里，可配合主力作戰，我軍可以四倍於敵之兵力迅速之行動一鼓而殲滅之，殲滅張師後轉移兵力由西向東，進攻原頭，則有利於敵之地形轉利於我。根據這一判斷，卽决心於十二月廿七日，以中央突破，先行進攻龍岡張輝瓚師，並令駐興國之紅軍獨立師（千餘人）向龍岡敵後迂迴攻擊，截斷敵軍退路，並對東固方面警戒，以掩護主力决戰。激烈的戰鬥於廿七日拂曉開始，紅軍以絕對優勢的兵力將龍岡四面包圍向敵猛攻，僅六小時的戰鬥，卽將駐龍岡墟墟內及附近之張輝瓚師師部直屬隊及兩個步兵旅全部解决，未漏網一人，師長以下官兵九千餘人全部被俘。

龍岡戰鬥結束後，是晚接獲報告：原頭之譚道源師已悉張師被紅軍消滅，開始向東韶方向撤退，紅軍卽全部向譚道源師跟踪追擊，卒在東韶附近消滅該師之一半，其餘各路國軍均已紛紛向後撤退。計由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廿七日開始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止，僅五日之時

間，經過兩次戰鬥，國軍對江西紅軍的第一次圍剿便因失利而結束了。

是役紅軍繳獲軍品甚多，尤其是俘擄了張輝瓚，這是紅軍官兵最興奮的一件大事，因張輝瓚過去剿共甚力，共產黨人恨之刺骨，張被俘後被紅軍以鐵絲穿手反縛，受過了官兵的鞭撻及各種酷刑，然後將他手脚捆綁，點天燈，死後割下其頭，以木盒盛着放於河裡，使它順流流出白區，藉以警告國軍。這一個打了大勝仗的龍岡墟，以後便改爲勝利縣，以紀念反抗國軍第一次圍剿的大勝利。

國民政府鑒於第一次圍剿的失敗，更審愼的準備第二次圍剿，除了兵力增加到二十萬人外，幷採步步爲營，逐漸推進，包圍紅軍於寧都青塘地區而殲滅之的戰畧，其部署大畧如下：

一，派何應欽爲剿匪總司令，總司令部設於南昌；

二，第五路軍王金玉部（轄四十七師王金玉部，三十四師郭宗華部，五十四師郝夢麟部，二十八師公秉藩部，共四個師）在吉安以東永豐以南地區集結。

三，第二十六路軍孫連仲部（轄兩個師）在宜黃集結。
四，第八路軍朱紹良部（轄第八師毛炳文，三十四師許克祥等師）在南豐集結。
五，五十三師劉和鼎部在建寧集結。
六，各路軍均於五月初旬集結完畢，中旬開始向蘇區逐步推進。

紅軍自第一次反圍剿勝利後，在寧都廣昌一帶整訓，接獲敵軍第二次圍剿的情報後，立卽將主力三萬餘人，集結於寧都以西之靑塘，因爲經過了四個月時間的訓練，官兵精神旺盛。當時判斷：敵軍第五路軍王金玉部及二十六路孫連仲部，均係自華北調來的馮玉祥降軍，旣不服南方水土，又不慣山地戰，士氣頹喪，王金玉部爲敵軍之右翼，我軍應先攻其最脆弱之一翼，消滅王金玉後由西向東而各個擊破之，旣可免我軍有被敵壓廹於贛江邊聚殲之危險，幷可於戰事結束後在閩贛之建寧，黎川，泰寧，等地區擴大根據地，以準備下一次會戰。朱毛根據這一個判斷，決心於五月十六日開始向已佔領富田（蘇區）的王金玉，公秉藩兩個師（共十一個團）突擊，這是第二次圍剿的第一戰，由於紅軍作戰的堅決，很快的將

王、公兩師擊潰，且大部被消滅，當進攻富田時，富田之西北方四十華里有國軍蔡廷鍇師，富田以東有郭宗華師，紅軍是處於兩敵之間，左右側背均受威脅，但國軍雖明知富田在被紅軍攻擊中，因情況不明，及指揮不統一，致不能及時增援作戰。富田戰鬥結束後，紅軍立即進攻郭宗華師，也很快的消滅其大部，其餘潰不成軍，向北逃竄，郝夢麟師聞郭師被消滅，星夜退回永豐縣城。紅軍接連打了兩次大勝仗，士氣更旺。同時，紅軍因爲有民衆幫助，清掃戰場，抬運傷兵，看管俘虜，搬運勝利品，輸送糧食，以至偵察敵情，封鎖消息，都由地方蘇維政府指揮赤衛隊運輸隊負責，紅軍於戰鬥結束後又立即向東出擊，連續擊潰了孫連仲部，朱紹良部，劉和鼎部，計由五月十六日起至三十日止僅十五天的時間，紅軍由西徂東，經過了七百里的行軍作戰，五次慘烈的戰鬥，將國軍的第二次圍剿整個打破了，繳獲的步機槍二萬餘枝，彈藥軍品無算。國軍的殘餘部隊，退回吉安，永豐，宜黃，南豐，泰寧各地。

紅軍在反第二次圍剿勝利後，僅休息了三天，便按照預定計劃，將各軍分駐在建寧，黎川，廣昌間地區，進行擴大蘇區的赤化工作，幷籌粮籌餉以濟軍食，正在展開工作的期間，

忽接南豐城內送來的情報，國軍又準備對蘇區第三次圍剿，其情形大畧如下：

一，蔣中正氏親任剿匪總司令，駐節南昌。

二，進剿軍分三路，中路總司令何應欽，駐南昌。右路總司令陳銘樞，駐吉安。左路總司令朱紹良，駐南豐。

三，進剿軍之主力：陳誠，羅卓英，趙觀濤，衛立煌，蔣鼎文等五個師；其次是：蔣光鼐，蔡廷鍇，韓德勤等三個師，其餘尚有孫連仲，朱紹良，上官雲相等各軍師，總兵力約三十萬人。

四，進剿軍的戰畧是：各路軍向蘇區長驅直入，壓迫紅軍於贛江邊一舉而殲滅之。

那時紅軍因經過第二次反圍剿的艱苦戰鬥，官兵傷亡不少，且未經休息補充，紅軍兵力，除第十二軍須留駐福建，對該方面敵軍警戒外，其餘第三，四，五，七共四個軍，約三萬人。朱、毛接到這一情報，大爲吃驚，經過了一次討論後，立卽命令各軍開赴興國集中。經過十多天的行軍，繞道迂廻，步行千里，到達興國時，敵軍已分路前進，迫近興國，乃決

避敵主力，打其弱點，并擬定作戰方針，大畧如下：

一，由興國經萬安，突破富田一點，然後由西向東，向敵之後方連絡線上橫掃過去，讓敵主力深入蘇區，而置於無用之地，此爲作戰第一階段。

二，待敵回頭北向，兵力疲勞的時候乘隙攻其弱點，爲作戰第二階段。

時間和敵情逼迫着紅軍，再無從容準備的機會，乃卽集結兵力向富田前進，可是在紅軍行動之後，被敵偵悉紅軍行動企圖，陳誠，羅卓英兩個師立卽趕至富田，形勢又對紅軍不利，乃被迫改變計劃，撤回興國城西之高興墟集結，斯時僅有這一個小墟場及附近鄉村未被敵佔領。紅軍集中了一天後，乃决向興國東部之蓮塘，及永豐縣南之良村，寧都縣北之黃陂方面突進。第一天乘夜通過了蔣鼎文，和蔣、蔡、韓、各師間之四十華里空隙地帶而到達蓮塘。第二天和上官雲相軍之前哨開始戰鬥。（上官指揮他自己一個師，及郝夢麟師）第三天擊潰上官師爲第一仗。第四天擊潰郝夢麟師爲第二仗。這兩次戰鬥結束後立卽繼續東進，經過三天的行軍，到達黃陂擊潰毛炳文師爲第三仗。紅軍連戰皆捷，繳槍萬餘。此時國軍已發

現紅軍主力所在，正在向南向西進之國軍主力，立即轉而向東，以黃陂爲目標，以大包圍的態勢，分路併進，尋求紅軍主力決戰。當國軍主力迫近紅軍時，紅軍乃從蔣、蔡、韓軍和陳、羅軍之間一個二十華里間隙的大山中偸越出去，回到興國境內集中。國軍抵進黃陂，已不見紅軍的踪影，經過多方的偵察始知紅軍已回竄興國，待國軍再向西進追尋紅軍時，紅軍已休息了半個月，精神飽滿，士氣旺盛，，準備着迎接新的戰鬥。可是國軍呢？因蘇區民衆遷移上山，所有可供敵軍利用的物資，尤其是粮食都已匿藏山中，後方的交通運輸困難，粮食接濟常時中斷，且在蘇區內晚上常被民衆武裝騷擾，食旣不飽，睡亦不寧，經過了一個多月的磨折，官兵多飢疲沮喪，已無再戰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國軍被廹開始退却了。紅軍偵知國軍退却的消息，立卽向敵追擊，先行消滅了蔣鼎文的一個旅，接着消滅韓德勤全師，最後在高興墟和蔣光鼐，蔡廷鍇兩個師發生了極激烈的攻防戰，紅軍用密集形向敵軍陣地衝鋒，在國軍優勢的火網之下傷亡慘重，使紅軍攻擊頓挫，蔣、蔡兩師乃得從容撤退。毛澤東說：這次戰鬥打成對峙，讓其逃去了。這次鬪剿自七月初旬起至九月初始告結束。

## 二　爭取了二萬國軍「起義」

我在回到紅七軍的第五天（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廿六日），接到總司令部的寢午電：

「限即到會昌龔軍長，某密，該軍立即開赴瑞金縣城北面村莊集結待命，並限於感午前到達勿延朱德周恩來寢午參作。」

我看了這一個電報，立即以電話命所屬部隊，準備於本日午後八時，按軍部直屬隊十九師二十師之序列出發。（廿一師正在瑞金整編中）各師大小行李，在各師後頭行進，並即補發了一個出發的命令，着各師派連絡參謀一人，於八時前到軍部隨同軍部行進。我便於八時率軍部出發。是晚天氣寒冷，開始出發時，寒風襲人，官兵都有瑟縮之狀；但行動後，便將寒冷克服了。時星月無光，行走在高低不平紆廻曲折的道路上，非常吃力。直至第二天（廿七日）午前十時，我和先頭部隊才到達目的地。立即命通信連接通總司令部的電話線，乃由電話與朱總司令連絡，報告本軍到達目的地的時間。他答復我是：「七軍部隊，可進入附近

村莊宿營，請你來總部一談。」那時各師部隊已陸續到達，我告訴參謀處長唐濬（那時七軍沒有參謀長）分配各師及直屬隊的宿營地，并着各部隊迅速吃飯後休息，準備接受新的任務。我便帶了一位林參謀，兩個傳達，赴相距五華里的總司令部。不到三十分鐘便到了，朱總司令正在作戰室內和參謀長葉劍英，看墻壁上掛着的五萬份一軍用圖。看到我來，朱德立即和我握手，並問我：

「昨晚夜行軍辛苦嗎？士兵有沒有掉隊的？現在都到齊了吧？」

「并不見得辛苦！士兵行軍力很强，該不會有掉隊的。我來的時候，十九師已到齊，廿師也開始陸續到達。」我答。

「我們大家坐下來談談吧！」他說。

于是朱德葉劍英和我三個人便圍坐在日字形的大辦公檯側。朱首先對我說：

「我先告訴你一件事：駐在宜黃的二十六路軍孫連仲部，原來是馮玉祥的部隊。在去年（一九三〇年）秋天「反蔣」失敗，孫連仲部投降後，于今夏調到宜黃來進攻蘇區，曾參加

國民黨對蘇區的第二次及第三次圍攻。可是兩次圍攻，都被我軍擊潰了。該軍雖未受到大的損失，但和我們作過戰，退守宜黃不敢出來。他們官兵都是華北人，初到南方又値天氣炎熱，官兵水土不服，患病死亡的很多。現在南京又積極部署第四次圍攻，由于他們不慣山地戰，他們便不免發生恐懼；同時南京對該軍完全當雜牌軍隊看待，從來沒有補充該軍的槍彈；軍餉和粮食運濟數量上，固不及南京的嫡系軍隊——中央軍；時間上常又拖延時日。同屬圍攻部隊，而待遇不平，致該軍官兵發生了極大的反感。該軍參謀長和一位旅長，是我們的同志。本月中旬曾派一位代表吉某來廣昌，跟我們連絡；準備伺機起義。我們已督促他迅速行動，幷允許他編爲一個軍團。最近該軍總指揮孫連仲，已前往南京，要過年後才能回來。他們（指廿六路軍的中共黨員）準備在過新年的時候，乘機起義。前幾天又派代表李某來連絡，據稱已得到另外一位非同志的旅長贊成參加，要求我們派兵策應。一切問題，都已商定。本擬派七軍開赴寧都，協同第四軍策應。所以調七軍先開來瑞金，再轉赴寧都。但昨晚接到四軍由廣昌發來電報，據云已派一個師，開赴寧都，準備于卅日開始向宜黃推進，卅

一晚到宜黃附近，並已與宜黃城內國軍同志取得密切連絡，無庸七軍協助。我剛才正和劍英同志研究，七軍趕赴寧都，廿九日可到達，時間尙足；但到寧都後，馬上又要向宜黃推進，不免過于疲勞。現宜黃策反工作旣已成熟，且有兩個旅爲基礎；四軍又願意單獨負責完成這一個任務，使全軍迫近宜黃策應，則兵力儘已足用，七軍可不必再赴寧都。但仍應在瑞金附近集中，以備必要時調動。」

葉劍英接着說：「我也認爲四軍全部，已足担任這一個任務，七軍可不必再出發，就在此間整訓。廿一師已編組完成，可即乘此期間命歸還七軍建制。龔同志應特別注意該師的整訓工作。」

談話至此，他們見我有點疲勞，且知我夜來行軍尙未得休息，便就讓我回部了。

一九三二年一月三日的早上，朱總司令打了一個電話給我，語氣非常興奮：「廿六路軍起義，已順利的成功了。四軍昨天已進出宜黃東北地區，掩護起義軍隊整理，幷準備於今天開始南下，移駐寧都，宜黃縣城，暫由四軍接駐。今晚中央召開會議，討論對該軍處置問

題，另有通知給你，晚上便知詳細情形了。」是日午後二時，我接到通知「本日下午八時，在中央政治局開會，請按時出席。」中央政治局辦公室，距我駐地不遠，我於晚餐後前往出席。會議廳是在一間民房的樓上，長方形的大廳，四張方檯連接的擺在廳的中央。枱面鋪上一塊白布，周圍擺着日字形的木櫈；廳之一端，擺了一張日字枱，放置着茶具，另一端掛了一幅中國地圖；廳中的會議枱上面，掛着一個大的洋油吊燈，照耀着全屋，雖不十分光亮，但比我們軍部掛一隻馬燈要明亮得多，這就是一個重要會議廳的佈置。我走到樓上時，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正坐在會議廳的枱旁談話；我先向他們敬了禮，他們兩人都站起來；毛澤東笑容滿面的走前來和我握手。我到中央蘇區來還是第一次和他會面。我注意看他的臉色，隔了三年多的毛澤東，嘴角的笑容掩蓋不了臉上的憔悴。這當是三年來的艱苦鬥爭生活，給予他的影响吧！我心裡在想着，他握着我的手不放，很熱情的先開口說：「你健康好嗎？」我答他：「我好，祝你健康。」他接着說：「多年不見了，我們革命同志，經過了幾年的鬥爭，今天尚能再見，眞是不容易的事呢！哈哈。」他又面向張聞天說：「龔楚同志是

我們井崗山鬥爭的老同志呢！」張聞天接着說；「我早知道了。我和龔同志談過了一個宵。」這時周恩來已上來，他祇向大家點點頭，那副冷酷的臉孔，可比較平昔溫和。毛澤東斜眼望他一下，又望望我。好似有點不自然的情形。接連着項英，彭德懷，朱德，林彪，鄧發均到來。朱德隨卽介紹我和彭德懷見面，這是「彭德懷同志」，這是「龔楚同志」，我與彭又握握手。林彪很有禮貌的走過來和我握手，「你好嗎？你還是往年那樣年輕呢！」我先說：「祝你好！」他說話時很興奮。我觀察他的態度，還是和往年一樣的靜默（那時林彪還是在紅四軍任師長）。忽聽周恩來叫着：「請大家坐下，開會了。」各人便紛紛入座。周恩來坐在主席位上，張聞天在左，毛澤東在右，朱德，我，彭德懷，連坐在一起，先由周恩來站起來報告，畧云：「駐宜黃的國軍廿六路軍的孫連仲部，由本黨同志該軍參謀長趙博生，旅長董振堂的策動，說動了警衞旅長季振同，于一月一日晚上起義，共經過情形是：

先由趙同志借春宴之名，請全軍團長以上的軍官飲酒，乘機將全體軍官拘留。同時由董振堂同志及季振同同志，集合全軍官兵，監視着全軍的部隊，宣佈參加紅軍革命。如不願共

同行動者，無論官兵，均可放下武器，自由離去。當時除少數官佐離去外，百分之九十五的官兵，均願參加紅軍。被拘留之高級軍官，亦任其自由離去。現起義官兵共有二萬餘人，械彈極多，已由第四軍掩護該軍開來寧都整理，這是該軍起義的情形。關於該軍的初期處置，已令改編爲紅軍第五軍團，以季振同爲總指揮，趙博生爲參謀長。但要如何保障這個勝利的果實，是我們今天要決定的問題！請各位提供意見。」

軍事委員會主席項英站起來說；「關於該軍的編組、人事、和整理問題，軍事委員會曾經研究，幷提出以下意見：

一，依照紅軍現行編制整編，按照現有人數，分編爲十三，十四兩個軍。

二，以趙博生同志兼十三軍軍長，以董振堂同志爲十四軍軍長，確實掌握部隊。其餘各級軍事幹部，目前仍由該軍舊幹部遴選充任，以後再繼續調整。

三，派蕭勁光同志爲該軍團政治委員，劉伯堅爲該軍團政治部主任。其他各級政治委員與政治部主任，由現有紅軍中遴選優秀政治幹部調任，迅速展開該軍團政治工作。

四，對該軍團之動搖份子，應迅速調整，由蕭勁光，劉伯堅會同趙博生，董振堂負責辦理。

項英報告完畢後，幷交出書面提案。周恩來對于蕭勁光爲政委的問題，曾再三考慮，且問張聞天對蕭勁光的印象如何。張聞天表示同意；幷說，「他在莫斯科學習時，成績不差。能力足以担負這一任務；不過小資產階級意識稍强一點」。毛澤東接着贊成這一建議，幷說明該軍是國民黨的部隊，若不派一位學識能力相當的幹部，去負起責任，恐怕不能取得該軍官兵的信任。關於以劉伯堅任政治部主任，甚爲適當。劉同志過去曾任馮玉祥總政治部主任，與該軍有歷史關係。毛說過後，大家沒有異議。周恩來提出，關於其餘各級政治工作人選問題，請總政治部迅速從四，五，七軍及政治部同志中，立卽遴選派去；俾能迅速開展該軍政治工作。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當卽要求我們各軍負責人回去，立時辦理，兩天內將名送單交總政治部。

我當時提出關於人事調整工作，不要操之過急，以免引起該軍官兵的不安心理；幷應注

意到如何從精神上和物質上，鼓舞該軍士氣。大家同意於我這個意見！并決定先以三萬元犒賞官兵。林彪提議：爲了保障這一勝利果實，對于該軍政治控制工作，應馬上展開。請國家政治保衞局迅速計劃、并展開工作。毛澤東聽了之後，卽對周恩來說：「林彪同志很進步呢！是不是？」周恩來微笑點頭。以後王稼祥提出兩個提案：

一，立卽發動蘇區各地的勞軍運動，并在寧都舉行歡迎大會，以鼓勵該軍士氣，擴大這一政治影響。

二，由黨政軍高級幹部在瑞金開會歡迎季振同，并通知各地政府在其經過之地，均舉行歡迎會，以堅定其意志。

這兩案全體同意，并請總政治部會同蘇維埃政府立卽發動。

會議經過了三小時才結束。我走的時候，毛澤東拉着我說：「襲楚同志，你在這三年多來，做了很多工作，而且負了重傷，我想找一個時間，和你談談，好嗎？」我說：「請主席約定時間，在未出發以前，隨時我都可來。」他聽了後，說：「好！我過日通知你。」

會議後的第三天，第五軍團後方辦事處便在瑞金成立，剩餘的各種械彈軍品，動員了很多人員由寧都搬運到瑞金，蘇區黨政軍人員，皆大歡喜。

在一個天氣晴朗的中午，蘇區黨政軍高級人員均在中央政府禮堂聚集，歡迎起義歸來的高級將領；季振同，趙博生，董振堂及其隨從衛士，騎着二十多匹高頭駿馬，來到中央政府的門前下馬，在熱烈的掌聲中，進入大禮堂。那時季振同春風滿面，喜氣洋溢，在酬酢時不時發出笑聲。他是個短小精悍的身材，穿着新製成的淺藍色列寧裝（注一）棉軍服，態度很活潑。趙博生長瘦的身型，棕黃的臉色，目光非常銳利，態度肅穆，一望而知是燕趙出生的男兒。穿的是套舊棉軍服，說話聲音幷不宏亮。董振堂是個胖胖的中等身材，講話遲緩，發音聲低，穿着半新的呢絨軍服。趙，董兩個人較季振同態度比較含蓄些，在沉默中，帶着愉快的微笑。

開會的程序是：鳴炮，奏樂，唱國際歌，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致開會歡迎詞，紅軍總司令接着致歡迎詞。他們說的都是贊揚，勗勉，鼓勵的話。最後，由起義的第五軍團總指揮

季振同致答詞，他說「今後服從共產黨，服從主席及總司令的命令，為中國革命奮鬥。幷向主席總司令致敬」。他說話時很費力，很小聲，面紅耳赤，很不自然。說完話後，大家報以熱烈的掌聲。他便在掌聲中步下演講台，漸漸的恢復了常態。接着大衆高呼「共產黨萬歲」，「蘇維埃政府萬歲」，「紅軍萬歲」，「第五軍團萬歲」等口號。

會後，朱德在紅軍總部設了三桌酒席歡宴他們。猪牛雞鴨，擺着滿枱，算是蘇區內最豐盛的酒席。我是陪客之一；在觥籌交錯中，談談笑笑，季振同非常愉快。餐後自由談天，我和季振同很談得來；因為我的軍部在瑞金近郊，季振同在餐後便很客氣的通知我，明天中午到七軍軍部拜訪我。

我在季振同來訪之先，集合了團級以上官佐，將軍部特務團作為儀仗隊歡迎嘉賓。季振同在正午十二時如約到達。見我集合部隊接他，很遠就下了馬，步行前來與我們握手。我引導他檢閱了儀仗隊，他很興奮的到了軍部，送了一枝新出廠的駁殼手槍給我作禮物。大約談了一小時，臨別前，還客氣的說：「龔同志！我們個性相同，一見如故。你是老革命，我是

新革命，一切望你多多指教」。說時非常誠懇。

這便是國軍二十六路軍叛國投入中共的一幕。由于二十六路軍的叛離，不僅壯大了紅軍的實力，提高了紅軍的士氣，和蘇區人民的革命情緒，而且破壞了國軍對蘇區的包圍圈，沉重地打擊了國軍的士氣，延緩了國軍積極籌劃的第四次圍剿。

## 三　利用抗日來壯大自己

在日本軍閥的處心積慮下，一九三一年的九月十八日，日軍進攻瀋陽，開始侵佔我們的東三省，翌年一月二十八日，又進攻上海，與駐在上海國軍第十九路軍，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瑞金的中共中央，接到上海中共辦事處的急電，認爲這是一個最好發展的機會，立即召集一個緊急會議。決定：

一，政治決議案內容。

1本黨堅持抗日救國主張，號召全國人民聯合抗日，促成國民黨的抗日行動，以解除國

軍對蘇區繼續圍剿的威脅。

2 把握抗日時機，爭取合法地位，和公開活動。在抗日過程中，壯大自己。

3 立即通令本黨全國各地組織，利用各階層人民，特別是工人與學生的反日情緒，在全國各城市組織人民抗日救國會，督促國民黨政府，擴大抗日戰爭。本黨對這種民衆組織，必須取得領導地位，以實現本黨的抗日主張。

二，軍事決議案內容

1 以抗日爲號召，發動蘇區工農參軍，首先充實紅軍。將現有組織的實力，繼續擴大紅軍組織。

2 蘇區紅軍應立即集中行動，提出「打通抗日之路」的口號，攻打大城市。

3 江西蘇區紅軍，應首先攻下贛州。使贛江西岸蘇區，與東岸蘇區，連成一片。

當紅軍正在準備集中時，又接到各地的情報，圍攻蘇區的國軍，已大部調往南昌或上海集中。且知道贛州守軍僅雲南部隊之馬昆一個旅，轄有三個步兵團。它的武器，祇有重機關

槍和步槍，沒有礮兵，素爲國軍所歧視的雜牌軍隊。但該旅駐贛州已有多年，軍官們都有眷屬住在贛州，其中且不少是和贛州本地女人結婚。因此他們與當地紳商，連成一氣。該旅旅長馬昆是雲南講武堂畢業，與紅十二軍軍長羅炳輝，是同期同班的同學，且都是雲南人。在羅炳輝未參加紅軍以前，他們兩人時相過從，感情很好。因此該旅情形，紅軍參謀部知之甚詳，認爲是不堪一擊的。中共領袖聞訊，更是歡喜若狂，認爲眞是日本軍閥幫了大忙，恰巧可以坐取漁人之利。因立卽召開軍事會議，在討論全盤戰畧的時候，曾發生了爭論：周恩來及國際派的高級同志認爲現在已經到了兩條道路決擇的時期了，應該馬上和國民黨分個勝負，要就是革命的勝利的道路，不然就是殖民地道路。因此，在軍事上反對毛澤東的原則，提出了「禦敵於國門之外」「不以蘇維埃寸土讓給敵人」的口號。戰畧上：放棄運動戰，遊擊戰；轉用陣地戰，攻城戰，要堅守國土，以堡壘對抗堡壘。戰術上：反對集中兵力，誘敵深入，各個消滅敵人；轉用分兵出擊，兩個拳頭打人。毛澤東的主張仍是過去一套；戰畧上：避免陣地戰，速決戰，採取持久戰，運動戰，和游擊戰。戰術上：誘敵深入，堅壁清

野，集中優勢兵力，打擊敵人一部份，進行速戰速决；沒有勝利把握的仗不打，要打就要集中五倍至十倍於敵人的兵力，澈底乾淨的消滅敵人一部份。可是他的意見竟被周恩來等否决了。最後幷决定進攻贛州，紅軍的戰畧，便由守勢進攻，轉爲攻勢進攻；由運動戰轉爲陣地戰攻城戰。彭德懷在會議席上誇下海口，可在一星期內，攻下贛縣。當時的部署是：

1 三軍團爲主攻兵團，進攻贛縣縣城。

2 一軍團之第四軍，以主力進佔南康新城，（贛縣至大庾交通要點）截斷粵軍援贛通路，幷打擊援贛之廣東部隊。

3 第四軍派一個團，進出贛縣北之沙地，對吉安南昌方面警戒，並阻滯該方面向贛縣增援之敵。

4 五軍團爲總預備兵團，控制于贛縣附近之贛江東岸。

5 第十二軍仍駐長汀，相機奪取連縣，上杭。

這次會議與進攻贛縣部署的决定，是中共蘇區紅軍戰畧的大轉變。中共的軍事幹部，從

此便積極研究陣地戰與攻城戰的戰術與技術，造成了普遍的正規戰的學習高潮。

## 四　攻堅戰失敗了

贛縣縣城位於贛江西岸，東北西三面環水。紅軍由二月下旬自贛江上游渡江圍攻縣城，紅七軍担任自小南門迄東門贛江邊之綫，紅五軍担任西門至小南門連接之綫。

紅七軍先行掃盪了東門城外的國軍，佔領了城外街道。國軍三個團全部固守城墻，城墻厚約四十尺，東南門外有與贛江相連的護城溝，水深三尺以上。紅軍沒有攻堅武器，無法破壞城墻。東門外是一條正對城門的直街，在城上火力瞰射下，不能接近城邊，因此，我們的攻擊部隊，乃沿着街道兩旁商店，穿牆前進，直抵城下。我親自愼密偵察，決定由東門外右水側溝內水面之上，開挖坑道，爆炸城墻。幷從城外電燈廠，拆來大鐵板，遮蓋了溝面，進行坑道作業。惟因坑道底，須與溝水之平面平行；過低卽有水冒出。坑道內之上層，不足五尺，須以杉木支撐，提防崩潰，且因坑道內之高度，不足四尺，搬運泥土杉木，往返不便，

作業亦感困難，致工程進展極慢。經過六晝夜作業，坑道內端達到深入城墻約五尺，僅及墻的厚度五分之一。

這時，彭德懷命令于翌晨六時，施行爆炸，乘機攻城。當時我曾提供意見，必須待坑道深入城墻過半，爆炸方能收效，要求再以兩天時間進行作業。但彭德懷無學識，又好大喜功，堅持己見，拒絕接受我的建議。我也只好在已挖好的坑道內裝置炸藥，準備按時爆炸。并令十九師備好竹梯，趁爆炸之瞬刻爬城。可是爆炸的結果，僅將城牆外層炸崩約五十尺寬的面積，守城國軍經以沙包在城上構築側防工事，經過二小時的衝鋒戰鬥，我軍無法搶登城牆。且傷亡過百。於是又從新尋找新坑道口，再進行坑道作業。可是，同樣未完成作業，彭德懷又命爆炸，復歸失敗。而五軍方面，亦毫無成就。

當第一次爆炸攻城未能成功之後，紅軍一面繼續坑道作業，同時進行招降的政治攻勢。印了很多招降小傳單，用弓箭束縛射進城上，呼籲國軍官兵與紅軍合作抗日。晚間組織宣傳隊，在城邊高聲呼叫，進行對敵宣傳。并電請紅十二軍軍長羅炳輝，親來贛縣城邊致書守城

旅長馬昆，勸其來降，幷約他來城上面談。當時城內官兵，都極動搖，紳商聞此消息，深恐守軍投降，影響到他們的生命財產，乃以紳商經常隨從馬昆，勸他堅强抵抗；另由紳商輪流上城督戰；這一政治攻勢，依然歸於失放。

紅軍兩次炸城失敗，朱德偕參謀長葉劍英，親到贛縣前線視察。我帶着他們視察各爆炸口及巷戰設備，幷將經過情形面報；他們也認爲過去若能多以兩天時間，延長坑道，必可成功無疑。現在已成過去，應繼續偵察新坑道口，再進行坑道作業。

當時，葉劍英問我：「三軍團攻城部署的缺點，在什麼地方？敵人增援部隊到達時，可能出擊的地區，在那個方向？」我告訴他：五七兩軍接合部之小南門外高地，兵力配備薄弱，且無防禦工事設備。國軍若從城內挖坑道通出城外，攻佔我軍陣地，卽可截斷五軍的退路。但該地區在五軍戰鬥地境之內，我已通知彭德懷總指揮注意；可是仍不見其改善。現七軍重點置於左翼，也就是注意該地區的變化。

葉劍英認爲我的意見很對，要我特別注意。朱德偕葉劍英離開了前線第二天，偵察員卽

來報告：「贛縣北門昨夜已架設浮橋，由吉安南下增援之國軍，爲陳誠之十一師，羅卓英之十四師，該兩個師已在今晨過橋入城。」同日午後六時，又接到在贛縣北面沙地担任對南昌方面警戒之第四軍一個團的報告「國軍兩師，昨晚已通過沙地，向贛城增援，我軍因兵力薄弱，無法阻止，已向塘江撤退。」等語。

守城的國軍已增加了援軍，我們的總指揮部沒有新處置。我祇得密切注視着情况的變化。

第二天上午四時，天還未亮，西南門一帶响起了密集的槍聲；國軍發動的攻勢展開了。雖然本軍的陣地幷沒有發生戰鬥，但我急速將指揮所，移到小南門附近小高地，令廿師特別注意戒備。拂曉時，國軍兩個團，由小南門窪地，向五軍陣地猛攻，旋即佔領，幷向五軍退却部隊追擊。我即將已集結的五個團的兵力，向國軍側背攻擊，將國軍擊退，恢復第五軍已失的陣地。這時，彭德懷偕第五軍軍部已向南退却。我乃按第廿一師廿師的次序，陸續向南退却。我親自指揮十九師作掩護部隊，擊退了國軍的兩次攻擊。從容脫離戰場。

## 五 內鬨的一幕

贛縣之役，是紅軍應付國軍三次圍剿以來，最大的一次失敗！攻擊了半個月的時間，不但沒有攻克贛縣，反而遭受了損失。紅七軍傷亡指戰員百餘人，紅五軍傷亡最重，超過五百人以上的數字，且被國軍俘去師長一員，及指戰員二百餘人。紅四軍在新城擊退了粵軍獨立第二旅，傷亡極少，紅五軍團沒有參加戰鬥，撤回江口塘休息。

總司令部在長洛墟召開軍事會議，毛澤東，周恩來均親自趕來主持。參加者：周恩來，朱德，葉劍英，彭德懷，滕代遠，龔楚，鄧平，趙博生等；首先檢討攻贛戰役失敗的原因。

彭德懷首即指出：「龔楚同志領導第七軍，坑道作業不力，不能依照預定時間完成，兩次爆炸均未成功；致延誤了時間，而遭受失敗。」我即席批評這是他的主觀判斷，幷將彭德懷的錯誤，和戰役經過情形，作了一個詳實的報告。同時又重指出紅七軍未能依照預定時間，完成坑道作業，尤其是我自己應負的責任，個人决不推諉與轉嫁。

朱德站起來說明兩點：（1）我曾親到贛縣前線視察，發覺第七軍之坑道作業的工程浩大；且在敵軍火力控制之下，自較其他地區爲困難。彭同志如能親到第七軍前線觀察，那麼，我相信必不致在坑道作業未完成前，實施爆炸，致兩次爆炸均告失敗。因此，這一次失敗的責任，是不能單獨由龔同志担負。（2）第五軍西南方的坑道作業，施工較易，爲什麼不能將城牆炸垮？這責任是應該追究的！」

葉劍英繼續指出：「第五軍攻城部署有很多缺點，各攻擊據點，又沒有構築堅固的工事；尤其是夜間警戒太過疏忽，致敵軍出擊時，攻入師部才發覺，連師長也被俘虜去，這還成什麼話？」

彭德懷和鄧平在這樣的指責下，無法狡辯；兩人急得臉也變色了，態度非常不安。作爲會議主席的周恩來，看見會議快要鬧成僵局，不願意使彭德懷過於難堪，便站起來作總結報告，指出「這是一個攻城戰的血的教訓，各軍須分別召開幹部會議，詳細檢討，俾能澈底糾正錯誤。」至於彭德懷和我所負的失敗責任，並不提起，輕輕的一筆抹煞；向以冷酷無情著

稱的周恩來，今天却使得會議的氣氛逐漸緩和起來。

檢討會議結束之後，接着在瑞金召開軍事會議，討論紅軍的下一次行動。周恩來提出：贛州雖未攻下，但打通贛江東西兩面蘇區使能聯成一片的計劃，仍然是要貫澈進行。同時，應乘福建敵軍脆弱，進攻漳州、廈門，奪取出海口岸。因此，紅軍現時的戰畧，應以一部在贛江西岸地區活動，造成控制鄉村，包圍贛縣，截斷贛江交通，孤立贛縣的形勢；以後再伺機奪取贛縣縣城。另以一部向福建漳州進攻，準備奪取廈門海港。以一部留駐中央蘇區，對南北兩面之敵軍警戒，確保蘇區安全。當時毛澤東同意紅軍主力向東西兩面擴展的計劃，但反對過於分散兵力，他主張以三軍團（五、七兩軍）渡過贛江西岸活動，以一、五兩軍團向福建進攻，對於中央蘇區的警衛由地方武裝負責。可是毛澤東的意見爲周恩來等必須固守蘇區門戶，不讓敵人進入蘇區寸步的意見所反對。

經過了熱烈爭論之後，乃决定：

（1）第三軍團（第五軍，第七軍）渡過贛江西岸活動，恢復湘贛邊區永新，寧崗，遂

川，上猶，崇義各總老蘇區；幷向贛江邊吉安，泰和推進，與中央蘇區連成一片，造成控制贛江，包圍贛縣的形勢。

（2）第一軍團（第四軍，第十二軍）向福建漳州進攻，佔領漳州後向厦門進攻，奪取厦門海口。

（3）第五軍團在茅店，雩都之綫整訓，幷對贛縣，信豐方面警戒。

經過了攻贛戰役檢討會議，及軍事會議之後，中共高級幹部間之磨擦，便日漸加深。主要的是周恩來與毛澤東之間，因戰畧觀點的不同而發生磨擦。毛澤東以攻贛失敗的教訓來批評攻堅戰的錯誤，他更反對留五軍團守蘇區，不集中主力去攻漳州。他認爲將來進攻漳州亦有因分散兵力而遭受失敗的危險。（後來攻漳州時，果然是因兵力不足而失敗了。）其次是彭德懷與我之間，也因攻贛州之役，而存下了裂痕。因爲第五軍是彭德懷的本錢，在作戰時便處處爲保存自己的實力打算。進攻時的主攻方面要第七軍，撤退時的後衛掩護，也要第七軍。這次戰役檢討會議，使彭德懷幾乎下不了台，更懷恨在心。以後便吹毛求疵，釀成許多

不良的結果。

## 六　舉棋不定的軍事行動

紅軍第三軍團，於三月下旬，從贛縣北面之良口，渡過贛江，經南嶺坳，進入遂川上猶間之寺下墟，左安，營前，思順，古亭一帶活動。接着，佔領了上猶，崇義兩縣城，恢復了遂川，上猶，崇義三縣毗連地區的蘇維埃運動。

這一帶是國共兩軍鋸刀下的地區。三年前，紅軍在此地建立了蘇維埃政權，組織了赤衛隊，少先隊等民衆武力。迨紅軍退出爲國軍佔領後，蘇維埃政權便瓦解了。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赤衛隊，少先隊隊員，多半自動逃散。同時，國民黨又積極的組織了各地的自衛團，挨戶團之類的地方武裝。等到國軍敗退，紅軍再度佔領後；又恢復了蘇維埃政權，重新組織所有的民衆團體，又屠殺了一批地主階級的自衛團，挨戶團；就這樣的你來我去，屠殺繼續着屠殺，沒有休止。

我回到別了四年的老蘇區，我的良心實感不安。舊日的青年壯丁已很少見到了，滿眼是荒蕪的田畝，破壞的房舍。

遇到一個四年前認識的老農民，他提起歷年的苦況，泣不成聲。我也陪他流了一陣傷心之淚。「革命」的目的，難道就是這樣的嗎？

在這一階段，由于老蘇區農村的經濟全部破產，生產大大的萎縮，紅軍的補給，大受影響，經常以雜粮渡日。軍事方面，整個三軍團，祇有七軍曾攻下集龍墟，擊潰湘軍一個團，得到了一點械彈的補充，幷由上游攻佔塘江，鍾村，威脅贛縣。彭德懷的紅軍，毫無表現，心情也沒有過去那樣興奮了。

那時駐守贛縣的滇軍，和國軍部隊陳誠，羅卓英兩師均已他調，由粵軍余漢謀部接防。紅七軍進抵贛縣西南地區時，即與粵軍派出之小量出擊部隊遭遇，將其擊潰。待贛縣粵軍續派大部隊增援時，我即率隊退回鍾村。戰鬥結果，計俘虜粵軍三十七名，步槍三十四枝，輕機槍一挺，七軍亦被俘去副官一員，傷亡十餘人。

由鍾村轉移到楊眉寺的晚上（一九三二年六月尾），總指揮部即送來指示：「（一）我軍以消滅大庾，南雄之敵爲目的。一軍團已佔領信豐，向南雄推進；五軍團由王母渡向梅關急進，截斷大庾南雄間交通；三軍團應在南康附近，消滅贛縣南調敵軍之後，立即進攻大庾縣城。（二）七軍即由楊眉寺進出南康，截斷贛縣南下之敵，五軍由崇義進出新城，爾後五七兩軍，均向大庾推進。」

我接到這一個命令，覺得這一個戰略決策，是錯誤的。因爲粵軍自進駐贛縣以來，幷未進攻蘇區，也沒有向三軍團攻擊。這是證明粵軍尙無向我進攻的企圖，正是紅軍進行政治攻勢的機會。爲什麼紅軍不向北進？反要向南進攻？一個馬克思共產主義者，利用矛盾和製造矛盾，是進行政治鬥爭的唯一法寶。爲什麼還要投身在敵人的矛眉之中，多樹敵人呢？這一決策，令我感到惶惑不安。但命令是要服從的，祇好立即準備明晨拂曉前的行動。

晨起我率領紅七軍順利進攻南康，知道贛縣的粵軍已全部通過南康，向大庾急進；我即率部啣尾追擊，在新城附近打擊其後衛部隊，幷與總指揮部及第五軍會合。

七軍指戰員，在一日之內步行一百華里，遭過兩次戰鬥，指戰員均疲憊不堪，僅休息了五小時，又在夜間接到命令向黃龍墟急進，攻畧大庾。指揮員們從睡夢中喚醒，整頓行裝，在黑夜中搜索着向大庾前進。由拂曉攻擊到黃昏，已迫近大庾城邊。紅軍第五軍團，已佔領梅關，粵軍被迫固守大庾。

大庾守軍，是粵軍第一軍軍部及第一師，兵力相當强大。經一晝夜的戰鬥，仍未攻下。七軍即奉令繞道遊仙墟，轉出鄧坊，增援紅四軍在南雄水口墟與粵軍第二師及獨立第三師之戰鬥。本軍僅展開兩個師加入戰鬭，即將敵軍擊潰。戰鬥結束後，奉令在新田墟停止待命。是晚總司令部在鄔逕宿營，接獲贛縣情報：「國軍于粵軍撤退大庾時，已進駐贛縣縣城；現有向信豐及池江前進，攻擊紅軍側背企圖」。總司令部决將各軍撤回信豐鄠都之線。紅七軍奉令撤回信豐以南之鐵石墟，安息墟一帶組訓民衆，經過了半個月的時間，於七月下旬又奉令調回與國縣城，集中整訓。

這一階段中的戰畧，一時南進，一時北進；舉棋不定，使得紅軍遭受了許多不必要的損

失。而紅七軍在這一舉棋不定的戰略運動中，因彭德懷總指揮的過份自私，使紅七軍疲于奔命。指戰員們對彭德懷的這種作風，都表不滿；肉體與精神都大受刺激。所幸全軍上下融洽，士氣尚無影響。

總政治部爲加强七軍政治工作，特將葉季壯同志調任七軍政治部主任。葉季壯是七軍老同志，各部情形都很明瞭，與各指戰員有深厚的感情，他重返七軍，對我的幫助很大。

## 七　三分軍事七分政治

「一二八」中日戰爭，國民政府採取了妥協政策，在一九三二年五月和日本簽訂和平協定，上海中日戰爭，因以和平解決，於是又積極進行第四次圍剿蘇區的準備。他們體察過去三次失敗的教訓：（一）忽視了政治攻勢，使蘇區人民不爲國軍所用。（二）蘇區內及環繞蘇區地帶，交通不便；國軍深入後，補給運輸困難，影響進剿軍事不能持久。（三）各路進剿軍的行動，不能配合一致，被共軍各個擊破。（四）中共雖缺乏重武器，不能攻堅，但共

攻擊精神旺盛，利於野戰。根據這幾項見解，他們便定出了「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政略；及「步步為營，碉堡進攻」的戰略；實行對全國各地蘇區進行全面的進攻。這就是國民對黨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其計劃大略如下：

甲、政治部署

一、組織隨軍政治工作隊，隨進剿軍行動，負宣傳，情報，策反，及組織鄉村保甲四大任務。

二、散發投降傳單，勸告蘇區人民及紅軍自新。

三、禁止屠殺蘇區人民及焚燒屋宇，并策動人民協助國軍，對紅軍作戰。

四、進攻蘇區的各主要據点，須建築公路，并隨軍事進展，繼續延伸，以利交通運輸。

五、對蘇區嚴密封鎖，以斷絕紅軍的物資來源。

乙、軍事部署

一、以何應欽為閩粵贛三省剿匪總司令。劉峙，王均，何成濬，分任前敵總指揮。

二、以廣東陳濟棠之第一軍余漢謀部，第三軍李揚敬部，由西南面進攻，先行鞏固贛縣，信豐，安遠，尋鄔，武平各縣相連之線各據點。

三、中央軍由東北兩面進攻。先行鞏固福建之建寧，寧化，淸流，連城各縣相連之線各據點；及江西之黎川，南城，宜黃，永豐，吉安，泰和，萬安各縣相連之線各據點。

四、以衞立煌爲鄂豫皖區（註一）剿匪總司令。

五、以徐源泉爲洪湖區（註二）剿匪總司令。

這份最機密的作戰部署命令，是由南京軍事委員會用無線電所發出的。這最機密的作戰計劃，同樣由紅軍總司令部偵察電台窃收了一份，經過紅軍中精明的密碼專家迅速的偵譯，全部機密便完全洩漏了。

## 八　以寡勝衆的李西趙戰役

紅軍高級將領洞悉了國軍第四次圍剿蘇區的作戰計劃，立即召開緊急會議，商討打破國軍圍剿的對策，再準備一次大規模會戰，來迎擊國軍的部隊。

當時紅軍總司令部的情況判斷：兩廣的軍政領袖，正在聯合反對南京政府，所以廣東入贛入閩之一，三兩軍，必無積極進攻蘇區的行動；福建方面兵力薄弱，不足爲慮。其主要之敵人，爲北面之中央軍，紅軍決集中一，三，五軍團主力北上，在國軍還沒有積極向蘇區進剿之前，採取主動的攻勢。先攻破黎川，南豐，然後會攻南城，再奪撫州，突破其北面封鎖線；以第十二軍担任對福建方面警戒，江西各獨立團對贛縣，安遠，尋鄔方面警戒。

這一戰畧原則確定後，便以第四軍（此時四軍軍長已由林彪升任）進攻南豐；第三軍團進攻黎川，第五軍團爲預備兵團，控置於寧都。

第七軍爲攻黎川的先頭部隊，於八月中旬由興國出發，經寧都，廣昌，向黎川前進。這時國軍主力還沒有趕到，僅一個團固守，故僅經三小時戰鬥即佔領了黎川縣城。紅四軍亦順利克復南豐。第一期的軍事任務，已勝利完成。國軍的飛機，雖經三度轟炸，但紅軍傷亡極

少。

十月上旬，紅七軍奉命與第四軍攻南城，由朱德親自指揮。于展開攻擊後，才發覺南城外圍築有十餘座堅固的碉堡；副防禦障碍物之設備，重重叠叠。我親自到接近敵軍碉堡線之陣地偵察，也覺得無隙可乘。便將國軍防禦配備情形，繪具畧圖，呈報朱德。朱德和彭德懷也親到我的前線陣地偵察，均認爲攻擊不易，放棄攻城計劃，全部撤返硝石，黎川，南豐一帶，集結待機。

紅軍的情報工作，一向是很靈敏確實的。由撫州南下增防南城的國軍的行動，預先爲紅軍所偵悉。對于他們所必須經過的路線，也知道得清清楚楚。紅軍便決定將運動中的國軍殲滅，幷乘機奪取撫州。

這次由撫州南下的國軍爲李雲杰，毛炳文，許克祥三個師，實力頗爲雄厚。紅軍第三軍團的任務，是在南城東北的李西趙地區，伏擊南下的國軍；第四軍及第五軍團的任務，是在佔領滸灣後，直撲撫州。各兵團在運動時，保持着高度的秘密，與紅軍總部的連絡是以無線

電爲主。朱德則親隨第四軍行動，直接指揮進攻撫州。

每次分配給第三軍團的任務，其重要而最危險的作戰任務，總是屬于第七軍的。這次也不能例外。第七軍奉命爲伏擊兵團，按照規定時間，展開埋伏于李西趙東北山地。

五軍是彭德懷的老本錢，控置于李西趙以東之山口，軍團總指揮彭德懷，自然在第五軍的位置。

第七軍全體指戰員，從拂曉到正午，餓着肚子埋伏在李西趙東北山地，眼睜睜的等待着國軍的通過。到下午一時，國軍的部隊，沿撫州南城間的大道前進。其先頭部隊到達李西趙時，總指揮即發出攻擊開始的信號，我也跟着下令攻擊。各部隊立即向其當面行動中之國軍衝鋒，迅速的解决了國軍一個團以上的部隊。七軍十九師師長李顯就在衝鋒中，負了重傷。國軍遭到意外的伏擊，也迅即展開，佔領李西趙西北端高地，其後續部隊，繼續加入戰鬥。

七軍與二倍以上之國軍苦戰到下午四時，五軍才派一個師來增援。七軍連續攻下國軍四

個陣地，俘虜官兵甚多。時已黃昏，還繼續進攻國軍最後一個山地。但因經過半日的激戰，各部隊建制已經混亂，且夜間連絡不易，到晚上九時，還沒有將國軍的最後陣地攻下。

彭德懷這時以電話詢問前方情況，我便將當時情形報告。他再問我：「當面的敵人戰地，經過四小時的攻擊，還不能攻下，是不是固守待援？據俘虜的口供，與我作戰的敵人，確係三個師，被我消滅了五分之二，南城的敵人可能增援，但必須在明晨方能集結向我反攻，你的意見怎麼樣？」我告訴他：「（一）當面的敵人，是不是固守待援？現在還不知道，要等偵察之後才可判斷。（二）敵軍增援的可能性很少，但我軍如不撤退，應在本晚解決當面之敵。（三）本軍除一部繼續攻擊外，正在連絡集結中，最好由五軍派一個師參加攻擊，收效較易。」彭德懷遲疑了一會，通知我：「為了保持勝利的果實，今晚應全部撤回來路之山地內，假使到十二點鐘，還不能攻下敵人的最後據點，請你即刻撤退！」我說：「要撤退的話，請你補個命令來好了。」彭德懷在電話中答道：「說了就是，何必這麼認真！我的電話命令就行了。」誰知這正是彭德懷預先安排的詭計呢！

攻擊到午夜十二點鐘了，國軍固守的最後陣地，還沒有攻下。我便依照彭德懷的命令，放棄攻擊，向山地內轉移，留下二十師五十八團繼續監視國軍。待第七軍主力轉移陣地後國軍卽乘夜撤退，五十八團啣尾追擊了十多里路，因不明敵情，恐遭伏擊，便撤回來了。

李西趙戰役，七軍得到輝煌的戰果，俘虜國軍一千五百餘人，給予國軍的傷亡也很慘重。然而七軍也付出很大的犧牲，指戰員傷亡了一百四十餘人，第十九師師長李顯重傷不治斃命，喪失了我一個英勇的同志。五軍僅在激戰三小時後，才派出一個師加入戰鬥，繳獲甚少。戰鬥結束後，本軍調回硝石整理，知道朱德親率第一軍團攻擊滸灣的戰鬥，也已獲勝。殲滅了國軍大部，但因爲撫州有國軍重兵固守，便放棄進攻撫州計劃，回駐南豐，黎川。

在黎川附近召開的軍事會議，主要的是檢討滸灣與李西趙戰鬥的優點與過失。出席的有俄顧問李特，周恩來，朱德，彭德懷，聶楚，趙博生，董振堂，鄧平，與新升任軍長的林彪。（李振同已被軟禁，未來前方）

首先由朱德報告滸灣戰鬥經過，「第四軍各部隊在攻擊時，展開迅速，并能同時使用優

勢兵力。將敵擊潰；五軍團增援作戰，動作迅速，且能機動地攻擊敵人側背，收到了很好的戰果。」

接着由彭德懷報告李西趙戰役經過情形：「李西趙戰役，使用了第七軍全部，和五軍一個師；敵軍是李雲杰，毛炳文，許克祥三個師。七軍在最初攻擊時動作很迅速，戰鬥剛開始，便解决了敵軍一個團。但我軍佔領陣地後，不能乘敵陣地未固，即行强烈攻擊，致敵軍有構築臨時工事的時間；且因攻擊不力，致到午夜前沒有將最後一個陣地攻下。龔楚同志是最前線的指揮員，報告敵情不實，影响指揮官對敵情判斷的錯誤，致沒有將敵人全部殲滅，讓他們乘夜逃去。還有一點是五十八團在戰鬥中動作遲緩，也是一項必須追究的過失。」

彭德懷這一席話，完全是對我而發的，他將沒有全部殲滅敵人和自己判斷錯誤的責任，加在我的身上，想藉這機會給予我一個打擊。出席會議的人們聽了他的話，都集中視線到我的身上，等待我的答辯。朱德望了我一眼：「情形到底怎麼樣？龔同志，你自己詳細說吧！」他這句話和這個眼色，似在為我聲援！意思是「不要怕得罪了人，我幷不相信彭德懷

的話呢！」

於是我站起來，將戰役的經過情形詳細說明，幷且指出：「整個戰鬥過程中，全軍團兵力沒有同時展開作戰，是這次沒有全殲敵人的最大原因。假如要追究責任的話，這責任要向誰追究呢？七軍在戰鬥時，犧牲了十九師師長李顯，和一百四十多個指戰員，並生俘了一千五百多敵人，和很多械彈，試問，五軍的戰績如何呢？至於五十八團戰鬥行動遲緩，這是事實，該團長黃冕昌和我都應該負責；但是，當時由於軍部進展過速，電話網沒有構成，致該團脫離了掌握。不過該團距離總指揮部不遠，彭總指揮已有所見，爲什麼不直接指揮呢？」這兩個反問，問得彭德懷漲紅着臉，瞠目不言。

李特問我：「給予五十八團的任務是什麼？」我告訴他：「戰鬥初期，該團是本軍伏擊部署最左翼的伏擊隊，當敵軍後續部隊佔領一帶連接的山地，構成了抵抗陣地後，敵軍的兵力和地形，均比我優勢；我軍因經過了一次廣大正面的激烈衝鋒戰鬥，且須立即清理戰場，處置俘虜，運送傷兵，搬運勝利品等工作；致建制紛亂，不能不重新調整部署。因敵軍陣地

正面是廣闊的田洞，從正面攻擊，不易接近。而我的攻擊部署，是以五十八團爲箝制隊，向敵正面進攻；全軍主力迂廻至敵軍陣地右側，向敵包圍攻擊。軍的指揮所，亦移向主攻方面，以致該團一時脫離掌握，而指揮不靈。」他聽了我的詳細敍述，點頭認爲滿意。

至是全場靜默，大家都不作聲。最後還是由周恩來出來做結論：（一）李西趙戰鬥，在敵我兵力對比上，敵軍佔極大優勢，我軍不能同時使用所有兵力，給敵人有佔領陣地起而抵抗的時間，是一個最大的錯誤。這一錯誤．彭龔兩同志都要負責。（二）關於龔同志報告不實一點，這是彭同志誤會所致；不會有不實之處。（三）五十八團戰鬥動作不積極，龔同志及該師師長黃子榮要負責任；因爲戰場指揮員必須切實掌握部屬，才能適時適切的運用。」一塲彭龔之爭的僵局，就因爲周恩來用這種各打五十板的手法，輕易地結束了。不過，從此彭德懷對我是更加懷恨與不滿。

散會後已是深夜十二時。我和林彪同住在一間房裡，林對我說：「革命隊伍裡，仍有賞罰不明，功罪不分的事情，眞是奇怪。今晚周恩來的結論，明時是袒護老彭，我不明白，他

是黨的最高領導者！贛州作戰檢討會，和今晚的李西趙檢討，都顧全老彭的面子，眞是豈有此理！」他爲我發出不平之鳴！

會議過去了數天。十一月初旬，我的調職命令來了。朱德召我到總司令部去，他向我懇切的解釋：「你不應該與彭德懷鬧意見，因爲彭德懷同毛澤東是一鼻孔出氣的。這次黨中央對你幷無處分，而且連黃冕昌也不加處分，都是爲了平息七軍指戰員的不平之氣。既然這樣，你再無法在第三軍團工作，祗好調你到上級幹部訓練隊去當副隊長，藉此休息一個短時間。同時可以學習學習，使理論與經驗融合起來。你看好不好？」我便告訴他：「我正希望有一個機會多學習些革命的理論，和軍事的學識；當了副隊長便阻礙了學習的時間，我願意當一個學員！」他馬上答應，卽提筆寫了封介紹信給我。（紅軍中的重要人事調動和部署，幷不一定要由參謀擬稿，書記繕寫，校對，監印和收發這一連串手續的；大都由指揮員和政治委員寫一個字條便行了。有時一張極粗劣的紙上便是一個最重要的計劃，或是人事調動的命令。）這樣，我便立卽離開了紅七軍，到瑞金的紅軍學校裡去，開始另一種學習的生活。

## 附註

註一：鄂豫皖區——鄂東，豫南，皖西三個地區，在國共分家前就有中共鄂東特委，豫南特委，皖西特委的秘密組織。自一九二七年中共「八七」會議後，策動秋收暴動，黃陂，黃安等地的農民武裝便漸漸發展起來，三個地區均各成立一個師的紅軍。到一九三〇年，這三個地區聯成一片，稱爲鄂豫皖區。三個師的紅軍也集合起來，成立紅一軍，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派徐向前爲總指揮。這支紅軍後來發展爲四方面軍，并派張國燾負責該區黨政軍之領導。

註二：洪湖區——洪湖位于湖北省南部的長江北岸，環湖縣分如監利，石首等地都有農民運動的基礎。秋收暴動後，這一區的農民武裝逐漸擴大起來，到一九三〇年初已發展到一萬多人，成立了紅六軍，由段德昌任軍長。賀龍自潮汕失敗後，逃回他的老巢湘鄂西部的楨桑，鶴峯一帶，拿他的妹妹賀三姑所領導的土匪爲基本，發動農民鬥爭，建立了紅二軍。至一九三〇年，賀龍率紅二軍至洪湖區與紅六軍會合，成立紅軍第二軍團。

# 第十一章　學習期間的認識

## 一　高級幹部的訓練

中共軍事幹部的正規訓練，在紅軍學校成立後才正式開始。但紅軍學校是訓練紅軍的下級幹部，到一九三二年九月，又成立「上級幹部訓練隊」，訓練中上級軍事政治幹部。

這個教育單位的學員，是由各部隊機關中，抽調團級以上軍事幹部集合編成，目的在提高幹部的戰術修養，與共產主義的理論。全隊學員一百二十人，由第五軍團調來一位姓李的非共黨員當隊長，因爲他是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學生，戰術修養很好，所以隊長一席，便由他來担任。

上級幹部訓練隊的訓練時間是三個月；當我由第七軍離職後參加訓練時，全部課程已完成了三分之二，所以我個人僅受訓了一個月的時間。

在上級幹部隊裏面，有共產黨的支部組織，隸屬於紅軍學校的共黨委員會。支部之下，分編九個小組，教官與學員混合編組。每月開支部黨員大會一次，主要的是包括國際形勢，國內形勢，本黨的政策，紅軍的任務……等內容的政治報告。每星期有一次小組會議，除了討論上級發下的政治文件外，更注重各個人的生活檢討與批評。因爲全體學員都是黨員，且在訓練期間過着一定的學習生活，沒有對外的羣衆工作對象，黨的生活表現着鬆懈和枯燥無味，反比不上在紅軍中那樣的積極和緊張。但討論問題時，發言辯論的精神却很積極；往往超過開會時間。這是因爲所有的黨員，除少數什役同志外，最大多數都是高級幹部之故。

我們的軍事學科教材，是蘇聯步兵操典第二部，以講授，作業與野外演習的方式實施。政治教育，是用討論方式，由紅軍學校發下研究材料，交學員分組討論，每組臨時推定組長作結論，總結研究的所得。這種自發式的互相磋磨，容易引起研究者的興趣，收效很大。

每天早晨六點鐘的時候，我們便起床了。一個鐘頭的早操過去，便是每日八小時的學習時間開始。晚上還要召開學習生活檢討會，時事討論會……每一週的晚上，又有晚會（紅校

全體），有各種的歌唱，演奏，幻術等游藝節目。隊裏起居清潔，營房整頓，統由學員自己處理。與紅校各隊之間，並有內務比賽——包括了清潔，衛生，武器保管等內務比賽，每星期日由員生共同組織的檢査隊檢査後發表。

每週週末，出一期壁報，由學員中推選出來壁報委員會負責主持的，廣泛的發動學員投稿，每一個學員都能利用這一個園地，自由地發抒對黨的理論的創見，學習的心得，教育的意見，生活的建議等；使這個園地，成為同志間經驗與意見交流的場所。

我們的給養，比較紅軍的指戰員及黨政機關都要好些。每週有一次肉食，每日雖全是青菜、豆芽、豆腐之類，但已足夠營養，在國軍地方團隊碉堡重重封鎖下的蘇區，一般紅軍及人民的生活，均陷於極端艱苦的情形下，有這樣的生活，大家都很滿足了。

生活，敎育，完全採取暗示式，發動學員自動遵守紀律的精神，幷以生活檢討為補助。我當時感到這樣自己維持紀律的辦法，非常進步；自然而然的養成了學員遵守紀律，約束自己的生活習慣。

從上海到蘇區一年多來，每天過着緊張的戰鬥生活，一旦擺脫了責任與職務，與同學們過着輕鬆的生活，彷彿覺得自己年青了許多，精神非常愉快。

在我們結業的時候，中共便決定將上級幹部訓練隊，由第二期起，專門訓練軍事幹部，另成立一個政治營，訓練政治幹部；仍隸屬於紅軍學校編組之內，并調我為政治營營長。

## 二　政治營中的生活

政治營是培養紅軍中上級政治幹部的教育機關，學生都是紅軍中的連政委，團政委，及各級政治部科長，幹事，地方黨務的中級幹部。共有學生三百六十人，分編為三個連。為適應當時的事實需要，訓練期間，定為三個月。（但因需要幹部，僅訓練兩個月就提前結業）。

教育的目的，完全在造就政治工作人才，故軍事學科僅佔全部教程的百分之三十。主要的課程為軍隊黨務，軍隊政治工作的實施，對官兵政治教育，對民衆政治工作，對敵軍政治

工作，對俘虜政治工作……等。

因爲學生中，大都是沒有受過嚴格軍事教育的知識份子，和工農出身的優秀幹部。爲了養成他們軍隊生活的習慣，採取了軍事管理。但仍以自發自動的遵守紀律爲原則，而以開展生活批評爲執行紀律的主要方法。教育方式避免枯燥的課室教授，減少課堂講授時間，大多採用作業，討論，問答等方法實施。

「做禮拜六」是中共仿效蘇聯的辦法。每逢星期六下午，所有黨政機關各級工作人員及紅軍指戰員，都替人民做兩小時無代價的勞動工作。這種制度稱爲「做禮拜六」。這一時期「做禮拜六」的制度正在蘇區開展。開始發動的時候，蘇區內的工作人員無不踴躍參加，我們政治營的員生，當然不能例外。爲了響應中共的號召，全營員生分編爲四十個小組，於星期六下午，由各組組長率領到農村中去，直接找到人民家裏，幫助人民做工。所做的事情，大致是砍柴、割草、扒松毛、挑水、做米、種田……等，不受人民任何的招待和代價。初時人民見到我們是官長和學生，不敢給我們工作做，經過了解釋後，才給我們做點輕工，如搬

運柴草，清潔地方等事；我們做完工，就集體回去。等到逐漸習慣後，人民就不再客氣了。因爲蘇區的人力已感到缺乏，所以我們到達時，各家各戶的男婦老幼都搶着帶我們去做工。我曾做過整菜地、扒松毛、做米、修路等工作。做工的時候，大家都有說有笑，歡天喜地。我們也利用了這種機會，來進行民衆宣傳工作，使教育與民衆工作聯系起來。我幷利用這一機會調查蘇區農村情形和人民對中共，對蘇維埃政府的觀感。因爲人民和我們已沒有隔閡，他們或她們心裡的事情，往往無保留的坦白說出來。一般的說，對蘇維埃政府全不瞭解，他們所知道的是：共產黨的政府就是「毛主席」的政府。他們時時顧慮「白鬼子」（指國軍）來，因聞剿時要殺人燒房子。他們又感覺負担不起各種慰勞的捐欵捐食物，且不滿意共產黨限制糧食數量及收購的辦法；更有很多人不滿意蘇維埃政府的地方幹部那種兇狠行爲，嚴禁無故不許過村探親留宿的辦法。其中有一個婦人告訴我，政府要她做兩對布鞋勞軍，既沒有布又沒有錢，迫得回到娘家去借布借錢，適天黑又下傾盆大雨，便在娘家住了一宵，因此被政府扣留了兩日。說時還不斷的流下淚來。在這一個短期的調查訪問中，使我對蘇區的人民

生活和人民對共產黨革命的觀感，有了更淸楚的瞭解。

紅軍學校在這一期間，發動了各種比賽運動。計有：成績、生活、紀律、演講、壁報、射擊、衞生等各項節目，幷分爲團體與個人兩項。這一比賽制度的建立，是教育中的一種進步的措施。

我主持政治營期間，除負起全營的敎育實施與管理的責在外，還利用一切可能的時間，輪流去參加學生的各項的小組會議。因此，不特深切地了解每個學生的思想、能力、學習進步的情形；幷且從學生中得到很多寶貴的工作經驗，所以，時間雖祇兩個月，但學生與我個人，在理論與經驗上均有很大進步。値得提出的，便是對軍政工作實施時獲得最切實際的方法，尤其是在戰鬥緊張時，提出適當的政治鼓動口號。如「這是生死關頭，只有硬打是我們的生路，被敵軍俘去必被慘殺！」及「敵人就要敗了！這是我們勝利的最後五分鐘！」……等。可以穩定軍心，提高士氣，使局勢轉危爲安，轉敗爲勝。對士兵的政治和識字敎育，最好利用行軍、作戰、作業的時間，運用巧妙的方法去進行，比較課室或操場敎育還易

深入。對于動搖敵軍軍心的政治工作，如：「火線喊口號」，「與國軍士兵相約不打鎗」，「火線上和敵軍士兵談話進行瓦解敵軍宣傳」，「投擲香烟慰勞敵軍士兵」……等，也在小組討論的交流經驗中，得到很多良好的意見。這種打破師生界限的教育方式，不是我去教育學生，而是學生自己在教育自己。第一期政治營的學生，不久便遍佈紅軍和蘇區黨政機關中，成爲日後中共政治人才的主幹。

## 三　紅軍的部隊教育

中共一切的一切，無不仿效蘇聯。部隊教育，自然更不能例外。紅軍教育的目的，不僅是在提高指戰員們的軍事學術技能，俾能發揮在戰鬥中的效用；而且要鞏固共產黨在紅軍中的領導，保証每一個指戰員都能把生命付之於革命鬥爭。因此除軍事學術科外，更爲注重政治和文化教育。這就是共產黨人所說的：一個革命軍人，不僅要武裝自己的手脚（指軍事技術），且要武裝自己的頭腦（指政治修養）。

但是，紅軍的指揮員，除了一小部份是知識份子，曾經在國民黨所辦的軍校受過軍事教育的老共產黨員外，大部份是工農出身在紅軍的長期鬥爭中鍛鍊出來的。戰鬥員除小部份是國軍俘虜及四、五、七軍的原始部隊外，（這些原有的士兵，除在戰爭犧牲外，多數已成了幹部，所餘的極少。）都是來自農村的農民和手工業工人：他們大多數不識字而頭腦簡單，要他們接受高深的政治理論和複雜的軍事教育，自然是很困難的。而且，負責教育的軍事政治幹部本身的能力已經是薄弱，所以只有採取重點教育的方法，從基本做起，同時運用組織與集體教育的方法來推行。因此，政治教育的內容，以簡單的共產主義的原則，配合着實際環境的需要來定出政治教育材料，如什麼是共產黨？什麼是共產主義？什麼是蘇維埃政府？什麼是紅軍的任務？什麼是階級鬥爭？分田地的方法如何？以及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官僚、土豪、劣紳等的罪惡怎樣……等等。所以紅軍的士兵，都有一套簡單的政治理論。

軍事教育的重點：各種兵器的使用、保管、瞄準、射擊的技術，各個以至班、排、連的戰鬥教練。并注重於爬山運動，鍛練快速强韌的行軍力，以適應於運動戰的要求；一般的制

式教練是不注重的。所以紅軍士兵對于瞄準射擊，利用地形地物，衝鋒肉搏的動作是相當確實的，尤其是行軍力特別强。同時由于紅軍的彈藥缺乏，不能不特別注意到彈藥的消耗而注意於射擊紀律；因此步槍班裡的特等射手，是經過了嚴格的訓練和考選的。他們的射擊技術雖不能說是百發百中，但却能做到彈不亂發。所以紅軍的射擊軍紀有特別的規定，一般的步鎗兵在沒有指揮員的射擊命令對距離二百碼以外的敵人，是不准自由放鎗的。特等射手，則在四百碼以內可自由選擇目標放槍射擊。這種辦法，既能節省子彈，又能發揮殺傷敵人的效能。我在進攻大庾城外一個據點時，曾眼見一個十九師的特等射手何銘，他用步鎗連續射殺了守在戰壕內僅露出頭部的國軍十一名，連長一名，幷因此攻克了這一個重要據點。我給了他一個神鎗手的榮銜，幷得到了紅軍總司令朱德的嘉獎。

文化教育是以連爲單位，按各人的智識程度編成文化小組和識字班，由最淺的字教起。所以紅軍的士兵，只要參加紅軍一年以上，都能認識不少的字，甚至可粗讀報紙和書籍。由於文化水準的逐漸提高，政治軍事教育也就易於收效。

紅軍經常是在行軍作戰中過着緊張的生活，集中訓練的時間很少，如何來進行教育訓練呢？加以幹部的能力又那樣薄弱，如何能夠得到上述的成績呢？局外人是不易了解的。主要的原因是能夠運用着組織的力量，每連所設的列寧室是教育活動中心，有學習小組及射擊比賽、文字比賽………等，運用着中共黨的組織，領導着全體黨員，有連政治委員，有士兵中的政治戰士，共同負起教育的責任。並利用老兵敎新兵，識字者敎不識字者的辦法，充份運用和發揮每一個人的學識、技能、經驗，使敎育工作更能廣泛的展開和深入。

# 第十二章　政治攻勢的發展

## 一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紅軍主力一、三、五軍團自李西趙與濟灣作戰勝利後，江西蘇區北面的國軍，又需要從新調整進攻部署。紅軍便利用這個時期，在黎川，南豐間地區休息整訓，經一個多月的時間，部隊已補充完善，官兵精神亦已恢復。正在此時，偵悉國軍主力由北向南，企圖進攻廣昌寧都。紅軍即迅速轉移至宜黃以南、南豐、廣昌間地區之黃陂、東陂山岳地帶，部署了一個大兵團的伏擊。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國軍裝備得最好的四個師，在向廣昌蘇區推進中，遭受了嚴重的損失。國軍李明、陳時驥兩個師首先被紅軍突擊，全軍覆沒。師長李明陣亡，陳時驥及一個旅

長被俘。其他的兩個師也跟着被擊潰。國軍死傷枕藉，損失慘重。這次勝利，是紅軍擊敗國軍第四次圍剿的最大也是最後的一次勝利。繳獲步槍二萬餘枝，輕重機槍千餘挺，各種手槍二千餘枝，迫擊砲及野戰炮二百餘門，俘虜國軍官兵一萬一千多人。國軍第四次圍剿又失敗了。是役紅軍第五軍團代總指揮趙博生負重傷斃命，事後爲紀念趙博生，將寧都縣改爲博生縣。

紅軍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後，立即以彭德懷的第三軍團，移師轉向福建，進攻以抗戰英雄自負的十九路軍，消滅了區壽年師的大部，俘獲甚多，給予了傲慢的十九路軍一次嚴重的打擊。幷曾佔領建寧，寧化，連城，永安各縣。但因紅軍兵力不大（第一及第五軍團沒有參加），於勝利後即調回江西整補。

紅軍連續兩次空前的勝利，獲得了大量武器的補充，除了充實一、三、五軍團外，幷在江西增編了紅八軍，在福建增編了紅九軍，幷成立瑞金、興國、會昌各縣的模範師，獨立師，獨立團等，整個蘇區洋溢着勝利的氣氛。

然而中共中央是很敏感的。鑒於反擊第四次圍剿，已冒了很大的危險；雖然僥倖大獲全勝，但國民政府是不會能休的，必然將繼續傾其全力來進行第五次圍剿。同時，各地中共的秘密電台與黨的小組，也將各地國軍調動集中的消息，像雪片般的送到中共中央，增加了高級人士重大的憂慮；這時，每個高級人員的腦中，都有「怎麽辦呢？」的感覺。

這時，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內策動各階層人民的抗日運動，將近有一年的時間，已得到了各大城市的學生和工人的良好反應；加以左派文化人士的推波助瀾，造成了輿論界的抗日高潮。正在此時，中共又接到共產國際的指示，大意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的侵略行為及國民黨政府的投降妥協，已引起了中國人民的反抗，中國反帝的民族革命運動已在全國各地廣泛的開展。中國共產黨必須把握這一個有利時機，提出抗日的積極具體主張，爭取廣大人民的同情和擁護，造成與國民黨再度合作聯合各階層人民共同抗日的機會，同時中國紅軍為了要担負這一偉大的抗日民族革命任務與準備爭取抗日領導權，必須要建設優良的紅軍二十萬，以為進行革命戰爭的主力。只要中國紅軍能佔領一個海口，蘇聯立即供給陸空

軍裝備………」等語。中共接到這一指示後，便首先決定了以政治攻勢來粉碎國軍第五次圍剿，爭取與國民黨合作抗日的機會。同時積極充實紅軍，來實現他們奪取政權的計劃。

中共在這一政治決策下，於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發表中國共產黨告全國同胞書，呼籲全國人民支持紅軍抗日，採用一句最通俗的口號，便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一個又好聽又新鮮的口號，頗能打動了大多數中國人民的心弦；同時，對國民政府又提出了四項要求：

一・立即停止進攻蘇區。

二・立即承認中華蘇維埃政府。

三・立即武裝民衆，組織抗日義勇軍。

四・組織抗日聯合陣綫，統一抗日指揮。

同時，中共中央通知全國各級黨部，號召全體黨員，爲實現這一主張而奮鬥！并鼓動全體黨員團員，以灰色份子（國民黨左傾份子）的身份，參加全國各軍事學校，掌握軍隊，滲

入國民黨各級政治、文化、經濟機構，刺探情報，爲革命鬥爭而獻身。

## 二 馮玉祥的抗日同盟軍

中共中央在發表告全國同胞書之前（一九三二年冬），已想到素以倒戈起家的馮玉祥。這時馮玉祥在「反蔣」失敗後避居察哈爾張家口，韜光養晦，以待時機。那時中共對馮的估價：馮的軍隊雖然已投降了，他手上掌握的軍隊不到三千人，但這個手創西北軍的基督將軍還具有相當的號召力，若能與本黨合作，舉起抗日義旗，不僅可號召其舊屬來歸，即察哈爾附近各省及西北一帶的雜牌軍隊亦可望風來歸，其力量實屬不小；如此，既可壯大紅軍抗日聲勢，予國民政府以重大威脅，并可掀起全國抗日怒潮，迫使國民黨停止進攻蘇區，而與中共妥協，造成國共合作的新局面。中共根據這一個估計，一面電請蘇聯協助進行，一面電飭北方共黨負責人積極策動馮玉祥組織抗日同盟軍與紅軍聯合抗日，同時由中央派員携帶毛澤東親筆信及組織抗日同盟軍的全部計劃，赴張家口會同北方負責同志共同進行，并領導這一

枝抵日同盟軍。當時中共對於派赴張家口工作的人選問題，曾經過了詳密考慮，除了須派兩個中共幹部外，並須找一位與馮玉祥有相當關係的人同去，工作方易收效，因此便想起了曾在馮玉祥部任過師長，陪同馮玉祥到過蘇聯的吉鴻昌，那時吉鴻昌在紅五軍團工作，便通知吉鴻昌到瑞金密商，要他偕同楊曉初，劉少文兩同志赴張家口，當時中共提出的主要條件是：

一、馮玉祥立即號召其舊部在察哈爾成立抗日同盟軍，以馮玉祥任抗日同盟軍總司令，與紅軍聯合抗日。

二，蘇聯即以軍用物資及經濟援助同盟軍。

三，華北，西北，及察，熱，綏一帶中共所能領導的軍事力量均編入抗日同盟軍，受馮玉祥領導指揮。

吉鴻昌奉到中共這一個命令，甚為高興，因為當他投降國民政府後，原任師長，自一九三一年夏因在鄂豫皖區剿共不力，被撤職，迨至一九三二年一月，廿六路軍起義投共後，他便到蘇區參加第五軍團任幕僚，不為中共所信用，其內心蘊蓄的苦悶，不言可知，今中共給

他這一個重要的任務，正是他脫穎而出的良好機會，自然是滿口應承，幷表示有達成任務的絕對把握。於是他便偕同楊曉初，劉少文隨着中共的交通人員赴香港，轉道北上。

吉鴻昌等潛抵張家口時，蘇聯已派中共留俄的楊子康，及華北的中共要員張慕陶先就到了張家口，策動馮玉祥組織抗日同盟軍的工作亦將近成熟，加上吉鴻昌等帶來的中共中央及毛澤東的函件的煽動之下，馮玉祥的抗日同盟軍總司令部便起於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宣佈成立。

由於當時中國軍民抗日情緒的高漲，馮玉祥抗日同盟軍成立的前後，察哈爾及附近鄰省的雜牌軍隊地方武裝，一時聞風參加抗日同盟軍者不下十餘萬人。可是馮玉祥舊日的部屬祇是對馮敷衍，幷沒有宣佈參加，這給予馮玉祥在心理上相當的打擊，但騎虎難下，不能不幹，且有了近十多萬軍隊，而且希望蘇聯能予以械彈及經濟的援助，前途仍有無限的希望，乃毅然決然的出兵向察東被日軍佔領各縣大舉進攻。當時事出日軍意料之外，無充份準備，且同盟軍士氣旺盛，很快的便克復察東各縣。

馮玉祥自興兵抗日以來，軍事上雖然節節勝利，但蘇聯軍品經濟援助幷沒有到來，使他無法繼續下去，此時他才知道上了蘇聯和中共的大當。同時國民政府方面除增調大軍北上集中於河北省外，幷派員勸導馮玉祥懸崖勒馬，勿以抗日爲兒戲，抗日大計應候中央政府決定，請馮與中央合作。馮亦感到現狀實處於不利地位，乃於收復察東各縣後立即宣佈停止作戰，準備將察哈爾軍政大權交還中央，他自己便再度下野。（那是一九三三年九月的事）

中央參加抗日同盟軍的高級人員楊曉初，劉少文，張慕陶，楊子康，吉鴻昌等，見馮玉祥更變了，他們便連絡所可能爭取的軍官，集中己能領導的軍隊，仍用抗日同盟軍的招牌，藉抗日爲名，準備與國民黨展開軍事鬥爭，以配合蘇區的紅軍行動，當時推定方振武爲抗日同盟軍總司令，以吉鴻昌爲總指揮，率部約六萬人向北平前進，聲勢仍相當浩大，但這些軍隊官兵是爲抗日而來，現改向國軍作戰，違背初衷，多不願意，且軍費無着，生活困苦，中途逃走者甚多，迨軍至古北口時前有國軍防堵，俘的俘，逃的逃，全軍便被消滅了。吉鴻昌本人於失敗後逃赴天津，潛居於租界內，卒被國民黨偵察人員刺傷被捕，以後解赴北平槍斃

了。

此次抗日同盟軍的行動，其結果雖然是失敗了，但在抗日方面言：曾收復了察東各縣失地，給予日僞軍以重大的打擊，表現了中國人民抗日的力量。在中共方面言：雖然沒有達到他們預期的希望，但却延阻了國軍對蘇區的五次圍剿，給予了中央蘇區及各地蘇區紅軍以相當時間休息整補的機會。在馮玉祥個人言：表現了他個人的號召力量，并藉此與國民政府當局取得了諒解，終於出任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副委員長。

## 二　模範團的創建與編組

中共的抗日呼籲發表後，國民政府并沒有反應，各階層的反共人士亦不贊同中共的蘇維埃運動，對中共提出的組織抗日聯合陣線的主張，更不重視。因爲反日帝反侵略運動，是求國家的獨立與民族平等，并不是同情共產主義。中共在此形勢之下，一面繼續加强政治宣傳和活動；一面積極執行共產國際所指示的建設優良紅軍二十萬的工作，那時雖然佔領一個出

滸口的計劃還無法實現，但準備擴張軍事實力和改變編制是已在實行的。

這個改革編制的任務交在我身上，命我按照蘇聯步兵操典的戰術要求，配合當時紅軍的需要，以及與國軍火力的比較，擬定一個以師及團爲戰畧單位，以營爲戰術單位，以連排爲戰鬥單位的編制案；幷號召蘇區優秀青年工人，編組紅軍模範團，以我爲團長，黃子榮爲參謀長，伍修權爲政治委員，於一九三三年二月中旬，在會昌縣屬的武陽圍成立。

模範團的編組，爲：（一）團轄三個步兵營，一個野戰礮營，一個特務營。特務營轄搜索連，工兵連，運輸連，衛生隊。（二）步兵營轄三個步兵連，一個步兵礮連，一個特務連。特務連轄搜索排，通訊排，警衛排，衛生排。（三）步兵連轄三個步槍排，一個重機槍排。重機槍排有兩個重機槍班，配備重機槍兩挺，另一個彈藥班。（四）步兵排轄三個步槍班，兩個輕機槍班（每班六人），步槍班每班十二人與當時的紅軍相同。

這個編制的特徵是以輕機槍爲排的火力骨幹，以重機關槍爲連的火力骨幹，以步兵礮爲營的火力骨幹，以野戰礮爲團的火力骨幹。同時爲顧慮騾馬缺乏，且便利在閩贛邊區山岳地

帶運動起見，炮兵連全部運輸力均由人力擔任，即野戰炮亦不例外，故能適應地理環境，機動使用。

．始創的紅軍模範團，僅訓練了兩個月，於四月中旬，便奉令出發參加進攻福建清流縣作戰，受紅軍東路總指揮葉劍英指揮（葉仍兼任紅軍學校校長）。我兼任第一縱隊司令員。當時清流的國軍，已有充分準備，碉堡林立，障礙極多。攻擊一日，僅攻破碉堡三座。爲顧慮寧化、歸化之國軍增援，乃奉命撤退。

葉劍英無從擺脫紅軍學校校長職務，故東路紅軍總指揮一職，又改調我接任。我便率領模範團開赴上杭縣屬之舊縣，指揮第九軍準備迎擊駐新泉之國軍第十九路軍。

當我率領部隊趕到上杭之舊縣時，十九路軍的三個團，已向朱坑以北紅九軍之陣地攻擊。我將模範團秘密展開，佔領朱坑西南高地，先行發揮猛烈的機炮火力，射擊國軍之側背；接着指揮步兵衝鋒，當即消滅國軍兩個營的部隊，迫使國軍全線潰退。模範團乃乘勝勇猛追擊，佔領新泉，幷續將國軍一個營殲滅。放棄經年的新泉蘇區，又回到紅軍的手裡了。

模範團初次出擊，便旗開得勝，虜獲步槍四百餘枝，機槍八挺；俘虜敵軍三百餘人。這次戰役的經驗，證實紅軍模範團一個團的火力，超過了國軍一個團，如果能機動地運用，足與國軍一個師對抗。因此，紅軍的高級幹部，迫切的希望能迅速的佔領一個出海口，以接受蘇聯援助的大批軍用物資，充實紅軍的實力。

## 四　曇花一現的福建人民政府

國軍十九路軍蔡廷鍇部，在「一二八」上海抗日戰爭時，極受當時國民政府的非難，因爲中央主張對日暫時採妥協政策，避免軍事衝突；以此，十九路軍官兵，都非常怨憤，及戰爭結束後，又奉調福建担任圍剿江西蘇區的工作。那時他們在意識上，對中央已經有了很大的距離；所以對於共方也並無積極行動的決心，可是，因爲既担任了圍剿的任務，也不能不參加作戰，不過，在紅軍反第四次圍剿的戰役中，首先紅三軍團總指揮彭德懷給予他們一個重創；接着又由我所領導的東路紅軍給予他們一個打擊，他們鑒於這兩次敗仗，認識了紅軍

的戰鬥力，於是，改進攻爲防守，只有深溝高壘，監視着蘇區紅軍的活動。後來由於李濟琛，陳銘樞等的積極煽惑，他們便醞釀着反抗國民政府運動。

他們早已看到了中共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呼籲聯合抗日的宣言，和組織抗日聯合戰線這一套動人的名辭。他們自己認爲是抗日的部隊，人人以抗日英雄自豪，在抗日的口號下，當然可與紅軍合作。乃派徐名鴻爲代表，携了李濟琛，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四人聯名給朱毛的信，由福建連城至長汀，先與紅軍第十二軍接洽。然後由紅十二軍引導到瑞金與中央接洽。信的大意是：「國民黨中央當局，不惜以辱國條件與日本妥協，而集中全力進攻蘇區，提出所謂『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不僅要消滅紅軍，而且要打擊一切抗日的力量。因此，抗日革命力量必須要團結在一起。現在準備組織福建人民政府，領導福建人民，實行抗日主張；并願意和紅軍徹底合作，駢肩作戰。并希望蘇維埃中央政府，派全權代表到福州商討具體的合作辦法。」

中共中央的負責同志和朱德、毛澤東等，接到這封信時，歡喜若狂。一面款待來使，一

面立即召開會議討論應付的辦法。當時在會議中發生了兩個不同的意見：一個是以毛澤東爲主的保守派（註一），對福建人民政府缺乏信心，主張派不重要的代表到福州去與李濟深等先進行試探的會商；另一個是以周恩來爲代表的積極派，主張立即派大員到福州舉行正式談判，幷希望能够拉緊福建人民政府，使它跟着中共的政策走。但結果採取了毛澤東的主張，決定派潘漢年，張雲逸爲代表，隨同來使赴福州，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廿一日，簽訂了抗日作戰協定，其內容如左：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與福建人民政府及十九路軍，雙方面爲挽救國家民族之危亡，反對帝國主義殖民地化中國之陰謀，幷實現蘇維埃政府及紅軍每次宣言，準備進行反日的軍事同盟，因此，訂立初步協定條件如下：

一、雙方立即停止軍事行動，暫時劃定軍事疆界線（如附件），在該線不得駐紮主力軍隊。同時十九路軍必須運用各種方式，排除或消滅存在福建與蘇區接壤地區間妨礙貫澈該協定之一切障礙勢力。

二、雙方恢復輸出輸入之商品貿易，幷採取互助合作原則。

三、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方面，贊同福建境內革命的一切組織之活動（各民族抗日反帝團體及革命民衆一切武裝組織，幷允許出版言論結社集會罷工之自由）。

四、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方面，立即釋放在福建各牢獄中政治犯。………………（錄自救國時報，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中國人民政府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廿五日在福州宣佈成立。以李濟琛任中國人民政府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以陳銘樞任人民委員會主席。蔣光鼐任經濟委員會主席。黃琪翔任參謀團團長。蔡廷鍇任十九路軍總司令。幷將福建省所轄地區劃分爲四個省，派出各省政府主席。幷派全權代表一人駐瑞金，與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連絡。中共當時雖然採取了愼重的合作政策，但如何去鞏固人民政府的陣營，它們是很注意的；因此，它們特請人民政府整肅十九路軍內部的不穩份子，以鞏固內部組織。同時，卽急電蘇聯速運大量陸軍裝備及飛機來廈門補充紅軍。蘇聯對於援助中共奪取中國政權，素來是不遺餘力的，過去因爲沒有一個海

口，所以無法運送。現在既打通了福建，當然非常方便。於是，立刻答覆，準備先運步槍三萬枝，輕重機關槍四千挺，各種炮二百門，飛機十架，及各種彈藥通訊器材等，此種器材，已陸續集中海參崴，裝船候運。另由上海先運送中國大洋券一百萬元爲紅軍軍費（大部爲中國銀行及實業銀行一百元券），這一百萬的經援，以後便成爲紅軍突圍西竄的軍費。

福建人民政府及十九路軍，因爲內部意見複雜，矛盾叢生。中共對福建人民政府，始終是存着利用和觀望的態度，幷沒有眞誠合作的積極措施。當國民政府積極調動在贛、閩兩省剿共的第九師李延年部，十八軍羅卓英部，六十四軍劉和鼎部，以蔣鼎文爲總指揮，準備對閩用軍事解决的時候，人民政府曾迭電中共請立即派遣紅軍入閩配合作戰，以阻遏國軍的攻勢；但是中共的大軍，仍遲遲不發，再三拖延時間。卒使國軍主力由浦城進攻建甌，繼以中央突破，佔領延平，十九路軍便告瓦解，福建人民政府亦即於一九三四年一月杪整個崩潰。中共援閩的一、三、兩軍團也祗好中途折回，而蘇聯集中海參崴準備援助中共的軍械和飛機，也無法送達，徒成了中共的黃粱一夢。

這一次閩變失敗的原因，雖然很多，但中共的延誤與敷衍，實為其主要原因之一。

附註

註一：保守派——這是指毛澤東守在山區打游擊，保存實力，不敢向外發展，維持現狀的保守，不是維持舊制度的保守。

# 第十三章　開除黨籍與再被重用

## 一種下了一個禍因

中共對于民兵組織是歷來所重視的工作。當國共合作時期，卽着手組織農軍，到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五日的中共第五次大會，又有武裝二萬黨員與五萬農民爲武裝鬥爭基礎的決議。嗣後由湘南暴動起，以赤衞隊、少年先鋒隊爲民衆武裝的組織形式。迨至中央蘇維埃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時，便將赤衞隊的名稱，擴充而改爲赤衞軍；幷選其精銳者編爲獨立師或獨立團，成爲紅軍的戰鬥主力部隊。當時的地方武裝組織，計有四種。

一、少年先鋒隊，以十四歲至十八歲的青年編成，是青年軍事訓練的組織，也是負責地方治安的輔助部隊。不脫離生產。

二、赤衞軍，凡十八歲至四十歲身體健康的壯丁，都加入這種組織，是紅軍的預備兵，

幷負責維持地方治安與警備的任務。不脫離生產。

三、獨立團是紅軍的初階，是脫離生產的地方部隊。它的給養由地方政府支給。它的番號，在中央蘇區者由中共軍事委員會編定，如「紅軍第〇獨立團」等，不冠地方名稱；但在非中央蘇區者即冠以地方名稱，如「某省紅軍第〇獨立團」等。獨立團隨時可編爲獨立師或正式編入紅軍，中共名之爲升階；但在未升階以前，他僅能在各該省或該縣的地區內担任警備及作戰任務。

四、獨立師。與獨立團的性質大體相同，但獨立師可隨時外調，配合紅軍作戰。

中共爲了要統一地方部隊（各獨立師獨立團）的訓練指揮，及加强對蘇區南面粵軍守勢作戰之策劃指揮起見，在一九三三年二月成立粵贛軍區司令部於會昌縣屬之筠門嶺，以張雲逸爲司令員，由中共軍事委員會直接指揮。

我於四月下旬率領紅軍模範團在福建擊敗了十九路軍佔領新泉後，奉到軍事委員會的命令，調我接任粵贛軍區司令員，並兼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軍事廳長（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設於會

昌）。同時，模範團擴編爲紅軍二十四師，也由我兼任師長。

包圍蘇區南面的國軍，在贛縣經信豐，至安遠之線，爲粵軍第一軍。由蒋郎至武平之線，是粵軍第三軍，這方面的兵力甚大，粵贛軍區司令部的作戰任務，便是對抗這兩線的粵軍，保衞中央蘇區的南面。

但因兩廣仍在聯合反對南京政府，對勦共軍事，採取了攻勢防禦的戰畧。他們除固守全線碉堡據點外，僅派小部隊向蘇區騷擾，維持着相持的戰爭狀態。

我接任軍區司令員職務後，即決定構築自福建之羅塘起，經山背，青溪，天心，龍市，小密，龍石潭，長洛墟，大田市，至茅店這一線的堡壘工事；並調整充實江西省各獨立師，獨立團分區守備各據點，而集結二十四師機動使用，我的戰畧是選擇國軍弱點積極出擊；曾以突襲攻陷重石墟及龍岡墟；幷在澄江墟，與青溪，兩次伏擊向蘇區進擾之粵軍；兩次均獲勝利。

七月間曾受一次小挫折，是駐龍布墟江西獨立第六團遭受粵軍第一師的突襲，損失了步

槍五十餘枝，在整個南國作戰形勢來說，并不算是失敗的；然而，這次小挫折，竟成爲我日後被處分的理由之一，也可以想見中共對自己同志的羅織之深了。

## 二　消滅地主的農民政策

中共過去的農民政策，雖然是提出了消滅地主的口號，但在實際執行時，除了有反動行爲的地主階級遭到殺戮外，普通地主，他們仍然生活在蘇區，沒有徹底消滅。對於富農，則採取限制的辦法，分田時，以「富農分壞田，中農分中田，貧僱農分好田」爲原則。分田手續雖難免有不平的現象，但沒有引起農民反抗的嚴重問題。

五月下旬，我到瑞金參加中共高級幹部會議，討論中共農民政策時，周恩來提出了新的修正案，他的原則是：「消滅地主，反對富農，中立中農，聯合貧農，以僱農爲基礎。」并即席說明：

「地主階級的實質是反革命的。若保留這階級份子存在蘇區，一旦革命受到挫折時，他

們必定會起來勾結幷聯合反動勢力，破壞革命。爲了要鎮壓蘇區內反動階級的死灰復燃，必須毫不姑息的斬草除根，將地主澈底消滅。這是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列寧所說的：『對反革命份子的姑息，便是對革命同志的殘忍』。

「其次是對富農問題。過去對富農政策太過于放縱，他們利用着優越經濟力量，仍可以在農民身上進行剝削；或從土地生產中取到更多的利益，逐漸再成爲農村的資本家，這是有害革命的前途，故應進一步沒收富農的財產，以澈底剝奪其經濟優越條件。

「中農是農民中的革命與反革命的中間份子，但他們有很快的成爲富農的條件。他們的革命性是極度薄弱的，應防止其走向反革命的集團。

「貧農在土地革命中是熱心的。但要注意他們的自私自利觀念，保守觀念，溫情主義和封建思想。

「在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中，祇有僱農是基本的革命農民。所以我們要以僱農爲基礎，進一步扶助他們，團結他們，養成他們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堅强意志與信心。」

周恩來的農民政策報告完畢，全場靜寂下來。大家都在考慮有沒有修正的意見。會議桌上的時鐘滴答滴答的响着，——時間過去了將近十分鐘，還沒有人發表意見。

我不是無產階級出身，我的家庭是個小量土地擁有者兼營商業的中產階級。按中共的定義，應該列爲富農。但我并不以爲我是富農而反對這一個農民政策，因爲我在農村中生活很久，我深深地了解農民的痛苦和農村的土地分配與經濟情形；我也和農民一樣，厭惡并憤恨一般苛索農民的土豪惡霸；因之，我參加中共的革命鬥爭，希望創造一個公平合理的良好社會，尤其是使農民的生活得到改善。

我未到過蘇聯，沒有實地觀察蘇聯在大革命時的農村情形；但是，從留俄歸國的中共黨員中，我獲悉了帝俄時代的農村情形，俄國的地主所佔有的土地動輒以萬畝計；俄國的富農也是經營有廣大的農場。他們確是農村的資本家；俄國的貧傭農特別多，他們多數是農奴轉變爲貧農，或者受僱於農場爲傭農，這種情形與中國大不相同。

中共在南昌暴動時宣佈沒收二百畝以上土地，也可說是對二百畝以下的土地不加沒收。

但土地革命方案一次一次的修正，到一九三三年時，地主富農的定義都規定得非常苛刻與不合理了。凡有土地十畝，甚至不足十畝，其生活來源主要是收租，或部份收租部份自耕者，皆名之爲地主。農民中凡自耕自給，或僱用一二農民助耕的即名之爲富農。如果照周恩來這個說法，那麼農村中要殺的人實在太多了。我想：中共的革命，如果是爲了被壓迫的人民謀解放，爲了要使廣大人民得到自由幸福的生活，那麼，就不應站在階級仇恨的立場，把稍有田地的人，一概加以屠殺。因爲，地主剝削制度是中國數千年來遺留下的社會制度，決不是這個時代的地主的個人犯罪行爲。以革命手段來消滅其制度是合理的，但是毀滅其生命，不僅是違反了人道主義的精神，也大傷國家的元氣！而且中國革命的主力是農民，若得不到廣大農民的同情及擁護，革命是沒有前途的。我經過這樣的考慮，便打好了一個腹案，在大家沉默中站了起來，說明我對這個政策的意見：

「一・本黨土地政策，照現在的地主定義，要消滅的地主極多，犧牲人民生命過大，有損國家元氣。

二·因反對富農，很容易發生執行政策時的偏差，致演變到任意殘殺。

三·因反對富農，必動搖中農，并因而影響貧農的革命情緒。

四·中國無產階級的力量薄弱，中國革命必須爭取廣大農民的積極參加和擁護，若採取這一農民政策，必斷送廣大的農民羣衆。

五·中國農村生產，主要的是建築在小地主·富農，與中農階層，若摧殘了小地主與富農，必造成生產萎縮的現象，影響國家經濟。

因此，我們的農民政策，應修正爲『反對地主　消滅地主剝削制度』『中立富農，以穩定農村生產』『以中農、貧農、僱農爲基礎，充實與鞏固人民陣線』。

我這個意見，得到許多同志的贊成。接着我起來說話的是賀昌，他說明中國現階段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小資產階級和農民是現階段的重要力量，本黨不能忽視了小資產階級與廣大農民的利益。龔同志的修改案，我很同意。繼續還有幾位同志發言。他們踴躍地發表與我相同的意見，更充實了這一建議的內容。在這個激辯的議程

中，會場情緒顯得很緊張。

可是，中共的負責人，固執地，務必要貫澈他們的主張。并不因多數同志的反對而加以修改。周恩來提出說明：「這個政策是根據第三國際給我們的指示而決定的，過去中國革命的不斷受到挫折，都是黨的負責同志不能澈底執行國際路線的結果，我們鑒於過去的失敗，今後再不能對國際路線有所懷疑。今天祇有討論如何去深刻的了解，及如何去執行這一政策，而不是研究修正的時候。」這個執行國際路線的大帽子，鎮壓了全場反對者的意見，各項實施的細則，也就如議通過了。

會後，我到軍事委員會主席項英的家裡，跟他和他的小脚太太三人共進晚膳。他很沉重的對我說：「龔楚同志，你今天的見解雖然有充份的理由，但太過激烈了。」說到這裡，中共的高級幹部賀昌也跑來了，急忙問道：「老項！你同意他們的政策嗎？你看事情還有什麼發展？項英笑道：「我看事情不會那麼簡單，龔楚同志要當心一點！」項英的太太雖然是個舊式女子，但社會經驗非常豐富，他勸我道：「龔同志，你這麼口直心快，知無不言，言無

不盡。本來是很好的，但以後還是含蓄一點的好。」我聽了很受感動。但我仍覺得我是一個共產黨員。基於黨的「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討論黨的政策　我是有權說話的。尤其是這一個關係到人民生存與黨的前途的重大問題，我更不能不說，惟事情已經過去，祇有靜待事件的發展。第二天，我便起程回�門嶺去了。

## 二　我被開除黨籍半年

滿天陰霾，暴風雨終究是要來的。八月下旬，我接到命令調回軍事委員會，粵贛軍區司令員一職由何長工接充（註一），其餘的職務，也分別有人接任。交卸手續完畢後，我便回到瑞金軍事委員會。

第二天，項英偕我到俄顧問李特的辦公處。周恩來和朱德已先到，圍坐在一張長方形的會議桌上。李特指着五萬分一的軍用地圖，問我南面前線的情況（有翻譯員傳語），我詳細的告訴了他。他再問我：「（一）前線堡壘爲什麼將近三個月還沒有完成？（二）龍布墟獨

立第六團被敵襲擊，爲什麼事前沒有準備？」我告訴他：「前線的保壘百餘座，已完成了百分之六十。因正在農忙時期，動員民工比較困難，已盡了最大的努力。龍布墟獨立第六團駐地，與我相隔六十里，幷無電話網架設，全靠徒步通訊，事前我曾到該團巡視，事後也曾親往處置，粵軍係先以武裝便衣化裝小販，潛入龍布墟，然後內外夾攻，致該團處於混亂狀態，損失步槍五十餘枝。這固然是該團警戒疏忽，但也是意外之事。」李特對我的答復，似乎表示滿意。

惟坐在一旁的周恩來，立即站起來以嚴肅的口吻向我說：「龔楚同志！你的階級意識一向糢糊，在此革命鬥爭到了短兵相接的時期，一切個人的利益定要服從革命戰爭的需要。農民要收成趕着種稻，自然很忙；但任何工作沒有構築這條堡壘線的重要。你祇顧及單純的農民利益，忽視了整個革命的利益，是你的錯誤之一。守龍布的獨立第六團被襲擊，是由階級警覺性不夠，事前疏於防範，致被敵人化裝潛入，內外夾攻，而遭受了重大的損失，這是你的錯誤之二。你以前在廣西工作時，沒有堅定的政治立場，走進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道路；

現在又對農民攻策沒有澈底的認識，保持着狹隘的農民保守觀念，動搖了同志們的意志，這是你的階級意識薄弱所必然招致的結果；這是你的錯誤之三；根據你上述的三個錯誤，黨中央已決定開除你的黨籍半年，并給你一個學習的機會，希望你能澈底轉變。」

他說完之後，大家都不說話，木然的望着我。五分鐘過去，李特才打破僵局，帶着笑容對我嘰哩咕嚕說了一通。翻譯員告訴我：「李顧問說你是黨的老同志，知道你過去很努力，將來對革命貢獻時間正長，特請你在這裡吃頓午餐。」

不久，特務員端上兩大盤白麪饅頭，和四碗菜。大家團攏來歡歡喜喜的吃着談着，彷彿剛才的一幕已經像一個噩夢似地過去了。這個場合我本是非常尷尬的；這些黨的高級同志，祇知坐在家裡及上層機關中談革命，祇知盲目服從蘇聯的命令，沒有了解中國農村經濟情形，將來不僅要危害中國人民的生命，而且要斷送中國革命，我心裡不覺隱伏着無限的憤怒，所以表面上反而沒有尷尬的表情。

晚上朱德約我在他家裡吃飯。他要我提高階級覺悟，并好好的到紅軍大學去學習，特別

是：不要寫信回家，在蘇區另外找一個思想前進的女同志作老婆，以免遺人以攻擊的口實。我聽了，默不作聲，餐後，便回到軍委會去了。

## 四　我遭受了無情的鬥爭

中共中央，像是鄭重其事的來轉變我的思想；在一個黑暗的晚上，在紅軍總部會場召開一個規模甚大的思想鬥爭會，同時被鬥爭的，還有被撤了職的紅九軍軍長孔荷寵。瑞金的黨政軍上級幹部近百人也全來參加，由周恩來親自主持。我知道，這一次思想鬥爭會的作用，一方面在向我們兩個人進行思想鬪爭，希望轉變我們思想，同時也在教育其他的高級幹部。然而，這給了我的傷害實在太深了，他所得到的恰恰是一個相反的作用。

會議開始時，由周恩來宣佈：「龔楚、孔荷寵兩同志，犯了嚴重的錯誤。他們是革命的老幹部。黨爲了要教育他們，特向他們進行無情的鬪爭；使他們的錯誤屈服在全體同志的猛烈鬪爭火力之下，再成爲一個黨的優秀幹部，現在先由龔楚同志坦白批評自己的錯誤。」他

說完話時，整個會場靜寂下來。我在這個場合中，既不能昧着良心，對自己的靈魂作殘酷的凌辱，承認自己確有着一些內心并不同意的「錯誤」；同時，又顧慮到環境的惡化，如果太倔强，便有招致犧牲生命的危險。這時內心異常痛苦。如何突破這一個難關呢？」我考慮之後作了一個簡單的報告，大意是：

一、我在廣西右江工作，沒有澈底執行黨的政策，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一點，我是承認的。我犯這一個錯誤的原因，是由于我遷就當地社會環境，以致對黨的政策發生了錯誤！

二、我在粵贛軍區司令員任內，我認爲盡了我最大的努力。因防線遼濶，兵力單薄；且所指揮的多數是地方部隊；百密一疏，在所不免。第六團的被敵襲擊，遭受損失，我自然應負其咎。對於堡壘線的不能如期完成，是我顧慮農民的生活與不願影響農村生產所致，黨對我的批評雖是事實，但我認爲我們不能完全忽視了羣衆困難的實際問題。關于農民政策，我的意見已在幹部會議上詳細陳述，至今我仍認爲我的意見是正確的。但我要申明的是：我的出發點是爲了中國革命的前途着想，絕無半點的自私觀念存在其間。黨開除了我的黨籍，這

是在我革命過程中最大的恥辱。但是的我錯誤絕不是背叛革命的行爲，而是對中國革命現階段政策見解上的稍有不同而已。我說完後，便坐下來等候同志們的「批評」。

在靜僻的角落裏，一個人站了起來，他便是黃甦，三十四師的政治委員。

「我與龔楚同志認識很早，而且有很多次在他的領導下工作，我知道龔同志是小資產階級出身，過去生活腐化，在廣西工作時，曾以千元的代價娶一個妻子，這一點是龔同志沒有坦白的」。黃甦這段話的最後一段，完全是無中生有，使我聽了忍無可忍。因爲我與我妻子結婚。我前文已經叙述過，是在廣西南寧國民政府下工作的時候。當時得到黨內同志如賀昌和鄧小平等的協助，他們還參加了我的婚禮。這一千元代價娶老婆的話眞是從何處說起？於是，我立即據實提出答辯。中共高級同志賀昌即席提出証明，總算是渡過這一難關。

孔荷寵是個無產階級出身。但他在湘東紅九軍軍長任內，平日好買點肉食，且有時作麻雀牌戲。中共認爲他的生活腐化，便被撤職調來江西蘇區。在會議中遭受了很多同志的嚴厲批評，使他啼笑皆非，情形非常尷尬。最後由周恩來作一個結論，指出「龔楚同志，對他的

錯誤仍沒有深刻的認識，我們希望他能進一步的去自我檢討；孔荷寵同志，頭腦頑固，更須他自己切實的去糾正。」

孔荷寵在這次鬥爭會議中，給他的精神打擊極大，嗣後他在紅軍大學畢業後，被派到興國縣做羣衆工作時，乘機逃出蘇區，脫離了中共的牢籠。

鬥爭會後，我與黃甦又在項英家裡碰面，恰巧鄧小平也在坐。我便追問黃甦：「我在廣西工作時，你幷沒有參加，爲什麼說我一千元買老婆？」他搭訕着說道：「這個消息我也是聽人說的，人人都知道我與你是老同志，在這次鬥爭會上我若不批評你，便是我缺乏無產階級的意識。所以我不得不將這件事說出來，反正事情已經過去了，我們老同志還是老同志，何必介意呢？哈哈！……」

他這些話眞令我太寒心了。原來他爲了爭取黨對他的信用，表現他有無產階級不徇情的優良品質，便以道聽途說之詞來鬥爭我。假如沒有黨中央强有力的同志聲援，我在鬥爭會上怎麼下台呢？如此的老同志！如此的無產階級優秀幹部！眞使我有無限的傷感！

## 五 紅軍大學生活

紅軍大學是訓練上級軍事幹部的最高學府，開辦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位置在瑞金縣西十華里的松林內，依着小崗用木板建成了十餘座課堂，宿舍，和校本部。闢有兩個廣闊的操場，幷有一座可容千人的大禮堂。

學員區分爲上級幹部訓練隊，高級軍事研究班，及參謀人員訓練班三個部門。上級幹部訓練隊有四百八十個學員，由紅軍中曾任連長以上的青年軍事幹部抽調受訓。並將紅軍學校上級幹部訓練隊併入紅軍大學；共分編爲四個中隊。教育的目的是「培養正規團長以上的軍事幹部，提高紅軍幹部的戰術修養，與諸兵種聯合作戰的指揮。」高級研究班是抽調紅軍中師長以上的軍事幹部，及適合担任軍事指揮人員的政治幹部，以「研究戰術戰畧與大兵團作戰指揮，培養高級軍事指揮人才」爲目的，全班祇有十二人。參謀班是就紅軍中的中級幹部，遴選其文化水準稍高者調訓，全班共有四十五人。

紅大校長周琨，過去曾任紅四軍的師長，後升紅八軍軍長。在反擊第四次圍勦作戰時負傷，治愈後調來高級班當學員，被選為校長；但仍參加高級班上課學習。校內行政由事務人員負責。這種祇重學習不重人事行政的作風，是紅軍大學的特點。

高級研究班主任何迪周，是國軍的工兵營長。參加對蘇區四次圍勦時在黃陂作戰被俘。他的學識很好，他雖然在國軍中地位低微，紅軍反而將他重用。這一來，他很樂意將他的全部學識教授出來。教官有陳時驥（國軍師長）及另一國軍旅長，俄顧問李特亦為教官之一，担任兵團戰術及研究戰畧的指導。

高級班的教育內容主要的是：兵團戰術，諸兵種聯合戰鬥指揮，戰畧研究，戰史研究、築城學、兵器學、參謀業務……等。教育的實施方法，是盡量採用現地戰術作業，與圖上作業。每天除了清晨運動外，有六小時正課，其餘的時間是閱讀軍事政治書籍，自我學習。每星期六在大禮堂開晚會，有紅軍總政治部劇社演出的話劇，及各種娛樂表演節目。朱德及所有高級黨政軍幹部，常來參加。

我們的給養很好。每星期一次肉食，每人有四兩猪肉或六兩魚。平日的菜蔬也豐富，比較紅軍士兵要好上幾倍。我們於入校後，每人發一套灰斜布列寧裝軍衣，兩套白布內衣，尙有蔴草鞋和布襪，這些，都是紅軍士兵所沒有的。高級班學員中，有孔荷寵，彭雪楓和我三人，每月能領十元大洋的營養補助費。因爲我們過去曾爲革命流過多次血，身體健康受很大影響，所以有這個特殊待遇。這個特殊待遇，在我到蘇區以後就開始按月發給，其他高級幹部如彭德懷等，因爲沒有負過傷，也就沒有這個特殊待遇了。

## 六　成爲紅軍最高的幕僚長

在紅大受訓兩個月後的一天晚上，本班中共黨支部書記彭雪楓通知我：「奉到中央黨部的通知，你已經恢復了黨籍。請你今晚參加黨支部會議。」我聽了非常駭異。我不是被公開宣佈開除黨籍半年嗎？現在僅祇兩個月，又是在學習期間，幷無工作表現，爲什麼就恢復了黨籍呢？孔荷寵同志在我之前開除黨籍半年，期間已經過了，而他的黨籍還沒有恢復，這又

是什麼原因呢？我爲警惕與喜悅的心情所包圍，警惕的是：「今後的工作更加繁重，更難應付，必須有更好的工作表現，才能得到黨的信任和滿意。」喜悅的是：「在開除黨籍階段，隨時有殺頭的危險，黨籍既然恢復，生命暫時有了保障，心情逐漸安定下來。」

後來，我從一個中共中央高級同志那兒，得到關于我恢復黨籍的原因。原來我的開除黨籍，完全是周恩來所主張的，當時情勢頗爲嚴重，且有殺頭危險。時中共中央總書記秦邦憲及組織部長張聞天，因赴博生縣（寧都）調整第五軍團人事未返（第五軍團政委蕭勁光在那次被撤職開除黨籍，政治部主任劉伯堅亦被撤職處分），沒有參加那次會議。待張聞天、秦邦憲回來，知道開除了我的黨籍，認爲周恩來處置失當，不能因爲這種小事而開除了一個有長遠鬥爭歷史的高級同志。但事情已經發表，不好朝令夕改，祇好過了一個短時期，再在中央會議提出討論，恢復了我的黨籍。這種業經開除黨籍半年，而能在兩個月內恢復的事情，在共產黨中是很少有的。

一九三四年四月中旬，因國軍對蘇區的五次圍勦已在黎川，南豐之線展開，爲了工作的

需要，我們高級研究班便提前畢業。在紅軍大學大禮堂舉行了一個盛大的畢業典禮。所有高級幹部都到場觀禮。毛澤東、朱德均致訓詞。高級班同學推舉我致答辭，由校長周崑同志發給我們一張白布丁方三寸的畢業文憑（他自己也領了一份），會後敘餐。情形頗爲熱烈。

畢業後的第二天。周恩來召集高級班的學員，到總司令部訓話。大意是：「在此革命鬥爭的嚴重環境中，各位能得到幾個月的學習時間，這是極可寶貴的事。在這一學習階段中，據我所知，多數同志均能努力學習，在軍事的修養上也有了很大的進步。惟其間仍有個別的同志，遊擊思想仍極濃厚，政治的覺悟還不夠。希望你們自加警惕，迅速轉變；否則革命的紀律是不能放鬆的。現在各位既已畢業，即要分配各位的工作崗位，今後務加倍努力，庶不負黨對各位的期望……。」他那副冷酷的面孔，和刻薄的語調，使我感到不安。解散後，我們正擬回紅軍大學去的時候，朱德派人通和我，着我即刻到他的辨公室去談話。我會見朱德後，他告訴我：「紅軍總部參謀長劉伯承，因爲患了嚴重的貧血症，已進醫院休養。繼任的參謀長一職，還沒有適當的人選；經過黨中央的會議，認爲只有你能勝任。你即日起便代理

參謀長的職務，將行李搬到總部來，開始辦公。」于是，我便成爲紅軍的最高幕僚長了。

附註：

註一：何長工——現任人民政府重工業部副部長。

# 第十四章　突圍

## 一　紅軍戰畧的策劃

中央蘇區的紅軍總司令部，爲全國紅軍的最高指揮機關。指揮的軍事單位有：江西中央蘇區紅軍一、三、五軍團，粵贛軍區司令部，湘黔邊區的紅軍第二軍團賀龍部（註一），川東北的紅軍第四方面軍張國燾，徐向前部（註二），閩浙贛邊區紅軍總指揮方志敏部。

總司令部內分作戰部、情報部、和軍事教育部（紅軍的後勤補給，另有獨立的紅軍供應部負責）；這三個部門的參謀人員，總共祇有二十個人。工作極爲緊張，每晚非至深夜一時不能休息。尤其每日作戰情報，必在當日處理完畢。工作效率與服務熱忱都很高。

紅軍情報的主要來源，是藉無線電偵察國軍的駐地方向。幷竊取國軍統帥部與各軍師間

的無線電報，破譯出國軍的密碼，以了解國軍的行動和作戰部署。另一方面與潛伏各地的中共黨部連絡，蒐集當地國軍動態情報；和潛入國軍組織內的中共黨員供給情報。因此，國軍的作戰部署和一切行動，都逃不過紅軍情報工作者的掌握了。

我在紅軍總司令部工作了兩個月。這時，黎川、南豐兩縣已失守。我軍反攻黎川，及黎川以北之硝石和黎川東南面的資溪橋各敵軍碉堡據點均遭受失敗。國軍第五次圍勦蘇區北方的包圍圈，已逐漸縮小。紅軍對抗五次圍勦是處于內線作戰形勢，當時的戰畧是：以碉堡對抗敵人的碉堡，固守碉堡線，阻延敵軍前進，并乘國軍向蘇區分進時，集中主力之一部，各個擊破敵人，以粉碎敵人圍勦計劃。戰術是：以短促突擊來殲滅由碉堡向蘇區推進的國軍，以達到戰畧的目的。

短促突擊戰術在初期實施時頗收效果。國軍由南丰、黎川兩個縣城，向南推進時，曾兩次遭受紅軍突擊，傷亡重大。自此，國軍的推進更爲愼重；每次推進前必經過飛機的空中偵察和地面搜索，而且將推進的距離縮短。每次推進五華里至十華里內，卽構築陣地，須待碉

堡完成後再行逐步推進。這種步步爲營的戰術，使紅軍不易獲得在國軍運動中遂行突擊的機會。因此，國軍推進雖緩，但包圍圈逐漸縮小，北面國軍已逐漸向廣昌、博生之線進迫，給予紅軍以莫大的威脅。

爲了戰術戰畧的問題，中共高級軍政人員，在紅軍總部研究了三個夜晚，決定了戰畧原則：

一・以閩浙贛邊區方志敏部之紅十軍，改稱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卽以方志敏爲總司令，由閩浙贛邊區向北突圍，派紅七軍援助并掩護，俟突圍後進入浙江皖南地區活動，以分散圍攻蘇區的敵軍兵力，擴大紅軍抗日的政治影响，以動搖敵軍的戰鬥意志，爭取有利條件。

二・在圍攻蘇區北面國軍尙未越過廣昌、博生、勝利（註三）之線時，仍採用各個擊破的戰畧；并以廣昌、博生、勝利之線爲最後決戰地帶。

三・戰術應採取梯次集團衝鋒，强攻敵軍堡壘；捕捉敵人短距離前進的機會，以短促突

擊消滅運動中的敵軍。

四・目前敵軍的碉堡線以黎川、南豐方面最利于我軍攻擊。因福建方面敵軍尙在延平、建寧之線，距離尙遠，我右翼未受威脅。且其碉堡及野戰工事均未鞏固，即集中主力向該方面之敵軍進攻。

五・倘廣昌，博生，勝利之線決戰失敗，各路敵軍越過該線南進時，其合圍之勢已成；我軍主力應向西南突破南康，大庾，信豐之粵軍防線，轉出敵軍對蘇區包圍圈之外線作戰，以破壞敵軍向蘇區圍攻之計劃。

六・加緊動員所有蘇區內的壯丁參軍，充實紅軍兵源，且可避免資敵。

七・粵贛軍區改爲贛南軍區，司令部移設于雩都縣城。并加强贛南軍區司令部之組織，俾能負起對粵軍作戰，與探測贛江上游水位，偵察粵軍後方情況之任務，以爲大軍突圍之準備。

我在這一新計劃下，被任爲贛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并以劉伯堅爲政治部主任（註

四）。

## 二　毛澤東留黨察看的眞相

一九三四年七月，我到鄂都接任贛南軍區司令員後，重新到前線各地視察，完成一切部署。因粵軍沒有進攻蘇區的跡象，我的工作便很淸閒。

八月初旬的一天下午，我正在讀五萬分一的軍用地圖，研究湘粵邊境地形；忽然特務員跑來報告：「毛主席來了！」我連忙放下地圖，跑到大門前，毛澤東帶着兩個特務員剛在門外下馬，我便請他到我的辦公室休息。他那時臉色發黃，形容憔悴。我問他：「主席不舒服嗎？」他回答道：「是的，近來身體固然不好，精神更壞。你近來好嗎？我有兩個月沒有到總司令部去，也有兩個月沒有見到你了！」

洗過臉，抽着烟，他接着說道：「我現在來鄂都縣督導蘇維埃政府工作。在此將有相當的時間住，我們在一起，一切問題可隨時談談。我住的房子，最好是離你不遠，那就更方便

了。」這時鄠都縣的負責同志跑來報告：「請主席到後面園裡休息，那裡是一幢獨立房子，還有半畝園地，一切已安頓好了。」毛澤東便隨着那同志去了，臨走時要我有空暇時到他住處去談天。

第二天晚上，我和劉伯堅去看毛澤東。他的愛侶賀士珍也來到鄠都，手裡抱着一個孩子。幾年不見，她已經從一個天眞活潑的小姑娘，變為一個沉靜的少婦了。我們談了一小時。毛澤東問起我贛江上游沿岸情況，及紅軍二十四師，三十七師的位置（那時我指揮的部隊有紅二十四師，三十七師，及兩個獨立師，六個獨立團），我一一告訴了他。

我們告別時，毛澤東握着我的手，誠懇微笑的說：「我們是井崗山的老同志了，希望你晚上有空時便來談談，我還有很多問題和你商量呢！」因此，我在晚間有空的時候，便到他家中去談談各種問題。毛澤東是很健談的。賀士珍更為我們弄些可口的食品消夜。三個人一面談談笑笑，一面喝酒抽烟，常常要談到深夜十二時我才走回司令部。

八月間的一天，我到瑞金總司令部去開會。會後，朱德在他的辦公室內，問起我關於毛

澤東的近況。我在告訴了他以後，乘機問道：「毛主席爲什麼親自到雩都縣住在那裡指導工作？」他幸災樂禍的笑道：「還不是被黨處分的嗎？」我不便向他追問，特跑到另一位與我相知最深的中央高級幹部那裡，問起這個內幕，他便將毛澤東被處分的前因後果，原原本本的告訴我，我才恍然大悟。

事情的發生，完全是爲了福建人民政府的一樁公案。當蔡廷楷，蔣光鼐等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的時候，中共中央除派潘漢年，張雲逸前往福州連絡外，黨中央政治局會議，曾討論應如何援助福建人民政府，應付國軍對福建進攻的問題。當時，張聞天，秦邦憲，周恩來等，都主張應速派第一，三兩軍團赴福建，與十九路軍駢肩作戰。因爲紅軍的增援，足以堅定十九路軍的鬪志，幷協助肅清其內部的動搖份子。但毛澤東堅決主張愼重行事，不宜輕舉妄動；並主張先請十九路軍配合紅軍，消滅駐閩西北的國軍劉和鼎部，紅軍方能援閩；否則，卽使要派援軍，也得待十九路軍表現堅決抵抗國軍進攻的行動，我軍方可適時增援。因此，積極援閩案便擱了下來。

但事情的變化，往往出人意料之外。由于國軍的行動神速，和中央突破戰術的成功，十九路軍在建甌，延平等處一敗塗地，福建人民政府，僅有一個月多的壽命便夭折了。因此紅軍援閩的一，三兩軍團，中途折回；堆集在海參崴待運的蘇聯軍援，因為沒有海口，也無法運來。這個重大的錯誤，當時第三國際加以追究。適值掌握實際大權的留俄學生派，平日既認毛澤東為保守派與游擊主義者，便將這個錯誤的責任完全推在毛澤東頭上。儘管毛澤東為舉世知名的「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但第三國際的一紙命令，毛澤東便受到「留黨察看」的處分。這種處分，僅較開除黨籍稍輕一點。在這期間，他的職權是完全剝奪了；黨務會議更無權參加。于是，毛澤東便悲憤的離開了中央政府大廈，帶着賀士珍和兩個特務員，來到雩都縣，名為「指導縣蘇維埃政府工作」，實際就等於封建時代的待罪或貶放。」

我回到雩都後，從旁觀察，毛澤東居處，除了我常到外，沒有什麼人來往。中共的高級幹部更沒有一個人來過。眞是門前冷落車馬稀，他的抑鬱和淒愴之感，是可想而知的了。

九月間，我收到了十塊銀元的特別營養費，買了一隻大母鷄，二斤猪蹄，先派人送到毛

澤東處，作爲晚上消夜時的食品。我到晚上九時才去，賀士珍將燉好的母鷄和猪蹄端上，毛澤東很高興，他的酒量很好，我們痛快的吃了一頓後，便滔滔不絕的長談起來。

不知是故意做作或出自衷心；當談到我過去被處分的事，他說當時并不贊同給予我以處分，但周恩來過于刻薄，才鬧成那件不愉快的事。同時，他說留俄歸國學生毫無鬭爭經驗，又要攬權，很多事情都被他們弄壞了，對他們表露着深深不滿。

酒後是最易引起人傷感的。我們追溯到井崗山鬭爭的往事，他喟然長嘆：「龔同志：我自從參加革命以來，受過了三次開除中委和八次嚴重警告的處分，這次，更將造成失敗的責任，完全推在我的身上，現在，可不是我們井崗山老同志的天下了！」說時竟凄然淚下。這時他有點輕微咳嗽，臉部更加瘦削而枯黃，伴着一盞熒熒的豆油燈，神情顯得非常頹喪。到十月中旬，紅軍決定西竄，毛澤東才由雩都回到瑞金，與中共政府人員集體行動。紅軍突圍最後決策的中央會議，毛澤東正在處分期間，沒有參加。在後來突圍行程中，沿途遭受國軍的追擊截堵，紅軍損失甚大，許多幹部表示不滿和動搖。當他們逃到貴州遵義時，得到了一

個喘息機會，便召開了一次中共中央會議。這便是有名的「遵義會議」。

善用策畧的毛澤東，利用着他與紅軍老幹部長期鬬爭的歷史關係，來檢討這一「突圍」決策的錯誤，將這一錯誤的責任，加在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秦邦憲等人的頭上，以打擊留俄歸國學生派。這個會議雖僅僅是撤了秦邦憲的總書記職，而以張聞天擔任總書記，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重要性又恢復了，由于毛澤東的湖南同鄉任弼時，彭德懷，滕代遠，劉少奇等的協助，和大部紅軍老幹部的擁護，由遵義西竄後的黨政軍一切大權，又重新回到毛澤東的手中了。

## 三　太上皇李特

中央蘇區時期，第三國際的駐華軍事代表李特，是個值得記述的人物。

李特是德國人，高個子，體格强健，軍人出身。過去是德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自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奪取了德國的政權，便嚴厲的捕殺德國共產黨黨員，使德共組織一敗塗地。他

在那時便逃亡到蘇聯，參加了第三國際軍事委員會工作，史太林對他極為信任。

經過情形是這樣的：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成立，佔領了相當大的蘇區，擁有十餘萬的紅軍，在當時第三國際控制下的各國共產黨，以中共實力最為雄厚。史太林為了要加强對中共的控制，幷領導中共從事武裝鬭爭起見，特由第三國際軍事委員會選出三個高級幹部（一位軍事委員會委員，二位幹事，李特為幹事之一），為第三國際駐華軍事代表，幷派中國留俄學生伍修權陪同他們到達上海，送往江西蘇區。李特是化裝天主教神父，偕同伍修權先行來到蘇區。其餘的二位，在香港前來蘇區的途中，受了檢查阻礙而折回（以上是伍修權對我說的），李特于是便成為第三國際駐蘇區的唯一代表了。

李特的主觀意識很强。在討論問題時，他提出來的意見別人不能反對；即反對，他也堅決的不放棄他的意見。他自認是第三國際派來的代表，居于最高的指導地位。在會議席上他的雄辯和傲態是令人最難消受的，我個人就嘗夠了這種滋味。

不過，他的軍事修養很有基礎，而且有決心，很機警，判斷力很强，對問題的解決也很

快。他初到蘇區時，專注重軍事問題，廣泛的聽取各紅軍高級幹部的陳述：在黨務方面，他完全信賴秦邦憲，張聞天等留俄歸國學生。

負荷第三國際的使命來控制中共的李特，他當然知道在怎樣的情勢下，才能掌握着整個的控制權。他起先是靜靜地觀察，靜靜地研究，當他澈底了解中共黨、政、軍各方面的情形和中共內部人事間的矛盾時，然後，他便一脚伸入，實際控制了決策的會議，逐漸使黨政軍一切決策的最後決定權，完全操在他的手中。他雖然不懂一句中國話，不識一個中國字，但這個第三國際的代理人，終因掌握了控制權而成爲中國共產黨的「太上皇帝」，和幕後決策者了。

他好抽香烟，而且必須是好烟，每天總在五十支以上。蘇區內貧瘠到了極點，根本無香烟可買。中共爲此特派人經常到香港去採購大批洋酒洋烟，經由潮安、大埔，而偸運到蘇區來。他又極好女色，不慣紅軍中那種枯燥生活。周恩來等爲了仰承色笑，想盡了辦法才找到一個體格健康，曾經讀過小學的農村漂亮女子和他同居，他倆雖然言語隔閡，但情感却很不

錯。可是，這個不幸的女子，到紅軍突圍西竄時，便被遺棄了。

他的食量很好；每日三餐，每餐要十多個大饅頭，半斤猪肉，四個鷄蛋及青菜，眞有兼人之量。後來他吃厭了饅頭，想吃麵包。但整個蘇區沒有麵包店，中共即設法找到了一位失業的麵包師，專爲他作厨師。對于這位太上皇的侍奉，可說是無微不至了。單以他個人的伙食計算，是數倍於一個紅軍指揮員的消耗量的。

他不會跑路，即使兩里路的短程，也要騎馬。若是要整天行軍，除了備馬而外，還要備一副担架，預備四個年富力强的轎伕，他騎馬倦了，便睡到担架上去休息；睡了一會又再騎馬。這個高高在上的第三國際代理人，雖在蘇區那種最貧乏的環境中，他的生活還是最舒適的。

## 四　日暮途窮的西竄

國軍第五次圍勦的軍事進展，到一九三四年八月，共東面福建，及南面贛州以南地區之

粵軍，均未向蘇區推進；但北面方志敏的北上抗日先遣隊向北突圍沒有成功，而紅軍主力擬轉於北面敵軍之碉堡線下，企圖以短促突擊消滅敵人的計劃亦遭失敗，敵軍主力已迫近廣昌、博生兩縣縣城之線，合圍之勢將成。紅軍主力利用既設之碉堡工事固守廣昌、博生，形勢逐漸不利。八月中旬召開的重要軍事會議，更加緊準備突圍，并派活動于贛江西岸湘贛邊區的獨立師蕭克（註五）部，號稱第六軍團，以任弼時爲政治委員，加强其政治領導。於八月下旬，經湘南轉向湘黔邊區西進，準備在湘西創立新根據地，預爲紅軍主力突圍後集中作戰的準備。

十月初旬，經過了一次慘烈的戰鬬，廣昌、博生兩縣相繼失陷。但紅軍損失不大，仍集中於廣昌，博生以南，石城以北的地區。因以一部固守沿線碉堡工事，主力準備機動出擊。同時，爲適應以後作戰要求，便利主力突圍起見，决定新的兵團編組及作戰計劃如下：

一·紅軍主力編爲野戰軍，由贛縣以南突圍西進，轉移至湘西地區，然後向湖南國軍之外圍採取攻勢作戰。

二•以紅軍之一部，及地方獨立師，獨立團之大部，編爲中央軍區守備軍，留于中央蘇區繼續作戰，以牽制國軍，掩護紅軍主力突圍。

三•紅軍一、三、五軍團，及紅八軍紅九軍編爲野戰軍（總兵力約十萬人），中央黨部及蘇維埃中央政府各機關，均隨野戰軍行動。

四•紅軍二十四師、三十七師，紅軍野戰砲兵團，江西獨立師，福建獨立師，紅軍幹部學校，軍事委員會特務團（總兵力約三萬七千人），編爲中央軍區守備軍。

五•福建江西兩省地方部隊除動員參加紅軍，充實野戰軍外，槪編爲獨立團，統歸中央軍區司令部指揮（約有一萬人）。

六•閩浙贛邊區方志敏部，歸中央軍區司令部指揮。

七•高級人事調整如下：

軍事委員會主席　周恩來（兼）

國家政治保衞局長　鄧發

野戰軍總司令 朱德
參謀長 葉劍英
政治部主任 王稼祥

中央軍區司令員 項英
政治委員 項英（兼）
參謀長 龔楚
政治部主任 陳毅
國家政治保衛局分局長 譚震林

野戰軍總司令部設六局，第一局主管作戰（辦理野戰軍各兵團作戰業務），第二局主管情報，第三局主管教育，第四局主管後勤，第五局主管通訊，第六局主管游擊作戰（辦理並指導二、四軍團及各地區游擊作戰業務）。

十月下旬，紅軍主力向贛縣以南大庾、信豐間地區突圍西進，沿湘粵桂邊區轉向湘黔邊

境北進；國軍以主力向野戰軍追擊。幷從新調整繼續進攻中央蘇區部署。

紅軍主力突圍後，國軍主力卽分路啣尾追擊；而沿途各地的國軍，亦分頭截堵，襲擊。紅軍損失慘重，且無停留集中的機會，而預定以蕭克部建立湘西新根據地的企圖，亦因湘西各地武裝的反抗與國軍的進勦而失敗，竄到貴州省的沿河縣，與賀龍的紅二軍團會合。於是紅軍主力不能不放棄預定的作戰計劃，繼續向黔川西北逃竄。以後幾經艱險，才經西康、青海而到達陝北。這一段長途的逃竄，便是中共所自詡爲「世界軍事史上的奇蹟」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附註

註一：賀龍部，於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間，在國軍第四次圍勦時被迫放棄洪湖蘇區，轉移至湘黔邊區活動，至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蕭克，任弼時所率領的紅六軍團到達貴州沿河縣與賀龍部會合後，改稱爲紅軍第二方面軍。

註二：紅四方面軍，在國軍第四次圍勦時，被迫離開鄂豫皖蘇區，流竄至四川東部及北部地區，創立新根據地。

註三：勝利縣——是永豐縣屬之龍岡墟，中共因反國軍第一次圍剿時在該地俘擄張輝瓚，取得反圍剿的大勝利，乃將該墟改爲一個縣，名勝利縣。

註四：劉伯堅——四川人，國學修養很好，在國共合作時期，曾任馮玉祥軍之總政治部主任；在紅軍曾任第五軍團政治部主任。紅軍主力突圍時，爲粵軍俘擄，後被殺。

註五：蕭克，任弼時所率領的紅六軍團，是紅軍主力突圍的先遣支隊。

# 第十五章　蘇區剖視

## 一　崩潰了的蘇區經濟

紅軍主力——野戰軍突圍的時候，交給中央軍區司令部的現金大洋劵十萬元、及稻穀三百萬觔（司馬觔），而中央軍區司令部所屬的紅軍共有三萬七千人，算計起來，不足維持兩個月。中央軍區司令部的任務，是要繼續領導中央蘇區的鬬爭，盡可能的保存并發展這一塊赤化了將近六年的地區和人民。我在接任中央軍區參謀長的時候，即與司令員項英研究今後情況的變化和作戰方針，當時我們判斷野戰軍突圍後，圍攻蘇區的國軍主力，仍將向蘇區進攻；今後的作戰方針有二：

一•國軍如仍以大兵團向蘇區圍勦時，我軍卽依據閩贛邊境的武彝山脉轉移戰場，與敵

軍進行游擊戰，以求保存實力，待機策應野戰軍作戰。

二•如國軍進攻蘇區的兵力不大，我軍有將其擊潰的把握時，即集中力量轉移攻勢，各個殲滅敵人，以保存蘇區的領土，配合野戰軍作戰。

這是野戰軍開始突圍時，中央軍區司令部的軍事決策。但無論運用游擊戰、或陣地戰、人力、物力、財力的消耗與需用不斷的補充是必然的；而目前這個地區的戰爭資源，人力，物力、和財力、是否還能夠支持呢？這是身為幕僚長的我，必須要明確了解的事，我很急切的做了一個詳細調查和研究的工作。在進行這一工作時，曾召集了江西福建兩省的蘇維埃主席，和中共省委書記到司令部來開過一次會議，詳細的詢問各地區內人力、物力、財力的一切情形。會後我幷親到長汀、瑞金、雩都三縣縣城及瑞金會昌的鄉村去視察，得到的結果，使我非常的痛心和失望。

中央蘇區境內，在紅軍未到以前，雖然是山多田少；但全區人口，不過一百五十萬人左右，人民的生活相當安定。出產以稻穀、木材、土紙為大宗，其次是猪、牛、鷄、鴨、……

等。廣東潮、梅，各縣的糧食，多仰給這一地區的輸出。對於交通運輸，福建方面，有經上杭峯市流入大埔韓江的汀江爲運輸的水道。江西方面，有由會昌經筠門嶺至廣東平遠的大路（當時未完成公路線），大量的稻穀猪牛便由這一路線輸出，另有綿延數百里的贛江，上游可通大庾，下游直達南昌，爲贛南物資交流的水道。這一地區的人民，經年以其有餘的農產品輸出，去換取他們所需的布匹、食物、及一切日用必需品。這一個地區是一個足以自給的農村經濟社會。

自一九二九年春，朱、毛，率紅四軍佔領了這個地區之後，因爲是閩粵贛三省的邊區，有武彝山脈連接到九連山脈的廣大山地，在地形上與地理環境上都是一個最好的紅軍游擊根據地，并有足以自給和發展的農村經濟條件，比較以前有良好地形而缺乏糧食的井崗山不知要好了多少倍。所以朱德毛澤東等，便在這個地區積極的展開蘇維埃運動，擴充紅軍，造成了一個廣大的新蘇區，引起了「無產階級祖國」蘇聯的重視。史太林稱中共爲世界共產主義國家的第二位（註一）。但中共所缺乏的東西還太多，而蘇聯給予中共的經濟援助仍是極

少。除了支付白區的地下工作經費外，還不足購買紅軍必需的通訊器材，被服，醫藥等等費用。軍費完全是就地籌給，所以自紅軍開到後，即發動民衆打土豪，分田地，組織蘇維埃政府，由農民直接向政府繳納地稅。由一九二九年春起至一九三零年冬止，初期正式紅軍的數量不過四萬人。這一期間，紅四軍經常向吉安、永新游擊，紅三軍紅五軍則向湖南游擊，在游擊中籌措軍費。那時，閩贛邊區的地方人民武裝，也不過一萬人左右。人民分了田地，不用再向地主繳納地租，祇是向各縣蘇維埃政府繳納地稅。人民的負担減輕了，自然全踴躍納稅，因此，地稅的收入，爲數甚大。儘足供應紅軍和地方政府以及中共黨部等工作人員的需用。對於人民的生活，並無重大的影響。

自一九三一年一月，擊破了國軍對蘇區第一次圍勦之後，紅四軍紅五軍均集中在蘇區，紅十二軍編組成立，紅七軍亦由廣西開來集中，紅軍的數量就大大的增加了。國軍對蘇區的圍勦跟着展開，軍費的支出更加浩大。中共爲了應付戰爭的需要，採取了以農產品實物作準備金的蘇幣開始發行，人民可以蘇幣代替實物繳納各種稅捐，當蘇幣發行的第一年，很得到

人民的信用；可是至一九三一年冬，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成立後，由于紅軍數量繼續擴大，軍費和政費的支出也同時增加，又因國軍對蘇區的封鎖加强，蘇區與外面的物資交流更加困難了，中共祗有增加發行蘇幣，來應付支出；其結果當然是通貨膨漲，使蘇幣逐漸的貶值。那時蘇維埃中央政府的經濟政策，一面鼓勵發展蘇區農業生產，一面提高地稅收入，統制物資交流；發展合作社事業，一切對蘇區外的貿易均由合作總社所壟斷。同時統制物價，以低廉價格收買農產品；且運用走私偷運的方法，勾通封鎖蘇區的國軍和接近蘇區的地方政府，將蘇區內的物資如糧食，木材，土紙等運輸出口，套回民生必需品的食鹽，布匹，火柴……等運入蘇區。在經過合作社的物資交流中。取得加倍的盈利。這對于蘇維埃政府的財政收入，佔了相當重要的地位。但戰事在不斷的進行，紅軍日益擴大，不僅軍費增加，所需的戰爭資源也跟着增加。不得已，祗有向蘇區內的人民身上打算。可是農村生產，因壯丁大量調入紅軍，而赤衛軍，少先隊，運輸隊等，爲了鬬爭局面的緊張，日夜分佈在山上放哨，站在路口盤查，及幫助紅軍運輸，配合紅軍作戰，幾乎沒有時間從事耕作；因此人力大感缺乏，農

事多數是婦女和老年農民及小童担任，加以缺乏肥料，耕耘不力，生產便大大的萎縮下來。迨至紅軍主力突圍前，中共還運用嚴格統制糧食的辦法，秋收後每人祇許存穀一百斤，其餘的存糧全部由蘇維埃政府照實價收買，經由合作總社大量的運往廣東方面出售，造成了這一個支持紅軍戰爭五年零九個月的中央蘇區，人財兩空。

在中共突圍時，除帶走了十萬紅軍外，還徵調了五萬以上的壯丁，担任運輸工作，跟隨着紅軍突圍，蘇區內除紅軍及獨立師，獨立團外，已找不到一個五十歲以下的壯丁，即十歲以上的男童亦不多見了，殘留在蘇區的是一些臉黃肌瘦的婦女和垂死的老人，此外，還有紅軍的傷兵和病兵。

商場呢？早已在發展合作社，消滅商人中間剝削階級的政策下打倒了，過去點綴着市面的小販、小食店、雜貨店，因爲紅軍主力突圍走了，蘇維埃中央政府各機關的工作人員也跟着走了，他們已無生意可做，大部份亦跟着關門倒閉。

整個蘇區人民的家裡，所存的是不足兩個月的糧食，其他的物資都精光了，現金也沒

有了；存着大堆的蘇幣也成了無用的廢紙，蘇區的經濟不僅是在崩潰，簡直是徹底的毀滅了。

以上情形是我耳聞目見的實況，在這個沒有了戰爭資源的地區內，我們中央軍區司令部所屬的部隊還能繼續在這裡作戰嗎？我們還能希望保存這一個中央蘇區嗎？

## 二 刺刀下的人民生活

蘇區內經濟狀況，既如上述，人民生活的困苦，是可想而知的。可是，他們不僅受經濟壓迫，而且還受着嚴重的精神上和肉體上的痛苦。他們早已由安定平靜的生活，走上飢餓死亡的邊緣了。

在紅軍未到之前，大多數的蘇區人民是務農，每日工作六小時至八小時，剩餘的時間便是在大樹下相聚談天，或者在小茶寮中喝茶下棋，消磨空閒的時間，他們經常吃的雖然是兩餐青菜飯，一餐雜粮或白粥，但每週總可食點肉類。在一般中國農民的營養標準下，幷不算

壞。

他們穿的雖是大布粗衣，但都很整潔，每年每人總要添置幾套新衣，尙不至於挨冷受凍。

可是，在紅軍來了之後，「打土豪」「分田地」，寧靜的鄉村，秩序便大大的混亂了。地方蘇維埃政府成立，工會，農民協會，婦女會相繼組織，今天開會，明天開會，再沒有餘暇的時間去喝茶聊天了，接着，又組織赤衞軍，少先隊，担任維持治安和警戒的任務。國軍來了要「空室清野」，紅軍回來要慰勞歡迎，人民對於這種生活方式，已感到萬分的痛苦與厭惡。

何況，緊接而來的是：鬥爭、屠殺、參軍、勞軍、幫助紅軍運輸，幫助紅軍家屬耕田，耕種公田（註二）；儘管他們有自己固定的農業工作，但這些紛至沓來的義務勞動是必須要担承的，於是，婦女們，及已經脫離生產的老年人，連尙未成年的少年人，也都投入了生產工作，從事「超負荷」「無代價」的勞動。

當青黃不接的春荒時期，往年縱有缺粮，也可以向親戚朋友處借來維持，但這時有錢的人跑光，殺光了，農村是普遍的貧窮。在紅軍佔領的初期，粮食統制尙未嚴密，其中雖尙稍有餘粮的人，可是並不敢借貸與人，深恐招致「高利貸」的罪名而遭受淸算；於是，大多數農民便由吃三餐而改爲吃兩餐，晚飯改爲吃粥，或雜粮，甚至吃草根來維持生命。

到了秋收以後，還公粮，納穀勞軍，買公債，獻金買子彈，慰勞傷兵、慰勞紅軍家屬，一次又一次的壓搾，將人民的存粮和金錢，完全搾乾。在一切貢獻於革命戰爭的口號下，連番薯青菜都要向紅軍捐獻，人民不得自由享受。

婦女們更苦，在十萬紅軍十萬雙鞋的口號下，晚上全點着一盞豆油燈來趕着替紅軍做布鞋。挨更熬夜還是小事，最困難的是沒有錢去買做鞋的布料。不少因此而出賣了僅有的粮食來購買布料，餓着肚子來慰勞紅軍。

因爲國軍的封鎖嚴密，食鹽極難運進蘇區。外界一元可買到十五斤，蘇區內一元只能買一斤。後來食鹽來源幾乎斷絕。廣大的人民根本沒有鹽吃，紅軍也祇有挖取鹽店內的泥土來

熬煎取鹽。因此，蘇區人民，因缺乏鹽質而失去了健康。同時，因無鹽調味，而以辣椒來代替，以致發生爛脚生瘡，經久不愈。

中共對蘇區統治，可以說，强化到了極點。人民的自由當然完全喪失；從甲村到乙村，探親訪友，都要經過村蘇維埃政府主席的批准，發給「路條」：否則就不能通行。人民彼此很少談話，因一不留心，就會惹上反革命的罪名。在共幹捐錢派粮時，絕不能反抗，如果表示不滿，那便是「不革命」；照辯証法的羅輯，「不革命便是反革命」，誰還敢因此而去冒一個殺頭的罪名呢？掙扎在死亡邊沿的人民，除了參加紅軍到前線充當砲灰外，祇有在後方遭受奴役；由於勞動過度，營養不足，缺乏醫藥，又加以精神虐待，除靜待死神的降臨外，別無生路，因之，人口的死亡率遂遽速地增加。鄰近戰線的地方，很多村莊，只剩下斷壁頹垣，沒有一個人。有的村莊，縱剩下一些老弱婦孺，也在恐怖凍餒之下過着非人的生活。

## 三　蘇區的教育

蘇區各縣教育，在紅軍未佔領前，雖然落後，但每縣至少有一個縣立初級中學，鄉村中也普遍設立了小學。在自由主義的教育方針下，一般青年，可以隨其意願，學習一些新的知識和技能。這種教育，幷不是專爲有錢人服務的。中產階級的子弟，就學的也很多，由此而升入高中大學的也不少。對於貧寒子弟，多數有獎學金，他們一樣可以獲得深造的機會。

紅軍佔領的初期，只有長汀縣立中學還繼續開辦了一年，其他各縣的中學，因爲學生的家長恐遭到富戶的罪名，不敢再讓子弟讀書，以致學生人數銳減，便也就只好停閉了。中共這時正在銳意建軍，對于中學教育幷不重視，因爲中學的停閉，反可將過去的教育經費，用到擴軍方面去，而失學的中學生，又可以鼓勵其參軍以增加紅軍的實力。因此，蘇區就根本沒有一間公立或私立的中學了。

農村中的小學教育，是由蘇維埃政府以義務教育的方式辦理的。但過去的課本，既然作廢，新編的課本又供不應求，學校普遍鬧課本荒，學生缺乏教科書，教師的教材也缺乏之。教

師們天天又忙着開會，且多數還兼着鄉蘇維埃政府的工作，因此，實際的授課時間，每天祇有三四小時，僅能夠教兒童認識幾個字，灌輸些最膚淺的共產主義理論，與違反人道的革命鬥爭方法。同時并組織了少年先鋒隊，兒童團，鼓動他們去參加農村中的各種淸算，鬥爭會議，反對父母的約束，甚至於在屠殺豪紳地主時要他們充當劊子手，使這些毫無人生體驗的兒童，從小便養成殘忍暴戾的個性。

此外，辦有夜校。在消滅文盲的口號下，强迫十六歲以上四十歲以下的成年人入夜校上課。其主要的目的，是鼓吹共產主義思想，挑撥階級仇恨，教他們識字不過是補助工作。婦女的夜學，專吸收青年婦女參加，識字課程外，煽動她們反封建、反束縛，要她們打破貞操觀念，鼓勵她們戀愛自由。

蘇區當時人才缺乏，尤其缺乏對教育學理有研究的人才。教育制度可以說根本沒有，中共唯一指示的原則：「打倒一切舊的教育，鼓吹一切新的教育。」因此，在實施時，步驟凌亂而帶着嚴重的盲動性，完全忽視了文化與學術的進步，而在理論上，示範上，打破倫理觀

念，强調階級意識，挑撥階級仇恨，只促成受敎育的人，充分的發揮殘忍的個性。

## 四　殘酷的農村階級鬥爭

一九三三年四月中旬，我率模範團由淸流南下，道經長汀縣城。那天晚上，有位五十多歲姓劉的中醫生，特地跑來見我，這位誠樸慈祥而醫術頗精的儒醫，兩年前曾爲我醫過病，因而與我有一段交情，他老淚縱橫的告訴我：「三十年來我都是靠當醫生來維持一家數口的生活，因爲省吃儉用，積蓄了一點錢，早年在鄉間買了七畝田，還在縣城開了間藥店。蘇維埃政府成立後，我在鄉間的田地被沒收了，一家的生活，于是僅靠着藥店的少數收入和我行醫的酬金來維持，而政府每次派下的捐欵，我都設法照繳，并沒有任何拖欠的情事。近一年來，店裡兩個工友，先後都去當了紅軍，店務完全由我自己一人料理，而他們的工資，我還是遵照政府的規定，按月送給他們的家屬。惟近來沒有生意，屢次想停業，政府都不批准。最近不知爲了什麼，又要我繳出一筆大捐欵。你想，我已一貧如洗，就是傾家蕩產，也無法

籌出這筆錢來。這怎麼辦呢？我想來想去，只有請求你救救我，不知你願不願意！我聽了他的一番訴說，心裡眞有說不出的痛苦！替他去主持正義嗎？一則恐怕不發生效力，再則甚至引起地方政府對他更深的仇恨；不理他呢？我的良心又覺得不忍。在這樣的矛盾心情下，所以在離開長汀時，便鼓着勇氣，特將此事面告當地政府負責同志，要他們查明辦理。不料，經過十多天後，當我由閩西再回到瑞金時，那位醫生已被殺害，藥店也被政府沒收，他家的寡婦孤兒已流爲乞丐了。我聽到這個消息，異常痛苦，也非常憤怒！好幾晚，爲了這件事而不能入睡。

一九三三年七月，那時正是展開查田運動的時候（註三），我由會昌到瑞金去參加紅軍總部的軍事會議，路經距瑞金十多里的龍坊，因爲天氣炎熱，到村裡去找一間民房休息。這個龍坊，全住的是姓龔的居民，我進入休息的是一棟很大的青磚平房，外面非常整潔。但等走進大廳時，却意外地感到凄涼與蕭條，因爲屋子裡的傢具都沒有了，祇有一張爛方桌 和一條長板櫈，屋子裡有兩個中年婦人和一個老年婦人，還有三個小孩子，全穿着破爛衣服，

形容憔悴，看見我帶着四個携有手槍的特務員進來，非常驚恐，小孩更嚇得哭了起來，我的特務員連忙叫他們不要怕，我們是暫時來休息片刻的，他們才半信半疑的跑到廚房裡去爲我們煎茶。特務員借了他家一個舊臉盆，盛些冷水給我洗臉，他們聽到特務員，稱我爲「司令員」，便悄悄地問：「這個司令員姓什麼？」特務員不經心的說是姓龔，她們馬上帶着三個小孩子，一家六口跪在我們面前，求我救救他們的命！

老太婆哭哭啼啼的說：「我家的老頭子是個讀書人，兩個兒子也讀了點書，因爲家裡有十多畝田，兩個兒子便在家裡耕地。上半年老頭子和兩個兒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我們到處張羅了一百二十塊錢，並將女人家全部的首飾湊足起來，送去贖他們。但金錢繳了，老頭子仍被吊死，兩個兒子也被殺了。現在，他們還逼我們繳五百光洋，否則我們六口人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員呀！我們飯都沒有吃，那裡還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們說句公道話，我家老頭子在世的時候曾經說過•有位紅軍軍長是我們姓龔的，他很早就想去找你，另外兩位小叔也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許我們離開一步，今

天眞是天開了眼，你來到我們家裡，司令員呀！你無論如何要救救我們！」說罷，她便不住的叩起頭來，他的兩個媳婦和小孩，也跟着叩頭，流淚。

這時，從隔鄰來了兩位農民，也跑來幫助說情：「他們家裡實在沒有錢了，請司令員看在同宗面上，救救他們寡婦孤兒的六條命！」我問這兩個農民：「你們是不是農會會員？」他們回答說：「是的！」「那麼你們爲什麼不替他們証明呢！」他們無可奈何的說：「我們也曾說過兩次，村長說我們袒護自家人。假如再說情，連我們都要受處分呢！」處在這個場面，任你鐵石心腸也要感動，何况我一向是懷着人道主義的精神來從事革命的呢？過去我祇知道在某些方面中共的農民政策太過火了，但因環境的限制，使我無法和人民生活在一起；又因種種關係，人民有痛苦也不敢向我伸訴，我對人民的痛苦自然很多隔膜。前此爲了長汀劉醫生的事件，已使我心中非常難過，現在，擺在我眼前的又是這樣一幅血淚交流的場面，叫我怎樣向自己的良心交代？於是，我毅然地答應了替他們想辦法。他們聽了我的話，這才含淚的站立起來。不過，這件事，我後來還是沒有辦通，雖然我幾次下了決心，必須選擇一

個適當的時機，將這些實際情形向中共中央當局報告，但終於沒有這個適當的機會，負人負己，慚恨每難自已！

自一九三三年秋，中共實行消滅地主的農民政策後，農村階級鬥爭更趨嚴重，清算接連清算，殺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殺到紅軍的幹部家屬，如江西獨立師長楊遇春，他是瑞金武陽圍人，父母伯叔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財物全被沒收，他以參加革命多年的結果，弄得家破人亡，迫得他冒險逃出蘇區，向國軍投降，掉轉槍頭，參加到反共的隊伍中去。無產階級出身的紅九軍軍長孔荷寵，也因不滿現實，在紅軍大學高級研究班畢業後，逃出蘇區投降國軍。其他紅軍中下級幹部逃亡的更多，地方幹部中逃亡的有石城，寧都的赤衛隊長，許多縣份的村、區赤衛隊長，以及大批人民全紛紛逃出蘇區，走向吉安，贛縣一帶的國軍區域去。

農村中處決地主反動的手段，是萬分殘酷的。他們在未殺以前，用各種嚴刑拷打，以勒索金錢，等到敲搾凈盡，才加以屠殺。在「斬草除根」的口號下，被指爲豪紳地主的家中連襁褓的嬰孩也不免于死，所謂「人性」這個名詞，共產黨的字典中，已經是找不到了。

## 五　統治階級的眞面目

中共打着革命的旗幟，其目的是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以實現共產主義的。

我曾經組織幷策動過蘇維埃運動，我深深地體驗到，中共在蘇維埃運動時的革命，幷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中國的無產階級，只是被愚弄，被欺騙的對象。

中國的無產階級——工人，及其同盟——農民，他們在數千年來的文化薰陶之下，他們都是愛和平，重道德，敬業樂羣，樂天知命的，對于中共的激烈鬥爭政策，幷不感到興趣。因此大多數的人們，都採取躲避觀望的態度，只有地方上一般游手好閒的地痞流氓，却歡喜中共，中共也看中了他們，認爲他們是貧苦工農的身份。其實，這些人早已脫離了生產，乘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機會，來滿足他們的發財妄想。他們惟中共之命是聽，幷且還要做得更爲激烈以表示他們的忠實，于是，這些便被中共認爲是革命的積極份子，更盡量的吸收到黨裡面來，不斷的加以提拔，大胆地將他們捧上統治階級的寶座。因此，這一批鷄鳴狗盜好

吃懶做的壞蛋，便一躍而爲新統治階級了。他們大多數成爲地方蘇維埃政府的重要人物，或農會工會的主席。一旦掌握了地方政權，或領導着民衆組織，他們當然無法無天，胡作胡爲了。第一：他們過去或者受過了善良的人們的厭惡及歧視，現在便利用「翻身」的機會，吹毛求疵來報怨洩憤。第二：他們過去窮困久了，打土豪是唯一的發財機會，可以不勞而獲，坐享其成，所以在打完土豪之後，又將富農稱爲地主，中農升爲富農，極盡其敲詐勒索的手段。第三：他們現在有錢有勢，便藉着「男女平等」的口號。以提倡婦女參加革命工作爲手段，將農村中年青貌美的女郎，任意凌辱與玩弄，如果她們反抗，便用種種罪名，加以迫害，許多農村女子，便在這種淫威下橫受蹂躪，而一些堅貞不屈的便犧牲了生命。

有一個時期，中共也覺得這種情勢非常嚴重，乃提出「反貪污，反腐化，反對保守報復的農民意識」的指示，在黨內展開思想鬥爭，進行思想教育，企圖糾正地方幹部的錯誤。可是，這些流氓地痞的本質太壞，任你如何鬥爭，教育，都無法改造糾正。他們已變成了新興的統治階級，成爲蘇維埃的主幹，如果沒有他們，蘇維埃也就一無所有了。所以，揭穿了蘇

區內統治階級的面幕，完全是一羣貪污腐化，卑鄙齷齪的魔鬼在狂舞！像這樣的無產階級專政，怎不令純潔的革命份子寒心呢！

附註

註一：中共是共產主義國家的第二位——一九二三年德國希特勒奪取政權以前，德國共產黨的勢力很大，是世界共產黨的第二位。迨希特勒專政以後，德國共產黨被摧殘了，中國蘇維埃運動展開後，中共便成了世界共產國家的第二位。

註二：公田——分田時各鄉蘇維埃政府留出一部份好的田地為公田，由該鄉農民共同負責耕種，收穫的稻穀歸政府。

註三：査田運動——一九三三年六月，中共實施消滅地主反對富農的政策後，於六月初旬召開了中共蘇區八縣的査田會議，決定了淸査地主富農的具體辦法，根據毛澤東七月份査田運動的初步總結報告中有：瑞金與博生（寧都縣因趙博生陣亡後改為博生縣）兩縣共査出了二千幾百家地主富農……最好的例子是瑞金的壬田區……査出了地主富農三百家，槍斃了十二個反革命份子……。其殘酷情形，可想而知了。

# 第十六章　瘋狂的大屠殺

## 一　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權威

在蘇維埃政府時期，中共的政治警察制度是完全效法蘇聯的。警察最高機構是國家政治保衛局，這機構名義是隸屬於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實際上直接受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指揮。國家政治保衛局的主要任務，是防止與取締反革命份子的活動，鞏固蘇維埃政權；同時它又是監視着全體黨員，人民，與所有的高級幹部。它有權隨時拘捕，審訊，與處決每一個它認爲有反革命嫌疑的人。除了黨的高級人員，須要報告中央政治局審查議決外，中下級幹部及普通平民的處決，根本不須要任何機關的核准。

它的組織：在國家保衛局之下有省，縣分局，鄉村特務員，和機關部隊中的特務員。它

們執行任務時，與各級黨部及各級蘇維埃政府經常取得密切連繫，以聽取各方面有關於反革命份子所有活動的情報；并充分運用黨員為實施調查工作時的細胞，使他們在各機關，各部隊，和鄉村中的每一個角落，監視着每一個幹部和人民，同時也互相監視。

他們逮捕人民或幹部，大多在夜間。執行時往往不說明理由，第一句話便是：「保衛局請你去問話」，說完便把人帶走，反抗是絕不可能的事。被傳去問話的人，多數是從此失踪了。失踪的人絕不會宣佈任何罪狀或透露任何消息。

國家政治保衛局就像一條絞索，套在蘇區每一個人民和幹部的頸子上，它高興時，可以讓你在圈子內多活幾天，不高興時祇要將絞索收緊，便要你嚥下最後一口氣。他又像一個恐怖的魔影，時時刻刻跟隨着你，使你由出生到死亡，始終在它的控制之中。

## 二 大規模屠殺的執行機構

中共在準備突圍西竄時，為了要使紅軍的組織更加強固，保障在突圍時沒有逃跑及投降

的軍政幹部，以保持軍事機密，特別將紅軍部隊，地方部隊，蘇維埃政府中的各級幹部與員兵，來一個嚴格的整肅。一時被撤職查辦的幹部達數千之多。中共特在瑞金縣屬之九保、麻田、沿壩田心墟一帶，設立了十多個收容所。

收容所就是變相的集中營。到收容所的幹部，經過了所長登記，便有住，有食，還可在附近行動，但不得離開指定範圍。他們表面上很自由，住的附近幷無紅軍看守。但外圍就不同了，重重叠叠的赤衛軍，少先隊守在路口，沒有蘇維埃政府的路條是不准通行的。

中共為了要處置這一大批被指為動搖的幹部，和少數殘餘的「反動階級」，在瑞金北與雩都邊界的大山叢中選擇了一個山深林密的山腹，設立了一個特別軍事法庭。有一座木板房屋作為審判廳，一座警衛員兵及法官居住的宿舍。離開法庭一百五十碼，有一條二丈多寬的山澗。澗上架着小木橋，橋下亂石縱橫，荆棘叢生，距離橋面有二丈多深，人在橋上過，就覺得胆戰心寒，恐怖萬狀，這條冷僻的山徑，平日就很少行人，這時更已全部封鎖。特別軍事法庭設置好了，幷在不遠的山麓，挖了一條大坑，那些在收容所裡被撤職的幹部，動搖份

子，反動階級，便三個五個，一羣兩羣的送到特別法庭去審訊，與其說是審訊，不如說是宣判，因爲審的時候，手續非常簡單，祇要點了名，便對犯人宣佈：「你犯了嚴重的反革命錯誤，革命的隊伍裡不能容許你，現在送你回去，」說完，便是背着大刀的劊子手，押着犯人到預先挖好的大坑邊，一刀結果了性命，飛起一脚將屍首踢落深坑中去，便在坑邊扒些壘積着的泥土掩蓋在屍體身上，另外一種最慘酷的死刑，便是要犯人自己挖坑，挖好後纔將他一刀殺掉，或者就是活埋，這種殘酷的歷史性大屠殺，直到紅軍主力突圍西竄一個月後，才告結束，在國軍克復蘇區幾個月之後，中共所製造的超歷史殘酷的大屠殺才爲人所發現，「萬人坑」這恐怖的名詞，始爲蘇區以外的人所知，其實區內的人民，早已聞之戰慄了，

## 三　整肅到紅軍總指揮頭上

一九三二年一月，季振同率部在宜黃起義投共，本書第十章第一節已敘述過，當時中共委他爲紅五軍團總指揮。雖然實權操在中共黨員趙博生，董振堂的手中，但中共在表面上對

他很客氣，季振同自己也感覺到躊躇滿志。

可是，在調整第五軍團幹部的時候，他與趙博生，董振堂的意見便發生衝突。因爲他主張以原任警衛旅的團長黃宗岳爲師長，但趙博生却極力反對，幷說他培植私人派系，不顧革命利益，結果將黃宗岳撤去兵權，調總指揮部任副官處長。因此季振同與黃宗岳大有「飛鳥盡，良弓藏。」的感觸，心懷不滿，口出怨言。於是，趙博生將這種情况報告上去。中共接到報告後，深恐這種情緒會影響到第五軍團內部的團結，乃迅將季振同，黃宗岳調來瑞金縣一個鄉村中；名爲「讀書」，讓他們有一個研究馬克思學說和中國革命問題的機會，實際卽是予以軟禁。惟對外行文方面，初期還是用紅五軍團總指揮季振同的名義。這是一九三二年六月的事。

當季振同被軟禁時，我曾去看過他一次，他住在一座很整潔的民房內，屋子裡有很多共產主義的理論書籍。他的飲食起居還很好，有二名衛士隨侍在身邊，他的精神顯得很頹唐。我安慰他道：「有機會讀書，總是很難得的，將來你一定還要負很重大的責任的！」他回答

我一個苦笑，笑裡藏着無限的辛酸與痛苦；別後，我不敢再去看他。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就聽說李振同和黃宗岳兩人同時被殺害了。

李振同事件，還有一點餘波，就是紅五軍團政治委員蕭勁光（註一），政治部主任劉伯堅，當時也因「沒有堅定階級立場，忽視革命利益，措置失當」的罪名，受了撤職的處分。蕭勁光且被開除了黨籍一年。

## 四　與林野夫婦共進最後的晚餐

林野是福建龍岩縣人，黃埔軍校畢業的中共黨員。紅四軍在湘南成立時，他在軍部任少校參謀，參加革命鬥爭的歷史，相當長久。

然而，因爲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階級，影響到中共對他的信任。當一九二九年朱德率紅四軍攻陷龍岩時，他的父母被當地農民在暴動時殺害了。當地共幹並要求朱德將林野送交地方處置。但朱德不允，並痛斥當地幹部。因之，林野便繼續在紅軍中工作。

紅十二軍在福建成立，林野調任該軍參謀長。由於他得罪陰險詭詐的政治委員譚震林，又被調任紅軍學校教育長，並種下了他異日慘遭殺害的禍因。

一九三四年冬，紅軍主力突圍時，林野調野戰軍總司令部任參謀。「大軍行了兩天，因為他的脚部曾受過重傷，行動不便，朱德便要他回中央軍區司令部來工作。當他回到瑞金的那天，他的妻子剛由上海大夏大學畢業，由福建跑來江西，和他團聚。久別重逢，林野夫婦當然是極度歡悅的。他倆在瑞金住了三晚，便同來西江市中央軍區司令部，請示工作。

他到部的第二天，譚震林秘密地跑到我的辦公室中輕聲的對我說：「報告參謀長！我們準備請林野回家去！」我誤會了他的意思，以為要林野回福建龍岩去做地下工作，便回答他說：「司令部正需要林野這樣的參謀人才，我看還是另外調一個人到到龍岩去吧！」譚震林獰笑了一聲：「不是要他回龍岩去，是要他回老家！」我聽了不覺打了個寒噤，連忙問道：「林野同志是老黨員呀！他並沒有犯錯誤啊！」譚震林嚴厲而堅定的說：「我應該報告你的是，林野同志的思想向來不正確，立場也不堅定，而且本身又是一個反革命的地主階級，中

央早已對他懷疑。現在他回來了，在此艱苦鬥爭中，我們再不能容許他混在革命隊伍中。我已經報告項英同志，并已得到了他的同意了。」

我聽了這一席話，心裡憤恨極了，像林野這樣一個年青有爲的革命同志，并沒有顯著的錯誤，爲什麼要將他殺害呢？譚震林的地位雖然比我低，但他是國家政治保衛分局長，直接受中央領導；而且他爲人刻薄，鐵面無情，我決無權阻止他；但心中打算，如能說服項英，也許可以挽救林野的生命。

於是，我找了一個機會去問項英：「林野究竟應該怎樣處置？你是不是曾經考慮過？」項英很莊重的說：「譚震林的意見很對。處在這個嚴重鬥爭的環境，爲了革命的利益，也就顧不到私人的感情了！」我聽到他們口口聲聲「爲了革命的利益」，知道老項已被譚震林說服，無可挽回。

那時瞿秋白和阮嘯仙同住在附近，我平日和他們有私人友誼。尤其阮嘯仙是早年廣東省農會的委員。爲多年的老同志，又同在蘇區內工作多時，特別感到親熱。我想若能夠得到他

們兩個說話，或者還有一線希望。於是我立即跑去找他們。告訴他們這件事情，幷說「若將林野殺了，難免不影響一般中央軍區司令部同志們的心理。現在要挽救林野，除了你們兩位外，再沒有第三者了」。他們聽了以後，互相望了一下，瞿秋白先開口說：「這件事，我同意龔同志的說法，不過現在我們也不便說話了！」阮嘯仙接着說：「龔同志，我看你也不要管了！我和瞿秋白同志就要離開這裡，你和譚同志共同工作的時間長着呢，何必因此而引起不愉快呢！」我聽到他們的答覆後，只好帶着失望的心情告別而去。

就是這天下午三時，項英通知林野，派他到紅軍學校去當敎育長，幷請他夫婦吃了晚飯再到差，林野夫婦聽了非常高興，雙雙赴約。五時正，特務員開上飯來，幷爲林野夫婦加了一碟炒蛋。添了兩雙杯筷。這時，我雖然知道林野夫婦吃的是最後一次晚餐，再也沒法救他倆了。眼看着這一對活活潑潑的靑年夫婦，飯後便要身首異處，而他們自己還一點都不知道呢！我的心像有千萬把鋒利的刀子刺着，每顆飯粒都變成石子一樣，無法下咽。我忽然間一想，旣然救不了林野，也應該救救他的這個不幸而無辜妻子。我便對林野夫婦說：「林野同

志！今晚去紅軍學校有十五里路，天快黑了，此間有的是空房，讓你太太在這裡住一晚，明天再派人送她去吧！」坐在一旁的項英和陳毅也領會了我的意思，附和着說道：「龔楚同志的意見很好，林嫂子明天去好了！」可是他倆却婉謝了我的好意，他倆那裡會知道我這一句話的眞正用意呢？結果，林野夫婦便在赴紅軍學校的中途，被護送的特務員殺掉了。

事後，那兩位殺林野夫婦的特務員中，有一位對我說：「走了十里路光景的山邊，那時林野先行，他妻子跟着他，我們見時間已入夜了，祇好動手。當黃同志（另外一個特務員）拿着大刀搶前去舉刀殺林野時，被他妻子發覺，『哎呀』一聲，雙手拖着黃同志的手，死力的糾纏着不放。林野發覺了，立卽逃跑，我舉刀追上去，向着林野的頭上用力砍下，他的身子一偏，斬着他的左肩。他立卽回過頭來和我拚命。但他的左臂不能動，我跟着又是一刀，他的右手又受創；等他再想逃走時，我追上去再一刀，劈開了他半邊腦袋，他就倒下去了。這時他的妻子也給黃同志殺掉。」他說完後，還笑着說：「這次若不是我們兩個人，或許要被他跑掉呢」！我聽了心裡有無限的悲憤。有一次我對譚震林說：「以後遇到這樣的事，頂

好痛痛快快的將他殺掉，不必要再演這一齣滑稽的悲劇了！」譚震林帶着諷刺的口吻笑道：

「參謀長還有一點溫情主義的意識呢！哈哈！」

同樣的情形，還有一位紅軍大學上級訓練隊的李隊長，也是在特務員護送途中殺了的。這些事實，紅軍幹部中，很早就互相傳告，不但中下級幹部終日憂惶，不知死所，即高級幹部也感到人人自危。在這種高度恐怖的氣氛中，怎能叫人生活得下去？這時，我便暗萌「從速離去」的念頭。但是，逃亡到那裡去呢？週圍左右都是重重叠叠的特務密探網，爲我舖床叠被，招呼得無微不至的特務員，就有一排以上是國家政治保衞分局譚震林直接指揮的「通天特務」，任何行動都是逃不過他們的眼睛的。假如一不小心，就要踏上李明瑞的覆轍了。我祇有萬分的忍耐着！

## 五　從死神魔掌中救出同志

一天，我在批閱各方送來的文件中，知道紅七軍有十多個同志被撤職。有四個已送到田

心墟招待所。由中央軍區司令部所在地的西江市到田心墟，相距幷不很遠，我決定要去救他們。

我批閱了公文後，走出辦公室，吩咐特務員快去備馬。項英含笑問我：「到那裡去？」我故意伸了一個懶腰：「帶久了兵是不習慣坐辦公桌的。好久沒有到外面跑了，想到外面跑一跑馬，輕鬆輕鬆身體。」

項英忙道：「對的對的，你應該到外面去跑一跑，舒暢舒暢精神。」他和我素來很好，他時時關懷着我的健康，現在一起工作，自然更爲親密了。

離開司令部，我特地在馬上用力加了一鞭，飛也似的向田心墟跑去，步行跟隨我的四個特務員跑得上氣不接下氣。到了田心墟，我在這個小市集的街上繞了一個圈子，然後走進一間茶舘，選定靠裡面的一張枱子，坐下來喝茶。我看到四個特務員不住的揩着汗，便以很體恤的口吻，要他們坐在門口的桌上去喝茶。因爲門口比較淸爽，可以涼一涼，這一來，便將他們遣開在十步以外了。

那個小墟埸尙有五百多個待處决的「囚犯」，但他們還睡在夢裡，不知道末日就快要臨頭。紅七軍被撤職的一個營長，見我騎着馬來了，立即找着另一個營長同來見我。他們看到我就像見到了久別的家人一樣，不住的流着眼淚，問我能不能給他們一個工作？我見到這些曾經同生死共患難的老同志，內心痛苦極了。明知他們的生命在十天內要完結，但又苦於無法洩露這個最重要的機密；我經過了兩分鐘的考慮，望望門口的四個特務員，正在不住的喝茶，并沒注意我們談話，我立即簡捷而含蓄的輕聲地說：「你們不要再胡思亂想了，你們祇有拼命的逃走，再沒有第二條路了，注意！决不要向其他無關係的人說出來，快些走！」他們領悟了我的意思，祇說了一聲：「謝謝軍長」，就走開了。

我付過了茶錢，乘着馬，緩緩地似遊山玩水樣的回到司令部。第二天晚上接到田心墟招待所報告：「逃了四個第七軍的同志」。經過八天的繼續追查，知道他們已沿着山地向安遠逃走。他們沒有在中途被攔截，而我唆使他們逃亡的秘密，幸而也不致敗露，壓在心頭上的一塊大石，這時才算放了下來。一方面我慶幸自己，同時也爲這四個紅七軍的老同志感到慶

幸。因爲他們已逃出了死神的魔掌，走上了新生之路。

附註

註一：蕭勁光——湖南人。黃埔軍校畢業，留俄多年，現任中共海軍司令員。

# 第十七章　出亡前後

## 一　獨當一面

紅軍主力西竄時，圍攻中央蘇區的國軍，抽調最大部份向紅軍主力追擊，其餘經過約一個月時間的調整後，重又向蘇區繼續進攻。石城，興國兩縣相繼失陷，眼看這最後的根據地也無法自保，到處風聲鶴唳，充滿着日暮途窮的失敗現象。

中央蘇區的高級幹部召開了緊急會議，決定將蘇區紅軍及江西獨立師，獨立團集中整編為五個師，一個野戰砲兵團，一個幹部教導團，總兵力約四萬二千人，準備放棄中央蘇區根據地，繼續突圍西進；幷將這個決議的計劃，急電中共中央請示！中共中央迅速回覆了一個電報，內容如下：

一•鑒于野戰軍突圍受挫經驗，中央軍區應立卽放棄突圍計劃，而將部隊分散游擊。

二•閩浙贛區（中央蘇區在內），成立本黨中央分局，該區黨政軍由項英負責。

三•以龔楚率步兵一個團，配足電訊器材，突圍轉移至湘粵桂地區，收集野戰軍遺留部隊，建立新根據地。幷在該區設立本黨中央分局，蘇維埃政府，及紅軍總指揮部，該區之黨政軍事宜，卽由龔楚負責。

同志們見到黨中央對我如此的信任，給予我以獨當一面的黨政軍大權，以爲是莫大的榮幸。而我自己呢！我對這些高級的名位，幷不感到榮耀；反而感到責任更加重大，隨時隨地都可能遭遇挫折。毛澤東以中央蘇維埃政府主席之尊，也屢次受到開除，警告及留黨察看的處分，那便是最好的榜樣。因爲我們的命運，並沒有掌握在自己的手裡，而是掌握在那高高在上的蘇俄顧問及政治保衞局的特務員手裏。我們爲什麼一定要受那些魔鬼支配呢？

項英看了這一個電報後，表現着很徬徨。他對我說：「我們指揮着五個師的大軍，你走了我怎樣辦呢？」我對他說：「陳毅同志雖然不是軍人出身，但他有豐富的軍事經驗，可將

三十七師楊師長調來司令部工作，就足以領導了。況且以後作戰以游擊戰爲主，盡可能避免陣地戰，軍事問題或許比較簡單了。」他表示中央既有指示，祇得遵辦。並很客氣的讓我挑選紅軍中裝備優良的部隊，那便是由模範團擴編的紅廿四師的兩個步兵團（等於兩個營），和兩座無線電台的人員，配足通訊器材，帶了一萬元上海實業銀行紙幣作經費，離開了中央軍區司令部的所在地——會昌縣屬之西江市，向湘粵桂邊區進發。

過去我在粵贛、贛南兩軍區司令員任內時，國家政治保衛局派在身旁的特務員足有一排之多。這次，由于黨中央對我特別信任，派在我身邊的保衛局特務員減少了三分之二，祇有一個班的人數。因我是這一個單位中共黨的負責人，這些特務要受我指揮，他們自然無微不至的招呼着我，任勞任怨的做着各種瑣碎的工作。但同時他們仍然無時無刻不在監視着我，就是上厠所時，也有兩個特務員藉警衛名義守候在門外，這種生活，不過比囚犯差勝一籌而已，一個有自由意志的人，豈能長此的生活下去？可是，我依舊忍耐着！等待着！希望有一個最好的時機來臨！

## 二　湘粵桂邊區的新根據地

我這一支一千二百人的隊伍，避開了國軍的主力封鎖線；沿着鄠都，會昌邊境大山，經馬嶺，牛嶺至信豐之鐵石墟；再經猷山，轉出梅關，南雄間，進入北山；沿途經過了三次戰鬥，突破了小股敵軍和地方團隊的阻截，於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到達湖南郴縣之黃茅。

在黃茅休息三天，建立了當地的秘密組織。然後，緩緩地繼續前進，經桂陽、臨武、藍山、江華、轉入廣東連縣邊區。我每到一個地區，便積極進行收容和連絡的工作；并將當地黨的組織，赤衛隊組織，蘇維埃政府組織完全恢復或建立起來。兩個月的時間，建立了由郴縣以西的黃茅至臨武縣以北，轉入藍山，江華，連縣邊區，長達四百多里，橫跨五縣廣大山區的湘粵桂區根據地。

我來到湘粵桂邊區的消息，迅速的傳遍了邊區各縣。湘南各縣中共黨的地下負責人多親來連絡，或派人請示工作任務。活動於桂陽、常寧、新田間的湘南游擊隊二百餘人，也派員

前來連絡。紅軍主力西竄時，遺留於湘桂邊區永明、灌陽邊境的紅七軍兩個團，也與我派往該方面的游擊部隊取得了連繫。那時國軍主力正向紅軍主力追擊，又派了有五個師的兵力進勦中央蘇區。在湘粵區作戰的祇有湘南保安團，戰鬥力不强。我們曾兩次擊退了湘南保安團的攻擊，一時聲威大振，中共在湘粵桂邊區的武裝力量，又迅速的發展起來了。

我們依靠着這毗連三省，險要複雜的廣大山岳地帶，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形勢相當的穩定。惟糧食缺乏，須派隊向外游擊方能解決。

## 三 有計劃的逃亡

中共湘粵桂邊區黨政軍最高指揮機構，以郴縣之天陽山，臨武之源頭，連縣之天光山爲基地。由於國軍一時無力也無法向這毗連三省的山區進勦，我雖然是過着富於流動性的游擊生活；但環境安定，工作清閒。荒嶺的夜月，山野的淸晨，頗使我得到最好的思辨的時間和空間。

人民對紅軍進入這一地區，幷不像四五年前那樣熱烈的歡迎。紅軍野戰軍突圍西竄時也曾經過這一地區，人民受到的損失，非常重大；因此他們對紅軍的厭惡，自不待言。雖然他們並不敢形諸於詞色，可是，無言的反抗和憤怒，更令人痛苦和惶恐。而我也早已洞若觀火的看到這廣大人民的一般心情了。

紅軍中的指戰員們，誰沒有看到過中央蘇區撤退以前的大屠殺？那種殘民以逞的暴虐行爲，那種滅絕人性的對付同志的手段，豈是有良心的人所能忍受？在政治保衛局嚴密的控制下，人民的行動和言論早就失掉了自由，參加革命鬥爭的人；連自己的生命也掌握在別人的手裏，這樣的革命，不是自欺欺人嗎？然而在這種情勢逼迫之下，有些人只好渾渾噩噩，得過且過，將自己的一切完全交給命運，成了一個失去靈魂的軀壳。有些人便憂鬱恐懼，終日在愁城中過日子，讓無情的現實，殘酷地嚙嚙着他們的心靈。他們不想脫離黑暗，尋找光明嗎？可憐的是：他們全受着特務員們的監視，恐怕光明還沒有找到，生命便可能先被摧殘。

紅軍中的高級幹部，祇要稍存半點民族意識，對於高高在上的蘇聯顧問，和遙遙控制的

第三國際，無不心懷憤恨的。而以改造社會拯救同胞為革命出發點的我，對於中共這多年來的殘酷手段，更是深惡痛絕。尤其是與我從事革命鬥爭的老同志，他們假如是為了革命而戰死沙塲，則死何足惜，可是他們的生命竟無辜地斷送在自己同志的手中，想到這裏，眞令人不寒而慄！雖然我現在負荷着三省黨政軍的重寄，但在良心上實不容許長此這樣盲目下去！

每夜，我都做着可怕的夢，我彷彿看到了千千萬萬個鮮血淋淋的蘇區人民，在痛哭！在呼號！在呻吟！在掙扎！在憤怒！在反抗！我懷疑這幷不是夢呀！我在親身經歷那些慘絕人寰的景象，一幕一幕都呈現在我眼前，中共在武裝鬥爭短短的八年中間，已經使中國人民遭受了千萬人的死亡，今後若再盲目地錯誤下去，又不知要慘死了多少人？由於這種心理的發展，我的耳畔似乎常常聽到這種聲音：「饒了我們吧！中國再不需要流血的革命呀！」這種聲音，正是廣大的中國人民的呼聲啊！

因此，我決定脫離紅軍！我決定立刻逃亡！

然而，身為一個指揮湘粤桂三省黨政軍的首長，在一班特務員時時刻刻的監視當中，在

黨的組織與各級黨的工作人員環伺包圍之下，脫離和逃亡，决不是輕易的事。所以，我時時都在警惕自己：「不要做李明瑞第二！」經過了五天周詳審慮，我才佈置好了一個嚴密而決心的逃亡計劃。

我將身邊的特務員，陸續的派出了六個到各部隊作連指導員，及排長，名義上是使他們實際掌握部隊，防止指戰員逃亡：而實際是遣開他們，逃避他們的監視。

然後，我又故意擬好幾個幷不重要的指示，分派給身邊黨的重要助手，要他們到各地方黨部和游擊隊的基地去連絡。這樣，僅剩下四個特務員留在我身邊。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我藉着出席指導宜章中共縣委會議之便，帶着一連部隊，由臨武基地赴郴縣的黃茅，這一連紅軍的警衛部隊，幷不同國家政治保衛局派來的特務員一樣，要時刻守衛在我身邊的，他們祗是在外圍保護我的安全，根本不會監視我的行動。

到達黃茅的那天晚上，我託詞身體不舒適，要早些休息，吃過飯便上床睡覺。特務員們也因白天的步行過於疲勞，紛紛睡覺去了。我便趁這時爬起床來，悄然的離開了黃茅這個小

山村，向南方的廣東故鄉逃去！

我臨走以前，寫了封信留放在床前的枱上，給我的政治部主任何君。他已被派赴桂陽和中共縣委連絡，我在那封信上大意說：「何同志：你回來時候，我已到廣東去了。以我一個負了方面重任的同志，脫離你們而逃，你們該會覺得驚奇，更將會責罵我由動搖而走向不革命反革命道路的。誠然！站在中國共產黨的立場來責罵我，這是我錯的。但我要告訴你們，中國共產黨已不是一個爲廣大人民謀福利的眞正的革命黨了，它已經變成了一個在蘇聯役使下的賣國黨，它走向了毀滅國家，毀滅人民，以及毀滅世界人類文化的道路。近三年來，中央蘇區的措施，你們是知道的；人民得到了革命的利益嗎？紅軍主力西竄時對黨內幹部的大屠殺，你們難道不寒心嗎？這些事實一向是我所堅强反對的；往年對黨的政策曾經勇敢的提出建議與糾正，希望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能夠走上正確的道路，可是，所得的結果，是個人被處分，而黨的政策依然沒有轉變過來。今後呢？我還能盲從他們去幹着殺人放火的勾當嗎？我如何對得起國家和人民？更如何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呢？我的出走，就是這麼簡單的理由。

此後請你領導這一支同過患難的隊伍；幷希望你將我這封信召集全體黨員大會來檢討一下，倘若是你們對于我的出走還表示同情的話，你們可派人到樂昌長垺村我的家裡來找我，我當盡我的力量來帮助全體同志走出這一個罪惡的深淵。倘若你們認爲我的出走是錯誤的話，那麼，人各有志，請從此別……」

山高夜黑，祇天空幾點星光，閃爍搖動，點綴這林菁茂密的山徑，我一步緊一步的向前趕着！到晨光曦微時，已經離開黃茅數十里了，回望那雲山重叠的湘粤桂邊境，不禁使我有無可名狀的傷感！別了！這濺滿了同志們和同胞們的碧血的豐草長林！別了！這埋葬了我的心的碎片的古嶺深山！

回憶我過去，由童年以至弱冠，受中山先生偉大的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所感召，乃投筆從戎，準備以熱血和頭顱來爭取革命的成功；可是，由于種種現實的激刺，加以友朋意氣的

契合，轉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但這轉變，也完全是很自然的，因爲當時的熱血青年，和我同樣情形的，不知凡幾。但我在參加中共十一年的鬥爭生活體驗中，認淸了中國共產黨幷不是根據中國人民的願望，謀求中國人民的福利，而從事革命的；他完全是本着一個不合乎國情的理想，而受命于蘇俄帝國主義者，不惜毀滅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犧牲中華民族的獨立生存，以從事反人性反人道的苛政暴行，而驅使四億五千萬同胞，以供克里姆林宮主人的奴役；這對于一個激于正義，本乎熱情，以期獻身于革命的我本身，當然是一種絕大的打擊。因此，我寧願抛棄十一年的鬥爭歷史，毅然的逃出了這個罪惡的淵藪，以自求新生。這可以說完全是出于良心的抉擇；雖然中共的首腦們對于我的懷疑和排擠，也是促使我及早出走的原因之一。然而由于我在良心的主張上，終不能盲從他們；所以縱使他們以後還給予我以高級的名位，我還是毫無留戀的而離開他們了！這十一年中的生活，眞像是一塲噩夢！

現在，中共雖然佔據了大陸，但我相信，這種違反人民的意志的政權，遲早必將與蘇聯帝國主義者同遭消滅。我願將這本書貢獻給一切愛好自由的人們，期能從我的經歷中，和我

一樣的了解共產黨，而不再爲共產黨的宣傳所欺朦；從而團結一致，以推翻此人類社會的公敵而建立和平幸福的世界。